译丛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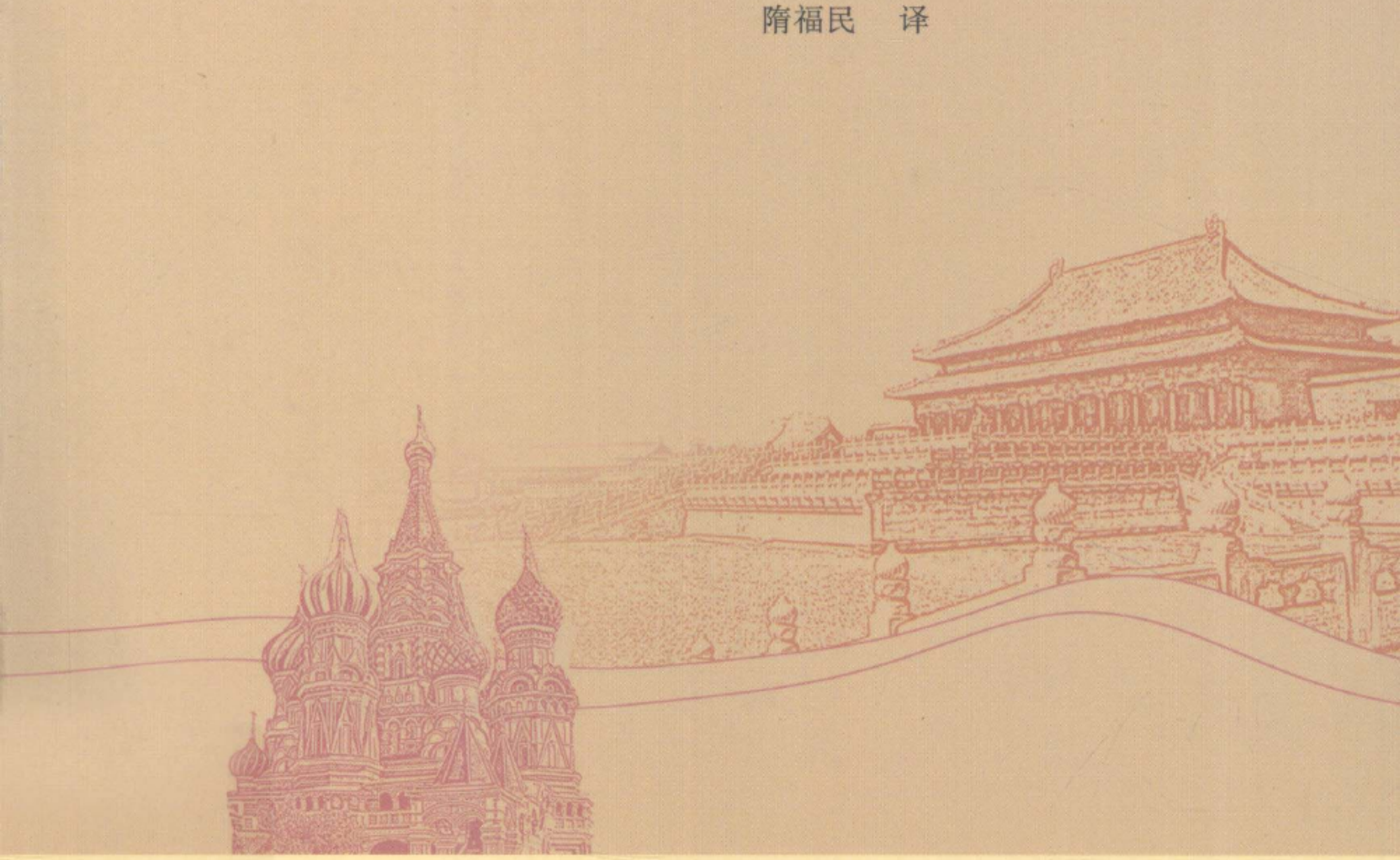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

## 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

[英] 彼得·罗澜 著

隋福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罗澜教授通过对比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进程及其结果，详细地说明了俄罗斯改革失败和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尽管俄罗斯和中国的改革起点不同，比如相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且人均GDP较高，但两国改革结果的差异应主要归因于政策选择的不同。俄罗斯选择了“大爆炸”式方法，即“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代表了一种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政治体制的改变。罗澜教授认为俄罗斯政策选择上的错误应归咎于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家，他们建议莫斯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作为给予国际援助的条件的理论基础。中国与之不同，政策选择上没有听从国际组织和新古典经济理论家的建议，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自主抉择，因此获得了成功。

上架建议：经济史、社会转型

ISBN 978-7-308-09853-3

9 787308 098533 >

定价：58.00元

启真馆

网址：www.qzgpress.cn

社会经济史译丛

[英] 彼得·罗澜　著

China's Rise, Russia's Fall

*Politics, Economics and Planning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linism*

#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

## 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

隋福民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英）罗澜著；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4

ISBN 978-7-308-09853-3

Ⅰ.①中… Ⅱ.①罗…②隋… Ⅲ.①经济改革-对比研究-中国、俄罗斯 Ⅳ.①F121②F1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6007 号

**中国的崛起与俄罗斯的衰落：市场化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计划**

[英] 彼得·罗澜 著 隋福民 译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19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853-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社会经济史译丛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席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讲席教授

学术委员会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包弼德（Peter Bol）　哈佛大学讲席教授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　莱顿大学讲席教授
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陈春声　中山大学教授
陈争平　清华大学教授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何　明　云南大学教授
刘　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刘兰兮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马德斌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韦　森　复旦大学教授
吴松弟　复旦大学教授
萧国亮　北京大学教授
张国刚　清华大学教授
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　剑桥大学教授

主　编
龙登高　清华大学教授



启真馆 出品

纪念 Siobain

# 总　　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相互之间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

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显得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 谢　　辞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同事 Geoff Harcourt，他通读并评论了全部书稿。他一直是很多同事和同学的灵感。

我还要感谢以下之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为本书贡献了思想：Paul Aiello，Amiya Bagchi，Bob Ash，John Barber，Chris Bramall，Trevor Buck，Vladimir Busygin，Terry Byres，Ha-Joon Chang，Dong Fureng，John Dunn，John Eatwell，Michael Ellman，R. Fenton-May，Igor Filatochev，Laurence Harris，Alan Hughes，Jiang Xiaoming，Grigorii Khanin，Mushtaq Khan，Michael Landesmann，Cyril Lin，Liu Xiaofeng，Geoff Meeks，John Sender，Albert Schweinberger，Ajit Singh，Dmitri Slavnov，Michael Twohey，Wang Xiaoqiang，Gordon White，Peter Wiles，Robert Wilkinson，Keith Wrightson，以及朱玲。谢谢他们，本书表达的观点绝不牵扯他们的责任。

我要感谢那些参与我所给定的各种各样的论题的学术讨论会的人，这些论题都是本书所关心的内容。讨论会分布在下列地方：阿伯丁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大学、香港非洲专家和东方学者的会议、康斯坦茨大学、威尼斯大学、剑桥大学、女皇学院的政治与经济学系的讨论会、剑桥大学社会政治学系“变革”讨论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彼得·罗澜

# 目　　录


1　导论　/　1

1.1　研究重点　/　1

1.2　研究意义　/　2

1.3　本书的主题　/　3

1.4　本书的架构　/　6

2　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时期的经济表现　/　10

2.1　简介　/　10

2.2　中国　/　10

2.3　俄罗斯　/　17

2.4　结论　/　23

3　中国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　25

3.1　导言　/　25

3.2　政治　/　26

3.3　经济　/　35

3.4　结论　/　53

4　正统转轨理论及其问题　/　55

4.1　从社会主义体制转轨的理论的缺失　/　55

4.2　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　57

4.3　政治　/　62

4.4 经济 / 77
4.5 结论 / 110
5 “赶超”能力之比较 / 113
5.1 导论 / 113
5.2 经济因素 / 114
5.3 非经济因素 / 159
5.4 结论 / 164
6 中国的改革 / 166
6.1 政治与改革 / 166
6.2 经济改革 / 174
7 俄罗斯的改革 / 245
7.1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经济问题的恶化 / 245
7.2 俄罗斯联邦的改革 / 274
8 结语 / 320
8.1 总结 / 320
8.2 对于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的含意 / 329
参考文献 / 339
索引 / 355
译后记 / 367

# 1 导　论

## 1.1　研究重点

两个共产主义巨人改革进程的结果的差异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无可争议地成为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最重要事件。这种差异将在21世纪影响深远。在本书中，我尝试解释产生这种显著差异的原因。

对于苏联解体以来的这段时间，本书只关注俄罗斯自身的发展，因为如果对每一个原属苏联的、新近独立的国家的各种各样经历都进行分析的话，就过于复杂了。尽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选举为苏共总书记时一些人抱有体制改革的希望，但戈尔巴乔夫掌权的第一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苏联体制改革的开始应当追溯到1986年的夏天，其时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清晰地阐明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开放”（glasnost）政策。中国的体制改革通常认为始于1978年12月。实际上，从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逮捕的1976年秋天，改革便开始了。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时间历程至少两倍于俄罗斯。

## 1.2 研究意义

### 所研究事件的规模之大

20 世纪的历史被社会主义的兴起深深影响，而且目前依然受到其转轨进程的巨大影响。本书中所要分析的两个国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巨人。苏联是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意识形态特点和制度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苏联占世界总人口的 1/4，而且，约占生活在共产主义体制下的世界总人口的 9/10。[①]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兴起与衰落的历史便是这两个国家的历史。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对分属于自己区域的共产主义国家施加了独特的强大影响。这一事实不仅体现在相对稳定的共产党统治时期，也适用于共产主义相对衰落时期。论述共产主义体制变革的东亚道路和欧洲道路并非想人非非，因为前者是渐进性的，而后者则是激进性的。[见张（Chang）和罗澜（Nolan），1995]

这是第一本比较研究两个国家改革进程和结果的书。本书的主旨是关乎最近的事情，而且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只有少量文献。当然，这些文献很可能在未来的时间里快速增加。

### 对中俄人民的意义

改革结果的对比对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来说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在过去的 15 年，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以很高的速度向不同方向变化。如果有谁在 15 年前预测到后来所发生的局面，他肯定会被斥为不可救药、异想天开。[②] 实际上，对两国人民的生活的最重

---

① 精确的数字依赖于如何定义共产主义国家。

② 最接近这种论述的一种看法来自于阿马尔里克（Amalrik，1980）。他指出，与中国的争斗作为一种催化剂可能会导致苏联的崩溃。然而，他也没有预期到中国的崛起。

要的方面——从人身安全、工作保障和国家自豪感，到个人收入、财富分配和经济力量——进行比较都发现了极为尖锐的差异。

### *对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性*

对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重要的后果还将要发生。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它将成功地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和更高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将成为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如果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继续显著地低于中国，那么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可能会明显地大于美国在20世纪中叶所扮演的角色。预言这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秩序是不容易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影响势必很大。同时，苏联的衰落留下了一个从欧洲到远东的不稳定的巨大真空。

### *对研究经济学的意义*



戏剧性和几乎完全不可预期的结果差异，已经对经济学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很可能在未来有更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的上升与人们对经济“科学”有能力理解和预测经济事件的自信心的膨胀。戏剧性的结果差异已经对这些比较极端的看法投下了阴影。在未来的一些年份里，人们可能会更关注这些差异对于经济理论和政策的重要性。他们至少可以在深化经济绩效的制度研究上施以强大影响。它可能会让经济学家更多地意识到经济原理的局限。而且我希望，让那些卷入到政策制定者行列中的经济学家少一些自信，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对他们所建议的国家实施一种“革命性”转变的政策曾报有信心。

## 1.3　本书的主题

### *决定改革结果的方针政策的重要性*

对于那些或多或少比较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历程的人来说，两

个国家的“改革者”所接受的不同体制有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人们对此是有争议的。改革结果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的相对水平、收入水平或城市化的相对水平、国有工业或少数民族的重要程度等一些因素吗？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这本书将详细讨论这些观点。当然，除了让每一个国家沿着不同的路径加速增长的区别之外，这两个国家也有很强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国家中，如果选择正确的政策，都存在经济快速进步的可能。改革进程必然要经历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骤降过程，这种看法在这两个国家的实践中得不到支持。相反，我认为造成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选择的不同。

### 4 *在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的计划的重要性*

大多数分析者都认为，共产主义的转轨本质上就是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书认为，如此认识这一过程是不正确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并不是“计划的”经济体。相反，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命令的”经济体。实际上，它们至少与资本主义的纯粹形式一样，是无政府主义的。一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巨大转变，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就几乎完全不能向其目标——被政策制定者所普遍认为是合意的那些目标——进行迈进，比如技术快速进步，不过分重视重工业（去除只注重钢铁的有色眼罩），改善产品质量，生活水平快速进步，以及在经济增长中对环境施以更少的破坏。本书认为，从命令经济体向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的转轨的过程中，一般而言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市场自身不能产生出合意的经济增长结果。在扶贫或者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上，它们也不能产生出普遍合意的结果。因此，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即在“计划的”经济体的转轨中，成功的核心条件反而是政府有效计划的能力。事实上，一旦人们认识到，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完全不是计划经济时，这一悖论就不再是悖论了。在转轨中取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需要建基于学习如何计划，而不是发布指令。

### 在经济转轨中的政治的重要性

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外，对转轨中的政治角色的分析深深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在共产主义政治体制下所遭受的压制的影响。大批的知识分子发现，很难想像有支持推翻共产主义体制的政策的合意替代。该观点在争论中——争论的内容是支持推翻共产主义经济体的所谓的优点——不断地被强化。本书认为，支持推翻的观点是错误的和不负责任的。他们低估了在漫长且艰难的转轨时期内，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组织，从而实现社会所需要的目标的重要性。他们低估了在共产党解体之后创造一个有效的政府体制的困难。他们低估了共产党接受市场经济转轨方向和允许共产党制度特征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逐渐转变，以及为实现民主政治制度最终转轨而奠定基础的可能性。在分析体制转变的大问题时，合适的政策应该是综合考虑政治经济，而不仅仅是分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科学”。因为，在体制转变中，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参数都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因素之间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结构中的互动。对于正确的政策设计来说，这非常关键。

### 选择比较改革政策的原因

改革政策不可能从一个“菜单”中进行选择，在“菜单”选择中，一部分领导人相对于另外一些领导人可能会选择得更加聪明。然而，在简单明显的“政策选择”之下，有着复杂的诸多因素。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不同的。苏联处于国际军备竞赛的前沿，而且承受着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中国与之不同。然而，中国受到来自周边的亚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政治经济的道路的强烈影响，特别是那些在人口和领导能力具有很强的中国元素的国家。

每个共产主义巨人内部的事件都与另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相关。正统的转轨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出现，就受到了这样一种认识的强烈影响，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失败的。该正统理论偏好于在政

治和经济两方面同时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例如，1990 年的激进的俄罗斯计划就特别提及了这一显然的判断。中国领导人对大规模政治改革的后果的担心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苏联的政治解体进程的加速以及 1989 年东欧共产主义的坍塌而变得非常强烈。逐渐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苏联的解体提供了一种自信来源，即他们相信，他们的渐进改革道路是明显正确的，他们在避免快速体制变革的替代选择上也是正确的。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也有助于形成不同的政策选择。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长期与无秩序同行，这让中国的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过分轻率的体制改革可能会导致混乱后果。20 世纪 80 年代的苏联领导人所能回顾的是长期的政治稳定，这种稳定甚至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况且，在一个经历了数百年民族统一的国家里，民族国家的解体的可能性似乎是遥远而陌生的。



## 1.4 本书的架构

本研究的首要工作是简要说明（在第 2 章中）对改革政策下的结果进行对比的主要领域。这显示了改革路径的最值得注意的分歧。两个国家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指标都向相反方向变化。本书的其余部分致力于尝试解释这种对比。

一种关于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观点认为，该经济体的体制问题被明显地夸大了。人们认为，变革的最后一着是来自相反体制的代表们的对意识形态积极批评的结果。第 3 章详细检验了这些关于中国和苏联的论调。通过检验发现，这些论调有非常大的弊端。这些论调认为仅仅通过对各自体系的胡乱修补来改善绩效是不够的。不论对这些体系经济绩效进行批评的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动机是什么，这些批评包含了真理的核心。为了改善经济绩效和人民的福利，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变革是必须的。

随着共产主义经济体开始认真地研究改善体系表现的方法，一种

关于所需要实施的合意路径的共识达成了。这种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体制开始进入改革阶段，以及多数评论者都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收益已经枯竭而变得愈发一致。关于改革前共产主义体系的合意路径的共识的最鼎盛时期大体是在1988年至1991年。在这几年里，苏联的共产主义体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在1989年，中国似乎也陷入了深深的政治经济危机。只有很少的评论者认为共产主义体制可以在中国幸存下来。当然，仍有极少的人认为中国可以繁荣昌盛。在1989年，东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一种普遍共识在国内外对共产主义体制持批评态度的人中间形成，这种共识认为只有对经济和政治同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才能使得经济体产生合意的结果，即完成共产主义的转轨。第4章描述了这种共识，即正统的转轨理论，同时对其进行了评判。我们发现，共识的逻辑和判断都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这本书是系统比较中国和苏联改革进程的初步尝试。[①] 在那些为苏联改革进程提供建议的外国顾问们中还没有人对中俄改革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对比较研究进行了评论。[②] 他们一致认为，原因不在于政策上的不同，而是两个国家开启改革进程时的起始点不同。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持这种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原因是在政策选择方面，而不是体系的不同。如果承认原因在于政策，那么责任就要落在提供不良建议的人的肩膀上。第5章分析了两个国家在改革进程的起点处，其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可以确定的是，两个国家在体制上确实有诸多不同。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上，这些不同对中国是不利的。而且，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两个国家在体制上有极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让两个国家通过更好地建构改革方案，使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换句话

① 就我的知识所及，该书是关于该主题的第一本。无可置疑，将来会有很多著作面世。

② 我所查找到的最重要的研究是萨克斯（Sachs）和胡永泰（Woo）所写的一篇文章(1994)。

说，改革起点的比较研究显示，政策选择而不是系统体制不同是导致不同改革进程结果的主要原因。比较研究还显示，苏联的体制改革并不必然伴随着经济的大幅度滑坡，而且，从中国的命令经济体制中获得快速发展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6章审视了中国的改革进程。这章首先描述了中国领导人抵制西方正统的转轨理论的道路，西方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实现快速的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所必需的，而且其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相反，中国领导人将注意力集中在尝试改善庞大的集权的政治官僚机器上，并且对维持政治稳定给予了高度重视以避免大乱（政治动乱）。然后，描述了发生在经济中的每一个领域内的改革的谨慎的试验性路径。这一进程结束时，公共产权仍然在每一个部门的产权结构中保持着核心角色。经济维持着高度的保护，以避免国际竞争者的强大竞争力。政府在改革——即彻底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即从经济命令方式转向与市场力量一起协同工作的经济计划方式——进程中保持着中心地位。在每一个主要领域，中国都实施了一种与正统的转轨理论截然不同的改革战略。依据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如何对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正统理论的智慧，中国实施的主要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是，它在改革时期是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这一事实显示，隐藏在正统的转轨理论下的方法论存有严重的问题。

第7章分析了苏联的改革进程。通过研究发现，苏联经济解体的关键是戈尔巴乔夫所实施的灾难性决定和他的紧密伙伴在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所鼓吹的开放（glasnost）与改革（perestroika）政策。这些政策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迅速瓦解，与此同时，却没有一个有效的可替代政府来代替之。而且，他们还导致了苏联民族国家的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府仅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尝试执行谨慎的试验性的和演化的经济改革计划。从其基本原理视之，这些改革计划与中国无异。然而，它的潜在效果却被淹没在政治改革的恶劣后果之中。而且，随着政治和文化的自由化思想逐步登上大雅之堂，受到快速扩展的西方思

想的强烈影响的权力核心，逐渐地开始支持更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即“休克疗法”。

戈尔巴乔夫遗赠给叶利钦后继政府的是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在既定的政治架构下，控制通货膨胀率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在大部分的改革时期内，以扭转极高的通货膨胀率下的非常不利局面为目标的其他政策被实施。法律与秩序瘫痪了。政府的经济哲学强烈地受到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影响。布雷顿森林结构的核心条款就是：大规模地放弃对通货膨胀率的控制，在 1992 年实施彻底价格改革，大规模地让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自由化，以及最重要的——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这种经济规划的逻辑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如此不利的政治条件下，比如 1991 年之后的俄罗斯的情况，尝试将这种逻辑上有问题的政策付诸实施引起了一场灾难。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较差的经济绩效变成了叶利钦时期的完全灾难。而且，改革时期还见证了资产产权的重大重构。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被压缩在两年时间内完成，在此条件下，极端的结果不平等产生了。这些结果将是既定的参数，在这些参数下俄罗斯人的经济生活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都要受到影响。

第 8 章对本书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总结表明，这种不同寻常的比较对于经济理论和政策来说还有许多含义。首先，通过对“转轨”经验的回顾，可以认为稳健是适宜的选择。西方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是非常失败的。它为知识分子的建议铺垫了基础，此建议由布雷顿森林机构给出，而且它还通过无数的联系——俄罗斯人与西方知识界之间所发展出来的联系——在俄罗斯的转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统的转轨理论很快并且信心十足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该理论对这种认识——即“转轨”应该被视为转轨国家内部的事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该理论瑕疵巨大。源自于这种正统的转轨理论的建议对苏联灾难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而不跟随这种理论的决策，却让中国在他们的转轨方案中实现了巨大的成功。

# [10] 2　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时期的经济表现

## 2.1　简介

毛泽东的逝世和1976年秋“四人帮”的被逮捕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转变的新时代。尽管重要的改变已经出现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两年内，但许多观察家仍将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改革的标志。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被选举为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提升了人们的热望，即体制改革即将开始。然而，直到1986年的夏天，改革（perestroika）政策的特征才被人们认识到。随后的改革历程——中国在时间上已经大大先于苏联——产生了显著不同的后果。

## 2.2　中国

### *产出增长*

改革政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关期间表现良好。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中国是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的三个经济体之

一。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从1980年到1991年，达到年均12%的增长率（表2.1）：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值从1978年的100亿上升到1993

**表2.1　中国经济的绩效比较（1980—1991）**

| | 中国 | 印度 | 低收入国家* | 中等收入国家 |
|---|---|---|---|---|
| 年均增长率（1980—1991，%） | | | | |
| 国内生产总值 | 9.4 | 5.4 | 3.7 | 2.3 |
| 农业 | 5.7 | 3.2 | 2.5 | n. a. |
| 工业 | 11.0 | 6.3 | 4.0 | n. a. |
| 服务业 | 11.2 | 6.7 | 4.8 | n. a. |
| 出口年均增长率（1980—1989，%） | 11.5 | 7.4 | 3.3 | 3.4 |
| 人口年均增长率（1980—1989，%） | 1.5 | 2.1 | 2.6 | 1.8 |
| 年均实际通货膨胀率（1980—1989，%） | 5.8 | 8.2 | 23.4 | 67.1 |
| 债息占商品和服务出口的百分比（%） | | | | |
| 1980 | 4.4 | 9.3 | 11.6 | 23.9 |
| 1991 | 12.1 | 30.7 | 25.0 | 20.3 |
| 单位资本的食品生产（年均增长率，1979—1991，%） | 3.0 | 1.6 | — | — |
| 每日卡路里摄入量（人均，卡） | | | | |
| 1965 | 1 931 | 2 103 | 1 960 | 2 482 |
| 1988 | 2 632 | 2 104 | 2 182 | 2 834 |
| 毛死亡率（每千人数量） | | | | |
| 1970 | 8 | 18 | 19 | 11 |
| 1991 | 7 | 10 | 13 | 8 |
| 婴儿死亡率（每千人数量） | | | | |
| 1981 | 71 | 121 | 124 | 81 |
| 1991 | 38 | 90 | 91 | 38 |
|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年） | | | | |
| 1981 | 67 | 52 | 50 | 60 |
| 1991 | 69 | 60 | 55 | 68 |

**注释**　*不包括印度和中国。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1991，1993。

年的920亿。（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105页）总产出增长的背后是大规模积累过程和生产资料存量的巨大增长。中国生产资料工业非常迅速地增长，以满足全面经济增长的需要。（见第6章）中国工业的前沿随着高科技产品的输入快速现代化，并且，生产资料的生产被现代化的国内企业所满足。



### *消费*

经济实绩的改善通过整体经济效率的迅速改善而实现，反映在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产出的增长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惊人进步。（表2.2）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绩效远远好于最相关的可比较国家，比如印度，同时，也大大超出70年代后期人们可以预期的水平。食物摄取的水平和结构大大改善。庞大的新耐用消费品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诸如自行车、手表、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等构成了产品的“第一波”，紧随其后的是构成“第二波”的更为复杂产品组合，包括像汽车、摩托车、录像机这样的产品。（表2.2）大规模兴建房屋的热潮充斥着改革年代，与此同时，人均居住面积增长了一倍多。

### *福利指标*

中国在提高占总人口40%的贫穷人口的收入上做得很好。这可以反映在“基本需要”指标的改善上。（见表2.1）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 Banister），一位最受尊敬的中国人口统计学分析者得出结论，1981—1990年间，中国“死亡率得到真正改善，尤其对于青少年女性和两性儿童来说”（班尼斯特，1992，第12页）。她指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仅仅9年时间内就明显降低了农村人口的死亡率，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来说，直至1981年，中国农村还具备较高的死亡条件。”（班尼斯特，1992，第12页）

### *贫困*

改革前夜的中国，最贫困的集中区域位于农村。（表2.3）改革时期，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贫困急剧降低。这包括来自富裕地区的

**表 2.2　中国生活标准的改变（1978—1992）**

| | 1978 | 1992 |
|---|---|---|
| 实际人均消费指数 | 100 | 252 |
| 人均消费，其中 | | |
| 粮食（千克） | 196 | 236 |
| 食用油（千克） | 1.6 | 6.3 |
| 猪肉（千克） | 7.7 | 18.2 |
| 鲜蛋（千克） | 2.0 | 7.8 |
| 糖（千克） | 3.4 | 5.4 |
| 水产品（千克） | 3.5 | 7.3 |
| 布（米） | 8.0 | 10.7 |
| 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每百人拥有的数量） | | |
| 洗衣机 | — | 10.0 |
| 冰箱 | — | 3.4 |
| 录音机 | 0.2 | 12.2 |
| 照相机 | 0.5 | 2.3 |
| 电视机 | 0.3 | 19.5 |
| 缝纫机 | 3.5 | 12.8 |
| 自行车 | 7.7 | 38.5 |
| 收音机 | 7.8 | 18.4 |
| 手表 | 8.5 | 51.6（1990） |
| 零售店和食品与饮料企业（每万人拥有的数量） | | |
| 企业 | 12 | 101 |
| 职工 | 57 | 249 |
| 保健供给（每万人拥有的数量） | | |
| 医院床位 | 19.3 | 23.4 |
| 医生 | 10.7 | 15.4 |
| 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 | |
| 城市 | 3.6 | 7.5 |
| 农村 | 8.1 | 20.8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1，第 42 页；《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 48、51 页；《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279、283、284 页。

辐射、援助贫困地区的政府政策、非农就业的快速增长和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收入快速增长。世界银行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构建了一个恒定的贫困线，并且估计贫困总人口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2.7亿降低到80年代后期的大约1亿，这仅仅发生在10年之后（表2.3）[①]。

**表2.3　中国贫困状况（1978—1990，括号内为百分比）**

| | 1978 | 1985 | 1990 |
|---|---|---|---|
| 总人口（百万） | 963 | 1 059 | 1 143 |
| 城市 | 172（17.9） | 251（23.7） | 302（26.4） |
| 农村 | 790（82.1） | 808（76.3） | 841（73.6） |
| 人均收入（以1978年价格计算，元） | | | |
| 城市 | — | 557 | 685 |
| 农村 | 134 | 324 | 319 |
| 贫困线（以目前价格计算，元） | | | |
| 城市 | — | 215 | 319 |
| 农村 | 98 | 190 | 275 |
| 贫困范围（百万） | | | |
| 共计 | 270（28.0） | 97（9.2） | 98（8.6） |
| 城市 | 10（4.4） | 1（0.4） | 1（0.4） |
| 农村 | 260（33.0） | 96（11.9） | 97（11.5） |

**注释**　农村实际人均消费出现明显停滞的三年之后，1991年出现了实质性的快速增长。（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42页）如果对世界银行来说1991年的数据变得可用，那么很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所报告的贫困人口数量。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2b，p. v。

## 不平等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期间，市场力量的增长产生了大量的新的不

① 莱昂斯（Lyons）通过研究福建省证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除非福建省没有代表性，否则中国确实向规模巨大的贫穷实施了一场战争——并且理所应当地比迄今为止其所受的关注更加值得人们注意。"

平等。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也扩大了。相比毛泽东时代，收入分配一些方面上的不平等确实是增大了。但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改革期间中国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经历了收入的更快速增长。[①] 中国在 14
改革进程中实现了大规模的、平等的土地改革。而且，大量的国有资产以若干公有制形式得以保留，所有权要么属于国家、省、市、县，要么属于农村集体。因此，严格地限制了私人财富大量积累的可能。不同层级的政府维持了相对有效的税收制度。

*心理*

中国经历了大约百年的民族耻辱，从 19 世纪 40 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1—1927 年的北洋混乱时期。作为一个简短的大约十年（1927—1936）的插曲，国民党统治期间国家貌似有了一些进步，但是，现代化的努力被日本 1937—1945 年的侵略所延缓。1949 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时，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毛泽东 15
充满了热情。尽管取得了一些巨大成就，但国家政策也导致了大跃进的灾难。大跃进期间，很多人死于饥饿和相关疾病。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前期的“文化大革命”给广大农村带来了混乱，破坏了经济发展并且使大部分人蒙受极大痛苦。

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使中国人恢复了往昔的民族自豪感。这样一个事实——改革计划由共产党实施，同时意识形态仅发生渐渐变化——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群众心理迷失。

*人权*

改革自始至终，中国都保持着一党治理结构。同时，它还是具有最强硬的法律制度的国家，平均每年有数千人被执行死刑。（国际特赦组织，1987）这引致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道德和哲学困境。这就是该国的“人权”状况，而且，它似乎不可能在所有方面同时实现好转。

---

① 从 1978—1992 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7%，而城镇居民的年均增长率为 5.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第 49 页）

如果在视阈上超越把人权等同于选举权的狭隘视野，把目光投向更宽泛意义上的人权，那么中国的状况在改革期间迅速地得到改变了。（罗澜，1994a）在宽泛意义上的“人权”供给上，中国实现了巨大进步，包括健康、教育的改善，迁徙自由，就业机会的巨大增长，更好的食物、衣服、住房和系列文化产品的大幅增加。满足基本需求的体制同时也能够使中国实现相对于其收入水平来说是非常低的死亡率。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的死亡率就降低到一个特别低的水平，其时，它还是一个穷国。中国经济改革的 10 年没有使其低死亡率的趋势反转。（表 2.4）的确，朱迪斯·班尼斯特的细致分析显示，大于 1 岁的所有年龄组的死亡率都降低了（由于计划生育女性婴儿死亡率上升了），对于一个如此低的死亡率的国家来说，比如中国，这是一个不凡的成就。预期寿命对于一个穷国来说已经是极高的水平上又进一步上升。（表 2.5）



**表 2.4　中国、俄罗斯和某些国家组的粗死亡率（每千人死亡数量）**

| | 1960 | 1970 | 1982 | 1991 | 1991 | 1994 |
|---|---|---|---|---|---|---|
| 中国 | 10.0 | 7.6 | 6.6 | 6.7 | — | — |
| 俄罗斯 | 7.4* | 8.7* | 10.5* | 11.4 | 14.4 | 16.2*** |
| 低收入国家** | 24 | 19 | 16 | 13 | — | — |
| 中等收入国家 | 17 | 11 | 10 | 8 | — | — |
| 高收入国家 | 10 | 10 | 9 | 9 | — | — |

**注释**　*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 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 第一季度。

**资料来源**　柏格森（Bergson）和莱文（Levine），表 3.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78 页；埃尔曼（Ellman），1994；世界银行，1984，1993。

表 2.5　某些国家和国家组的预期寿命

| | 1970 | 1982 | 1991 | 1993 |
|---|---|---|---|---|
| 低收入国家 | | | | |
| 男 | 46 | 50 | 54 | |
| 女 | 47 | 52 | 57 | |
| 中等收入国家 | | | | |
| 男 | 58 | 58 | 65 | |
| 女 | 62 | 62 | 71 | |
| 高收入国家 | | | | |
| 男 | 68 | 71 | 73 | |
| 女 | 75 | 78 | 80 | |
| 中国 | | | | |
| 男 | 61 | 65 | 67 | |
| 女 | 63 | 69 | 71 | |
| 俄罗斯 | | | | |
| 男 | 61（1979—1980） | 62 | 63 | 59 |
| 女 | 73（1979—1980） | 74 | 74 | 73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84，1993；埃尔曼（Ellman），1993；《观察家报》，1994 年 3 月 13 日。

## 2.3　俄罗斯



### *产出*

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经济绩效是差强人意的。共产党执政体制坍塌之后，差强人意的经济绩效便成为一场灾难。（表 2.6）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苏联的解体直接导致了崩溃。表 2.6 提供了一个极为简化的描绘画面，类似于借助标准光源为之画像。通过这种描绘，俄罗斯经济显示了一种规模上堪比中国大跃进的大面积危机，生产经历了可怕的下降。[①] 格里高里·哈宁（Grigorii Khanin）的缜密估计显示，

① 事实上，对产出的非官方估计显示，1989 年之前衰退已经开始，而且在 1985—1990 年间，国民产值可能是负增长。

从 1989—1991 年，国民收入降低了 34%，这个数值堪比美国和德国 1929—1932 年经济危机时国民收入的下降，而那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哈宁，1993b，第 7 页）然而，更为糟糕的是，在接下来的 1992 年，国民收入继续下降 30%，1993 年则进一步降低 10%。（表 2.6）而且，由于规模庞大的存货积累和企业为了保持流动性的不合意生产，“可利用的国民收入”据估计在 1992 年大约降低了 40%。（哈宁，1993b，第 17 页）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的资本积累变得不可能。（表 2.6）

**表 2.6　苏联的某些经济指标（除了特别标注之外，所有数据都为固定价格指数）**

| | 1989 | 1990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
| 物质生产净值 | | | | | | |
| (i) | 100 | 96.0 | 80.7 | 64.5* | 58.1 | 48 |
| (ii)** | 100 | — | 66 | 47 | — | — |
| 工业总产量 | 100 | 98.9 | 90.9 | 77.3* | 68.0 | 50 |
| 农业总产量 | 100 | 97.7 | 87.9 | 80.0* | 75.2 | — |
| 零售业营业额 | 100 | 110.4 | 99.4 | 59.6* | 53.6 | — |
| 固定投资总额 | 100 | 101.0 | 89.2 | 49.1 | — | — |
| 外贸总量 | | | | | | |
| 出口 | 100 | 86.9 | 85.2 | 63.0* | — | — |
| 进口 | 100 | 98.6 | 90.8 | 70.8* | | — |
| 外贸 | | | | | | |
| （以当前美元计价的外贸值指数） | | | | | | |
| 出口 | 100 | 95 | 72 | 54 | 54 | 47 |
| 进口 | — | 100 | 64 | 58 | 47 | 47 |
| 外债（10 亿美元） | 60 | 61 | 65 | 76 | — | — |
| 消费者价格 | | | | | | |
| （基于上年的百分比变化） | 5.0 | 8.0 | 150 | 2 500* | 1 000 | — |

**注释**　* 为估计值，仅对俄罗斯。

**资料来源**　经济学人智库，国家报告，独联体（苏联），no.4，1992；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993；哈宁，1993b，第 7、12 页（**）；《转轨》，7—8 月号，1994；史密斯·纽·库尔（Smith New Court），1994。

此外，国民收入下降的趋势持续到了 1994 年，该年国民生产净值据估计进一步降低了 25%—27%。（《转轨》，7—8 月号，1994）而且，由于外贸的糟糕表现，资本存量不能通过输入国外技术而迅速现代化。当巨大的生产资料工业在中国获得发展时，俄罗斯的生产资料工业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逐渐消失了。仅仅在 1994 年，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的产值估计就降低了 42%—45%。（《转轨》，7—8 月号，1994）由于产值下降的幅度是如此之大，几乎没有人可以想像这种下降速度能够持续多久。不管怎样，没有经济规律表明，下降不能持续一段时间，即便是超过这次灾难性的下降。

*消费*

仅仅依赖于统计不能描绘出混乱和痛苦的巨大程度。由于缺乏有力数据，对于大量人口来说，实际收入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显著下降和 90 年代早期的灾难性下滑，这个问题不能被严格证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种各样的国外奢侈品突然之间出现在商店里，而且理所当然的是，购买大部分这些商品都无须排队。然而与此同时，在大多数食品消费上出现了较大降幅，非食品的基本物品的消费降幅更大。（见后面的第 8 章）例如，纺织品和鞋的产出在 1991—1993 年间下降了大约一半以上。（见第 8 章）在 1992/1993 年度，棉纺织品产量（以平方米计算）下降了 38% 之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87 页）在 1994 年上半年，纺织品和鞋的产量进一步降低了“1/3 到 1/2”，这是对俄罗斯工业的最后的致命一击。（见第 8 章）基本工业产品的产量的灾难性下降主要因为大部分人口的收入的大幅度下滑。哈宁估计个人消费在 1992 年降低超过 30%。（哈宁，1993a，第 17 页）



*福利指标*

经济垮塌的重要后果之一是健康服务体系的解体，这个体系曾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健康服务体系的解体和贫困人口的迅速增加共同导致了“发病率的激增”。[默里·费什巴赫（Mur-

ray Feshbach）引自埃尔曼，1994］1993 年，传染性疾病——比如麻疹、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的发病率都有令人惊恐的增加（从 1990—1993 年的增长分别为 142%、72%、34% 和 300%）。（埃尔曼，1994）白喉、痢疾和伤寒据报道也有大规模增加。

而且，行政管理的崩溃伴随着犯罪的大规模增加。谋杀在 1992 年增加了 42%，到 1993 年上半年进一步变为 60%。（埃尔曼，1993）俄罗斯的谋杀率在 1993 年上半年达到每 10 万人有 25 人被谋杀，稳居“高谋杀率”国家之列，其谋杀率超过其他大多数“高谋杀率”国家——比如墨西哥（每 10 万人有 20 人遭杀害）和巴西（每 10 万人有 15 人遭杀害）。（埃尔曼，1994）

### *心理*

崩溃的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它同时也在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民族耻辱感。这个国家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曾自认为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领头羊。

20 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内，俄罗斯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变——从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转为疯狂的个人主义。我们能普遍观察到，对大部分苏联人民来说，他们对“社会凝聚力”的使命感已然支离破碎。全国性的混乱局面使得个人的心智完全失去了参照基准。

人们的不确定感大幅度增加了，这主要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对大部分基础保障体系的改变，比如就业、个人安全、教育、健康和住房等诸多方面，要知道这些保障曾经是水平较高的。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早期的意志消沉和耻辱感堪比中国同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三个悲伤年份”。

### *贫困*

大量证据表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超过一半以上），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后期是他们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少部分人收入急剧增长的时期。俄罗斯统计办公室（Goskomstat）与世界

银行共同对 1992—1993 年俄罗斯的贫困水平进行了认真的估计，尽管有些简略。在这个研究中，贫困被定义为一种收入水平，该收入水平代表着维持一个正常人在通常活动水平上所需要的食物消费水平。研究表明，大约 37% 的俄罗斯人口目前生活在贫困中。（引自埃尔曼，1994）对于儿童来说，贫困情况更为糟糕。1992 年，大约 46%—47% 的 15 岁以下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埃尔曼，1994）俄罗斯劳动部的生活标准研究中心使用最低贫困线的估计表明，1993 年第四季度约有 29.4%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然而，1994 年，贫困情况令人惊恐地发生恶化，贫困人口比例上升到 30.7%，并且在接下来的季度又达到 38.5%。（《转轨》，7—8 月号，1994）

贫穷主要体现在饮食的恶化上。1992 年，按照俄罗斯统计办公室的家庭预算调查，肉和肉类食品的消费降低了 11%，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降低了 16%，鱼类消费降低了 19%，蔬菜消费降低了 10%，水果和浆果消费降低了 15%。与之相反，面包消费上升了 3%，土豆消费上升了 9%。[①]（引自埃尔曼，1994）



不平等

伴随着经济一轮又一轮的下滑，收入和财富出现了大规模的再分配。通常的情况是，产出灾难性地下滑时（比如战争时期），大家能相对平等地共克时艰，借助于定量配给和政府对生产的直接控制——以确保满足社会最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发生的情况与之相反。平均收入的显著下降在分布上是不平等的。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混乱经济下，苏联人在资产私有化中——仅仅两年时间里，大量的国有资产在缺失法律的条件下被私有化了——享有收益的能力差别巨大。之所以如此，与年龄、政治地位和关系以

---

① 《劳动报》估计，从 1989—1992 年，肉类消费降低了 21%，奶制品消费降低了 34%，糖降低了 13%，水果降低了 32%。面包消费提高了 22%。[韦尔（Weir）报道，1993，第 2812 页]

及原始资本禀赋相关。这是一个尽可能快速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这个过程在西方用了 100 多年。新贵族以极高的速度诞生了，并迅速地积累起大量的私有财产，这一切都有赖于其在共产党体制下的权力地位。该局面与大饥荒类似。为了生存，贫困人口迅速地失去了资产，但那可能是极其可怜的。这导致了实际价格水平的下降，并使得那些拥有金融财力的人以特别快的速度积累资产成为可能。

收入再分配快速进行。根据劳动报的统计，1991 年，10% 的高收入群体与 10% 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是 5.4∶1，到了 1992 年末，这一比例变为 8.0∶1。（结果引自韦尔，1993，第 2813 页）俄罗斯的生活标准研究中心认为，伴随着 1993—1994 年经济滑坡的进一步持续，不平等的增长率迅速加大。相对于最贫困人口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人口中的最富裕阶层的购买力有了异乎寻常的增长。他们估计，10% 的高收入群体与 10% 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以一种癫狂的速度在上升，从 1994 年第一季度的 9.0∶1 上升到第二季度的 13.0∶1。（《转轨》，7—8 月号，1994）

## 22 人权

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市场化的推进引导一党治理下的日常生活不断民主化时，俄罗斯的糟糕经济表现却让其退却到专制主义。如果建立一个“人权”的资产负债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苏联人民获得投票选举权和自由表达权的同时，大多数人在另外一些人权上失去的更多，包括生存权、就业权、获得合适的食品和教育的权利、住房和健康服务权。更为重要的是，在受益于新自由的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比如表达权、资本积累权）。这些自由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逐步赋予的。

苏联和后苏联改革时期的人口死亡率的迅速攀升，反映了人权状况的恶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苏联作为世界上的一个低死亡率的国家傲然屹立。到了 70 年代后期，苏联死亡率开始不吉利地上升，

主要反映在工作年龄的男性人口的死亡率的上升。80 年代后期，苏联的死亡率超越了中等收入国家之水平。然而，最显著的上升发生在后苏联时期。1993 年，俄罗斯的死亡率达到甚至超过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表 2.4）。俄罗斯的死亡率目前已经与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和多哥等国家一样。这对于俄罗斯的改革的糟糕结果来说，是一个可怕的证据。

就业权被快速侵蚀。1994 年 7 月，大约有 1 000 万非就业人口，相当于经济活动人口的 13%。（《转轨》，7—8 月号，1994）如果严格实施破产条款，那么，估计还约有 500 多人会失去工作。（《转轨》，7—8 月号，1994）但是非就业的概念也迅速地失去了意义。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大部分人长时间地领不到工资。政府失业救济随着政府消费的降低而快速下滑。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口将自己的失业登记视为心安理得。正如第三世界国家那样，非正规就业大量兴起，自我雇用的大部分人口在这些商业活动中只能获得较低的收入回报。当然，这些非正规就业活动的激增绝不是预示着令人激动的新机遇和收入增长，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快速增长的贫穷和正规就业机会的大规模减少。



## 2.4 结论

伴随两国改革进程的经济绩效之差异可能不是很大，但对两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没有人能预期到结果，包括发动这场改革的一些领导人。无论是 1986 年的戈尔巴乔夫演讲，还是 1978 年的邓小平的讲话，在改革计划正式开始时，谁都没有预期到如此不同凡响的结果。外国的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

是什么导致了如此引人注目和不可预期的差异？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还很少，部分原因是这一历史进程距离现在较近，人们还看不清楚。部分原因也是外国顾问在两国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令人不安。在苏联的改革中，他们的影响最初是间接的，但是很重要。同时，其直

接影响与日俱增。在中国的改革中，外国建议仅被有选择地接受。中国改革计划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外国建议。

解释两国差异的主流观点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政策本身，而是改革进程的不同起点。俄罗斯政府的主要外国顾问对他们的贡献——落在这个国家的灾难——并没有显示出谦恭之心。可以想像，如果俄罗斯的改革成功，那么他们会很乐意地将此功劳记在自己的账上，而不是该国的潜在条件。顾问中最知名的是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他分别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顾问。1992 年灾难降临时，他被问及现在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回答是："不必。对于俄罗斯的改革，自始至终我一直支持自由化的解决方案。目前的失败表明，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驶向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转轨》，11 月号，1992，第 5 页）

这本书的其余部分将试图确认，两国改革结果的差异在什么程度上归因于政策的选择，在什么程度上归因于政治和经济潜在条件的不同。该条件是改革政府所继承的。

# 3　中国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 3.1　导言

撰写这样一章看起来是件古怪的事情。有两个理由促成此事。这本书的中心主旨是指出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正统的转轨思想的缺点。我希望非常清楚地表达出这层含义，即不暗示斯大林体制内部有其他可替代的解决办法。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都需要根本性的变革。问题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是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许多反对俄罗斯疯狂投入自由市场体制怀抱的人对共产主义体制并不抱有幻想。事实上，俄罗斯的改革策略的尖锐批评者正是那些因为反对斯大林体制而被判处内部流放的人。

这两个国家向来都有较少但非常重要的一群转轨道路的批评者，事实上他们相信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只需要小修小补就可以取得巨大的进步。其中的一个观点认为“安德罗波夫”模式所产生的更大压力能够显著改善这个体制的表现。[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市场力量的有限

---

① 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以后，对苏联体制进行了改革。他毫不留情地进行反腐肃贪，大张旗鼓地整顿劳动纪律，同时，尝试改革苏联的经济体制。他的经济体制改革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推行农业集体和家庭承包制，鼓励多劳多得；第二，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推广承包作业队；第三，扩大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自主权，努力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译者注

引入已经足以显著改善这个体制的状况。实际上，仍然有少数分析者相信共产主义体制下的苏联和中国路径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任何社会模式。本章就是要质疑这些观点的正确性。

25

## 3.2 政治

### 3.2.1 相似性

***国内的政党组织***

中央集权的政党组织的核心特征在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7—1921）就已经确立了，这个时期苏联共产党对政治权力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在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些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新经济政策的市场导向性的措施被引入的同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阶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增强了政党组织的中央集权程度和它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苏共党内分离运动的传播——比如批评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工人反对派”——被宣布与党员资格相矛盾。[①]“党派之争”或者党内独立“讲台”的应用被禁止了。一旦一项党内决定被采纳，党员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于它。共产党的内部领导核心——政治局——建立起来了。卡尔（E. H. Carr）评论道：“在那时，这看起来是必要和明智的……但是保持党的核心组织的权力垄断实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尔，1979，第34页）

到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时，其政治的典型特征已经显露了。在每一个国家，革命后的共产党都仍然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政治权力的小“先锋队”政党。即使在斯大林死后它急剧膨胀之后，20世纪70

① “工人反对派”提出，“把国家工会化”的政治主张，其纲领口号是“工人阶级的最高形式不是党而是工会”。——译者注

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仍然只有 1 600 万党员，大约为全国人口的 6%。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中国，比较而言其共产党规模甚至更小，党员仅仅占中国庞大人口的 3%。但其党员的绝对数量是巨大的，1977 年总计 2 800 万人。在这两个国家，党领导着国家机构的各个层面，包括立法机构、行政机关、军队和司法部门。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到确立：

>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第二章）



>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苏联共产党党章》，1961，序言）

### 政党和社会

在中国和苏联各自实施现代化改革运动之前，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处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中心地位：

> 系统运行的关键……是共产党的核心地位。作为一项制度，威权和权力在共产党内部被有效地集中起来，以至于能够对整个系统施加强有力的控制。由一群被精心挑选、强化教育和严格训练的精英所组成的共产党进入国家的每个领域和社会的每个部门，一直到最低微的草根阶层，并且在每一个层面，它作为最终决策中枢的权威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巴奈特（Barnett），1974，第 37 页］

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经济控制的范围超过了20世纪晚期最为独裁的统治，准确地说，应该被称为“独裁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

在中国和苏联，战争在塑造共产党内部组织的演化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1917—1921年苏俄的国内战争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对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限制被容忍。然而，战争的结束引发了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不满情绪的流露，这种不满在1921年的喀朗斯塔得（Kronstadt）水兵叛乱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喀朗斯塔得革命者从一种左倾的角度抨击政体的社会政治性质：

> 在十月革命中，海军和红军、工人和农民为了苏维埃的权力抛头颅、洒热血，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劳动者的共和国……共产党员们首先剥夺了持其他立场的社会主义者拥有的权力，然后又将工人和农民从国家大船的驾驶盘旁拉走，一直以来他们不断地以他们的名义去统治这个国家……布尔什维克着手将工厂和商店国有化。工人们从资本家的奴隶变成了国有企业的奴隶……以劳动谋生的整个农民阶级都被宣布成敌人，等同于富农。市民的生活因其单调和程式化变得令人绝望。每个人都按照当局制定的时间表生活。这就是共产党专政给我们带来的社会主义的光辉国度。苏维埃官员顺从地根据党委会和它一贯正确的人民委员的命令投票，我们由此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引号中的社会主义》，1921年3月16日，阿维里奇（Avrich）翻译，1970，第244页］

27

布尔什维克领导阶层的回应是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①]，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包括取缔了其他的所有政党。在新经济政策中期，共产

① 阿维里奇估计，苏联方面约有10 000人伤亡，堡垒占据者方面约有2 000人伤亡（阿维里奇，1970，第210—211页），尽管一些估计可能比这个估计数字要高。斗争拖了很长时间，总共持续了超过3个星期，占据者遭到入侵者的大肆屠杀。

党的管理相对宽松，之后在新经济政策的后半期逐渐地发生了转变，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使用指令性机制，对小资本家的控制也逐步加强，同时共产党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反对力量失败后的 1928 年，工业化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个年份见证了遍布整个苏联社会的对一个强大和专横的威权的强制接受，对一个严格正统的观点的强制接受和对反对者施加最严厉处罚的强制接受。"（卡尔，1979，第 122 页）

在革命完成之前，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的基本原则在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奋斗中被奠定。关于这些问题的经典陈述体现在刘少奇在 28
1945 年的讲话《论党》[①] 中，这次讲话勾勒出党员应该通过什么方式去领导大多数人民去奋斗，从而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 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有些同志……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刘少奇，1945，第 206—226 页）

对社会经济事务的严密控制造成了本质上的负面后果和消极的经济效果。

"社会写实主义"的一致性被强加到所有形式的文化上，并在中国 29
"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致，那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戏剧、艺术、电影和音乐被视为政治上可接受的。尽管有后斯大林时期的"解冻"文学，

---

① 指的是刘少奇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译者注

共产主义时期的苏联文化仍然沿袭着一条相似轨迹，其基本立场在日丹诺夫 1934 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讲中规定得很清楚：

>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央委员会深思熟虑的日常指导下，在斯大林同志孜孜不倦的支持帮助下，整个苏联作家队伍团结在苏联政权和共产党的周围……斯大林同志曾经称呼我们的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头衔赋予你们什么样的责任呢？……艺术描写真实和历史的具体原则应该和本着社会主义精神的意识形态改造、劳动人民的教育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写实主义的方法。［日丹诺夫（Zhdanov），1934］

据估计，苏联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仍然有大约 70 000 人受雇于中央委员会从事审查工作。［莱恩（Lane），1978，第 259 页］

一种对强制的一致性进行深刻批评的地下拷贝传播的文化幸存了下来。这在那些真实目的在于逃避审查的公众作品的内容形式上得以体现，比如肖斯塔科维奇音乐表现的绝望强度。在最轻微放松迹象出现时，它们便复苏了。

30 比文化一致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对为数众多的人所进行的肉体迫害。革命前后，中国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整风运动”。被贴上“反动分子”标签的人的家庭在很多方面都被歧视对待。在“文革”期间，政治斗争被进一步强化。［罗金斯基（Rodzinski），1988，第 127 页］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作为国家直接暴力受害者的人数比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要少很多。

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大约 500 万个富农和他们的家庭被投入监狱。最近的一项估算认为有 1 100 万人因为集体化死亡，有的因为直接判处死刑而死去，但更具代表性的是死于关押他们的监狱的恶劣条件。［康奎斯特（Conquest），1986，第 306 页］在 1936—1938 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有 1 800 万人因为“政治罪行”被判刑或被关押。

[莱恩（Lane），1978，第 74 页］斯大林死后，苏联监狱规模急剧缩小。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掌权前夕，许多人仍然在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中遭受痛苦：国际特赦组织（大赦国际）估计“政治犯”的数目大约有 10 000 人。（莱恩，1978，第 269 页）

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得不屈服于自己成为各种少数派，但是更为严重的是，遭到各种惩罚，包括降级、调任到远处去工作、来自工作单位党员骨干的羞辱和批评、较差的住房分配，以及社会对他们家庭的歧视。

高度集权所施加的政治管理有着极大的消极经济后果，这个体制具备了犯大错的条件。这源自于独立专家广泛讨论的体制的缺失和一个能够影响经济的颁布中央命令的巨大权力的存在。这种政策的最重要的例子是苏联的集中化运动和中国 1958 年实行的“大跃进”，两者都造成了产出的灾难性缩减。在这两个案例中，许多人都因这些政策所导致的过失而死去。在苏联，饥荒导致了多达 700 万人的“额外死亡”。［康奎斯特（Conquest），1986，第 306 页］20 世纪最严重的饥荒发生在这里，如果没有这些饥荒，由于农业产出的稳定增长、贫穷国家收入的增加、运输和通信取得的巨大进步，本世纪死于饥荒的总人数应该有一个持续的减少。（罗澜，1993c）

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对经济绩效所施加的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仍然重要的影响是对经济学家讨论内容范围的严密控制。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的“取消主义者”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这种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出现消除了对“经济学”的需求。人们认为计划能够配置资源而不用参照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例如价格、生产成本和利润：“集体化大生产”的科学被认为可以替代“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经济学》（*Novaya eko-nomica*），莫斯科，1926；引自诺夫（Nove），1968，第 30 页］

在苏联的斯大林去世之后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中较自由的态度更为盛行的那些短暂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们能够研究更广泛的主题。这

些主题在“价值规律”题目下涵盖了许多来自市场经济的概念，包含了与交换关系相关的所有概念。苏联的利伯曼（Liberman）、涅姆钦诺夫（Nemchimov）、诺沃日诺夫（Novozhilov），中国的孙冶方、陈云和董辅礽等经济学家都使用近似于西方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开创了分析共产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新方法。（诺夫，1968，第 11 章；林，1981）然而，即使是在最为自由的时代，他们研究也要受到国家控制，并只能在自己所工作的研究所开展研究。此外，思想的整体框架也被严格地限定于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信条的范围内。



苏联大多数最具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是致力于尝试模拟市场，努力运用影子价格去计算资源配置，而不是想办法引入一个具有真实竞争机制的真正的市场经济。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最先进的思考者为企业提供更多生产动力的改革构想也不允许超越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框架。一个典型的说明是苏联经济学家卡申（Kashin）的例子，他论述一种新的状况：“计划性的生产仅仅是一个框架，对于国民经济而言仅仅是一种水晶格子，它能够提供足够的空间使工厂、工人、集体和地区去发展自由的生产积极性，这种生产积极性在中央计划的经济板块间自由地流动。”［引自卢因（Lewin），1975，第 166 页］另外，即使是最具创造性的著作，比如利伯曼 1971 年的著作，仍需要经常参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和讨论经济问题的语言。

不管是在改革前的中国还是苏联，经济学家们发展出了控制市场经济活动的技能。实证经济学更加贴近于会计学而不是西方理解的经济学。事实上，在苏联 1931—1941 年的 10 年时间里，中央统计局被改名为国家会计中央办公室，因为“统计”是一个“被认为意味着对随机性、偶然事件进行度量的词汇，因此不适用于计划经济”。（诺夫，1968，第 302 页）另外，所谓“政治经济学”不过是对马克思、列宁部分学说的生搬硬套的说教。因此，由于极不胜任政治经济的复杂分析工作，又因为其在设计一个成功的经济改革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这样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不得不进行改革。

### 3.2.2 差异

在苏联，共产党党内斗争和共产党领导的针对非党员群众的暴力事件的最极端时期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斯大林死后，苏联共产党正式承认阶级斗争在苏联已经结束了。政治体制朝更加实用、常规、稳定的方向进步，这导致了一个受过更好教育、技术专家型上层集团的出现。中国改革前的十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对于如今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和才了解中国的人来说，要完全了解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撼动中国的政治风暴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运用他强大的个人力量对党和政府的组织机构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 毛泽东相信资产阶级代表，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已经大量地渗透到党内、政府、军队和学术圈中。这意味着大部分组织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的手中了……毛泽东相信，要从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人手中重新夺取权力，只有通过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通过公开、明确地鼓励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去暴露威胁社会主义的危险。（宗怀文，1989，第 127 页）

当数百万红卫兵席卷全国，攻击各级政府机关时，巨大的全国性骚乱发生了。当“革命性的夺权”在全国各地发生时，地方政府崩溃了。企业管理被推翻，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

> 国家处于混乱之中。到 1967 年初，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和政府组织都被剥夺了权力，或者被彻底重组。当暴力和国内斗争劫掠全国时，公共安全机构、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停止了运转。工矿及其他企业的生产都运行缓慢乃至停止，通讯交通系统被严重地中断。（宗怀文，1989，第 141 页）

最后，通过军队的力量，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共产党组织机构被缓慢地重建起来。与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不同，毛泽东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攻击是对最基层机构的进攻："别的地方还能有一个革命最高领袖不仅清洗他自己过去大多数的同志，还对他自己付出很多努力从而构想建立起来的政权的最基本结构发起进攻的吗?"［巴奈特（Barnett），1974，第39页］从1966—1968年间的崩溃中恢复是艰难缓慢的。多克·巴巴奈特在1974年的论著中评论道："不稳定的状态可能要继续一些年……中国要达到1965年前的制度凝聚力，还有一段路要走。"（巴奈特，1974，第36页）



"文化大革命"的经济后果是巨大的，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过短期的生产停滞。对党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剧烈攻击对地方的"自力更生"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别无选择，既然协调经济活动的能力已经降低到只能进行大宗商品的跨省转移。"文化大革命"将个人崇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工作被领袖的"思想"所领导，这甚至比苏联斯大林时期更加严重。

这对经济学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参见林的叙述，1981）在"文革"早期，对经济学的攻击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这里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统治领域"的标签。攻击扩展到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和规划者："政府计划和管理机构停止运转，当其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或者进行'批判—斗争—改造'运动时，计划成了'伪计划'。"（林，1981，第36页）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经济学才得以恢复。一个敏锐的观点认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从根本上仍属于斯大林计划体制，但思想意识（比如对物质激励和利润标准的抨击）和工作人员的短缺意味着它的斯大林主义式的物质平衡运行得甚至还不如改革前的苏联。

在斯大林"对党进行大规模进攻"时期的苏联，整批最高层面的领导人和较低层面的领导人被斯大林处死了。在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

17 次代表大会的 1 961 个成员中，多达 1 108 人以“反革命罪”的名义被逮捕［夏皮罗（Schapiro），1970，第 421 页］，其中很多人死在古拉格集中营。在 1934 年中央委员会的 139 个成员中，可能有 98 人被逮捕处死（夏皮罗，1970，第 420 页），“在他们中间，他们代表着党内组织、国家经济、政府机构和军队的巨大的权力集中”（夏皮罗，1970，第 421 页）。 35

与斯大林的“对党进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有巨大的暴力与痛苦，绝大多数第一代地方和国家领导人却没有被处死。周恩来估计“文化大革命”只使 1% 的共产党员“永久驱逐”（巴奈特，1974，第 56 页），而且大多数反对毛泽东的核心国家领导人，比如邓小平、陈云和谭震林，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甚至在毛泽东去世后重返领导岗位（巴奈特，1974，第 57 页）。

## 3.3 经济

### 3.3.1 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问题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经济沿着非市场化的轨道运行，像管理一个独立工厂一样为整个国民经济作计划。中国经济紧跟着苏联模式的步伐。计划经济的基本结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建立。在这两个经济体中，绝大部分工业资产都被国有了，大多数农村资产也被转化为国有或者集体所有。集体所有远不是真正的私人所有权的合作形式。价格几乎完全被官僚体制快速制定。这个体制的核心是一项综合的物质平衡供给体制，它控制着所有主要商品的分配。 36

关于共产主义“计划”目标的经典论述可以在《共产主义 ABC》一书中找到，该书由布哈林（Bukharin）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Preo-

brazhensky）撰写，1920 年在苏联出版：

>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一定是生产和交换工具的社会所有。所有这些生产资料都必须处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下，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处于私人资本家和资本家联合体的控制之下……在这些条件下，社会将会转化为一个合作生产的巨大组织。这既不会有生产的崩溃，也不会有生产的混乱。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下，生产将会有组织地进行。任何一个企业也不会同另一个企业展开竞争，一切工厂、作坊、矿山和其他生产设施都只能算是分厂，就像隶属于一个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生产的全民大工厂。（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69，第 114 页）

在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1917—1921），国有计划经济的第一个范例被付诸实践。这个体制被大多数苏联经济学家称颂为一个本身就很合意的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能够使襁褓中的苏联在危急的国内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体制。拉林（Larin），国民经济最高会议的一位领导人，在 1920 年，也就是转变发生的时候写道：

> 随着生产的社会组织化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国民经济越来越转化成为一个整体，这些都是必然发生的。最重要的是这种转化将使一个不确定的市场变为一个有社会记录的订单生产……国民经济的众多分支都将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工作，由中央进行决策和协调它的细节……在这些经济支脉中的每个企业都会被一个唯一的所有者拥有：那就是国家。可以说，这些分支现在都成为同一个公司的厂子或车间，在这个公司里没有旧资本主义社会“盲目经济力量的自发运作”的余地，也没有个人工厂之间的商业联系。[引自绍穆埃利（Szamuely），1974，第 37 页]

用“计划”这个形容词来描绘斯大林的国有经济体制和源于物质平衡的指令并不是太合适。更准确地说，这个体制是一个“被管理”的、“指令性”的、“命令式”的系统，而不是一个“计划”的经济。[参见扎列斯基（Zaleski），1980]“计划”的核心要素是“前瞻性”、“合作性”和“谨慎目标的达成”。[丁伯根（Tinbergen），1964，第44页]共产主义计划体制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试图克服市场的混乱。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利润的竞争性追逐导致追逐利润的目标凌驾于人类生活之上。这既表现在简单的经济现象中——无法达成全社会共同希望的目标，比如完全就业和持续稳定的增长；也表现在一个更深的层面——与此相应的为利润而销售而不是为人类发展而生产的文化。试图克服人类远离其真实的“类存在者”的异化问题使其成为“有目的的生产者”（人类创造），是苏联构建“计划”经济的英雄主义尝试的主要动力。1926年3月，苏联经济学家皮达科夫（Pyatokov）用以下文字描述了“计划”的开端：

> 我们在为自己设定一项工作，我们按自己的希望谨慎地为我们自己塑造一个工业的模型，以便使其付诸实践；换句话说，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确定的目的和按自己的愿望布置的工作；我们使自己从历史局限中得到较大程度的解放；我们突破旧的边界，去获取一种更大的创造性的自由。[引自卡尔（Carr）和戴维斯（Davies），1969，第840页]

中国和苏联“计划”经济的一大悖论是，流布于企业的指令性体制无法建立一个更少混乱和更少疏远的经济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活动创造出经济体制。至少就像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下，人们自身创造出的体制反过来控制了人类自己。从本质上来讲，“计划”经济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克里茨曼（Kritsman）在“计划”推行过程中很早便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 在我们无产阶级的自然经济中，剥削和市场已经被征服了，但没有克服经济生活的混乱。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商品经济是无秩序的经济。但是，由此推论，非商品经济，即自然经济必定是有秩序的经济却是不正确的……是否拥有多样性的（独立的）经济主体对于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是无政府主义的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克里茨曼，1924，引自埃尔曼，第47—48页）



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现在已被广泛证明，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克里茨曼的评论是多么的敏锐。与作为一个团队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作的情况相反，“计划”体制下每一个层级的机构都努力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不能给“计划”体制下更高层面的领导提供真实的信息。在市场信息缺失的情况下，由各级机构进行的核实信息的工作变得异常复杂。而且，即使所有的机构都为计划决策者提供真实的信息，要构建一个物质平衡计划所涉及的循环反馈也是极度复杂。[①] 因此，就像众所周知的一样，行政性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它长期的供求失衡。［参见科尔奈（Kornai）的例证，1980］正如舒梅列夫（Shmelyev）和波波夫（Popov）所言：

> 在一个有着严格计划比例的经济体中，……生产的失衡、一些产品的短缺和另一些产品的过剩……都不是例外而是常规——一种每天发生的真实情况，一种治理规律。绝大多数产品处于不是短缺就是过剩的状态。通常是同一种产品同时处于上述两种状态——在一个地区短缺，在另一个地区过剩。但需要的产品数量几乎从来不在需要的时间和需要的地区出现。（舒梅列夫和波波夫，1990，第89页）

---

① 矛盾的是，现代计算技术的进步速率正在使这一过程的某些欠复杂方面的研究变得可行。

由此导致的系统性弊病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分析。在系统的各个层面，一种高度的自给自足现象产生了：“我们的工厂变得需要满足‘所有的目的’，变得非常不专业。通过努力生产各种东西，而且一点也不依赖于其他生产者，企业负责人使他们的经济活动‘自然化’了……与从那些不存在的专业化企业来获得螺帽相比，依靠自己生产所需的螺帽确实是容易多了。”（舒梅列夫和波波夫，1990，第 118 页）

这个体制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囤积倾向，因为在中间投入品供货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形成了“吸纳”与囤积相互滋养的恶性循环。（参见科尔奈 1980 年的经典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减少单位最终产品所对应的存货数量，最终导致所需投入品能够得到“恰好够用”的供给。苏联经济体经历了每单位最终产品所对应的存货数量上升情况：据称，到 1985 年末，物质生产方面的存货价值不低于当年国民收入的 90%。（舒梅列夫和波波夫，1990，第 133 页）据报道，在 1980 年的中国，机器设备存货的价值比当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还要大，全年所生产的钢铁几乎都是不需要的种类。[里斯金（Riskin），1987，第 172 页]

体制导致生产者不怎么关心他们产品的有用性。普遍存在的短缺意味着大多数产品的存在卖方市场。进行简单的物质生产的目标导致了生产范围缩小，即局限到那些最容易生产的产品上。因此，众所周知，多种消费品的生产不能有效回应消费者的需求信号，也导致了耐用消费品较高的故障率。一个给定的消费品组合所带来的真实福利比竞争市场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要小得多。另外，由这个系统生产出来的资本品也常常不能胜任它们应该完成的工作，并且经常损坏。

“计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深层矛盾是，“计划”经济远远没有克服资本主义体制的关键性缺点，反而以一种更加严重的形式加剧了资本主义的许多缺点。它不但没有清除垃圾，反而制造了更多的垃圾。它取消了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却没能用以功能为目的的生产替代它。它取消了由竞争性资本主义产生的短视主义，取而代之的却

是以完成现阶段计划为目的的更为严重的短视主义。它操纵经济活动向众所周知的不受社会欢迎的方向发展，却无法从这种经济行为模式中摆脱出来。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比竞争性经济更加“无政府主义”的体制。

### 3.3.2 苏联经济问题的加剧

#### *人口危机*

苏联的增长路径是“密集”式的，依赖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很小。在20世纪30年代，从较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人口充当了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增长的主要来源。这一劳动力供给增长的源泉在战后枯竭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速度的放缓使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年平均增长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约2%，下降到20世纪70—80年代的1%左右。而且，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其增长率甚至更低，这导致了1985—1990年工作年龄人口的负增长。

#### *资本积累危机*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资本生产率急剧衰减。西方的估算显示这一衰减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 苏联关于资本生产率的记录真是很糟糕，而且很难用传统的经济学加以解释……比如那些在苏联显现出的资本生产率的负面趋势表明其投资回报率正在降低。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投资回报率的降低将会使投资减少，从而减少资本存货的积累，从而阻止资本生产率的衰减。[科恩（Cohn），1982，第174页]

到20世纪80年代，产量的缓慢增长意味着即使是高投资率也无法使总投资产生巨大的增长。总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从20世纪50年

代后期的 13% 左右下降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 2% 左右。（科恩，1982，第 171 页）

*产出增长*

除了持续的高投资率以外，与劳动力增长的长期严重衰减相结合，资本生产率的急剧降低导致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持续下降。官方统计显示，经过几个连续的五年计划，净物质产品年增长率从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超过 7%，下降到 1981—1985 年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只有 3% 左右。另外，苏联非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增长率事实上已经下降到几乎为零了。［阿根柏岩（Agenbegyan），1988，第 2 页］

*生活水平*



苏联的生活水平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下降得很严重。到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差不多回升到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的水平。［查普曼（Chapman），1963］理所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生活水平出现了大的滑坡。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到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出现了一次大的改善。最好的西方统计数据显示，从 1951—1978 年，实际消费按 3.7% 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施罗德（Schroeder），1983，第 315 页］主要的进步发生在食品和耐用消费品上。

然而，苏联消费水平在进步的同时，仍存在着巨大的问题。第一，平均实际消费增长率下降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年平均 3%，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几乎没有增长。第二，战后苏联消费增长的基点很低。而且，苏联消费增长放缓的时候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真实收入持续强劲增长的时期。基于美元购买力平价的相对消费水平的详细统计显示，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苏联人均消费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 34%，法国和德国水平的 50%，香港地区水平的 69%。（施罗德，1983）第三，比较研究无法全面完成针对苏联和西方所消费产品的品质和种类的对比。苏联在工业技术进步方面表现平平，而与此同时，西方则在为消

费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性质方面掀起了技术进步的浪潮，从电子产品、汽车的井喷式发展到金融服务所提供的变革。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较晚时期，苏联所做的改革努力仍集中在产生更大的压力而不是引入市场力量（见下文）。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消费品品质的下降，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

第四，在死亡率方面，多数分析认为苏联的表现差强人意。苏联成功的主要领域是在医疗服务、食品基本需求、就业和庇护所的提供方面。到20世纪50年代，这使苏联的死亡率下降到与其收入类似的国家的较低水平。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死亡率开始可怕地缓慢上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形成鲜明对比。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自然死亡率从8‰上升到超过10‰。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然而，发生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特定年龄段的死亡率的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0—1岁的婴儿死亡率呈现了显著的上升，“就一个可比的基础而言，它应该是同期美国婴儿死亡率的3倍以上”［费什巴赫（Feshbach），1983，第90页］。另外，20—44岁的年龄组的男性死亡率也呈现了显著的上升，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酒精摄取增多所致。（费什巴赫，1983，第90页）



第五，尽管有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立法，苏联“计划”经济还是表现出在控制环境污染上的无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治理下，一场“绿色”运动迅速兴起，并向世界全面展示了苏联的环境危机。此外，苏联的“计划”体制无法保证经济体制朝着社会普遍认同的目的发展：“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部长因为环境污染而被解聘……倒是有很多人因为无法完成计划而被解雇。”（舒梅列夫和波波夫，1990）

### 国际关系

很明显，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经济体系已经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冷战策略的一个明确部分被西方势力采用，并在撒切尔夫人

强有力的支持下由里根总统对其进行加强，那就是军事竞赛的激化。那场竞赛的决定性要素是“星球大战”战略。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最好的物质资源的很大部分都被用在了国防部门。在戈尔巴乔夫掌权前的大约十年间和他自己的统治时期，用于国防部分的资源比重由于冷战的激化而增长。这导致民生部门面临严重困难，不能产生有效增长。

*改革努力*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关于苏联计划体制的缺点的辩论便开始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出人意料的发展活力的同时，苏联发展速度的衰退更促使人们去寻找改进体制运作的方法。三项改革计划相继出台。然而，任何一次尝试都没有改变体制运行的基本原则。 43

第一次改革发生在 1957—1965 年的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赫鲁晓夫改革将许多计划功能下放到共和国层面。然而，它们根本没有改变企业运行的机制。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改革培育了对地区的忠诚精神，这使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变得更加难以调和，从而使计划更加困难。此次改革最终在 1965 年被放弃。

第二次改革发生在 1965 年。乍看之下，好像基本体制的改革发生了，人们讨论引入利润平衡表作为企业的核心“成功指标”，增强企业决策的自主性，依靠正利率的银行信贷进行融资。然而，改革在削弱物质供给体制的主导地位方面成效甚微，而这正是“计划”结构的核心。一位在苏联计划方面颇具研究的美国专家评论道：“……改革七年以后，经济方法，或者说是经济‘杠杆’，被成功地转化为行政‘杠杆’……结果，集中计划或管理变得甚至更加根深蒂固了。”（施罗德，1979，第 36 页）

作为对体制问题认识加深的回应，第三次改革浪潮开始于 1979 年。这次改革的目标明确，即限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迫使企业节约使用物资和能源，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刺激技术进步。和以前的改

革一样，这次改革也没有进行引入市场机制的根本性尝试。相反可以清楚地看到，此次改革不过是一次引入更大“压力”以提高效率的尝试。例如，提高企业使用物资和能源的效率、限制其囤积劳动力的努力导致了对计划规范中投入产出系数广泛的修改，提高了这些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却没有引入更为综合的改革以使企业对市场信号做出回应：

> 1979 年的 7 月法令和接下来颁布的法令所做出的工作安排并没有对经济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恰恰相反，计划变得比以前更加集权、僵化和详尽；生产单位主动权的范围被更严格地限定；生产者的产品被更严格地限量供应；行政干预和基于价格的僵化的平均成本也被维持下来；而且复杂的激励机制被迎合计划所束缚，即用以处理许多潜在的冲突之间的关系，这往往使得物质生产单位的生产计划被予以优先考虑。这些改变使体制朝着与大多数西方（和一些苏联）评论者所认为的必需方向背道而驰——这些必需的方向包括分权、灵活和对市场要素的引入。（施罗德，1982，第 82 页）

这些改变远远没有改进“计划”体制的运行，事实上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它们把企业捆绑在“一个比以前任何情况都更加稠密的目标、规范、守则和激励方案的灌木林中”（施罗德，1982）。另外，“计划”体制更大的“教训”是加剧了“短缺”和瓶颈的严重程度。体制甚至变得更加倾向于“吸取”和“囤积”，更加成为一个牺牲质量与技术进步以满足现有计划的“卖方”市场。这种增长的压力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中可见一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体制一直在蹒跚前行。然而，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改进体制运行方面，不彻底的改革已经导致了三次连续失败。这些改革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由于俄

罗斯欧洲地区劳动力数量增长的停滞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放缓，实现增长的“老”办法甚至比过去更难发挥功效了。1985 年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根本性的体制改革是必要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速度？朝着什么目标？政治和经济改革是怎样一种关系？

*公信力危机*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多种因素导致了苏联领导层要面对严重的信心危机。经济恶化的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接二连三的改革不过是加剧了问题。苏联生活水平的停滞和潜在的倒退与西方经济持续而强有力的增长同时发生，逐渐削弱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合法性。

最后，苏联在冷战中明显败北，被西方以“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的技术进步甩在了后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接管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苏联所受到的敌对攻击远远甚于中国。苏联，被里根总统视为“邪恶帝国”。苏联，由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视为西方利益的最大威胁。



### 3.3.3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问题的加剧

在中国之外有许多关于“毛泽东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有区别的争论。1960 年苏联与中国决裂的事实导致许多评论者猜想两者对待经济事务的方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对许多概念，比如“群众路线”的使用，更强化了这个观点。另外，在大跃进时期（1958/1959），集体农场和工业企业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规模试验暂时撤退以后，类似的革命性的变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重新发生。

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地方，人民公社采用高度平均主义的方法分配工作酬劳，经常用“按需分配”的方式支付报酬，相信中国能够直接“跃”入共产主义。经过一段向苏联“冷酷专家”（舒

尔曼，1968，第247页）刻苦学习怎样建立一个工业企业管理、劳动力及其报酬分配的高效制度之后，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及其拥护者鼓励推翻这些艰难建立起来的体制。一本关于毛泽东式经济的苏联教科书以绝望的语调把这些改变叙述如下：“工人们自己制订计划并且自己设定速度；自己决定使用哪些技术，并随意进行更改；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替换金属等级和原材料；自己做设计并改动交给他们的草图或方案；并且控制业务运行、技术标准和财会业务。”［可巴什（Korbash），1974，第54页］

这些众多的改变对苏联造成了巨大的冒犯，因为它们事实上对苏联专家教给中国人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内容都废弃不用了。这些巨大的争论是中苏分歧的主要部分。毛泽东在其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所作的党内重要演讲中对苏联“修正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他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使苏联变成一个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个人私利在工作动机中扮演核心角色，而不是为共产主义无私奋斗（“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后者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

> 苏联相信技术和干部可以决定一切。他们强调特殊化，而忽略革命性；强调干部，而忽略群众……在中国，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工人参与管理；干部被下放以进行再锻炼；摧毁旧规定、旧体制……虽然他（斯大林）极力主张无私的劳动，但他们甚至不肯额外工作一个小时，也不能忘我……资产阶级特权必须被打倒，每天都被打倒，比如强调资格、强调级别……级别制度是父子关系，是猫鼠关系。它必须被不停地打倒……（毛泽东，1959）

除此之外，中国经历了两轮经济决策集权与放权的长期循环（见表3.1）。即使是在如中国一般相对贫困的经济体中，由中央来进行大

部分计划制定的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收集和传递信息存在很大的问题、处理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也很僵化。然而，地方分权的尝试也产生了缺乏整体合作的问题。在“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于光远，1984，第 76 页）的模式下，中国在集权与分权之间长期反复摇摆。

**表 3.1　中国的周期性集权与放权**

| | 1953 | 1957 | 1958. 12 | 1963 | 1971—1973 |
|---|---|---|---|---|---|
| 中央直接管理的企业数 | 2 800 | 9 300 | 1 200 | 10 000 | 2 000 |
| 中央部门统一分配的原材料数量 | 227 | 532 | 132 | 500 | 217 |

**资料来源**　于光远，1984，第 76 页。

然而，不管是企业内部激进的变革还是周期性的地方分权都使市场扮演了实质上更重要的角色。除了 1958—1959 年短暂的计划完全崩溃以外，物质平衡计划结构始终是完整无缺的。几乎所有的产品都依据计划指令生产，并交付国家批发机构。几乎所有的投资决策都由计划者而不是由企业决定。几乎所有的利润都上缴计划机构：

>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计划与市场规则是互相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服从于国家计划。如果企业有它们自己的计划，并允许市场规则存在，结果必将是混乱的，国家的整体利益就将受到危害。他们相信这就不应该被视为计划经济。结果，所有的企业都不得不僵化地服从国家计划，从而没有独立自主的空间。（许涤新等，1982，第 41 页）

47

**结果**

从表面来看，毛泽东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运行得不错。中国 1960—1981 年的人均 GNP 年平均增长率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世

界银行官方数据显示中国该时期增长率高达每年5%，相比而言，不包括中国与印度在内的低收入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8%，而且，在许多方面与中国最为相似的国家印度仅为每年1.4%。（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第148—149页）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接近于该时期发展中国家最快的发展速度。然而，近期的考察暴露了增长表现的深层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几乎所有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都在讲毛泽东主义增长模式的深层弱点和采取根本性政策措施对其进行矫正的必要性。

增长的模式是不稳定的，由两次大的政策导致的经济衰退干扰了长期增长的趋势。官方数据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产出量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衰退，据报道，实际国民收入从1958年的巅峰一直跌到1962年的低谷，衰退了3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4页）而且，在1976年后，这一事实很快变得明显，即50年代末的这次衰退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文化大革命”也导致了产出的一次大的下降，但没有前一次危机那样严重，据说在1966—1968年，国民收入缩水了10%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4页）

经济状况也有过一段长期的恶化。“国民收入”（净物质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8.9%下降到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5.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页）长期以来，资源使用的效率是下降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增长的产出资本比（资本每积累100元的国民收入的增长）从1953—1957年的0.32下降到1971—1975年的仅为0.1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8，第69页）国家工业部门的细致研究显示，资本的生产率出现了长期持续的衰退。①

① 陈康（Chen Kang）等人估计，1957—1978年，国家工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降低了大约0.8%。

在一个贫困国家，农业是经济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因为食物占据了很大的消费份额，还因为大部分的轻工业依赖于农业部门所提供的原材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超过80%的原材料来自于农业部门。（董辅礽，1982，第97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农业（净值）增长率为每年3.7%，几乎为同期人口增长率的两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1965—1975）中，农业增长率下降到平均每年2.8%，只是比2.4%的年均人口增长率略高。（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4、81页）

工业净值增长率下降到不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半，从每年19.6%下降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每年8.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页）建筑业的净产值增长率从19.4%下降到5.2%，交通行业的净产值增长率从每年12%下降到5.3%，而商业的净产值增长率则从每年8.5%下降到仅有2.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35页）

消费增长率也严重下降，从第一个五年计划4.2%的平均年增长率下降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2.1%。实际上，物质消费的官方数据显示在“文革”十年（约略如此），大多数重要商品的人均消费都没有明显的增长，而大多数被报道的消费的小幅增长都是由于高价耐用消费品积累的增多，尽管其水平仍然是很低的（见表3.2）。除此之外，产品的范围也很窄，而且质量差。

就像社会福利指标所反映的那样，毛泽东的政策在减少社会贫困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到20世纪80年代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婴儿及儿童死亡率水平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124人/千人，而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则为71人/千人，据说甚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81人/千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第192—193页）

**表 3.2　中国人均消费额的变化**

| | 1952 | 1957 | 1965 | 1975 |
|---|---|---|---|---|
| 粮食（千克） | 198 | 204 | 183 | 191 |
| 食用油（千克） | 2.1 | 2.4 | 1.7 | 1.7 |
| 猪肉（千克） | 5.9 | 5.1 | 6.3 | 7.6 |
| 牛羊肉（千克） | 0.9 | 1.1 | 1.0 | 0.7 |
| 鸡肉（千克） | 0.4 | 0.5 | 0.4 | 0.4 |
| 蛋（千克） | 1.0 | 1.3 | 1.4 | 1.6 |
| 水产品（千克） | 2.7 | 4.3 | 3.3 | 3.3 |
| 糖（千克） | 0.9 | 1.5 | 1.7 | 2.3 |
| 香烟（包） | 10.9 | 16.9 | 16.2 | 26.2 |
| 酒（千克） | 1.1 | 1.4 | 1.3 | 2.2 |
| 茶（千克） | 0.1 | 0.1 | 0.1 | 0.1 |
| 布（米） | 5.7 | 6.8 | 6.2 | 7.6 |
| 鞋（双） | 0.2 | 0.3 | 0.5 | 0.8 |
| 表（只/百人） | 忽略不计 | 0.2 | 0.3 | 0.9 |
| 自行车（辆/百人） | 忽略不计 | 0.1 | 0.2 | 0.6 |
| 缝纫机（台/百人） | 忽略不计 | 忽略不计 | 0.1 | 0.3 |
| 收音机（台/百人） | 忽略不计 | 忽略不计 | 0.1 | 0.8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国统计年鉴》，1988，第 803—804 页。

在贫困总人数保持恒定甚至上升的情况下，社会福利指标却有所进步，这是一个悖论。例如，这适用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非洲大多数地方和印度，如果人们承认其贫困线下的绝对人数在较近的过去
50 一段时间内增加了。增加收入比使社会指标进步更加困难。后者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做到的一样，而前者首先要求非农就业机会的增长，但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利于创造这样的就业岗位。虽然中国的工业就业人口的绝对增长数量是巨大的，从 1957 年的 1 400 万人增长到 1978 年的 4 300 万人，但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却没有翻一番（从 7% 增长到 1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 107—109 页）

贫困人口的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间迅速下降是不太可能的。世界银行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世界银行用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分析的标准相比，不少于28%的中国人口，即约2.7亿人的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世界银行，1992b，第ix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相似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在土地改革、定量配给以及集体农业的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等改革后的8年中有大幅下降。然而，很有可能的是，贫困线下的绝对人口数量在毛泽东体制下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多。如果大胆假设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50%左右下降到1957年的30%，那么贫困线下的绝对人口数量就会从1949年的约2.7亿人下降到1957年的约1.9亿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重新上升到2.7亿人左右。

中国经济以一系列不平衡为特征。这些不平衡源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只不过，这种体制在毛泽东那里进行了一些改变罢了。中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在许多方面都是比例失调的。

这种比例失调的第一个方面是消费和积累的不平衡。对投资的放任表现在一个高水平并不断上升的投资率上。“积累”率[①]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24%上升到第四个五年计划的3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3页）：“如果我们对积累基金的有效使用给予更多关注的话，我们就不仅能够确保更快的增长率，减少更多浪费，还能在消费水平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董辅礽，1982，第93页）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在1981年的总投资率为28%，是其他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的两倍，甚至比中等收入国家中较富裕的那些国家还要高。（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3，第156—157页）

比例失调的第二个方面是投资在各部门间分布的不平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给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在内的“非生产性”部门分配的

①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减去折旧，加上物质部门的循环基金的增加值。（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510页）

投资性资源相当少。[①] 它们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被大大压缩，从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总量的 1/3，下降到第三、四个五年计划的仅占 16%—17%。（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五部分）当 20 世纪 80 年代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以后，非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迅速上升，上升到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 40% 以上。（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五部分）特别是住房，过去被严重压缩，在第三、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占总额的 4%—5%，但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其份额迅速上升到 2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五部分）重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占国家投资总额 36% 的基础上迅速上升，而轻工业则萎缩至 5%—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五部分）

第三个比例失调的方面是不同部门和子部门的产出增长的不平衡。农业的增长率远远落后于工业。人均农产品净值长期停滞不前，1957—1975 年的年增长率仅为 0.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 年，第 34、81 页）另外，在农业部门内部，粮食产量的份额一直很高，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70% 以上。另外，在粮食产业内部，谷物又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在 1982 年，谷物仍占农业产总值的 49%。（农业部：《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1989，第 106 页）当农业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改革，市场力量开始发挥作用后，农业部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为农产品的供给效率不断提高，收入增加以及对更多品种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参见第 6 章）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重工业占到工业总产值的 5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58、60 页），体现了许多经济学家所说的资本品生产的“恶性循环”。计划经济导致了持续不断的

---

① 非生产性建设指的是“住宅小区、公共健康中心、公用事业以及其他那些满足人们物质和文化需要的行政组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 517 页）。

"投资饥渴症"，而投资品生产部门本身就是资本品使用的大客户："从 52
理论上讲，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这个道理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指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被忽略了。"（孙尚清、于光远主编，1984，第179页）

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的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份额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中国当时的客车生产还非常落后，但它的重工业比重已经接近于发达工业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内地工业中的重工业比重大约为64%，而香港地区的比重为67%，美国和日本为70%。（世界银行，1981，第16页）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机器、设备和金属制成品占总体工业产出的比重很大（30.3%），而食品、饮料和烟草的比重却特别低（为12.5%，印尼为44%，埃及和菲律宾也高于30%）。（世界银行，1981b，表1.8）其机器、设备与金属制成品的份额甚至远高于印度（21%），印度也是一个贯彻以资本品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国家。

## 3.4 结论

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体制，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无止境地发展下去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停滞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比苏联后期的经济发展得快。但是，即使是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经济状况也在恶化。在这两个经济体中，个人收入的增长率下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也许是停滞了，甚至很可能有所倒退，如果其生活水平能够被准确衡量的话。为了充分发挥既有资源的效益，使收入更快增长，这两个国家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

这两个国家不仅经济绩效较差，还面临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苏联，国民的很多社会政治权利都被剥夺了。由于经济发展的停滞，要 53

想维持这种剥夺的合法性越来越困难了。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阻碍了对体制问题解决方案的开放性探索。然而，在改革的前夕，中国“文化大革命”对党和政府形成的冲击使中国的行政能力更弱。国家的核心体制被冲击，而这在苏联从未有过。

在世界经济普遍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和苏联严重的体制问题进一步恶化。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们错误地预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共产主义国家“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论证资本主义世界，不管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越过一个临界点后就不会再发展。人们相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过度积累将会发生持续性的经济危机，并且由于垄断组织的发展，技术进步的动力将会逐步减少。而发展中国家被断定为不可能“赶超成功”，由于发达国家对它们进行资本榨取以及不平等国际贸易的有害影响。

面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内在资本主义制度持续发展的活力，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开始弥合与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差距的显著事实，上述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了。资本主义国家赋予了一种“反事实”假设的可能性，即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情况会更好一些，这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糟糕表现形成了压力。

上述两国的体制是否是一种国家危机呢？这两个国家都有严重的体制问题，需要根本性的体制变革。然而，两个体制都还未濒临崩溃。即使没有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这两个体制也不太可能迅速进入产出和收入锐减的阶段。确切而言，它们十有八九会继续缓慢发展，或者停滞不前。

# 4　正统转轨理论及其问题



## 4.1　从社会主义体制转轨的理论的缺失

苏联体制持续了较短时间，仅为 1917—1989 年。回顾这些国家的文献，不难发现，很少有文献着眼于转轨问题，即从指令性经济体制或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两种体制意识形态交锋的结果。

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有一大群知识精英，他们致力于批评共产主义存在的各种缺陷。这些文献大部分都认为由市场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理所当然。但是，很少有人同时谴责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更没有多少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缺陷——不可能带来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不可能实现完全就业和社会公平，同时会破坏环境。而且，由于强调政府在经济中的必要的作用，这些探索逐渐变得不再时髦。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很少有人试图逐步改革共产主义体制。在西方，关于此类改革的经验知识比较少，在共产主义国家本身甚至更少。例如，在苏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的倡导者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执行了死刑，他们的作品也遭到禁止。在中国，倡导引入市场力量以改善计划经济运行的人士都受到了极大的攻击，他们被剥夺了权力和话语权，并且基本上都被送到农村生活一段时间以便

进行改造。在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允许讨论的。他们已经“被指定”了意识形态，这使得整个国家没有能力打破这个制度。

55 近期最著名的对共产主义制度进行渐进式改革的尝试是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事实上，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舒尔曼（Schurmann），1964］试验至少同样重要，只是不被外界所知①。在关于匈牙利试验的最有影响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雅诺什·科尔奈（1986）的作品，它对上述试验持完全否定的评价。这种否定的评价对于共产主义国家考虑是否可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影响很大。该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较为流行，从匈牙利试验中所学到的教训也被广泛讨论。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被广泛且逐渐地解释为一种证明，即渐进的“折中方法”、“第三条道路”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并不可行，最后只有死路一条。这种观点在苏联解体和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达到高潮②。只有极少的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当社会科学家思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转轨”问题时，毫不奇怪，大多数分析在讨论之前只是将其简单化了，缺乏严肃的思考。而且这种分析很明显的地带有意识形态对抗之痕迹。这一章从不同方面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迅速出现的“正统的转轨理论”。

---

① 中国“新经济政策”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毛泽东提出来，刘少奇、周恩来阐发的。其中心思想是：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等。但受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变化的影响，这个政策未能实施。——译者注

② 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又译“丝绒革命”，是指东欧剧变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天鹅绒革命”也成为非暴力的通过和平方式更迭政权的代名词。颜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属于“天鹅绒革命”类型。——译者注

## 4.2　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

### 4.2.1　社会经济体制的“大跳跃”

*创造全新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好处*

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关注。[奥尔森（Olson），1982；雷诺兹（Reynolds），1985；诺斯（North），1990] 对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旧制度的完结为这些国家重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在旧制度瓦解的基础上建设经济和政治制度，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积累的智慧，避免许多国家曾经犯下的错误。这些可以称为制度上的“后发优势”：

> “大跳跃”只能在落后的、无效的制度被破坏之后才能产生……在历史上，大多数有活力的制度只是在巨大的破坏之后才重新诞生……像二战之后的西欧，中东欧国家拥有重新建立一个全新而合理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历史机遇，进而释放他们潜在的能量……我们倾向于一种名为“大爆炸”的方法……“大爆炸”方法的范围可能不好确定，因此需要对其做出描述。它最重要的特点是全面地、直接地和不可逆转地建立人性化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不包括“第三条道路”的“伟大幻想”，因为那条道路除了作为乌托邦的幻想之外根本不存在。[施泰因赫尔（Steinherr）①，1991]

众多大爆炸理论的支持者承认在转轨的过程中会产生“剧痛”。这与20世纪前期的“历史主义者”的观点出奇的相似，即鼓励通过革

① 这篇文章刊出时，施泰因赫尔是位于卢森堡的欧洲投资银行金融研究部的负责人。

命，跳跃进入共产主义。对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先辈来说，在今天的痛苦将会创造出明天的繁荣的信念支撑下，认为革命转轨中的痛楚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方向的努力是合理的。

### *政治经济体制的“大跳跃”问题*

从以上可以知道不存在任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这本身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因为该问题是第一次遇到。而且很显然，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政治经济体制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关系组成的交互影响的完整的巨大组织体。原则上说，这样一种机制运行的成功改进应该缓慢进行。很早之前，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就指出，试图使整个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大跳跃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 历史主义的每一个观点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不可抵抗的力量进入未来……他们的“动态”思想与他们先辈的静态思想有很大差异，他们相信自我的先进性可以使社会的变化在一个人一生的时间内实现，因为他们“生活在革命中”，这促使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当然这完全是个神话故事。（波普尔，1957，第160页）



他认为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可以和自然科学实验一样，较多地运用小心实验。他告诫说，希望通过巨大的制度改变而“跳跃”跨入太平盛世是“历史主义者”的幻想，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现在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者，都在鼓吹这种非实验的历史主义者所追求的幻想。

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即演化分析，强调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尼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1982］从根本上说，经济活动是由掌握有限知识的个人承担。一种经济制度是一个嵌

人个人思想的复杂的知识网络。摧毁现有的制度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人们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重构关于经济运行的知识。[莫瑞尔(Murrell)，1992]

许多领域的政策同时进行大跳跃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它无法补救预想不到的、不理想的结果。然而令人矛盾的是，这正是命令体制通常所导致的损失。一个微小的政策错误通常会导致政策方向的改变。实验之前的一项广泛采用的错误，在这项政策改变之前会导致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制度损失：

> 只有那些事前不作考虑，并且自己不会受损失的人才会采取突然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基于公式而不是事实。只要时间允许，就能进行思考——思考关注的应该是实际结果，而不是最初的意识形态。[加尔布雷思(Galbraith)，1990，第96页]

### 4.2.2 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的政府角色

*小政府的论点*

从第3章可以看出斯大林主义政府基本上是“失败”的。毫不奇怪，后斯大林主义的政府十分希望建立一个“小政府”。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初期，特别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了为了实现共同目标所需要的更宽泛的义务。这个论断在雅诺什·科尔奈的作品中做出了有力的表述：



> (我的改革方法是)自由的思想(用“自由”这个术语符合它的欧洲传统)。尊重自制和自我决定，尊重个人权利是它的关注点……它提倡将政府活动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它建议公民站在自己的立场行事，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主动性。可能政府的角色在以后会被重新考虑。但是现在，在转型的初期……需要在小政府

的方向上大步前进。可能以后的一代人可以正视更适合的折中的办法。（科尔奈，1990，第 22 页）

引进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小政府被认为可以给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全能政府的指导。俄罗斯的沙塔林（Shatalin）的 500 天计划就表达了这样的平民论者的期望[①]：

这项改革计划希望通过政府的而不是人民的代价而走向市场经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济政策从不考虑人民的利益。政府富裕而人民贫穷……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选择成为企业家、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或者股份公司的经理、进行个体劳动或者成为生活合作社中的一员……选择自由是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创造潜力的基础。［亚夫林斯基（Yavlinsky）等，1991，第 88 页］

支持“转轨”阶段的小政府观点的更进一步的原因是因为现存政府机构的低质量。尽管大家承认在转轨时，可能会存在大量的“市场失灵”，但由于政府是如此的不称职，所以更好的选择是自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无能和腐败：

官僚机构为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践理由，即使是存在“市场失灵”，而且纯理论描绘了细致入微的政策。把现存的官僚机构当做已经装备好的专业组织，并且能够执行以西

① 1990 年 7 月 28 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院士领导的专家小组，在俄联邦的 500 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 天计划”：《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500 天计划”主张对国有资产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除军工企业、核工业和天然垄断部门的企业仍属联盟所有外，其他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都应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译者注

方风格的“次优”理论为基础的复杂的政策，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官僚机构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垄断价格、推进幼稚产业发展或执行产业政策。[利普顿（Lipton）和萨克斯（Sachs），1990a，第35页]

*政府在转轨阶段作为一个强势角色的论点*

原则上说，在从一种社会经济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同时伴有经济结构的巨大调整的复杂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大量的“市场失灵”，这种说法非常准确。

这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不确定的时期。因此，投资者可能喜欢投入到有短期收益的领域。所以，国家干预资本市场，以确保长期投资能达到社会需要的理想水平就非常重要。

当经济从斯大林主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之后，将会产生巨大的个人不确定性。价格体系和消费品供给体系、福利供给体系、房屋的所有权和房屋组织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从一个地区、部门和职业转移到其他地区、部门和职业的人员流动。如果政府只是简单地退出这些领域，将会导致巨大的社会混乱。因此，在转轨时期，需要政府大量地介入这些领域，从而减少转轨过程中的冲击，并且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因为社会安全网的缺失意味着社会大多数弱势群体将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因此，在上述领域非常需要渐进的，强大的政府行为。

巨量资产的所有权一定会发生巨大改变。财产权的重新分配方式将决定国家未来的阶级结构。如果政府放弃控制转轨过程，那么很可能产生不平等的财产所有权结构。这种结果和财富资源，权力和获取信息的机会的初始不平等有很大关系。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偏好国家介入来保护幼稚产业。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体的改革提出了一个“幼稚产业”论点的极端形式。在斯大 60

林主义的经济体的大多数部门，不仅在技术层面，而且在整个制度组织上，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所有权结构等，相对于其他竞争国家，都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需要大量的政府行为以构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

只有经过复杂的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培训的官僚机构，才有能力成功地执行政策，以补救转轨时的市场失灵，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许多最重要的干预需要的是常识和经验，而不是较高的经济理论水平。况且，共产主义国家的官僚机构，从技术上看并不是特别没有能力，尽管他们的努力方向在指令性经济下被大大地误导了。成功的东亚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像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的早期盛行的正统的经济理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是采用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李斯特和熊彼特经济理论的混合折中理论。这些理论似乎更适合这些国家面临的“追赶”任务。[①] 事实上，他们缺少“西方风格理论”的知识，但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干预智慧。或许对他们的成功还有帮助，因为他们的知识背景使得他们不会把经济看做是与完美竞争一样的简单机制，而是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资本积累是增长的中心。

## 4.3 政治

### 4.3.1 政治民主化的论点

事实上，没有人敢于质疑最简单的正统转轨理论的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执政党是本质上最理想和最有效的实现经济增长的方法。人们提出许多理由支持这种看起来无可争议的论断。

---

① 参见张夏准（Chang H. J.）的讨论（1994，第 124 页）以及怀特（White）所编辑的《介绍》（1988）。

### 民主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

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民主制度是他们追求自身权利中最重要的发展目标。许多评论者认为民主至少和物质方面的福利一样同等重要。 61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过去几年的工作重点就是监测不同国家的人权纪录和批评其人权的失败之处。采取的形式是最著名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将“政治民主”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近年来，很多国际组织在很多场合都表示了对人权的极度关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将政治民主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条件之一。

“民主”不仅仅是指在选举中拥有投票的权利。它也包含广泛的公民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者有组成工会的权利“自由”。国际人权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国际特赦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ILO）一直在监测劳动者可以组成工会的“自由”程度。

### 民主制度和私有制不可分割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市场的作用，需要一个定义清晰的产权制度。从封建主义的不安全的产权制度中诞生的稳定的产权制度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要素。（诺斯和托马斯，1973；罗森伯格和柏赛尔，1986）这和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在议会中有政治代表人有关。许多评论者认为民主和资本财产权在西方国家同时出现是无需证明的。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许多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的演讲和采访中都表示了对此论点的支持：

> 关于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关系，历史上的证据都是一致的。我知道没有这样的事例，即在一个社会的任何时间或地点，具有高度自由的政治，但却没有采取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方法去组织大规模的经济活动……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历史是一般历史发展趋势中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情况。很明显，政治自由和自由市场以

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同时并进……自由的扩大和资本主义以及市场制度的发展相伴而生。（弗里德曼，1982，第80—81页）



### 极权政党不可能领导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大多数人认为极权的执政党不可能有效地领导一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运动，甚至不可能跨越市场活动所需的最低“门槛”。这些论断中没有一个比亚诺什·科尔奈的论断更有力量或更有影响。他严肃地批评了那些认为执政党自己可以使改革成功的“天真的改革者”：

匈牙利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统治者方面自发改变行为，而不是通过下层被统治的人起义的方式。因此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矛盾：如何获得那些改革成功后将会失去权利的改革者的积极参与。（科尔奈，1986，第1729页）

他敦促其他改革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匈牙利的经验中认识到，当权者领导的从“上层”开始的改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斯大林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是以政治革命推翻共产党作为最基本的前提：

一党专政的瓦解是向市场经济有效转轨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个论断被历史证明，那只能是东欧的共产党不可能有效领导一次激进的改革过程，从而创造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利普顿（Lipton）和萨克斯（Sachs），1990a，第34页]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推翻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提供自由政治选择的英雄，而这是真正激进的经济改革所需的实质条件：

人类已经试验过很多次第三条道路的解决方案。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直接影响了将近14亿人，是至今为止实施的最大的第

三条道路……这项大型试验迄今为止是失败的……社会制度改革所具有的不连贯的内部矛盾以及稳定性的缺乏表明它最终是不可能的。改革过程产生了一个异型组织，该组织包含了摧毁自身的种子：一个逐渐增长的内部压力，直至爆发。可以缓解这种压力的一种替代方法是权力的继承者通过暴力去抗击人们的不满，并使社会回归到第二条道路。另一种替代方法是将改革过程转变成一个政治革命变化的道路。那就提供了自由的政治选择的权利，如果那样的话，大多数的公众将会选择第一条道路。依我看，历史学家将会把戈尔巴乔夫和其他发起并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人看做为拥有不朽价值的人。（科尔奈，1992，第574页）



*外国投资者不会大规模投资到一个依然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该观点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西方对共产主义政府的评价很低，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动员国际资金来支持共产主义政府的经济转轨。"（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34页）

*民主不会损害增长并且能更好地促进其增长*

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支持此命题，即广泛的民主不会损害并且可能加快贫穷国家的收入增长速度。这个与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有关的著作，在这次辩论中非常重要。其中，达斯格普塔（Dasgupta，1990）的影响最大。在达斯格普塔的文章中，他通过对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实证发现，即发展中国家的大范围的民主似乎不会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的快速增长和……失去自由的抉择……是骗人的……抉择……从数据上看，社会不会面临这种两难抉择……政治自由……和人均收入增长呈现较显著的正相关的关系。（达斯格普塔，1990，第27—28页）

进一步说，此种观点与认为民主有利于增加人均收入的观点相差无几。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这种观点似乎是一个已经证明的事实，迅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主流思想。



### 4.3.2 转轨阶段的政治民主化问题

*大众民主一般发生在工业化之后而不是工业化之前或者伴随工业化出现*

一个国家很难在民主框架下实现收入从低到高的增长。没有任何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有过大众民主。事实上，在经济起飞阶段，政治权利都是在自由原则旗帜下，授予拥有财产的人，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允许城市或农村的工人阶级，贫穷的少数民族或者女人拥有任何政治权利。大众民主的发展不是在经济起飞之前而是在起飞之后。20 世纪后期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

> 资产阶级民主，与他们的雅典传统一样，首先只是统治阶级的男性成员拥有民主权利。只有经过漫长的斗争，这些权利才扩展到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有时候，这些早期政权的统治阶级的范围非常狭窄……有时候又相对广泛……但是无产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被排除在外的。[瑟伯恩（Therborn），1977，第 33—34 页]

毫无疑问，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社会经济团体之间存在广泛的利益分歧，并且由于自由的哲学观使得他们不可能通过民主的方法达至一个与国家经济发展相一致的妥协。（赫希曼，1977）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冲突是阶级冲突的核心。在工业化初期，工人阶级的贫穷意味着相对于未来的收入前景，他们更加重视现在收入水平，未来的收入前景建基于限制使用他们的垄断力量。而且，他们的贫穷以及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阶级距离降低了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在工业

化的早期，以民主为基础的能够满足维持较高的投资回报和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的合作方案难以实现。波兰尼（Polanyi）在关于英国工业化早期的论断中十分清楚地指明了这点：

> 当英国的宪章运动要求被剥夺权力者进入政府之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变成了无可辩驳的现存社会制度的一个条件。将新济贫法的管理权连其科学方法交给这一群人的代表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这个法案就是为了他们而设计的……在英国，剥夺工人阶级的投票权已成为一项不成文的宪法……大宪章通过斗争，争取停止这种市场压榨机压榨人们生命的行为。但是只有在经过可怕的调整之后人们才会被授予权利。（波兰尼，1957，第266页）



甚至西方自由民主的典型——美国，在18世纪后期，也是在同样的自由原则下开始逐步建立的，就像英国——这个让他们挣脱开镣铐并获得自身解放的国家——一样，投票权以财产条件作为基础：这不纯粹是偶然情况，当英国和殖民地的冲突发展到顶峰时，大陆会议应该以自有土地所有人的语言向自己的母国呼吁："为什么美国的自有土地所有人不能要求国会：拥有与英国的自有土地所有人同样的权利?"［威廉姆森（Williamson），1960，第19页］取消投票权的财产条件限制直到1860年才最终实现，即使在那时候投票权也不包括女人、绝大多数的黑人和印第安土著居民。（威廉姆森，1960，第278页）事实上，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南方最恰当的描述是"农场主主导的独裁政治体制"［鲁施迈耶（Rueschmeyer），1992，第122—132页］。

###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经济增长*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俱乐部的最新成员。

最近，大多数的关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把其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归于“相对自治”的政府[①]：

> 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把经济管理从分配要求，寻租和赞助支出隔离出来的制度，体现了一种能力，这是本质区别……韩国领导层一门心思追求经济增长的目的，受到独立的执行权力的保护，和政府的立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无关，并且工会对其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巴德汉（Bardhan），1984，第72—73页]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循着日本的道路，专注于利润动机和市场机制。但他们也认识到在现实的世界，国内和国际市场非常不完善，而且若想在一个贫穷的经济体内驾驭充满活力的市场力量时，进行大量的行政干预是必须的。[②]

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具有相对的自主权，这使得他们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有效政策，从而确保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增长。萧万长，台湾地区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在1994年坦率地指出：民主使得经济更加透明和公平，但是缺少效率……在实行军事管制时期，我们只是做了对政权正确的事情。现在想做出决定难度更大。（引自1994年10月10日的《时代》杂志）威权主义下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这对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配置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他们成功地建立了拥有外部正效应的各个经济部门。他们使汇率保持或接近自由

---

① 参见怀特1988年编辑出版的著作和阿姆斯登（Amsden）1989年出版的作品。

② 不是通常都如此。比如，香港地区就享有独特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在供给方面），即政府的干预较少（尽管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干预更多的是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的积累，那么政府干预的结果最终可能比自由市场的结果更糟糕。当然，认为“政府失灵”通常要比“市场失灵”还要糟糕的说法也是不适当的。迪帕克·拉尔（Deepak Lal）强烈地认同这一观点（Lal，1983）。然而，在制定发展政策时需要警惕“政府失灵”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作为最后的手段，“政府失灵”可能会比“市场失灵”更糟。

市场的水平。他们灵活地参与保护国内产业，不会经常性地承受游说团的寻求保护的压力。他们使用的保护方法只会在最低程度上扭曲资源配置，例如，关税一般倾向于使用配额制度，出口商一般可以按照在世界市场价格水平获得保护性的输入。他们也成功地控制了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并把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允许不具备较强正外部性的国有企业长期存在。

###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

印度几乎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一个长期追求民主制度的实例。政府需要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投票箱发表意见，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使得选举充满了竞争，这使得需要长期保持一贯的政策，从而阻碍了印度的经济增长。许多部门长期保留了贸易保护主义壁垒。汇率维持在一个损害出口的水平。国家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对国有企业施加硬预算约束，从而不能更好地利用稀缺资源。国家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改革。国家必须将大部分的支出花费在安抚地区和阶层利益上而不是刺激国家收入的增长："因为缺少协调利益冲突的政治隔离以及白领工人在公共官僚体系中强大的权利基础，这使得印度政府的职能——尽管它在经济中广泛存在——大部分都被限制在调节的作用上，这样就使印度政府不会在更加活跃的发展作用上做出艰难的选择和政治上不愉快的决定。"[巴德汉（Bardhan），1984，第38、74页]



### *民主和增长的定量研究的严重问题*

通过对达斯古普塔广泛引用并得出结论的数据的详细检验表明：更加谨慎的结论比通常得出的结论更加有效，特别是把这种结果运用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上。

达斯古普塔（1990）提供了几对"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政治自由、公民权利、收入水平、收入增长、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其中几个相关系数确实很高。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民主、婴儿

死亡率的下降和收入增长、预期寿命的提高和收入增长，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等之间分别有较强的或特别强的相关性。这些都不奇怪。但是民主和收入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则比较弱（而且公民权利和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弱，达斯古普塔，1990）。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相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自由的水平都比较低。[德比夏尔（Derbyshire）和德比夏尔（Derbyshire），1991，第3章] 因此，在那些只有极少的政治自由的国家中，不可能发现收入增长和民主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或者负相关关系。

这种相关性没有告诉人们它们之间的任何因果联系。到目前为止，如果收入增长和民主之间有相关性，那更可能基于这样的先天条件，即因果联系是从收入增加到民主的需求而不是相反的方向。[①] 除了极少的例外，关于政治自由水平的最显著的事情是（例如，哥斯达黎加和斯里兰卡），只有高收入的经济体才有高水平的民主。这就提供了一条非常不同的政策制定理由。也就是说，构建稳定的坚实的民主权利的最好方法是首先确保生产力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



横截面数据的研究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水平和经济增长没有负相关的关系，这对专制国家的民主发展产生了错误的引导，无论是在非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的前共产主义国家。他们没有提供将高水平的民主（发达国家民主）引入贫穷国家的效果指标。而且，这些研究——例如达斯古普塔的研究——没有分辨拥有稳定民主的国家和从一种水平的民主向另一种水平的民主转型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提倡将专制国家民主化的政策必须详细审视民主化的进程，以便观察将专制制度民主化的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更快还是更慢。

---

① 在每一个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最显著的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成功的发展政策使得人均产出和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随后导致了对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大规模需求。而且，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随着收入的提高，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大规模诉求随之而来，这种趋势是政府最终难以抵抗的。

共产主义体制的民主化过程中没有政治制度急剧变化的先例，并且将得自不同情况的结论不分条件地加以运用是非常有问题的。分析这个现象的最好的方法可能是简单地思考一下历史的经验和过程中的逻辑。在一个过程没有发生之前是很难通过量化的方法来审视的。

### *劳动力市场中的民主是很模糊的概念*

民主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不可分割，但是在劳动力市场，“自由”的含义是复杂和模糊的［费尔普斯·布朗（Phelps Brown），1983，第二章］。将社会的一部分人，即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权利和整个社会的权利相混淆，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大。不明显的是，以男性劳动者为主的贵族和产业工人阶级总是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潜在代价以满足他们道德上较高级的组织要求的权利。这些其他社会群体，不只是资本家，还包括许多没有雇佣工资的女人、退休人员、农场工人和其他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如果对“劳动贵族”的权利的保护超过其他社会群体，那么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增长，并且由于产业部门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提高会损害无组织的工人的雇佣前景。

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早期阶段，无论是19世纪的欧洲还是20世纪的亚洲，自英国的联合法案颁布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几乎都会介入以防止产业工人在劳动力市场形成垄断权利。如果没有建立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前斯大林主义经济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创造有效的市场是有待商榷的，反过来说，在民主制度下是否能完成这个目标也值得讨论。改革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在从一个为了城镇“劳动贵族”设置特权的体制向一个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体制转变时面临巨大的困难。在民主制度下建立一个充满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政治代价可能比较高。大部分的国家预算可能不是用在重新培训和重新组织方面，而是用在补贴方面，以便保证政治上危险的工人安静地呆在他们原来的工作岗位。

在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价格自由化肯定会

创造需求以补偿货币工资的增加。没有一定形式的收入政策，可能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螺旋发展的危险。而且，工会和政府的反应习惯很快就会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政治经济制度很难摆脱工资—货币—价格的螺旋发展，一旦这个过程开始运转将很难停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拉丁美洲（高通货膨胀）和东亚国家（低通货膨胀）在这方面的对比很有教育性。①

*不允许市场经济的发展是错误的*

原则上，设计一个共产主义制度（由共产党领导的）的转轨过程是可能的。关键是在转轨期间要给大多数党员提供有用的工作，并且按照他们的新角色提供满意的货币和心理报酬。而且，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成功地实现经济的繁荣，那么最终共产党完全有理由在民主选举制度下成为主要的政治党派。



有重要的历史事例支持这样一个论断，即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专制共产党可以转型成为一个“理性的威权政党”。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苏联在经过了高度集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后，苏联共产党在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的同时，认识到国家经济的成功需要增加市场力量的作用。由于高度中央集权和自律，1949 年中国共产党从内战中脱颖而出。共产党对根据地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实行了严密控制。从解放初期到 1955—1956 年的大规模集体化，伴随着严密控制，共产党开展了政治和文化事业，实施了混合经济，在很多经济领域进行指导而不是直接的计划。最后，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斯大林主义时期开始，不仅中国的共产党，其他国家，例如缅甸、越南和老挝的共产党也都领导了本国的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如果共产党可以成功地引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进入市场经济体制，释放被斯大林体制所束缚的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很有可

---

① 关于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的民粹主义立场，参见多恩布什（Dornbusch）等人的 1991 年著作。

能通过实施“领导的威权主义”把国家从专制统治体制转轨到民主体制，并且始终拥有权力。这种前景可以保证大多数共产党员被有效雇佣并促使他们支持转轨。

外国投资者会担心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投资，这种论断显然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力量。20 世纪 90 年代，首先在中国，接着在越南发生的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使得这个论断显得特别愚蠢。这两个国家仍然都是由共产党统治。相比之下，流入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直接投资的规模却很令人失望。①

### *在后共产主义的民主制度下很难维持国家的统一*

民族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很复杂。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统一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得以实现。在 19 世纪，德国和意大利都是通过暴力战争才实现国家的统一。尽管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美国内战中的基本问题不是奴隶制度而是国家统一。② 最终的经济一体化无疑在经济上更合理，但是统一是通过暴力而不是民主的程序完成的，并以极高的代价在维持。当今的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在 19 世纪借助于英国暴力创建的。在独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印度中央政府领导了大规模的针对分裂运动的暴力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最著名的是在克什米尔和旁遮普。

在众多的前斯大林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和地区分裂主义力量很难处理。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当新的共产主义者诞生之后，统一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意识应该消失。然而矛盾的是，资本主义比非市场经济的斯大林主义经济能更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后者限制人员的



---

① 1992 年，中国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为 111.45 亿美元。（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第 204 页）同一年，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的吸引净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仅为 28.25 亿美元，叶利钦领导下的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获得的净外国直接投资为 1 亿美元。（联合国，1993，第 239 页）

② 1862 年 8 月，林肯总统宣称：“我在这次战斗中的最重要任务是拯救美国，而不是拯救或者毁灭奴隶制。”在反对南方分离运动——发生在 1861—1865 年——的斗争中，超过 60 万的士兵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流动并且孤立他们，使其远离体现在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中的国际文化的影响。在斯大林主义下，国家的少数民族意识处于深深的冷冻状态。一旦从斯大林主义的束缚中解脱，这些力量将会爆发。斯大林主义体制消失后，成功的经济增长为不同的民族提供了机会，并且通过市场的同质化力量，形成一股可以消灭种族分歧的巨大力量。

拥有高度整合的地区生产结构的大型共产主义国家的边界的快速改变会引起很大问题。除了国际政治关系需要重新讨论的困难之外，还得创造新的产品交换基础。这种不稳定性本身将会对产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以前属于中央政府，而现在属于新独立国家的资产的所有权突然出现了不确定性。这个问题需要时间解决，或者解决的方式可能损害增长。劳动力的处境也出现了巨大的不稳定性，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生活在“外国”。一个大的国家分解成一系列新的小国家是由激进的改革引发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激进的改革迫使每个人放弃他们的旧知识，并学习一套全新的关于经济过程的知识。



没有政治稳定，经济生活将会瓦解。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投资者都没有信心。如果政局不稳定，几乎就意味着国家机构无法领导经济发展。国家收取赋税甚至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会减弱。国家的精力被引向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朝后期中央政治权力的崩溃对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了坏的影响。在中华民国时期（1911—1949），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地区是那些在整个国家不稳定的情况下社会仍然保持稳定的地区。①

后斯大林主义社会在共产党下台之后谋求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时，很可能面临巨大的困难。一个能建立一整套清楚的并代表其选民的政策选择的政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出现。政治的不稳定性会由于急速的

① 这些区域主要特指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日本所占据的区域（主要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和台湾地区）与以外国炮舰作为后盾的通商口岸。

政治转轨而增强，这会引起草率的决定——关于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规则，比如选举投票方法。

### *自由与平等的选举是民主的非充分条件*

人们利用政治权利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他们需要在政治活动中花费的精力。如同其他“资产阶级权利”一样，利用权利的能力取决于国家的阶级构成。如果后斯大林主义改革伴随着财富的快速分配和从旧的共产主义权力结构出现的行政权力的重新集中化，那么民主水平是否能真正提高将值得怀疑。从自由组织政党和争夺选举权等权利中获利的能力和拥有的财富关系很大，后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控制大众传媒对于共产主义产生的初级阶段尤其重要，因为人们对于民主实践毫无经验。

“自由平等”选举中的“投票权”和选民被给予的选择权的意义相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中，选举纲领逐渐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可以合理地预测出来。现代发达国家民主政策的最激进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在保守党选举宣言中清楚地指明了该纲领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工会的立法以及部分国有工业的私有化。制度变化带来的效果非常大，符合预期。

然而，在改革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为选民提供了一个完全的、更加激进的制度转轨计划时，民主原则将会出现问题。投票人无法评价这个计划的可能影响。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计划往往比较模糊（例如，“转轨到市场经济”，“创造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改革的计划越激进，政策回转的可能性越小。不幸的是，大多数选民在下一次选举之前可能已经对这个计划不再迷恋，但他们没有机会表示不同意。

### *贫穷国家的最重要的人权是大众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贫穷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提高大多数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换句话说应该是过上富裕生活方面的“人权”。最理想的政治制度是能最好

地实现这个目标的制度。即使是居住在初始收入较高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许多社会群体，特别是穷人，也更加看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民主权利。况且，在后共产主义时期，随着他们的收入水平和保障水平的改变，他们的目标的重要程度排序可能会迅速转变。

如果国家成功地提高了大众的收入，那么将会为长期的民主建立了稳定的基础。事实上，在大众收入和文化没有引发他们自身需求变化——来自于大众的葛兰西式的组织风尚①——之前，国家就从“上层”开始建立不成熟的民主制度，会出现很大的政治“再次犯罪”的危险，即从正常的民主转向专政（像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印度流行的许多争论），或者如许多贫穷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一样，
74 在正常的民主和军事专政之间摇摆。不可能所有的前共产主义国家都可以避免这种政治的“再次犯罪”。在一个成功地提高了收入的国家，大众允许转向专政统治的可能性较小。

### *在民主框架下，后斯大林主义的巨大结构改变难以生效*

从斯大林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在技术层面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都非常复杂。它是一个像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正如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运动一样，许多的既得利益集团会直接受到转轨影响。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区域、阶层或部门的人员，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人员的命运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改革为某些社会群体提供了获益的机会，但是对其他群体来说，获益可能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大量的工人和经理需要学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生存，并且学会应对潜在的或实际的破产和失业的心理压力。

转轨带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会引发冲突，并可能

---

①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强调文化自身的功能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力作用。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占有是通过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实现的。因此，教育和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备条件之一。——译者注

使它进入两种非民主的政治解决方案中，这两种方案都会被称作“威权主义”，并经常冠以“新独裁主义”之称谓。事实上，这个称谓隐藏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一种“新独裁主义”的解决方式认为：为了加快向资本主义经济转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强硬”和非民主治理是合理的。为了压制那些将要在转轨中失去大部分财产的人的潜在的反对，威权主义是必须的。因为这些人在民主制度下可能阻止“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让转轨过程更受控制并缓慢进行，构成了在转轨中需要“强硬”和“威权政府”的另一个理由。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府能更好地用权力防止财产不平等的迅速增长，能更好地防止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转轨过程中受到更大的伤害。

## 4.4 经济



### 4.4.1 “休克疗法”经济学

共产主义国家的革命是内部广泛的对政府的不满和外部的被政策顾问主导的学术气氛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人们对政府通过计划来实现国家目标有很大的信心。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遭到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以前对政府的天真信任被现在的天真地相信市场所代替。两个重要的实践经验造就了如此的政策氛围。

第一个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从布雷顿森林机构给予发展中国国家的建议中获得的信心。富有影响力的国外顾问向斯大林主义经济体推荐的一揽子政策与向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贫穷国家推荐的稳定化和结构改革一揽子政策相似：“我们学到的东西和东欧国家有多大的关系？很明显，我们不是要修复一个现存的遭到破坏的市场经济而是启动一个新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因为初始条件差异很大而需要

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认为不是那样。大多数标准的稳定化一揽子政策也适用于东欧国家。”［布兰查德（Blanchard）等，1991，第1页］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并受到世界银行广泛支持的针对“经济困难”国家的稳定化和结构调整一揽子方案中最有名的是：迅速的价格自由化和减少政府补贴；从紧货币政策下的平衡预算；国家货币由自由市场决定；货币可兑换；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迅速地向可忽略不计的关税过渡；向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实施制度改革，包括银行和工业企业的私有化。

第二个是对从“市场社会主义”试验中得到的有限证据的解释方式。市场社会主义的事例很少。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匈牙利的事例。主要是借助于雅诺什·科尔奈的有影响力的著作，这个被广泛认可的经验是：任何解决计划经济问题的“折中方案”尝试——计划和市场联合——都注定要失败：



> 在匈牙利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则成为改革过程的指导思想……在这个原则下，国有企业应该保持国家所有权，但是应创造合适的条件，使这些企业好似处在市场竞争中，是市场的一部分……我希望在此使用强硬的词语，没有任何修饰：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完全失败了。南斯拉夫、匈牙利、中国、苏联和波兰见证了它的惨败。时代应该正视这个事实，放弃市场社会主义的原则。（科尔奈，1990，第58页）

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休克疗法”经济学达到高潮时几乎成了信条。

东欧和苏联的改革顾问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有力地证明了某些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不可能成功地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科尔奈、哥穆尔卡（Gomulka）和普瑞比纳（Prybyla）等学者的观点极大地支持了西方顾问的看法，这些西方顾问在给苏联和东欧国家提供建议时，实

际上对中国的改革几乎一无所知：

> 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试图引入现代经济制度的不成功经验中有一个非常有益的教训，这个教训东欧国家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个教训就是在一个能力低、效率低、懒散的、浪费的社会制度下，用现代的方式解决经济问题时，必须直接迅速地转向市场体制，不要在中途停止。在路途中慢慢地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前进，最终不会有任何出路。（普瑞比纳，1990，第 194 页）

正统的转轨理论与 1968 年匈牙利改革和 1978 年后的中国渐进式改革不相关，因为该理论已经牢固地嵌入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思想。1991 年，在他们的主要杂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论文》（*IMF Staff Papers*）中，伯恩斯坦（Borenzstein）和库马尔（Kumar）得出结论，在快速全面地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损失一定很大，特别是在资源配置不当的部门”，但这还是一种人们乐意采用的方法，“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央计划制度的折中转轨方法只能产生不太好的结果”。 77
（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 231 页）

正统的转轨理论所包含的主要经济要素将在以下的段落中列出。

### *全面融入世界经济*

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必须去掉共产主义体制下的“扭曲的”价格和世界市场的价格之间的藩篱，而且这个过程必须迅速完成。该理论认为只有少数几个部门需要保护，而且这种保护也仅仅出现在短暂的转轨阶段：

> 为了加快……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必须迅速向透明和分散的贸易体制和汇率体制转变。汇率需要转移到市场出清水

平。只有几个部门需要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的竞争隔离一段很短的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以及其他人，1990，第17页）

国际经济关系需要迅速自由化，以实现本国与世界经济的完全融合，这种认识被改革国家的激进改革者所接受。1990年，俄罗斯的沙塔林计划就是一个例子，他们认识到俄罗斯的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相隔绝，解决此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放开贸易，以使其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

这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制度导致我们的工业部门处于恶化和停滞的状态。打开国内市场将会迫使我们的企业家面对便宜的进口商品竞争。这将会使我们的经济充满活力，并能灵活地应对市场状况并通过市场将产品销售给消费者。[亚夫林斯基（Yavlinsky）等，1991，第219页]

1829年，约翰·克劳福德（John Crawford）用几乎同样的口吻敦促英国议会将印度推向完全的国际竞争："只有通过竞争的强有力的激励，印度才能崛起。虚弱与无知必须和强壮与智慧一块碰撞，因为这是唯一可以磨砺和激励他们的官员并且是在社会范围内提升他们素质的方法。他们必须公开吸纳高级文明。"[引自斯托克思（Stokes），1959，第42页]



全面的货币可兑换必须迅速完成，以便"确保他们的货币可以自由换取产品和外币"，这样他们国内的价格将会与世界市场的价格保持一致。[菲莱克（Fieleke），1991，第276页] 如果阻止外资使用可兑换的货币赚取利润，并将利润送达国内，那么外资将会受到极大的阻碍。（菲莱克，1991，第277页）

### *私有化*

**政治目标** 布雷顿森林机构对于通过快速私有化来推进指令性经

济体的制度改革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私有化可看做是将生产领域的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体中重新引人的不可分割的过程。"（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30页）而且，从政治的角度看，生产设备所有权的快速转轨可以确保旧的政权的彻底崩溃。（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31页）

政府追求快速私有化的改革代表了一种大众喜爱的政策。相对于旧时代"人民"只是表面上拥有国家的财产，私有化的吸引人之处是可以使他们再次成为真正的主人。俄罗斯的沙塔林500天计划按以下的方式表达了这个平民关注的主题：

> 财产所有权通过去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方式实现，将国家的所有权交给人民。将财产权交给人民之后，经济的社会发展方向将会自己显示。该行为不是报复而是社会正义的体现——一种使每个人有确定的分享国家的现在和将来的财富权利的方式。对于私有化来说，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愿意选择接受这些责任的所有人民来说，它是一种确定国家责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方法……每个人手里的财产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是防止社会和国家出现灾难的一个重要条件……私有化计划给了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实际上每一个人，即使他没有可观的原始资本，都将会有机会分享国家财富。（亚夫林斯基等，1991，第217页）

79

**经济目标**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财产权的私有化可以促使管理财产的人最小化生产成本，并根据市场信号决定产出。（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29页）私有化提供了唯一可行的"让产权所有者监视、评价和控制经理，使他保持企业有效地运转"的方法。（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29页）

将"企业留在公众的手里"，但"要求他们在运行中针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这种可能性被明显地否定："不论是东欧国家的历史证据

还是理论上的推导，都显示答案是否定的。”（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29页）为了追求更广泛的目标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发现不插手公营企业是不可能的。政府不能抵御游说压力，强迫接受“硬预算约束”，也不能宣布亏损的公营企业破产。而且，独立的公营企业只能被股票市场有效监督。这使得论断更加全面：“然而，有效股票市场的运行要求企业被私人拥有或实际控制，而不是政府。”（伯恩斯坦和库马尔，1991，第230页）换句话说，私有产权需要一个股票市场，一个运转良好的股票市场也需要私有产权。

《经济学家》总结了正统的转轨理论在私有化方面的特点：“通过去中央化引入市场力量是浪费时间，除非经济环境能做出正确的反应。这需要具有两个条件。首先，资本的私人所有权。其次，硬预算约束，这反过来需要竞争，需要限制税收和补贴以及仅对商业条款适用的信用。”（《经济学人》，1990年4月28日，“关于新思维的调查”，第15页）

### *“保持价格合理”*

价格改革必须完全快速地完成。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构成“无缝之网”的其他要素不会成功：“在价格可以根据国内和国际的供求关系改变而自由做出反应之前，市场不可能开始发展……结束影响经济发展的商品短缺问题必须放开价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17页）增长的主要动力被形象化为市场提供激励，即价格正确地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当……收入流作为对激励的反应被创造出来时——此激励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社会面临的交易，实际收入就可以快速增长。（克鲁格，1992）对于利普顿（Lipton）和萨克斯（Sachs）而言，简单地引入自由市场机制和财产私有权就可以确保东欧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

> 如果货币可兑换、自由贸易、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部门的自由化都完成之后，自然的市场力量将会降低差距——波兰人均收

入1 100美元和西欧10倍于波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352页）

### 从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步伐需要迅速完成[①]

有一个普遍一致认可的观点，即一揽子改革方案的主要部分应该迅速生效。改革需要迅速是由“无缝之网”这个事实决定的。关于该主题的经典论断之一包含在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的著名文章中：

> 经济逻辑和政治情形都要求一个全面且快速的转轨过程。东欧的历史让我们懂得，零碎改革的方式存在巨大弊端，同时，经济逻辑也支持快速转轨的可行性……转轨过程是一张“无缝之网”……经济战略必须认识到新的政治环境背景，即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迅速，直接和明显的经济改革计划。（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34、350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且表示迅速和全面的改革计划将会用一个神秘和无法确认的机制引导成本和利润的广泛分配：

> 鉴于经济之间的联系，全面改革会提高一种可能性，即计划的每一部分将互相影响。而且，全面的改革可以确保经济转轨的成本和利润可以被广泛分配而不是集中在社会的某个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引自菲莱克（Fieleke），1992，第274页]

① 提倡快速的、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来实现成功转轨的经济学家很多，他们的作品可以列一个很长的书单。科尔奈认为匈牙利改革的失败就受到了关于后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改革的早期思维的深深影响。

利普顿和萨克斯认为转型将会导致严重的问题。他们相信实施全面的一揽子改变方案是政治上更可行的方法，因为一个不如意的渐变，将导致改革进程的逆转："面临严重经济危机的虚弱政府，在任期开始最好采取强硬的政策。因为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最著名的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所有的坏消息一并提出。"（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350页）他们赞许地引用这个类比：如果你想要砍掉猫的尾巴，那么应该一次砍掉，而不是一点一点地。（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350页）

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Aslund）呼吁用"常识"支持迅速转轨。他最著名的言论是将转轨进程比作翻越一个深沟：常识表明如果你想要跨越深沟，你应该迅速跳到另一边，而不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没有任何理论支持渐进式的制度改革。（阿斯伦德，1990，第37页）

### 小企业是未来增长和繁荣的关键

大量的证据证实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制造业生产效率较低。共产主义国家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能销售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而且，当后共产主义国家，最著名的是民主德国（GDR），一旦向国际竞争市场全面开放以后，大部分的国内制造业都不能存活。前共产主义国家接受的大部分建议和他们自己的政策制定者都认为，如果不是所有的，至少大多数大型制造业在市场开放后需要倒闭，特别是在重工业。试图支持或重建重工业被认为是资源浪费。大部分增长来自于中小型企业的新生产活动：

> 东欧国家的大部分生产行业由大型的、低效的公司组成。如果不是大部分，至少是一些应当倒闭，其他的企业需要大规模地分流劳动力。大部分的增长将会来自其他经济，目前这些经济还处在萌芽阶段。迫切需要的是中小型企业，高科技制造业和大部分服务业……重建的挑战将是有效关闭旧组织，并允许新的工业

企业快速扩张。（布兰查德等，1991，第64—65页）

在俄罗斯沙塔林计划中，就包含小规模企业具有优越性的信念，该计划以大众喜欢的方式表达：

> 政府将会通过减税和信贷优惠支持小企业应对大企业。该计划设想，社会需要小企业生产每个人需要的产品，以便应对大企业对消费市场和生产市场的垄断，并且为快速引进新科技思想创造有利的环境（中小企业乐于接受这个观点）。（亚夫林斯基等，1991，第219页）

### 付出才有收获

“休克疗法”的倡导者认为改革将会导致巨大的阵痛。事实上，“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通过各种比喻宣传经历许多“痛苦”之后可以得到的最终“收获”。他们经常把改革者面临的选择与外科医生面临的选择作比较。就像不情愿的外科医生遗憾地告诉病人：他（她）只有通过艰苦的手术才能生存，改革国家的顾问告诉困惑的政府：只有通过痛苦的“手术”才可以拯救他们的经济：

> 10个不同种类的半数总和不是5个成功，而是5个失败……如果对一个人来说只有切掉他的腿才能治愈疾病的话，那么通过使用必须的麻醉做一个切除手术比一个长期的手术计划，而且每周或每月切除一块更仁慈。（科尔奈，1990，第159—160页）

斯塔尼斯拉夫·哥穆尔卡（Stanislav Gomulka）在一篇简短但有影响力的新闻文章中说明了这个问题： 83

> 波兰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将是扑灭（通货膨胀）的火焰。货币政策必须从紧。中央政府赤字和企业赤字都将减小，因为价格可以自动地维持供需平衡，因此可以减少短缺。价格的自由和补贴的取消可以呈现出亏损的企业，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将持续亏损的企业关闭。如此结构改革可以增强波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也会导致失业……波兰经济明显需要一次外科手术来去除陈旧的和低效的产业。（哥穆勒卡，1989，第 5 页）

虽然认识到快速改革将会给自身带来一些问题，但最终可能获得的收益使得冒险可行。仔细衡量了这条道路的危险性之后，布雷顿森林机构总结道：

> 苏联激进改革的早期，产出急剧下降和价格快速上升的前景会令人气馁……在我们提倡这种激进道路时，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警告者的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1990，第 18—19 页）

大家普遍认为，如果实施激进的改革方案，将会出现产出和生活水平的初步下降。但在经过了最初的下降之后，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将会在短时间内带来快速增长。关于他们为苏联提出的计划，布雷顿森林机构评论道：

> 从产出水平下降中恢复可以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进一步的强势产出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将会在剩下的十年和更长的时间里出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1990，第 18—19 页）

### 4.4.2 正统的转轨理论在经济学上的缺陷



*经济改革政策的理论和实证基础已经过时*

改革国家的顾问和经济学家都普遍认为，西方经济学理论所积累的经验已经表明，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市场制度，可以推动共产主义经济转向繁荣。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为世界其他国家医治其经济疾患所提倡的老药方。对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基本原理的全面探索看起来并不比19世纪早期的论断高明多少，当时的经济学家，例如莱斯特关于印度的问题就提出：

> 广阔的印度半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战争和贫穷折磨，导致了财产非常不安全。但如果它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并由一个温和、自由和有效的政府所领导，同时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国民财产、法律、生命和自由，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我们不曾预料的变化？（莱斯特，quoted in Stokes，1959，第38—39页）

这些希望仅仅是个乐观的幻想。在此制度统治下的印度——该制度被莱斯特和其他一些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所提倡——在过去一百年经济年增长率仅为0.4%左右。（赫斯顿，1983，第410—411页）

西方经济学理论累积发展的结论远远不能支持如正统的转轨理论所想像的市场“无形之手”的力量。更加复杂的分析认为，“无形之手”不是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法宝。汉（Hahn，1984）曾对无形之手作过评价，并警告那些看重无形之手的人注意其有限的适用性：

> 采用纯粹市场理论的局限性很多，其中一些甚至非常严重。无形的手出现的例外情况不断堆积，亚当·斯密和后来庇古都研究了这些例外情况。我们关于这只手实际运动的知识很有限而且

非常不完整……斯密的观点虽然提供了一个基准，但是越来越远离现实。如果不能认识到它的有限作用，那么会有被它所误导的危险。（汉，1984，第 132 页）

85

而且，汉对于“无形之手”学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适用非常谨慎。他对来自于经济理论的经济政策的审慎评价与那些在正统的转轨理论具有极高热度时，充斥于杂志、报纸和政策文件的对于无形的手的无知的宣传相比，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 关于无形的手的最主要结论应该是我们不能确定实际情况如何发生。否则就会是由宗教或魔术般的头脑中想出来的借口。一旦这个不确定性被认识到，它将会极大地影响一系列理性行为。传统的理论……认为例外和几乎是灾难性的情况不同。一般来说，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或者猛力地推杠杆是不明智的做法，除非你是一个被经济学家所称的风险偏好者。偏好风险本身是不理智的……这就是原因……缓缓地、一步一步地，一件一件地做的方法我认为是唯一的合理的经济政策。（汉，1984，第 3 页）

汉观察到“很少有人可以活在虚幻的和不清楚的世界里”。因此他“不会在合理的能够赢取胜利的道路上做赌注”（汉，1984，第 133 页）。“无形之手”的学说为巨大的和复杂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任务，提供了一个能够慰藉人心灵的简单解决方法。为了建设“自由市场经济”，最需要的一切就是“改革”。

对于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的夸赞，汉持谨慎的不赞成态度。而这些称赞正是激励共产主义国家倡导“改革”的来源：“在这些国家，夸大无形之手的不能完全实现的作用，很可能导致这只手的反作用，导致我们的巨大损失，并且会毁掉一切。我们处在一个先知和巫术笼罩的时期，而不是一个对理性友好的时期。”

（汉，1984，第 133 页）

不同国家的绩效比较分析的发展导致近期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国家 86
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认识上发生了巨大改变。在美国和英国，这个意识的转变正渗入到实际的政策中，甚至保守党派都准备考虑在制定工业政策时，加强政府的介入，以便本国的制造业可以和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强国竞争。

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分析中，近来的一系列著作都强调了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在引导制度变革中的确定作用。[艾莫森（Amsden），1989；张（Chang），1994；迪约（Deyo），1987；芬德雷（Findlay），1988；雷诺兹（Reynolds），1985；韦德（Wade），1990；怀特，1988] 现在看来很明显，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英国实际上是第一个“新威权国家和新工业国家”。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威权和不民主的政府领导下发生，他们颁布并实施了严格的劳动法，保护国内生产商，并通过各种补助和退税刺激出口，防止技术工人外流而且支持垄断者。

前共产主义国家在通过计划进行工业重建时，需要向已经成功完成这个任务的国家学习很多东西，例如，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战后德国等学习。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国家与前共产主义国家有相似之处，但与近期的美国和英国相比，它们的重建问题与前共产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更为相似。然而，现在却是英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主导了建议的提供。

### *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中学到的教训是有问题的*

布雷顿森林机构鼓动的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远远没有他的支持者所认为的那样取得了广泛的成功。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仔细分析了 18 个发展中国家的稳定计划案例。他发现稳定计划的正统理论所导致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表现非常不同。他强调，“部分成功案例”是在稳定的一揽子计划、价格信号以及国家的直接干预的共同作用下才实现的，而获取正确的价格只起到

第二位的作用。（泰勒，1988，第168页）稳定战略能够取得成功可能建基于“混合经济制度的亲身实践管理而不只是全部的自由化”。（泰勒，1988，第168页）他发现一旦一个国家从“简单的储蓄推动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式”出发，“一项严格的政策”就不会“自然转向长期的发展”。（泰勒，1988，第168页）他指出“经济停滞不会激发储蓄和投资”。（泰勒，1988，第168页）他还警告说：最糟糕的是，“如果把近期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墨西哥和非洲国家，例如扎伊尔作为调整政策的指南，那么经济会有崩溃的危险”。（泰勒，1988，第168页）

然而，之所以对布雷顿森林机构所倡导的稳定和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作为解决共产主义计划经济转轨问题的解决方案——保持谨慎的最重要原因是下面这个非常不同的原因。即转轨不是一个低效的市场经济跳跃前进的问题。试图将整个指令性经济体制的制度结构全面转轨，这个任务是一个复杂的巨大任务。

### *快速转轨从原则上说不民主*

转轨进程越快，民众对该进程做出反馈的可能就越小。由于转轨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国家可能期望，民众的看法随着最初变化的结果变得更为清晰时或者预料不到的结果出现时或许加以改变。试图剥夺大众在转轨的每个阶段提出政治反馈的做法是非常不民主的。转轨过程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他们做出评论之前，整个过程已经完成。承诺民主原则的政府应该希望在转轨过程中，尽可能让广大民众广泛参与，并给予他们最大的参与机会，并且随着他们观点改变，赋予其给每一个转轨阶段提供反馈的机会，而不是通过给予他们唯一表达观点的机会——参加后共产主义政府的初选——来排斥他们的参与。利普顿和萨克斯将马基雅维利作为鼓励倡导迅速转轨的正统的转轨方法的支柱是正确的。但是，马基雅维利不是民主人士。实施渐运转轨的共产主义政府，给大众提供了一个通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机制表达他们关于转轨进程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比马基雅维利

87

88

迅速转轨方法更为民主的转轨。

*市场社会主义不是灾难*

仔细研究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的新经济政策（NEP）以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实施或者20世纪60年代早期再次实施的试验（舒曼，1964），我们可以得出比正统的转轨理论经济学家的评价更加积极的评价。事实上，这些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改革的主要灵感来源。

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谨慎地引入市场力量，通过非国有部门，特别是在服务业和小商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大众福利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这个试验使得人们更加了解市场，推动了市场文化的逐步发展。这些试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如果没有苏联解体，那么匈牙利有可能缓慢地走向市场经济。长期实行“折中方法”的改革的另一个巨大成果是，匈牙利是东欧在后共产主义阶段准备最好的国家。广义上说，它仍然在进行谨慎的变化，拒绝进入“疯狂私有化”过程，只允许股票市场发挥很小的作用。[①]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匈牙利是东欧国家中最能吸引外资的国家。[②] 它只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产出下降。而且，像中国一样，1989年之后，匈牙利的大多数的外国投资都是直接的实际投资，而不是证券投资或者投机的投资。

*增长和效率*

经济学家在测算经济增长的源泉并将其分解为组成部分上已经是专家。然而，这与解释什么原因导致这些输入会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一些国家相比其他国家产生了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为什么有些国家使用这些资源产生了良好效果完全不同。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

---

① 与邻近的捷克共和国相比，匈牙利的股票市场是“小的、更多管制的并且对经济体的经济表现来说通常是次要的”。（《金融时报》，1994年9月21日）

② 1990—1993年间，匈牙利吸引了占苏联和东欧全部投资总额的44%的外国直接投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4，第123页）

杂的过程，所有老实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他们对此的理解有很大差距：

89 经济理论没有为韦伯的著名问题——为什么是英国而不是中国成为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提供答案。也没有任何经济理论有助于解释日本战后的繁荣或英国的相对下降。很明显的是，这里有许多超出了市场信号和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对于这些因素，宏观经济学没有任何表现。（汉，1984，第 131 页）

而且，最机敏的分析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的作用是解释的关键。例如，雷诺兹在对过去一百年的大范围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绩效的权威性的总结中指出："各种量化分析似乎不能应用在政治上——政府的连续性，政治领导人的增长导向（或缺失）、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农业、外贸和其他关键行业的政策的有效性……有效或无效的政府似乎是增长的中心。"（雷诺兹，1985，第 418 页）

正统的转轨理论是建立在对"有效率的市场"形成之后，增长将会自动发生的强大的自信之上的。正统的经济学家自信地认为"无效率的市场"——即通过保持大量的公共所有权，价格控制、定量配给、亏损企业的补贴、保护和国内货币的不可兑换性等政策——将会损害增长。但是，历史经验证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经济学家对此——经济中最基本的过程——知之甚少，这就提示政策的形成至少需要更加谨慎。正统的转轨理论提出了一个精致的简单的针对转轨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尽可能快地转向有效率的制度，即使这意味着巨大的产出萎缩。在这个方法中，可以粗略地认为高效率将会通过生产曲线向内的突然"下降"，以致经济通过收缩而靠近生产曲线，"切掉经济不需要的地方"实现。（见图 4.1）

至少比较符合逻辑的方法是试着逐步迈向快速增长的经济，即通过谨慎的制度试验和向高效率逐渐转移来实现，即使这意味着接受许多低效率的存在。后一种道路，在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将在一定程度

上会更有效，并接近生产曲线，但是经济体将会变大。这种道路可能更容易保持社会经济的支持和政治的稳定，那是产生增长的关键因素。 90
使用这种方法，一个人可以粗略地认为在整个改革时期，经济会慢慢地向外面的生产曲线逐渐移动（见图 4.1）。这种道路被称为“计划外增长”（诺顿，1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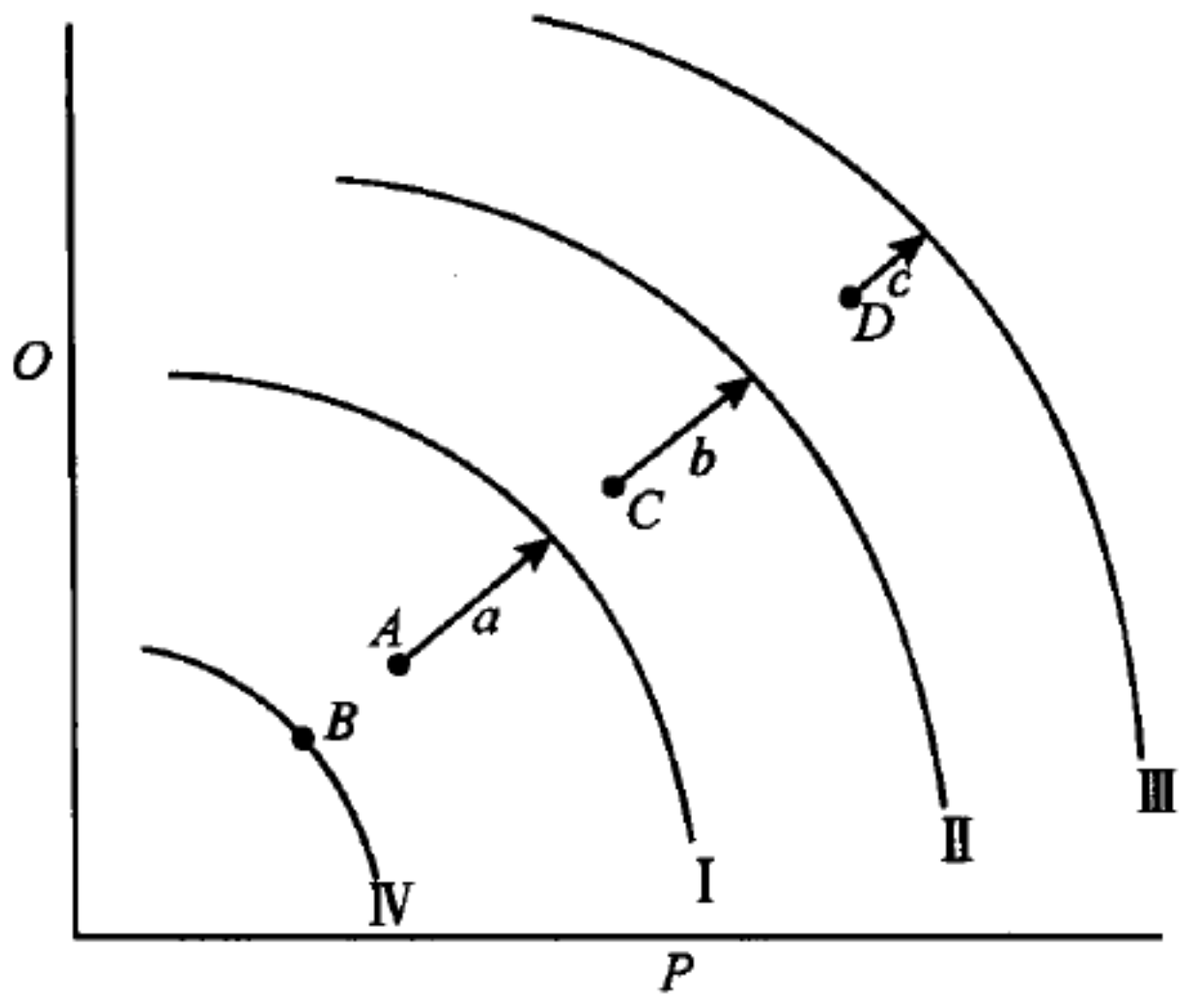



**图 4.1　共产主义经济制度改革的替代道路的二维图形**

**注释**
a > b > c
I – IV：生产可能性曲线
*O* 和 *P*：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混合投入
*A*：共产主义经济的初始点
*A* – *C* – *D*：增长的改革或“计划外增长”的改革
*A* – *B*：“滑向有效率”

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秘密是正效应或者负效应的自我产生过程得以发生。经济本身能够构建一条外力难以左右的路径。导致产出和生活水平在最初呈现显著下降的“休克疗法”战略，会启动投资下降，社会经济不稳定和政府无能的进程。政府无能会导致经济发展的长期困难，而不是能从“短期的急剧休克”中快速地“依靠并站立”。经济可能会出现“依靠”，但是在没有供需的条件下“依靠”可能导致

91 大规模的国内或国际的非投机投资。

*短期的苦难很严重，短期成本确定；长期的体制改善是不确定的*

正统的转轨方法试图解放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使其免遭政治和经济独裁统治。奇怪的是，对于源自改革的潜在巨大苦难，那些自己并没有遭受苦难的人却试图用一个非常浪漫的形式的改革去解决。加尔布雷斯认为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伦理上看，休克疗法都是不能接受的：

> 这些处在转轨进程之中的国家所接受的建议的特点是，它总是随便接受甚至承诺：人权剥夺、失业、通胀和生活水平灾难性下降。这个甚至被认为是必须的疗法……只有经历几年的痛苦，一切才会好起来。对此用最谨慎的语言加以描述就是：荒谬。在本世纪，没有什么比承受困难更多地被那些人——那些自己不会遭受痛苦，但是却催促别人承受社会的痛苦——受到怂恿……大多数建议都很简单，只是急切地想用“没有制度”来取代无效的制度。（加尔布雷斯，1990，第 93 页）

对指令性经济体制的学生来说，在获得长期的快乐和繁荣之前承受一段时间的苦难的看法是非常熟悉的论调。“今天面包，明天果酱”是共产主义国家旨在通过“计划”进行工业化的宣传口号，而这种“计划方式”导致了反共产主义者的巨大愤怒。[①] 共产主义国家的困难之处在于，痛苦是确定的，但收益可能没有出现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物质化。正统的转轨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收益”很快会物质化。到他们花费很长时间实现物质化时，改革的“必要痛苦”将会被一代人所承受，仅仅是为了下一代人取得“收获”。

---

① 我希望人们不会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问题像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苏联的问题一样严重。

还有一个“痛苦”和“收获”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分配的问题。除非一个人可以确定，今天的“剧痛”将会导致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得到与痛苦比例相当的收入上的“巨大收获”，否则更加合乎逻辑的转轨战略应当是试图将所遭受的痛苦最小化。“收获”越不确定，越遥远，那么收获越有可能被那些没有遭受痛苦的人，而不是那些遭受了痛苦的人得到，而导致出现大量痛苦的转轨战略也就越缺乏理智。



共产主义经济在改革之前深陷经济困境（参见第 4 章），如果没有基本制度的改革，最有可能的前景是经济继续恶化，但不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另外一个可能——缓慢的“折中方法”的改革——不会产生任何灾难，而且人民的福利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为现状的严峻和替代方式的危险，即“折中方法的改革”的危险，就认为急剧的，痛苦的改革值得冒险，这种论断难以站得住脚。

### *非国有经济部门的简单制度改革可以产生巨大的累积结果*

**非农小企业**　从新经济政策下的俄罗斯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都从允许人民从事小企业——这个小企业不会对经济的“高度计划”造成威胁——的进程中获取了大量效益。这些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它们只需少量的资本。它们通过满足实际需求而显著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特别是长期压抑的服务产业。在市场社会主义下，它们的规模允许扩展到更广阔的，需要小规模经济的工业部门，例如，运输、住宅建设和小规模的制造业。在某些领域，它们还允许和大规模企业进行竞争，或者在政府规定的领域内互相竞争。它们的成功逐渐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不仅仅是普通人的态度，而且是更多保守和恐惧的领导人的态度。

**农业**　农业结构改革比大规模的工业改革更易实现。农业生产过程比较简单，产品范围相对狭窄。每个生产单位的劳动分工较为简单。与其他产业相比，其投入产出关系一般也比较简单，材料重新安排的困难较小。斯大林主义体制的最不合理之处在于农业部门，因此，农

93 业制度改革的收益应该非常大。集体农场的成功改革将会提高产品供应的效率，这特别有助于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它直接通过改善食品供给和工作条件改善使农民受益。它也会提高城市贫穷阶层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大部门收入都是花费在食品上。

### 快速私有化不可能

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经济体的国有资产迅速私有化有很大的困难。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内储蓄非常少，这使得他们的市民没有钱购买政府的资产，而将大部分的国有资产卖给外国人（到现在为止只有他们有兴趣购买）在政治上对改革国家来说不可接受。

资产的评估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如果所有的国有资产同时出售，价格将会比逐渐私有化的价格低，那样大部分的国有资产将会以一个比长期价值更低的价格出售。国有工业的私有化即使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耗费时间的工作。迅速的私有化使得政府很难控制，从而难以避免腐败。政府官员自身也可能腐败。私有化的过程越快，公众越不可能监测，例如通过杂志揭露丑闻。很可能出现“内部交易”，经理，官僚和（少量的）工人可能获取意外收获。他们可能串谋降低资产价格，通过特权——通过高水平的知识或给予他们对一部分的股票有优先权的一般规定——获得股票。“休克疗法”期间，改革进程中的腐败对普通公民来说可能很难接受，改革对社会群体也有着不平等的影响。

事实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在最初三年里步伐是缓慢的。但是，政府将私有化作为改革计划核心的承诺，导致了资产所有权的极大不确定。在已知的一些企业中，实际控制权经常转移到企业的经理和工人的手中。由于不确定他们企业的未来，他们没有动力提高效益，因
94 为任何改善不能反映在他们的长期获利上，而是对最终所有人有好处。工人和经理对于短期效益和“我的”“企业”资产比较有动力。他们很难会考虑糟糕的产权安排。

唯一的完成这种大规模资产快速私有化的方法是将它们通过一种方法或另外一种方法分发出售。这会涉及国家未来收益的潜在的巨大损失。理想的形式是公民通过平等的投票决定国有资产的处置，即将国家所有权变为人民所有权，这些人民对投资实际上是毫无经验的。应付凭单会创造大量的投机活动，而不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有益于长期增长和公司利润的机制。如果应付凭单持有人只是简单地购买母公司的股票，这会创造一系列问题。艾伦·瓦尔特（Alan Walter）是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顾问，他警告说英国和美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些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有活力的证券资产投资经理，而不是利息经理。（瓦尔特，1991，第261页）根据瓦尔特的判断，这将是“非常危险的试验”：“颁发应付凭单的思想令人震惊，共同基金领域的活跃市场被全部民众所共有，那个市场上的这种工具已经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不为人知。我非常怀疑这个市场会全部透明，误导的可能和市场陷阱等将会大量出现。人们会担心资本主义将很快失去信用。”（瓦尔特，1991，第261页）如果企业全部或部分交给现任的工人/经理，那将非常不公平，因为不同企业之间的价值差别很大。而且，大量人口没有在企业工作（例如，家庭主妇和犯人）。

### *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可能性*

国有企业的绩效确实可以改善。如果根据业务经验选择管理人员，给予独立的执行权力，经理的红利和企业的利润或损失的减少挂钩，那么他们有理由应对市场信号，提高绩效。为了使企业提高利润的努力能够反映社会合意的目标——更有效的资源利用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至少需要大部分部门的价格走向市场定价，而且允许其他企业参与竞争。

关键的问题是政府的政治愿望和它改善企业绩效的决心。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提供了一个很显著的政府在私有化之前提高国有企业绩效能力的案例：

新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在西方热衷者的不时鼓励下，天真地认为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从国家所有权改变到私人所有权……但这个结论是一个误导，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简单化……有想法认为，如果这些企业还是国家所有，那么尝试改革现存的国有企业就没有意义……但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国家公司的改革成功完成，这些公司始终在公共部门中。（瓦尔特，1991，第 102—104 页）

英国的经验证明，如果政府愿意任命有委托权的有能力的经理将企业变成能够盈利，减少劳动力，淘汰不盈利的厂房和设备。那么在公共所有权下，很有可能迅速提高生产力，产品质量和服务。（瓦尔特，1991，第 259 页）事实上，英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私有化改革，“只有在完成所有艰苦的工作后改革才能发生”，该私有化改革进程对正统的转轨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特，1991，第 259 页）

“改革前进行私有化”是一个实现改革的简单方法，因为它免去了政府的责任和艰苦工作。但是，实现此目的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迅速和疯狂的私有化。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强有力论点，有助于说服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接受疯狂的私有化是一个理想的方法，因为政府官员会在转轨过程中通过内部交易获得相当的利益。①

私有化不需要迅速发生。一个有组织的私有化过程非常可行。当那些国有企业或他们建立的分公司变得能盈利之后，所有权结构随着所有权股份逐渐由外资或内资包括其他国有企业或国有机构占有而改变。股票交易市场的股票发行不是唯一的可以逐渐稀释国有企业所有权的方法。所有权的改变可以通过逐步向股份合资公司转变而实现，这种合资公司建基于各种不同的机构股东上，他们不需要通过市场公

① 如果要看在捷克共和国的“野蛮私有化”过程中，官员所操纵的内部交易的生动描述，可参阅《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1 日。

开交易获得所有权。然而，每个股东都会随着公司的长期发展和增长而获得既得的利益。

### 一刀切的价格自由化的危险

由于斯大林体制下的价格政策扭曲，在价格自由化之后，基本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的价格将会大幅度上升。贫穷阶层最容易受到一刀切的自由化价格改革政策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积极热情地、不可逆转地向市场经济前进时，在政策制定者还没有时间建立一个合适的“社会安全网”之前，价格的自由化将会立刻生效，这是很危险的。

由于建立了政治民主和新独立的工会，巨大的压力促使补偿工资上升，这又会导致工资—价格相互促进引发通胀，因为政府被迫相应的增加货币供应。

一刀切的价格自由化将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部门的相对利润率。到目前为止，由于经理和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利润率相关，因此可能导致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但收入的不平等反过来与企业的经济绩效没有太大的关系。缓慢的自由化将会使政府严密监测企业的经济绩效，并可以针对暴利企业征税，同时支持那些利润较低或亏损的企业，因为这些企业的经理和工人在经营中没有失误。

如果价格自由化在改革初期就迅速发生，那么还没有改革的国有企业很可能会有垄断价格的行为。改革之前被低估的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垄断的国有企业对此可以或多或少地通过价格上升的形式将原材料价格上升的影响转移出去。这可能会加重已经严重的通胀压力。鉴于企业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材料的价格应该随着企业改革逐步地自由化而不是在企业改革之前迅速完成。

实际供应原材料的巨大网络是指令性经济的核心。这个网络只有 97
在价格混乱的时候才能被立刻去除。建立各种各样的产品交换的知识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由于同时存在着大量的过度需求和需求不足现象，产生了大量的套利机会。最合理的改革方式是物品供应体系的逐

渐改革。这反过来又说明价格改革需要逐步进行。从定义上说，“自由市场”价格是指产品不通过物品供应体系分配而呈现的价格。

### *工业结构：工厂、公司和共产主义国家制造业改革的范围*

**缺少公司而偏重大型工厂** 共产主义经济体明确地放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理念，即竞争的公司。取而代之的是，试图花费巨大的成本使整个经济体像一个单一的工厂一样运行，运行的基础是行政命令而不是对立公司之间为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激烈竞争。在社会主义“计划”中，所有的工业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是国家所有。“公司”是政府部门的同义词（甚至是整个计划体制）。大型的生产单位更受欢迎，因为它比小型生产单位更加易于计划，而且领导和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大型的生产单位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并且因为重工业和经济规模的关系而使得他们偏向重工业。因此，大型生产单位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制造行业发挥的作用比大型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大。指令性经济在工业改革中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公司的创建，二是结构规模的重建。

在西方经济学家给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建议中，与所有权私有化的建议相比，需要在不同国家和部门建立不同规模的有竞争力的公司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正是公司而不是工厂是做决定的基础和竞争的关键所在。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小型制造公司业绩在过去 10 多年间增长很快。[①] 这一增长与新的电子生产技术让制造业更加灵活有关。通过使用许多可控制的机器工具，公司用灵活的生产系统代替了传统的自动生产。[②] 小公司作用的提高也和“服务”活

---

① 比如在英国，雇员在 20 人以下的公司的净产出占总的净产出的比重从 1963 年的 16% 上升到 1987 年的 25%。（休斯，1993，第 30 页）

② 这一趋势在金属制作工业中特别显著。例如在美国，在金属制作部门，小型和中型公司（雇员少于 500 名）的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的比重从 1976 年的 30% 上升到 1986 年的 40%。[阿克斯（Acs）和奥德雷希（Audretsch），1993，第 72 页]

动外包的增加有关系，例如会计和清洁工作，这些工作以前是制造业公司的一部分。最后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随着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进入下行经济周期，大型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

但是，大型公司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中心。拥有成千上万雇员的大型公司（表 4.1）仍然是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大型“现代



**表 4.1　1990 年世界最大的前 100 名企业中的雇员人数（根据年营业额）**

| 员工人数 | 公司数量 | 公司名称 |
|---|---|---|
| 超过 750 000 | 1 | 通用汽车 |
| 501 000—750 000 | 0 | — |
| 249 000—500 000 | 12 | 福特、IBM、通用电气、意大利工农设备公司（IRI）、戴姆勒－奔驰、菲亚特、联合利华、大众、西门子、菲利普、英美烟草工业（BAT Industries）、百事 |
| 100 000—249 000 | 43 | 埃克森、皇家壳牌、英国石油、日立、松下电器、菲利浦莫瑞斯（Philip Morris）、克莱斯勒、杜邦、三星、尼桑汽车、雀巢、东芝、雷诺、巴斯夫、赫斯特（Hoechst）、标致、拜耳（Bayer）、法国通用电器公司（CGE）、日本电气公司（NEC）、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ABB（ASEA Brown Boveri）、波音、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y）、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施乐（Xerox）、富士通、德国博世（Robert Bosch）、INI、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mex）、麦道飞机公司（McDonell Douglas）、英航（British Aerospace）、大都会公司（Grand Metropolitan）、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BTR、美国莎莉集团（Sara Lee）、伊莱克斯（Electrolux）、罗克韦尔国际公司（Rockwell International）、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西屋电器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鲁尔煤业股份公司（Ruhrkohls）、汤姆森（Thomson）、霍尼韦尔（Allied Signal） |

续表

| 员工人数 | 公司数理 | 公司名称 |
| --- | --- | --- |
| 51 000—99 000 | 30 | 丰田、美孚、雪佛龙、埃尼集团（ENI）、本田汽车、费巴（Veba）、阿莫科、埃尔夫阿奎坦（Elf Acquitaine）、宝洁公司、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大宇（Daewoo）、三菱电机、日本钢铁、索尼、北方洛林钢铁公司（Usinor Sacilor）、沃尔沃、天纳克（Tenneco）、宝马、三菱重工、汽巴－嘉基公司（Ciba Geigy）、普利司通（Bridgestone）、汉森（Hanson）、明尼苏达矿业制造（Minnesota Mining and Mfg.）、惠普（Hewlett Packard）罗纳·普朗克（Rhone-Poulenc）、国际纸业（International Paper） |
| 少于 50 000 | 14 | 德士古、道达尔－法国石油公司（Total CFP）、日本石油、三菱汽车、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雷诺兹－纳贝斯克（RJR Nabisco）、马自达汽车、委内瑞拉石油公司、菲利普石油、费鲁齐（Ferruzzi Financiaria）、科威特石油公司（Kuwait Petroleum）、康尼格拉（Conagra）、比利时石油公司（Perofina）、日本出光兴产株式会社（Idemitsu Kosan） |

**资料来源** 欧洲共同体，1991。

化的工业企业”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现代工业企业在创造当今技术最先进，发展最快的工业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工业，反过来又是这些经济体的工业部门的领跑者……他们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钱德勒，1990，第 593 页）19 世纪末，随着生产技术的改变，这些制度形式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迅速出现，并且至今还处在中心位置。有理由相信在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中，同样的制度将会在他们从兴起到繁荣的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

总体来说，在美国制造业中，大型公司（员工超过 500 人的公司）的销售额仍然占据了制造业销售额总额的 74%。（阿克斯和奥德雷希，1993，第 70 页）在英国，“制造业仍然被少数的大型企业（超过 1 000 名员工）控制，他们总产出占据了总的净产出的 3/5，并且雇佣了超过

一半的制造业的员工”［休斯（Hughes），1993，第 39 页］。[①] 在许多小国家，像瑞士、瑞典和荷兰，大型公司的地位更重要。在这些国家，前 20 位的公司在 1985 年分别吸纳了各自国家的工业行业员工总数的 60%、67% 和 95%。［谢勒（Scherer）和罗斯（Ross），1990，第 63 页］

大型的多工厂公司在降低成本和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受益于规模经济，即源自大型生产规模的单位成本的降低。工程研究显示，在许多行业中小于一定规模的工厂没有成本优势。［普瑞腾（Pratten），引自詹克敏（Jacquemin）等，1989］另外，大型公司经常受益于“范围”经济，即从一个生产单位向其他单位运送产品和 100
服务的交易成本的降低。（钱德勒，1990）多工厂公司可以从较少的运输成本、超强的研发、降低风险、较低的资本成本、创造品牌的能力、给客户提供信贷和售后服务以及维修中获益（钱德勒，1990，第 200 页），而且，在许多部门，没有经营几个工厂的公司可能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

成功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不像一个非常完美的竞争单位一样，完全按照价格机制分配资源的方式运行。相反，在这些公司里，协调机制是“自主决定和管理命令”（谢勒和罗斯，1990，第 109 页）。事实上，有一些与大型公司相联系的管理规模不经济。但是，可以这样解释许多部门的大公司的存在，即实际上，通过直接管理控制的方法组织大量经济活动的成本比通过多层次的小规模的复杂市场交易的方法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更低。成功的大公司包含一些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的计划运行特点。这并不奇怪，因为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很多大公司中可以看到计划的作用。而计划经济最初的观念就起源于这个计划作用的一般化。［绍穆埃利（Szamuely），1974］

---

① 事实上，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英国的前 100 名公司在制造业产量中的所占比重一直是非常稳定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大约维持在总净产出价值的约 2/5。（休斯，1993，第 31 页）

尽管经验各不相同，但是还能从历史中看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影响不同部门的特点。钱德勒通过分析员工超过 20 000 人的 401 个超大型公司，发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72% 以上的大型企业集中在一个小范围的工业领域，即化学、石化、粗铁矿和三个机器集团（非电子和电子机器、运输机械）和食品。（钱德勒，1990，第 19 页）这些主要是资本密集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是重工业部门。形成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可以获得技术规模经济有能力有明显差异（例如，与给定工业的不同技术特点有关的成本曲线的差异）。（普瑞腾，引自詹克敏等，1989）

**经济改革的政策启示**　后斯大林主义经济不应该忽视大型工业部门。最好的政策不是被动地把每一个工厂卖给私人购买者，而是要试着建立一个合乎规范的非常有竞争力的小企业组织。通过自发的市场力量导致大型公司的出现需要一段很长时间。期间，在许多部门这会导致效率损失，因为在工厂的层面没有利用规模经济，在多工厂运行层面也没有导致范围经济。而且，如果改革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未能产生成功的大型公司，那么就有可能降低多个部门的国际竞争力，这反过来会对经济体的收支平衡产生负面影响。



后共产主义国家政府的一个关键任务是制定一个会导致现代工业集团公司出现的政策，该集团通常出现在重工业部门，而这可以为其他经济部门的繁荣奠定基础。这个政策肯定会涉及一系列的工厂的不合适的部门的合并与拆分以及工厂之间的兼并，从而形成大型的有竞争力的多工厂公司。为了引导和支持这个过程的实现，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应该仔细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结构。

除了关闭大型制造业，而这在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条件下，借助于自由的市场政策和私有化很容易发生，我们还需要一个战略计划，该计划是为了利用这些经济体掌握的丰富的技巧。政府需要对现存的工业结构进行仔细研究，以确认在哪些部门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建立有竞争力的工业。这些部门需要被保护并且需

要支持他们的重建计划，这包括独立的运营、建立专业的管理团队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这样一个工业战略是建立在长期的比较优势上，它需要政府的参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直接依靠和大公司签订合同或间接地依靠满足由于大工业部门带来的收入增加而产生的最终的产品需求而生存。改革国家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长期被压抑的，需要较少的资本投资的服务业会有快速的增长。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在没有充满活力的大工业企业的情况下，处于改革进程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小规模制造业能否实现快速增长。



大型公司占统治地位的重工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只发挥微小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国家的重工业的份额并非明显小于前共产主义国家（表4.2）。这不值得奇怪，因为这些部门生产资本品，借助于这些资本品才能实现实物投资、资本深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确，这些通常“是这样一些行业，在这些行业中，需求的收入弹性很高，技术进步很快，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组织合作与发展组织，1972，第15页；引自韦德，1990，第25页）。

前共产主义国家对重工业偏重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掌握丰富的工程技术。如果要转向更加有竞争力的制造活动，那么问题仅仅是获得新的资本设备。当然还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投资计划的重要部分是工程技术，企业在购买新的资本品，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新的资本品生产时，需要这些技术才能做出明智的技术选择。前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已经投入了大部分的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体中，总是有较高的资本品需求收入弹性。资本品常常经历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事实上，日本的工业计划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增长战略中更加侧重发展资本品工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2，第15页）前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的工业政策的主要任务不是关闭

重工业，而是通过重构使其变成有竞争力的公司，这将会是长期的利润和收入增加的基础。

**表 4.2　20 世纪 70 年代，重工业占总工业产出的比重（%）**

| | 中国 | 美国 | 联邦德国 | 日本 | 英国 | 意大利 | 波兰 | 西班牙 | 南斯拉夫 | 韩国 | 印度 |
|---|---|---|---|---|---|---|---|---|---|---|---|
| 总值 | 64.1 | 69.5 | 74.2 | 69.5 | 66.9 | 69.0 | 64.1 | 68.1 | 61.8 | 56.4 | 61.7 |
| 其中的化工、橡胶和塑料 | 12.3 | 10.8 | 13.5 | 11.0 | 12.4 | 13.9 | 9.2 | 13.1 | 8.6 | 12.0 | 14.5 |
| 铁和钢、非铁金属和铁矿 | 9.0 | 6.9 | 9.4 | 10.5 | 7.6 | 9.9 | 9.9 | 16.8 | 11.3 | 2.7 | 10.9 |
| 机器、设备和铁制造 | 27.3 | 34.2 | 35.4 | 35.6 | 31.0 | 30.5 | 32.9 | 20.4 | 27.0 | 20.0 | 18.8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81b，第 16 页。

### 资本积累

在西方的大多数建议计划中，储蓄的产生和转化是一个空盒子。金融机构将被私有化，利率将反应市场力量，投资的比率和分配将反应公民的个人偏好。事实上，资本的积累和分配是前共产主义国家经济重构的中心问题。重构目前亏损的制造业，使之重新成为能够在国
103 际竞争条件下获取利润的企业，这是工业战略的核心，这种战略也形成了一种局面——资本市场在此情形下将会失败。进一步说，在财产所有权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不确定性是因为政府普遍认可私有化，但是没有能力快速实施），以及同时的政治不稳定环境下（由于尝试快速地推行经济改革，从而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紧张），私人投资者很难相信他们的投资资本在经过较长时期后会有收益。投机和短期收益的渴望将会主导投资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当提高储蓄并将他们导入重建项目上，目的在于重构制造业，通过直接地干预或者通过低息贷款。不幸的是，在欧洲后共产主义政治的动荡中，政府很难

提高税收收益以资助政府在工业战略中的支出。官僚机构的解体——被正统的转轨理论视为主要任务——可能会带来个人自由的增加，但同时使得价格体系不能通过有效的政府行为达到社会需要的目标。

### 需求的重要性



**外国需求** 西方对前斯大林主义经济的政策建议过分集中在国际经济领域，并且对贸易前景特别乐观。贸易是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但是20世纪90年代和此前时期非常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调整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相联系。这些国家采取的政策越灵活，增长的就越快，对前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出口前景就越好。

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挑战的反应方式非常不确定。将经济战略放在一个假想——对前斯大林主义国家来说出口没有需求方面的障碍——之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 对于东欧国家来说，欧共体对他们市场准入需求的半心半意，让他们引入西欧资本主义实践的幻想破灭……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贸易自由化显示他们掌握了自由贸易的信息……但是大量的贸易壁垒将会在至少五年内阻止东欧主要工业的出口……欧共体愿意接受某些重要敏感工业的特殊请求的意愿并不见得对东欧的未来有多大好处。（《财富时代》，1992年4月13日）

**国内需求** 不管出口如何，国内都有巨大的工业资本和消费品的需求，特别是像中国和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越南等国家。由于不能增加出口率，增加进口的能力可能会面临限制，所以改革国家的制造业需求依赖于国内市场。然而，难以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工业企业在满足国内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充满不稳定的时期，政府计划的重要职能是在经济结构改变的时候，通过分析可能的需求结构，

支持企业重建。这是指令性计划的传统作用，也是在不稳定的时期中
105 所急切需要的。如果形成一种预期——政府决策将听命于正统的转轨理论，那么将存在一种极大的危险，即商人们都会相信从长期来看，大型制造企业将会大量关闭的花言巧语。事实上，中小企业不能完成生产国内市场需要的大部分产品的任务。政府必须尝试重组大型企业，使之成为可以从规模经济获益的企业，而且要具有竞争力，而不是通过寡头或垄断的方式。并且，随着需求的增加，在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危机中不盈利的大型国有企业可能会盈利，尽管政府在危机中采用了通货紧缩的政策。因此，关闭和拆散这些部门是非常浪费的行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需要保护他们的幼稚产业，免于遭受发达国家经济的冲击。但是什么产业是“幼稚”产业，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处于改革进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幼稚”产业不只是在某时点之前没有存在的工业。一个过时的，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的“老”产业，但是由于其正在实施现代化和重建，也可以认为与幼稚产业有共同的特点。一个产业或它的一部分，现在没有竞争力，在开放国际竞争后可能会破产，但是在给予保护之后，可能会变得具有竞争力。

### *阶级结构和私有化*

在正统的转轨理论文献中，对私有化的讨论从最好的角度看是冷漠和无知的。从最差的角度看，该讨论是不诚实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不是对所有的“经济主体”都能提供平等的生活机会，即平等的职业选择、赚取收入和积累资本的机会。而是不同的生活机会，这种不同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与阶级结构相关。[①] 从指令性经济转轨的国家的财产所有权的私有化，是在这些国家创造新的阶级结构的过程。这也是“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转轨阶段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和使用

① 对地区、种族和性别的生活机会的影响，这里不予讨论。

权的改变方式将会对经济生活的最基本参数和给定的经济规范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是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使之生活改变的基础性因素。几 106
年之后，这种结果将会对不同社会团体的收入、生活条件、教育程度、婴儿死亡率、寿命、职业地位和社会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如此重要的将会影响未来几代人的社会形态的变革，任何人都想采取快速的和革命的方式，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从常识来看，几乎全部的国家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转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此应该通过试验的方式进行。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处理方法对称。整个20世纪，因其以革命的名义通过无情地没收资产而广受批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统的转轨分析同样简单地推荐了一个革命式的处理国有资产的方法。

很明显，正统的快速处置公共所有的资产的建议会带来危险。声称需要“将资产交给人民”，这是政府的花言巧语。不论采用那种私有化的变形形式，想要简单的迅速私有化很可能产生资产所有权的高度不平等。过程进行得越快，那么就越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落实到位的法律组织，也就越有可能产生内部交易、歪曲事实和直接的偷盗。如果推翻现有统治使国家出现政治动荡和法律缺失，那么这种可能性将会极大增加。而且，在转轨的早期，由于国家以固定的价格适应市场经济而引起的经济短缺，市场结构是非常不完善的。资产的长期价值很难估算。甚至是市场信息也很可能高度不可靠和很难取得，因此那些拥有高水平的知识的人可以快速进行资本积累。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和完成初期，这种环境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投机获利的机会。一些在私有化进程中的实践想法可以在哈博·罗内（Gabor Varzegis）的例子中反映出来。1994年，他被认为是东欧最富有的人。他的第一桶金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匈牙利的摇滚乐队（Gemini）的贝司手取得的。20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音乐，移民到了美国，并在纽约成了一个珠宝商，后来成了美国公民。在一次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说：“在东欧你可以在5—10年内建立一系列的

107 帝国，这是一生中仅有一次的机会。世界的一部分在出售。这之前从未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次发生。”（《金融时报》，1994 年 4 月 11 日）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地发生在没有有效的法律和秩序的事实下。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这会导致一段时间的严重的经济困难。[①] 在一个大衰退之中实施私有化，很有可能导致资产所有权的快速集中，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私有化方式。如果公共所有的资产向一般公众出售，那么衰退就越严重，公众参与购买资产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通过凭证计划将所有权赠送给一般公众，衰退也会越来越严重，公众将会卖掉他们的股票以换取当下的收入以便在转轨的剧痛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这样做的人越多，资产交易的价格就越低。这个过程与森（Sen）所描述的大饥荒的情况一样。（森，1982）智利在 1975—1978 年大衰退时的私有化，虽然没有像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的衰退那么严重，但是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②] 智利前财政部长将这个过程描述如下：

第一轮的私有化发生在深入的结构转型的中期，当时，没有多少外国人有兴趣向国家投资，这个过程伴随着巨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动荡……这些资产的私有化在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导致了巨大的金融资产的集中，金融的不稳定和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引自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第 251 页）

## 4.5 结论

本章研究了从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所包含的四个方面原则：

---

① 必须承认，衰退的严重性没有被人预期到。

② 详细的描述，参见 Yotopoulos（1989）。

第一，我认为成功地实现共产主义转轨有很大困难，因为实际上，在共产主义国家内部或者外部都没有将转轨问题置于优先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能触及核心的转轨讨论的缺乏源自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立。

第二，我认为，即使不是讨论的主导部分，也是重要的部分，即关于转轨采用的简单的假定——整个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转轨最好是政治和经济的所有领域的同时快速的转轨。这是在错误理解政治经济体制性质的基础上得出的，只有在个人的知识改变缓慢的情况下，上述假定才能起到合理有效的作用。

第三，推翻共产主义制度，从中得到好处，支持这种论调的观点是值得考虑的。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本质上是重视人权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只有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能保证；极权主义的领导人不可能领导国家引入市场经济，因为这会剥夺他们的权利基础；数据显示大众民主不会损害增长，甚至可以促进增长。本章认为历史的证据不支持上述论断；对民主和经济绩效的量化研究中有许多缺点；劳动力市场中的“民主”的想法很模糊；受到反共产主义的革命的激发，国家统一很难维持；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远不是建立民主的充分条件；人权不仅仅只是在选举中有定期投票权；大规模的后斯大林主义的结构转变在民主框架下难以真正实施。

第四，审视了狭隘的倾向于快速经济转轨的经济论点。大多数政策顾问对于改革共产主义国家的信心来自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结构调整计划的正面经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增强了信心——良好经济绩效的基本前提是货币稳定；价格自由，包括与世界市场价格的统一；财产所有权的私有化。他们认为理想的方式是做一次“外科手术”，应该让大部分国有企业在硬预算约束下关闭。大家普遍认为一揽子改革方案应该快速实施。本章认为这种方法原则上存在很大缺点。本章还表明：关于转轨的大部分建议是基于过时的关于政府干预优缺

点的认识；渐远式的制度改革就可以使经济绩效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财产的迅速私有化实践上不可行；不实行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也可以提高；快速的价格私有化会导致许多问题；企业资产的重组可以产生大量的工业绩效收益；在从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原则上难以建立资本市场；可以促使需求持续增长的政策应该可以大量提高经济绩效，而没有激进式改革的痛苦。

# 5　“赶超”能力之比较

## 5.1　导论

仅有的有限研究都把中国和苏联改革[①]表现不同的原因归结为改革起点的不同和各自的“赶超”能力的不同。“赶超”，这是阿布拉莫维茨（Abramowitz）发明的术语。在政治经济改革中的政策选择被认为是不重要的。

中国大陆的成功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因素：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大量的农村人口、深厚的商业历史传统以及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带动。苏联失败的原因在于以下一些特殊问题：过度工业化、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或者更为保守的共产党。萨克斯（Sachs）和胡永泰（Woo）对此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逻辑的说明。他们认为：“既不是渐进，也不是实验，而是中国经济结构，才被证明是对改革的最贴切解释。中国改革是从农业社会开始的，而苏东[②]是从城市化和过度工业化开始的……用格申克龙（Gerschenkron）的语言来说，中国具有‘后发优势’。”（萨

① 迄今为止最有力的分析可能就是萨克斯和胡永泰（1994）。

② 苏联和东欧国家。

克斯和胡永泰，1994，第 102—104 页）

本章将详细讨论以上观点。并且认为，两国有较多明显的不同。然而，两国也同样拥有“赶超”机会，这些机会源自于政治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国并不比苏联拥有更大的“赶超”能力。

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结果不同的主因就应当是政策选择的不同——这不仅意味着经济政策不同，也意味着对政治经济改革关系问题认识上的不同。



## 5.2 经济因素

### 5.2.1 地缘政治

中国大陆位于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区域中，这个区域有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四小虎”（韩国、新加坡、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还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而且，日本高速增长的经济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大规模贸易盈余和汇率升值，恰在此时，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这些国家和地区正渴望到劳动力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去投资。因此，中国大陆成为资本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俄罗斯的经济中心位于欧洲的边缘。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欧洲经济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其增长率要逊色于东亚国家。苏联不能从中受益，而且，广袤荒凉的中亚和极北的远东也没给其提供良好的地缘条件。

#### 贸易

邻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可能不像乍看起来那么重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可能容易被夸大。就大多数的商品贸易而言，一旦商品通过集装

箱装船运输，那么长距离相对于短距离来说，其对运输成本的影响不是很大。尽管西欧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但地区收入水平还远在东亚之上，贸易的绝对水平是很大的。[①]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也到了增长相对较为缓慢的时期。但是，其仍然是赖以成功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所在地，而且，美国市场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也越来越重要。[②]

*投资*

国家自身的地理位置对于国际间资本流动不起决定作用。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外国资本偏爱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比如拉丁美洲、非洲和后改革时期的东欧和苏联？而且，试图选择东亚进行投资的国家很多，并且东亚也能切实吸引外国投资。中国改革获得了外国投资者的信任。由于其政治稳定、较好的基础设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几率较低的罢工以及投资保障，中国获得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更进一步，保护措施背后的经济高增长让中国变得极具吸引力——对于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而言，中国都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因此，外国公司乐于在较宽的领域内投资而不仅仅是在低劳动成本的领域，这是非常关键的。



与其他的改革国家相比，中国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海外华人所掌握的大量的资本。其他改革国家也有大量的海外侨民。例如，印度侨民所掌握的大量资本可能超越了海外华人所拥有的。但是，只有少量的印度侨民资本被吸引回国，尽管印度政府也开始了经济自由化改革。很明显，这不是海外侨民的问题。一个改革国家必须成功建立好政治经济体系，以此来吸引投资者，不论是国内和国外。资本本身并

---

① 1991 年，7 个最大的西欧国家进口总额为 11 550 亿美元，与其相比，美国进口总额为 5 060 亿美元，日本为 2 340 亿美元。同一年，亚洲四小虎的出口总额为 3 140 亿美元。（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 264—265 页）

② 在中国出口总额中，美国市场所占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5.4% 上升到 1991 年的约 8.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1992）

不爱国。

改革伊始，苏联也有潜力吸引投资。俄罗斯经济的核心——乌拉尔山脉以西，本质上是欧洲的一部分，而 1992 年，欧洲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统一市场。与中国相比，俄罗斯拥有受教育水平较高、技能较好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的同等人群相比，他们也情愿努力工作，并接受较低的工资回报。俄罗斯还拥有大量的科研水平较高的科学工作者，这一点也是中国不能比的。更进一步，俄罗斯的基础设施要远比中国发达。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迄今为止俄罗斯没能吸引到大量的外国资本，这一事实也使人们认识到其投资环境中有某些恶劣因素。①

### 5.2.2 后发优势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开始改革进程时，它要比苏联更为贫穷。一个“后发”国家会有更大的快速增长的潜力，因为它可以获得比早期工业



化国家更多的先进技术。先发展国家在古老的传统制造业已经拥有大量的资本存量，因此，一旦后发展国家进行资本积累时，它们有可能在更为先进的优质技术上获得更多的资本存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上佳表现可以归因于它的更落后，因为这样可以让其在更大的范围内完成追赶。还可以看到，中国作为处于改革进程的国家，其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高比例也是一个后发优势。这让其能够较容易地实现农业改革，而不是工业改革。而且，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劳动密集型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而劳动密集型工业拥有较短的制造设备和交付使用之间隔，同时比大规模工业倾向于采用更为灵活便捷的机器。然而，这些看法还存在许多问题。

---

①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所做的风险评估估计，1993 年第二季度的俄罗斯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风险国家，仅次于伊拉克。尽管由于最近的经济过热，中国的评级有所下降，但依然介于马来西亚和泰国之间。这次评估基于 11 种因素，包括负债、活期存款和政治稳定性。

### 社会能力

为了消化发达国家的技术，实现成功追赶的国家需要拥有一定的“社会能力”水平。非常贫穷的国家通常不能成功地追赶是因为它们缺乏运转良好的制度：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来自于技术落后但社会能力发达，而不是没有限定条件的绝对落后［阿布拉莫维茨（Abramowitz），1986，第 388 页］。这正如哥穆尔卡（Gomulka）在“帽形”理论——即发展水平与增长率呈“帽形”关系——中所表达的。对一定发展水平之上的国家来说，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即越贫穷的国家增长速度越快，同时发生了“追赶”），反之，对欠发展国家来说，两者呈正相关关系（即越贫穷的国家增长速度越慢，同时“追赶”没有发生）。（哥穆尔卡，1991）中国开始改革时，与苏联比较其更接近于落后状态，苏联已经完成了满足基本需要的制度建构过程。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改革开始前夕，大量的人口是半文盲的农民，他们之中有超过 1/3 的人口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很难说是更落后给予了中国相对于苏联的决定性优势。但的确，在东欧内部，斯大林主义体制结束后那些表现非常糟糕的国家是那些体制转轨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不是“先进的”的匈牙利，而是贫穷的阿尔巴尼亚或者罗马尼亚吸引了 1989 年以来外国投资的绝大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那些更落后的国家获得了比中国还大的发展。



### 农业

对于处于改革进程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农业产出占国民产出的比重较大和大部分人都在农业部门工作不是一个必须的优势。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解释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它们之中的每个都在加速经济增长的开始阶段拥有相对小的农业部门：“在任何一个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经济体中，农业增速快于 5% 都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农业的重要性越小，让 GDP 获得高速增长就越容易。这是人们在去掉与之无关的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之后所

能想到的。”［里特尔（Little），1979，第 450 页］而且，扩大农业产出的资本需要通常来说是较大的，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的国家，中国许多区域的农业单位产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相当高了。最后，认为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的发展是由农业引导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初期，农业产出的增长率是较高的，国民收入也是如此。然而，改革后期，农业产出的增长率迅速下降，低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一半，但国民收入保持了高速增长，尽管农业产出的增长率跌落得很厉害。①

*资本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后来者的每一次成功浪潮都能从大量的国际资本中获益良多。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借助于机构的投资组合和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资本全球化的进一步加速。大量资本的可利用并不能有效确保经济发展。以拉丁美洲为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巨量的资本流入到该地区，但这并没有让该地区实现经济起飞，进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或者进行大规模结构转型的国家能够成功吸引和利用这些资本，那么它就可以实现加速增长。这是解释为什么后来国家拥有比先前国家拥有更快的增长机会的主要因素。

外国投资的性质，对于支持经济增长的进程能否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决定作用。由于投资者更可能在改善公司——他们对其进行投资的公司——绩效上有长期的承诺，外国直接投资特别具有吸引力。外国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还能做出更大贡献。然而，投机性的证券投资一般来说对技术进步就没有什么贡献。而且，投机资本的高速流出可能会导致国家经济不稳定，同时会影响到国内资本的活力，结果是



① 1980—1985 年，农业净产出的增长率（年复合增长率，以固定价格计算）为 8.6%，与此同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 10.0%，1985—1991 年间，上述两个指标的数字分别为 3.7% 和 7.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33 页）

国内资本把他们的金融资源转移出该国。[①]

外国投资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例如，跨国公司扩大了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雇佣，从 1985 年的 500 万人到 1992 年的 1 200 万人。（联合国，1994）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是不相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仅有可忽略的流入。对大量的非洲国家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来说，这是真实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第 282—283 页）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能够获得大部分投资。通过这些投资它们能够显著地增加国内储蓄，但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资本全球化，并借助于这一渠道快速地升级它们的技术水平。

### 5.2.3 规模

与其他的处于改革进程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相比，中国和苏联由于它们的巨大规模享有可观的潜在优势。这就意味着两个国家在保护主义藩篱下拥有进行无效率损失地重建的较大可能性。国内企业能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内，随着国内竞争的增长，同时受益于规模经济，以世界市场价格水平潜在地成为具有盈利能力的企业。从这方面看，它们每一个都有重蹈 19 世纪“美国”道路——在保护主义藩篱下，通过为国内巨大市场生产而引致工业繁荣——的可能性。[②] 从这方面看，它们每一个都拥有其他共产主义改革国家所不具有的巨大优势。

---

① 比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1994 年，预期到股票市场价格将有一个跌落的西方机构投资者“及时撤出”。然而，除了这些游资，大约 0.5 亿美元到 1.5 亿美元的国内资本“流入到西方商业银行的金库”。（《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1 日）

② 美国制造品输入的关税水平（一般的非加权平均）如下：1820 年为 40%，1875 年为 40%—50%，1913 年为 2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1，第 97 页）

### 5.2.4 劳动力

*总体教育水平*

共产主义国家的社会理想反映在它们对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的强烈承诺上，特别是针对小学和初中的适龄孩子来说。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总体教育水平对一个低收入国家来说是较高的（表 5.1）。的确，在小学和中学里上学的占相应年龄组的比例使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超过 25 岁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4.8 年，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且比低收入国家的数字（2.3 年）两倍还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2）。在正常年份[①]，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世界银行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对这种情形进行了总结："中国大约有 72% 的进入小学的人口完成了 4 年的教育，与之相比，印度是 41%，印度尼西亚是 68%，巴西是 38%；……中国儿童在基础科目上的平均成绩，比如数学，是领先于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的。"（世界银行，1981，第 66—67 页）

苏联的基础教育成就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也是良好的（表 5.1）。事实上，通过使用国际购买力平价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人均教育服务"消费"进行估计显示，苏联是除美国之外的西方国家的领先者。（施罗德，1983，第 319 页）

---

① 一个主要问题是，甚至是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来说，"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影响。"文化大革命"让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学校关闭了两到三年，当其重新开放时，意识形态教育在课程设计中占据了优先位置。

**表 5.1　中国和苏联的教育成就（1978）**

| | 小学入学人数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 | 中学入学人数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 |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 20—24 岁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 成人识字率的百分比（%） |
|---|---|---|---|---|
| 低收入国家* | 74 | 20 | 2 | 43 |
| 中等收入国家 | 95 | 41 | 11 | 72 |
| 工业化市场经济体 | 100 | 89 | 37 | 99 |
| 中国 | 93 | 51 | 1 | 66 |
| 印度 | 79 | 28 | 8 | 36 |
| 美国 | 98 | 97 | 56 | 99 |
| 澳大利亚 | 100 | 72 | 21 | 99 |
| 苏联 | 97 | 72 | 22 | 100 |

**注释**　*除了印度和中国。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1。

### 高等教育

中国采取了一个战略，决定在中小学里实施全日制教育。在 1978 年，只有 1% 的相应年龄组人口在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与之相比，低收入国家的这个数字总体上是 2%，而且印度是 8%。（表 5.1）更进一步，“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教育机构被关闭了比低水平教育机构更长的时间：“据估计，‘文化大革命’损失了 200 万中等水平技术人员和 100 万大学毕业生（另外，在此期间通过考试而毕业的考生只接受了较差水平的教育）。”（世界银行，1981a，第 106 页）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科技专家占生产部门总人力的比例很低。在化学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比例只有 4.5%，而巴西是 5.2%，墨西哥是 9.3%，美国是 21.1%。

而且，这些数据“掩盖了许多技术知识的低质量和过时特征——十年教育的结果是与世界中断和隔绝……如果考虑到中国对现代化的渴望和需要，那它的技术人员的供给是不适当的”（世界银行，1981a，

第 107 页）。在对中国的关键机器制造部门的评估方面，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 1978 年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完全使用、复制或者改善用于机器制造企业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大规模购买上有明显的阻碍。在基本研究技巧、制造技术和较差的组织和沟通渠道上的主要差距不利于中国对西方技术进行快速消化吸收。十年来，中国对整整一代人没有先进的科技培训，这导致中国不存在什么科技团体。"（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8，第 298 页）

118 苏联拥有比中国多得多的科技人员。苏联在利用科学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上不很成功，以至于它不得不分配大量的资源以便科技工作者的供给能够快速增长。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苏联每 1 000 人中仅有 15 位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之相比，美国每 1 000 人中有 26 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苏联超越了美国。上述指标的数字分别变为每 1 000 人中有 66 位科学家和 62 位工程师。（柏格森和列维，1983，第 55 页）而且，苏联科学研究的低效意味着在苏联每一位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辅助人员数量比较高，1970 年达到 5.0，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1.3。（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9，第 745 页）因此，除了大量的高素质的科学工作者，苏联还有大量的具有现代化意识的科技培训工作者。

实施成本高昂的中央计划的一个通常后果是，两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属于最终产品的单位资本品。而且，这两个国家资本品的性能不稳定，易坏。如果进一步地同市场经济国家比较，从专业生产者那里获得备件就更加缺少可靠性。因此，这两个国家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所有层次上的工程师的创造力水平都很高。比如，大量的用于一般目的的车床反映了这一事实。这些车床通常用于生产各种各样的备件。在其他经济体，这些备件常常通过市场购买。这种体制是相当低效率的，但它也普遍培养了工程师的基本技能。

两个国家都没有大量好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竞争和利润追求的激励的缺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甚至还导致对上

级单位所希望的技术进步的抵制。无处不在的短缺氛围导致了普遍的“卖方”市场，以至于在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生产上企业都缺乏使用合适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激励。在技术进步是一种公共品的信念下，大量的科技潜力远离了企业，即企业不参与科技进步的生产。比如，在1973年的苏联，只有大约9%的苏联科技工作者参与工业企业的工作，其余的都在高等教育机构、科学院或者分支部门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9，第729页）



***激励***

在中国和苏联都有一些因素能够促进劳动效率的提升，那些因素能够在既定的可用资本品的特性的基础上，让它们自身的能力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发挥。

在农业上，基本困难出现在生产单位上，比如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它们都雇用了大量的工人。农场工作过程的特殊性和与之相联系的对工作绩效评估的困难意味着很难让劳动力努力工作。①

在非农业部门，解雇作为一种惩罚措施是没有的。这大大降低了企业管理者能够施加给工人的压力。在物质平衡计划体系下，管理者有很强的激励像囤积资本一样囤积劳动力，因为这样可以让其容易实现关键的计划目标，即总产值或物品产量。通过研究计划体制不难发现，获得及时的要素投入需求的传递——这是为保持生产过程能全负荷的平稳运行——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在整个生产期间，工作节奏是非常不均匀的。

在论及工作节奏慢和低效——由这些因素引起的——等方面，已有大量的著作。然而，这还远不是经济活动的一个固定基准。相反，如果通过稳定的政策对工人施以激励，那么，意味着可以获得巨大的潜在收获。能够让这种力量释放出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多年来由于

---

① 为什么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发展上，雇用大量工人的生产单位是稀有的，这是主要原因。

高储蓄率和投资率，人们所获得的生活标准的普遍令人不满。尽管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苏联的绝对生活水平已经有所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的人们都对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差强人意怀有深深的不满。引进合适的激励机制能够释放巨大的渐增的劳动者工作热情，并且能大大提高现有资源的产出水平。

### 5.2.5 企业家精神

中国比俄罗斯拥有历史更长的企业家精神传统。中国中世纪的技术革命不是远离经济激励的发明家的头脑的灵光一现之产物。发明中
120 的大多数都是生产者为了解决为市场生产所遇到的问题时而产生的。早在10世纪或11世纪，中国就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拥有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更为完善的市场结构。可以说，中国至少是直至欧洲中世纪晚期时的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城市化国家。尽管中国没有实现欧洲式的工业革命的突破，产出增长、市场体制和城镇布局都继续领先于世界数个世纪。不论人们是否认为这一发展进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中国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多个世纪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企业家制度。到16—17世纪，最发达的地区位于东部沿海和长江下游流域。

中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的“挑战”的强有力的“回应”能力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而被深深地抑制了。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还处于贫困状态，大量的产品生产是在传统的部门完成的，出口产品也被初级产品所主导。然而，在某些区域，比如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东北和位于东部海岸的通商口岸——这些地区在某段时间内政治秩序貌似良好——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现代工业出现了快速发展。这部分原因是外国企业的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出现了兴旺的民族资产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上海资本家在视阈上是非常国际化的，他们“能平等地专注地研究伦敦证券交易所或者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四川市场”［白吉尔（Bergere），1981，第33页］。

很明显，中国拥有强大的商业历史传统。而且，中国革命只发生在相对较近的时期。因此，可以说商业的记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人身上还非常鲜活。

俄罗斯的图景初看起来让人感受到的是更多的不利。俄罗斯本身是一个现代化的建构。迟至15世纪中叶，“俄罗斯”还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大陆国家。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受限于严酷的自然环境壁垒，不利于商业和生产的市场化发展：“俄罗斯历史上的最稳定的本质特征是她的发展速度的缓慢，经济落后，社会形式原始以及由此引致的文化水平低……自然赋予给生活在贫瘠的大平原——对东部的风和亚洲的移民是敞开的——上的人们的责难是长期的落后。”［托洛斯基（Trotsky），1977，第26页］专制国家通过对经济事务的贪婪干预也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①] 而且，到1914年，资本主义发展才“仅仅触摸到俄罗斯经济体制的边缘。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区域内的和南方的零星的工业企业顶多是巨大的农业‘海洋’中的工业‘孤岛’，这个农业‘海洋’北以无穷无尽的大森林为界，南边则毗邻高山和沙漠”［道布（Dobb），1966，第35—36页］。在此基础上，苏联经历了将近60年的反资本主义的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

然而，事实可能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修正主义者认为，需要重新评估1914年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在1860年之前的欧洲俄罗斯时代，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要比曾经我们所认为的更为发达。［比如见加特莱尔（Gatrell），1986，第144—150页；布莱克维尔（Blackwell），1983］到19世纪后期，工商业活动的几个主要中心已经发展起来了，这些中心通常是建基于几个世纪之前的深厚传统。莫斯科地区是这些中心中最古老的，它是传统的冶金工业中心，该中心是随着蒙古时期莫斯科公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几代人的冶金活动赋予了这个地区



① 比如，参见派普斯（Pipes）：《丢失的中产阶级》（*The missing bourgeoisie*），1977，第8章。

丰富的给养，不仅是手工业的发达，而且还培育了企业家能力和经验。”（布莱克维尔，1983，第16页）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人们认为俄罗斯工业以大约4%—5%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加特莱尔，1986，第143页）大企业集团的出现受益于外国技术，通常也包括外国资本，而且经常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与此同时，较为原始的、规模较小的家庭手工业——约有1 500多万城镇和乡村的手工业者参与其中——在19世纪80年代大量兴起。（加特莱尔，1986，第154页）圣彼得堡是现代化进入最快的地区：“到了旧体制的最后十年，圣彼得堡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现代‘世界城市’的一个早期代表……圣彼得堡的企业家已经深深地卷入到世界贸易之中，而且也着力发展高度集中的工业，这些工业拥有大量的劳动力、公司组织和复杂的技术。”（布莱克维尔，1983，第17页）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革命仅仅发生在对斯大林经济体制进行彻底改革的30年前，即中国革命与后来的改革只相距30年的时间。但是在国家干预时期，中国对那些欲实践其资本主义者之能力的人来说只有有限的机会。除了其他因素之外，深刻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大影响了作为社会部门补充的私有部门的存在。在1955—1956年的集体化运动期间，在大跃进期间和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私有部门受到重重的攻击，这给那些怀有中产阶级梦想的党的干部和贫苦的农民套上了精神枷锁。[沃克（Walker），1965，第75页]在“左派”看来，“资本主义”是与“被痛打和被淹死的落水狗”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给农村商业和与之相联系的活动施加了这样一个强硬限制，这使得工作在“农村商业、食品和饮料的服务业和生产行业”的人口数量从1957年的280万降低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70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87，第80页）在城市里，个体劳动者的数量随着反对私有部门的运动而涨落，从1953年的890万降低到1956年的仅仅16万，接着又增加到1963年的230万，然后又逐渐地缩小至1977年的15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97页）

苏联集体化运动的早期阶段，苏联领导层残酷地镇压了农业上的私有部门。然而，政策很快发生了逆转，随后不久，又形成了集体农庄（1935）。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大量的牲畜都归私人所有，而且，私有部门提供了农村个人收入的主要部分。与中国比较而言，苏联没有接下来的对私有部门的攻击。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正式的农村私有部门据估计大约生产了25%—30%的农村总产出。[阿斯伦德（Aslund），1991，第155页]

斯大林主义的命令经济体制同时生产了短缺和过剩，这种短缺和过剩不能通过市场进行调节。作为结果之一，非法市场（黑市）和准合法市场（灰市）活动大量出现。在伯利纳（Berliner）看来，“大多数非正式经济活动由马歇尔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所推动，即向均衡状态重新配置资源”（伯利纳，1983，第196页）。

大多数非正式经济活动从事着个人服务的提供和消费品的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苏联，据估计大约有50%的鞋子修理、45%的房屋修理、40%的私人汽车修理以及30%的家用电器的修理都是由非法的私人企业所提供。（阿斯伦德，1991，第155页）另外，还有大量的非法产出，这些非法产出既是由企业自身提供的，也是由那些使用偷来的原材料并雇用大量工人的私人非法工厂生产的。[①] 据估计，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有30%—40%的个人收入来源于私有部门。事实上，由于短缺的无处不在，苏联的普通民众在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时与西方的稳定工资收入者更具有企业家精神。



在斯大林主义经济体的国有部门内部，大量人员［中介人（二道贩子）或者“非法销售者”］代表企业走遍整个国家，目的是用自己不想要的多余产品来交换自己想要的投入。在1976年以前，中国的计

① 对于在苏联黑色经济中可能采取的多种不同形式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见格罗斯曼（Grossman，1979）的论述。

划经济体制“让需求和供给失去了联系，以至于企业被迫派人到全国各地，通过私人关系、交易和其他不健康的手段来获得自己想要的原材料。据估计，每天大约有 300 万人承载着这样的原材料采购使命在全国各地奔波”（刘国光和王瑞荪，1984，第 97 页）。

总之，很难说中国改革比苏联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在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上比苏联拥有更大的先天能力。不言而喻，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传统确实比苏联更为古老，但同时她几乎也比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主要文化地区的传统都更为古老。到 19 世纪中期，欧洲俄罗斯已经在商业和工业上大大修正了自身的落后。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革命前的中国和俄罗斯都没能面对西方的“挑战”，在不同的政策指导下尽可能快速地做出现代化的反应。然而，两个国家都在某些部分实现了可观的进步。在革命后的俄罗斯，从命令经济体制开始付诸实施以来，非正式经济并没有呈现减弱态势，即便是在斯大林统治时代，而且，它一直是体现俄罗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领域。中国命令经济体制也同样催生了大量的非正式经济，趋势与俄罗斯相同。但是，由于中国周期性地实施了一些严厉运动，这使得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在运动期间，非正式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大大降低。

### 5.2.6 经济结构

人们普遍宣称，苏联经济改革失败主要是因为苏联体制已经使该国家“过度工业化”了。

根据工业部门所占的产出份额计算，的确，苏联总产出的大部分来源于工业部门，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约占 GDP 的 62%，这一比重甚至超过了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表 5.2）。然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是一个“过度工业化”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工业部门生产了比该收入水平上的国家所能够预期的更多的产出份额。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工业产出所占 GDP 的比重不小于 47%，这一数字领先于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经济体，甚至包括发

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表5.2）。如果接受这一事实，即中国工业生产是非常低效的，正如苏联工业一样，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过度工业化”对于中国来说，相比于苏联可能是更大的负担。中国的“过度工业化”是发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里，而且收入水平非常低，这种较低的收入水平还要提供国家增长所需要的财力。

从更深一步的含义上看，苏联的所谓“过度工业化”是指在工业部门就业的比重相对较高。的确，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工业部门的就业比重大约为45%（表5.2），这是高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然而，区别并不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也与其差不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工业部门中的就业比重较高反映了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中人员超编的高水平。合适的制度改革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能从工业部门中释放出劳动力，让其成为资本成本相对低的部门的雇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隐形的失业”状态。



**表5.2　中国和苏联改革前的经济结构及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比较（1980）**

| | GDP（%） | | | | | 就业（%） | | | | |
|---|---|---|---|---|---|---|---|---|---|---|
| | 苏联 | 中国 | LIEs | MIEs | IMEs | 苏联 | 中国 | LIEs | MIEs | IMEs |
| 农业 | 16 | 31 | 45 | 15 | 4 | 14 | 71 | 73 | 44 | 6 |
| 工业 | 62 | 47 | 17 | 40 | 37 | 45 | 17 | 11 | 22 | 38 |
| 服务业 | 22 | 22 | 38 | 45 | 62 | 41 | 12 | 19 | 34 | 56 |

**注释**　LIEs为低收入国家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和印度）。
MIEs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体。
IMEs为工业化市场经济体。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2。

在中国和苏联改革前，每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部门都有大量的劳动力。中国的就业结构与典型的低收入国家非常接近，总人口中的大约3/4都在农业部门工作。这些人口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贫穷而且没文化的。很难想像，这对经济加速增长来说是一个优势。尽管苏联只有

较少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一比例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较大的。对于苏联农业来说，就像苏联工业一样有较大的可能性将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让他们到其他部门工作。

两个国家服务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大于数字所显示的。在这两个国家，官方大大低估了服务业部门的比重。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的服务业部门的活动都直接由农业和工业企业供给，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则是由公有或私有部门的专业供给者完成的。这包括大量的健康、教育、社会保险、住房提供、食品制作和消费以及闲暇活动。

### 5.2.7 工业

*重工业优先*

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利用投资资源的极端无效率意味着，生产每一单位的最终产品需要大量的重工业产品（表5.3）。重工业产出的大部分的质量都较低，特别是机器，都不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然而，在大多数经济体中，重工业产出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中间投入品制成，而在中间投入品中，产品更多地都是同质的而且其质量在竞争力方面不是最重要的。[①] 重工业部门的高水平发展对改革中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意外之财。如果改革能够逐步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效率，那么这些经济体将会经历一个重工业相对低投资的增长期。而且，生产大量重工业产出的能力将能使它们获得增长，并且不会很快受到外汇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改革中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通过促进出口获得利润的能力不会受到外汇限制，在这种条件下，由于能够使用国内的重工业产品可能还是一种优势，尽管这些产品的质量低于世界市场的同类产品。



---

①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中，总工业产出的大约70%都是由重工业产品所构成，其中超过一半的产品由中间投入品构成（化学制品、橡胶、塑料、非金属矿石、建筑材料、冶金和金属开采、石油和煤炭采掘以及电力）。（世界银行，1981b，第90页）

**表 5.3　每一美元 GNP 的中间投入品（1979—1980）**

| | 钢（克） | 硫酸（克） | 水泥（克） | 能源消费（煤当量公斤） |
|---|---|---|---|---|
| 苏联 | 136 | 21 | 116 | 1.49 |
| 中国 | 146 | 31 | 319 | 3.21 |
| 美国 | 42 | 17 | 27 | 1.16 |
| 西德 | 61 | 7 | 47 | 0.56 |
| 日本 | 109 | 7 | 87 | 0.48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81a；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表 5.4　中国和苏联工业行业上的特大企业（超过 5000 名雇员）的作用**

| | 企业数量 | 雇员 | | 固定资产（%） | 工业总产值（%） | 雇员数量/企业数量（万） |
|---|---|---|---|---|---|---|
| | | （百万） | （%） | | | |
| 苏联（1983） | 1 316 | 14.4 | 38.1 | 46.7 | 35.9 | 10.9 |
| 中国（1987） | 885 | 11.9 | 16.8 | 33.9 | 18.9 | 13.4 |

**资料来源**　陆南泉：《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1988，第 120、145、436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 293 页。

**表 5.5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特大企业在部门间的分布（1987）**

| | 俄罗斯联邦 | | 中国 | |
|---|---|---|---|---|
| | 数量 | （%） | 数量 | （%） |
| 共计 | 952 | 100 | 720 | 100 |
| 工程 | 371 | 39 | 286 | 40 |
| 化学/石油工业 | 132 | 14 | 62 | 9 |
| 冶金 | 112 | 12 | 118 | 16 |
| 燃料/能源 | 100 | 11 | 26 | 4 |

**注释**　在中国例子中，数据指的是超过 5 000 名员工的企业；在苏联例子中，数据是模糊的，但是，在这张表里给定苏联“大”工厂的平均规模为 8 558 名员工，同样的标准也是适用的。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2a，第 83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

这两个国家对那些耗费了大量的中间投入品的部门产品有着巨大的被压抑的需求。这些部门包括住房、汽车以及与道路网络建设相关的投资。在这两个国家，这些产品的消费水平是相对较低的。而且，对其他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较低的单位价值的工业消费品，比如纺织品、玩具、运动器材和家用电器，将会创造对来自于重工业的上游投入的需求，比如电力、钢、化学纤维和塑料。尽管苏联的耐用消费品和衣服的消费水平大于中国，但对更新这些在苏联计划经济时期购买的旧的、不可靠的和过时的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是非常高的。

### *工业结构*

**相似之处** 在这两个国家，特大型（超过 5 000 名雇员）企业在工业部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表 5.4）。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和苏联，大约有 1 000 个特大型企业雇用了 1 200—1 400 名工人，这些特大型企业的资产总值大约占工业固定资产总价值的 1/3—1/2，其总产值大约占工业总产值的 1/5—1/3。

在每一个国家，大多数特大型企业都集中在重工业（表 5.5），以及某些轻工业部门，这些特大型企业在两个国家都享有规模经济收益。在中国，那些生产了 3/5 的部门产出，并且员工超过 1 000 名的工厂集中在以下一些部门：烟草（89%）、石油化工（96%）、化学纤维（78%）、橡胶产品（62%）、黑色金属（87%）、有色金属（73%）、交通运输设备（65%）、电子信息设备（6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而且，中国巨型企业的数量很可能要超过苏联。正如表 5.4 所显示的，中国特大型企业的平均规模要大于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中国机器制造行业，28 个最大的企业平均每个企业拥有 13.3 万名雇员。（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第 299 页）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特大型企业转移到大型企业，那么这两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画面仍然是相似的。在这两个国家里，如果根据固定资产总

价值，那么雇员超过1 000名的企业占据着行业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大约有64%的固定资产属于大型企业，苏联这一数字则为81%（表5.6）。在中国，大型企业的产出工业总产值的48%，而苏联为75%。

**表5.6　根据企业规模来看的中国（1987）和苏联（1983）的工业集中度（%）**

| 企业规模（员工数量） | 企业数量 | | 员工数量 | | 固定资产 | | 工业总产值 | |
|---|---|---|---|---|---|---|---|---|
| | 中国 | 苏联 | 中国 | 苏联 | 中国 | 苏联 | 中国 | 苏联 |
| 100名以下 | 68.5 | 27.2 | 14.0 | 1.6 | 5.8 | 1.1 | 9.6 | 1.9 |
| 100—500 | 25.6 | 42.4 | 32.6 | 12.6 | 18.1 | 8.8 | 26.6 | 12.8 |
| 500—1 000 | 3.6 | 13.1 | 14.7 | 11.2 | 12.2 | 9.0 | 15.5 | 10.8 |
| 1 000—10 000 | 2.2 | 16.3 | 27.5 | 52.4 | 38.2 | 51.8 | 36.5 | 54.1 |
| 超过10 000 | 0.1 | 1.0 | 11.2 | 22.2 | 25.7 | 29.3 | 11.7 | 20.4 |
| 平均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100 |

**资料来源**　陆南泉，1988，第120、145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第7、293页。

这两个国家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中小企业在部门产出份额中的比重在轻工业行业较高。在1987年的苏联，轻工业行业（狭义）上的大型企业在雇员数量上只占总数量的不足1/4，在食品行业上大约占19%，在玻璃/陶瓷、建筑材料和木材产品行业上占不足10%。（世界银行，1992a，第83页）在1987年的中国，雇员在1 0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生产了以下部门的超过了3/4的总产值，即食品和饮料制造、服装、木材产品、文化产品、建筑材料、家具、艺术和手工制品、塑料产品以及金属产品（非机器）部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

如果要正确认识结构改革的任务，那么就必须仔细审视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大型企业的特点。多数对共产主义国家工业改革的分析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这个特点没有被正确认识。举例来说，世界银行所作的关于俄罗斯经济的报告（世界银行，1992a）只用一页纸描述了苏联工业结构所带来的“遗产”，而用了20多页推介改革政策。令人吃惊

的是，苏联和中国的大型国有工业部门所遇到的机遇和问题是非常相似的。

在这两个国家，大型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垂直一体化水平很高。物质材料平衡计划的复杂性是其直接原因。每一层级的管理体制都会尽可能地增大自给自足程度，这样就降低了构造一个合适的“计划”的困难。这特别适用于那些不仅仅依赖于计划经济体制来保证投入要素的供给的企业。因此，借助于计划和自给自足两种制度，在大规模机器制造行业中的几乎所有企业都生产他们自己用的铁和钢，而不是从专业供应者那里购买。故而，在苏联的机器制造工业，仅有不足20%的生铁和钢是从专业供应者那里购买的，与之相比，美国这一比例超过了80%。[格拉尼克（Granick），1967，第157页] 而且，在这两个国家里，很大比例的备件和所需机器都由大企业内部加以生产。关于1978年的中国机器制造工业的美国国会报告指出：“中国的企业组织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领域；工厂是垂直一体化的，许多自身所需要的零件都由自己生产，不能利用专业化的效率。”（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8，第300页）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用于一般目的的机器工具，这些工具用于生产小批量的各种类型的投入品，使用率较低。一个批评性的苏联报道对此做出如下评论：“我们的工厂已经转变成最全能的、最全面的工厂。正努力让一切需要的东西在附属厂生产，不因为琐碎之事依赖于其他生产者，企业的领导者使他们的经济运行‘自然化’……自己生产所需要的螺母比从专业工厂那里获得更为方便，因为那些工厂通常都不存在。”（什梅廖夫和波波夫，1990，第118页）

中国和苏联的大型企业生产了大量的小批次产品，低于最优规模，并没有受益于大规模专业化生产。举例来说，在1962—1963年间的苏联，50%—60%的钢铁铸件都是由大型企业内部的小“车间”生产的，年生产能力在1 000吨以下。（格拉尼克，1967，第158页）在20世纪
130 70年代的苏联，电梯运输设备由不少于320家的企业分支机构生产，这些分支机构属于35个部和局，这320家中的大约250家是为了自己

的使用而在工厂生产这些设备的："因此，更多的机器产品是在小的无效率的车间完成的。"（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6，第169页）

苏联最典型的大型一体化工厂为基洛夫（Kirov）建造厂。1992年，该厂有大约50 000名员工［包括17 000名在完全分离的提克日（Tikrin）场地工作的人］。基洛夫建造厂内部有大量的半自由的"车间"，包括能够生产多种类型的钢铸件的锻造"车间"，牵引机车生产"车间"，军用坦克生产"车间"，生产涡轮、齿轮、泵、破冰船和商船上使用的主要引擎的"车间"，以及生产各种各样耐用消费品——包括拖车、有氧运动设备、健身设备——的"车间"（基于作者对工厂的个人旅行观察）。

因此，中国和苏联工业的核心部分的规模之大是误入歧途了。它并不是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者，而是在每一个大"工厂"都拥有一系列规模相对小的"车间"，这些车间进行着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主要分开的专业化生产者来完成，专业化生产者的规模都比较大。由于较大的垄断倾向，中国和苏联的诸多工业并非是专业化生产者。如果我们"揭开"大规模工厂的特点，就不难发现，其结构问题是颠倒的。在众多部门，那里宁愿存在太多的小规模生产者。

正如我们在第3章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的中心目标是捣毁资本主义体制的基本运行机制——利益驱动和市场。为了达致此目标，需要将全部的工业统一到一个全民所有的单一企业。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实际上只有少量的大型多角化公司。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很多工业巨人，这些巨人能够受益于多角化经济运行，同时能够参与国际竞争。当然，这些巨人的建立得益于非竞争的计划经济体制。结构改革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重建大量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能够自行设计、制造的工厂，这些工厂各自在低于最优规模的水平下生产，然后共同形成一个大的、通常也是多角化的公司。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大型企业内部，对不同的"车间"进行水平整合的一个复杂的过程。

导致中国和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企业规模庞大的更深层次
131 因素是在共产主义体制下企业还要承担大量的非生产性职能（表5.7）。这包括职工住房、上下班服务、教育、医疗、食堂、工人俱乐部以及有关部门内部雇员的宾馆。

**表 5.7　不同企业规模的制造业的员工分布（%）**

| 企业规模 | 资本主义国家 | | | | 美国 | 印度 | 中国 | 苏联 |
|---|---|---|---|---|---|---|---|---|
| | 小型 | | 大型 | | | | | |
| | 1950 | 1970 | 1950 | 1970 | 1986 | 1987/1988 | 1987 | 1983 |
| 10—100 | 40 | 35 | 23 | 20 | 31.0 | 27.6 | 14.0 | 1.6 |
| 101—500 | 30 | 33 | 30 | 30 | 32.0 | 23.8 | 32.6 | 12.6 |
| 501—1 000 | 11 | 13 | 13 | 14 | 11.6 | 12.0 | 12.0 | 11.2 |
| 大于 1 000 | 19 | 19 | 34 | 36 | 25.4 | 36.7 | 38.7 | 74.6 |

**注释**　仅仅指“独立核算企业”。在 1978 年，独立核算企业占 NVIO 的 9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49—1984，1985，第 41—42 页）

**资料来源**　艾利西（Erlich），198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1；阿克斯和奥德雷希，1993，第 62 页；陆南泉，1988，第 120、145 页。

*区别*

**工业布局**　中苏关系在 1960 年的分裂以及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隔绝导致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高度不安全感的一个主要经济后果就是工业投资分配上的“三线”政策。在总投资中，分配给内地省份的投资比例迅速上升，以至于内地省份的总的工业资本存量从 1952 年的 28% 上升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 56%（表 5.8）。由于这些工厂远离主要的人口中心，交通也不便利，因此投资的经济回报是比较低的（表 5.8）。比如，中国最大的载重汽车制造厂建立在位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的遥远的西北山区①。（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1978，第 288 页）

① 指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选址在湖北省十堰市。——译者注

**自力更生**　中国遇到了一个计划体制的经济体通常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被另外一些特殊的问题掩盖了，这些特殊问题导致了在工业发展中强调自力更生。首先，就是中国地域的广阔和交通体系发展的低水平。其次，三线政策意味着投资资源的大部分被用于扩展该地区的交通体系，这种投资的回报水平是较低的。比如，修建一条北京西到广州的铁路线（即在内地）花费了1963—1978年间的铁路建设总投资的84%。（于光远，1984，第168页）然而，更深层次的特点是全国范围内的长期政治混乱，尤其典型的是在大跃进（1958—1959）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由于不能依赖正常的交易网络，这导致对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的管理单位的渴望。同时，对于中央当局来说也便于保持一些政治命令的影子。这类似于一种封建时代的管理方式。在封建时代，低水平的领导才管辖自己领地内的所有各种活动，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尽量不让普通民众与外界沟通和联系，同时，在所有方面都构建从高到低的直接的和简易的命令链条，以便指挥和管理。



**表5.8　工业资本、就业和中国沿海和内地省份产出的分布（%）**

| | 1952 | 1978 |
|---|---|---|
| 工人 | | |
| 沿海 | 60.5 | 46.3（1984） |
| 内地 | 39.5 | 53.7（1984） |
| 固定资产值 | | |
| 沿海 | 72.0 | 43.9 |
| 内地 | 28.0 | 56.1 |
| 工业产值 | | |
| 沿海 | 69.4 | 60.9 |
| 内地 | 30.6 | 39.1 |
| 资本产出比 | | |
| 沿海 | 0.45 | 0.54 |
| 内地 | 0.40 | 1.08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85，第137页。

这些植根于中国的特征有助于在经济体制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产生高度的“自力更生”，甚至超过一个计划体制经济体的正常特点。的确，
133 自力更生成为整个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口号。奥德利·东尼索奈（Audrey Donnithorne）在1972年的作品中指出：“无数个自由或者相对自由的生产中心被建立在整个国家……对自力更生的强调适用于每个单位，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但不是企业意义上的单位，同时还包括当地的管理单位直至下面的生产班组……自力更生可能在一个企业内部，在一个当地的管理单位或者一个公社。甚至每一个县和每一个市都被迫‘在自力更生的旗帜下建立小的但完全是本地的工业体系’……企业自力更生水平的增长的特别标志是机器。”（东尼索奈，1972，第608—610页）

**小工厂** 自力更生的政策本身导致大量的小工厂快速建立。在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下，由于在农村有生产现代农业投入的巨大压力，因此小工厂的作用大大增强。灾难性的大跃进之后，中国寻求快速地扩大农业部门的现代投入的供给。这一进程的核心就是来自农村小规模工厂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机械的很大比重都是由这些小工厂供给的。地方的小钢铁厂扩大了他们在钢铁生产总投资上的份额，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8%增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不低于52%。（于光远，1984，第156页）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约45%的氮气总产出和大约一半的水泥总产出都是由农村小工厂生产的。（珀金斯等，1977，第156、178页）

类似于改革之前的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也是大量的工厂占据着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有非常多的小工厂。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数据显示，在整个工厂部门内部（“独立核算企业”），有286 000个小企业（占总数的68%），每一个企业的员工不超过100人（平均每一个企业为35名），这些企业仅生产了9.6%的所有工厂的工业总产出值。（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8，第293页）此外，1979年的数据显示，有580 000

个停留在班、组水平的微型企业（占中国工业企业总数的62%），每一个工厂平均只雇用17名员工，仅仅生产3.4%的工业总产值。（世界银行，1981b，第20—21页）

中小企业部门在苏联的工业企业规模结构中只占一个特别小的部分（表5.7）。一个成功的改革似乎应该是让这些部门的产出和雇员快速增长，因为按照正常逻辑，这些部门能够获得快速成长，并且通常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苏联的国有部门，多数员工都在那些部门工作，不同的职位和部门之间的生活水准和收入水平有着较大差别。而且，地区之间的平均收入有较大差别，劳动力增长率也有很大差别。在经济改革计划成功实施期间，随着大型国有部门外部新的雇用机会的出现，不难想像，员工可能会在部门之间、职位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这可能会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如下方式：（1）离开国有部门到高工资之处进行全职就业；（2）国有部门员工到非国有部门“兼职”工作；（3）在国有部门停薪留职，同时在非国有部门多多少少做一些全职工作；（4）在国有部门留职，同时保留社会保障，作为交换需要向原单位支付一些费用；（5）国有企业可能自身投资新企业（直接地或者与来自其他部门的资本联合成立合资企业）用以生产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企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在此过程中需要对来自原企业的富裕劳动力进行重新部署。所有这些制度安排的某些形式在改革期间都发生于中国，但是加入到劳动力大军的新成员的快速增长和农业部门中的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倾向于降低从国有部门到非国有部门的转移程度。



**中国独特政策的后果**　资源流向内地、“自力更生”和小工厂的遍地开花共同创造了一些收益。它们所提供的收益也成为未来变革的遗产。最为显著的，这些收益就是农村地区相对广泛的技术能力以及农村环境下大量的小批次机器生产所引致的学习效应。其次是地方政府角色的强化，即它们是各种各样活动的主要经济代理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的管理者。

然而，此战略成本也很高。中国工业不能受益于规模经济和专业

化分工与交换的好处，这种专业化分工和交换通常也超出了计划体制
135 经济体所能控制的方式。在此战略下所生产的大部分产出都是质量低下的，比如，利用了大量的动力和要求频繁的保养。正如人们所普遍认识到的，大量的小工厂的生产成本非常高昂，这是因为它们经常生产资本品，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些资本品应通过工厂水平的规模经济来生产。举例来说，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载重两吨的北京 130 轻型载重汽车的生产中，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每年大约生产 8 000 辆，每辆汽车的成本约为 10 000 元，与此同时，哈尔滨轻型汽车制造厂每年生产 50 辆载重汽车，每辆汽车的成本大约为 33 000 元。（于光远，1984，第 94 页）中国每单位产出对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投入的特别高的消费主要源于小工厂的高燃料成本。（珀金斯等，1977，第 72—76 页）

如苏联一样，中国在重建大规模的工业部门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然而，由于它还需要对小规模部门实现大规模重构，因此它还面临一个特殊问题。改革的中心任务便是重建中国的工业，“把分散的和包罗万象的经济单位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经济合理性的原则进行‘经济一体化’整合”（于光远，1984，第 108 页）。在 1978 年，余秋里便将小规模机器制造部门所面临的巨大任务总结如下：从农业机械和设备开始，就应该把重点放置在专业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生产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8）他宣布了一个中期计划，即把大多数中小型工厂从合同制下的一般的专业配件设备制造者改造为大型工厂。在每一个部门，战略规划都是改革政策的中心主旨，而不是私有化。

### 技术进步

中国和苏联都进行了科学方面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从全民技术进步的角度看，只获得了较低的回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科研院所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封闭性。但是，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在工业生产上缺乏利用科研人员的技术——或者是直接应用于工厂或者是通过获得科研成果间接地加以利用——从而改善工业绩效的利益激励。

事实上，企业管理者在抵抗技术进步上有较强的激励，更不用说他们还亲自尝试着实现之：

> 在苏联，创新不得不被“引进”。俄罗斯词汇“vnedreniye”（谆谆教诲）就暗含此意，即创新需要来自上面的推动。反之在西方，每一个国家都有工业间谍，并会花费大量的努力来防止竞争对手学习自己的发明创造。有此区别的原因主要是西方的工业部门甚至于被大公司的垄断所主导的部门之间都存在竞争（比如化学工业）；反之在苏联，许多戏剧和小说都刻画了领导人的妨碍者角色，他们抵制创新，仅有极小的兴趣做有创新意义的事情，出现这种局面绝非偶然。（诺夫，1983，第 76 页） 136

通过在工业生产中引入利润激励，现存的科研人员原则上有助于企业实现产出的大幅度增长。甚至对于他们的收入水平来说，都可以借助于改革获得可观的增长，关于这方面苏联也可能比中国更有潜力。

没有实现科技潜力的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还可以由配置给军队部门的科研人员比重过大来解释。在这两个国家中，这一比例都很大。这一方面反映了苏联处在冷战的前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早期既要针对苏联又要针对美国的进行“双面作战”准备的窘境。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据估计苏联的国防支出大约占 GNP 的 15%，而且国内机器生产的 16% 都要满足国防部门的需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82a，第 306 页）而且，国防部门还要求优质资源有一个不相称的更大比重的倾斜。（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82a，第 340 页）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国防部门的技术不如苏联发达，因此只能更多地依赖军队人员的数量。然而，被军队部门抢占的工业资源比重却大于苏联。据估计，在 1980 年，中国国防部门占据着不少于 21% 的工业总产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5，第 477 页）两个国家都有来自于冷战结

束的“和平红利”，因为冷战的消失可以释放科技和物质资源至民用。如果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工业竞争中引入设计良好的政策——该政策可为了盈利大量使用科技和军队部门先前的资本存量——那么，这种红利可能是非常大的。

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西方”，并由此导致苏联对外国技术
137 的进口加大，但设备进口仍然仅占国内设备总投资的大约2%。（汉森，1978，第31页）这一领域的顶级专家认为，苏联技术进口在苏联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有限的角色。（汉森，1978，第34页）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量的技术进口都来源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到20世纪60年代，“自力更生成为口号……并且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变为对最发达技术的有选择的进口……库存的苏联设备很快就变得陈旧而且国内生产的设备还比较简陋”（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8，第311页）。如果积累的外汇能够支付技术进口的扩大，那么中国和苏联都拥有特别大的技术追赶机遇。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技术能力被大大地损毁，因此，相比于苏联来说，中国在利用追赶机遇的能力上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位置。

### 5.2.8 农业

*区别*

**气候和产出** 气候的巨大差异导致中国和苏联的农业生产模式有本质的不同。不论在何种制度体系下，苏联的恶劣气候都业已决定了其农业生产模式必须建基于大规模的农业实践活动，并且生产一种不同于中国的谷物和肉类产品的组合安排。苏联的人均耕地面积与美国相当，大约人均0.8公顷，相反在中国人均大约只有0.1公顷（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417—418页）。中国的每公顷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达到约4吨，相比之下，苏联只有1.9吨。

与其他因素相比，苏联的低产量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气候，这个很难做出估计（接下来要讨论）。苏联谷物产量大大低于美国（每公顷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大约为4.7吨），略低于加拿大（每公顷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是2.4吨），加拿大的气候条件更接近于苏联主要谷物产区的气候条件。而且，通过对具有相似气候条件的美国和苏联耕作区域进行仔细研究发现，每公顷的谷物产量差别很小。（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9，第37页）苏联农业的主要缺点不是每公顷播种面 138
积上的谷物产量或者说增长绩效不好，而是要实现这种产量需投入大量的资源。

**农田上的人口压力** 中国只占有不足7%的世界耕地面积，约占有10%的世界草地面积和不足3%的世界森林面积，但是其人口大约是世界总人口的22%。苏联占有大约17%的世界耕地面积，12%的世界草地面积和23%的世界森林面积，但是人口只有世界总人口的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417—418页）中国总
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的6.5亿增长到70年代后期的将近10亿。 139
人口数量巨大增长的同时，耕地面积总额大大地减少，人均农田数量1957年减少14%，到1978年则减少40%，这给中国政府敲起了警钟（表5.9）。

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的人均农田数量已在世界最低国家之列，甚至大大低于印度（表5.10）。而且，在中国内部，地区差别也是显著的，中国东部和中部的主要经济活动中心已经大大低于国家平均水平（表5.10）。与日本不同，中国农田的绝大部分位于荒凉地区。在人口较为稠密的东部省份，那里有比日本还多得多的人口，但人均农田数量却和日本差不多（表5.10）。

尽管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控制人口增长（见以下内容），中国总人口从1978年到1992年还是增长了2亿多。而且，成功的工业增长还使得耕地面积进一步降低。到1992年，人均农田数量与20世纪70年代后 140
期相比已经跌落了1/5（表5.9）。

**表 5.9　中国的“绿色革命”**

| | 1957 | 1978 | 1992 |
|---|---|---|---|
| 耕地面积 | | | |
| 共计（百万公顷） | 112 | 99.5 | 95.4 |
| 人均（公顷）（指数） | 0.173（100） | 0.103（58） | 0.081（47） |
| 灌溉面积（百万公顷） | 27.4 | 45.0 | 48.6 |
|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 (24.5) | (45.2) | (50.9) |
| 其中 | | | |
| 机械灌溉（百万公顷） | 1.2 | 24.9 | 26.3 |
| 占耕地面积比重 | (1.1) | (25.0) | (27.6) |
| 机械耕种面积（百万公顷） | 2.6 | 40.7 | 51.5 |
|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 (2.3) | (40.9) | (54.0) |
| 农用机械（百万千瓦时） | 1.21 | 117.5 | 303.1 |
| 大中型拖拉机（千） | 14.7 | 557.4 | 758.9 |
| 手扶拖拉机（百万） | — | 1.37 | 7.51 |
| 联合收割机（千） | 1.8 | 19.0 | 51.1 |
| 农用卡车（千） | 4 | 74 | 642 |
| 化学肥料的使用（百万吨） | 0.4 | 8.8 | 29.3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341、349 页；世界银行，1981c，第 61 页。

**表 5.10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国家的比较（1979）**

（单位：公顷）

| 中国 | 0.10 | |
|---|---|---|
| 其中 | | |
| 东部 | 0.08 |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和山东 |
| 其中 | | |
| 人口稠密的东部省份* | 0.05（1992 年） | 江苏、上海、浙江、福建 |
| 东北 | 0.19 | 辽宁、吉林、黑龙江 |
| 西北 | 0.18 | 陕西、甘肃、宁夏、新疆 |
| 西南 | 0.07 | 四川、贵州、云南、西藏 |
| 中南 | 0.08 | 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 |
| 北部 | 0.15 |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

续表

| 其他国家 | | |
|---|---|---|
| 日本 | 0.04 | |
| 美国 | 0.86 | |
| 印度 | 0.26 | |
| 苏联 | 0.89 | |

**注释** *1993 年的总人口为 1.56 亿。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经济概要》，1982，第 12—13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83、332 页。

**表 5.11 中国和苏联的集体和国营农场的规模（平均每个农场）**

| | 苏联（1985）* | | 中国（1980） | |
|---|---|---|---|---|
| | 集体农庄 | 国营农场 | 生产队 | 生产大队 |
| 人员数量 | 488 | 529 | 56 | 449 |
| 播种面积（公顷） | 3 485 | 4 766 | 26 | 206 |
| 大牲畜 | 1 930（奶牛）** | 1 850（奶牛）** | 17 | 134 |
| 猪 | 1 109 ** | 1 163 ** | 55 | 430 |
| 羊/山羊 | 1 666 ** | 2 921 ** | 33 | 263 |
| 大中型拖拉机 | 20 | 57 | 0.1 | 1.1 |
| 手扶拖拉机 | — | — | 0.3 | 2.6 |
| 联合收割机 | 14 | 19 | 忽略不计 | 忽略不计 |
| 农用卡车 | 44 | 26 | 忽略不计 | 0.2 |
| 农用水泵 | — | — | 0.8 | 6.4 |
| 机械打谷机 | — | — | 0.5 | 3.5 |
| 谷物脱壳机 | — | — | 0.5 | 4.3 |
| 饲料粉碎机 | — | — | 0.3 | 2.0 |
| 胶轮大车 | | | | |
| 动物牵引 | — | — | 0.4 | 3.4 |
| 人力牵引 | — | — | 6.4 | 49.6 |

**注释** *在 1985 年，国营农场占有 1.79 亿公顷播种面积，集体农庄占有 1.43 亿公顷播种面积。

** 公共所有。

**资料来源** 陆南泉，1989，第 287、289、303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 232—233、244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第三部分。

**资本** 尽管中国有绿色革命，但是大型农用机械的存量却远远低于苏联。根据人数测算，中国的生产大队与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规模差不多，但是拖拉机、卡车和联合收割机的数量却远低于苏联（表5.11）。而且，中国现代化投入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较易分开的，即都是小型的。在苏联，大型的和不能分开的农场投入比中国更具重要性（表5.11）。在改革之前的苏联，平均每一个集体农庄大约拥有20台拖拉机、14台联合收割机和44辆卡车（表5.11）。在中国的可堪比较的所有权架构和组织形态中，即在生产队中，这样大型的生产工具的平均数量是可忽略不计的。事实上，甚至在高一个层次上，即在生产大队中，大型生产工具的平均数量也是可忽略不计的。

141

在苏联，所有农田中只有小部分是可以灌溉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约占7%）。（李仁峰：《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81，第6、446页）中国有能力在如此有限的耕地上喂养如此庞大的人口，关键就在于它的灌溉系统很发达（用了千年才实现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农田大约有1/4已经实现了灌溉和排水。（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经济概要》，1982，第133页）通过公社组织大量的劳动力去修建灌溉系统，中国的排水和灌溉面积已经从1957年的2 700万公顷上升到1978年的4 500万公顷，到了1978年，能够排水和灌溉的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已经提高到4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经济概要》，1982，第133页）在中国的大部分农田都处在半干旱地区的条件下，这一比例已经是非常高了。甚至日本在1979年的灌溉比重也不超过66%，而且在印度——这个国家与中国的气候条件相当——这一比重仅为2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经济概要》，1982，第134页）在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比如江苏和浙江，那里的气候条件与日本类似，灌溉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达到了耕地面积的80%（表5.12）。

中国在每单位农田上的高的劳动投入、高灌溉比例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表5.9），共同使其获得了每单位

播种面积上的高收益。而且，大约一半的中国谷物产地都要耕种一次以上，即每年耕种两次或三次：中国的复种指数——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之比——在1980年达到1.4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56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51页），因此，每单位耕地的年产出要高于每一次耕种的收获量。到1987年，中国每公顷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达到4吨，与之相比，孟加拉国是2.4吨，墨西哥是1.8吨，印度是1.5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419页）甚至在日本，每单位农田有更好的自然条件和更大的现代化投入，每公顷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总体上只比中国高出40%（1987年每公顷的产量为5.7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419页）日本的每单位播种面积上的谷物产量仅比中国最发达的省份，比如江苏和浙江，多一点点（表5.12）。



**表5.12　中国某些省份的农业生产条件（1988）**

| | 每公顷耕地所使用的化学肥料（吨） | 排水和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之百分比（%） | 谷物产量（吨/每公顷播种面积） | 农民的平均收入（元） |
|---|---|---|---|---|
| 中国 | 0.93 | 46 | 3.6 | 545 |
| 江苏 | 1.90 | 77 | 5.0 | 797 |
| 浙江 | 2.54 | 86 | 4.9 | 902 |
| 四川 | 1.12 | 44 | 4.0 | 449 |
| 甘肃 | 0.27 | 24 | 2.1 | 340 |
| 山西 | 0.52 | 30 | 2.6 | 439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11、225、252、255、263、272页。

中国有限的耕地面积和高水平产出已经实现这一事实意味着提高农业产出的技术约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要大。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导致饮食结构改善的不断增长的收入水平，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需要在农业上进行更大的技术投资以便能够获得所要求的农业产出的大幅度增长。

在改革进程刚刚开始之时，中国的食物摄取水平不仅大大低于苏联，而且也比亚洲最具有可比性的国家也就是日本落后很多（表 5.13）。中国高品质食品的消费大大落后于日本。中国改革使得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导致对优质食品需求的大幅度增加，这使得中国的食物消费越来越趋同于日本。从表 5.9 可以看出，中国的“绿色革命”贯穿了改革始终，并使得固定资本和当前投入都有显著增长。这需要大量投资，当然也会挤占这些投资资金的其他用途。

如果认为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之间实现的农业产出的增长是由于更好地利用了现存资源或者“提高效率”
143 的结果，那是不正确的。尽管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资源的使用效率有所提高，但为了保持农业产出的增长，以便应对潜在的供给约束从而满足需求的不断增长，投资和储蓄上的巨大努力是必须的。

改革开始时，苏联的人均农产品消费水平要大大高于中国（表 5.14）。的确，苏联和美国在农产品消费水平差距确实很小（表 5.13）。而且，苏联人口增长很慢。换句话说，即便苏联人均收入有较大增长，也不能导致农产品需求的巨大增长。中国在改革农业部门时所面临的任务包括两方面：改善效率的同时也要持续地增大农业产出。对于苏联来说，改革农业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效率，而不是扩大产出。

**集体农场的规模**　在中国拥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组织生产和进行收入分配的基层单位为生产小队。它平均大约只有 50—60 名社员，而且拥有的农田播种面积仅为 26 公顷。在苏联拥有生产工具所有权、生产组织和进行收入分配的基层单位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尽管严格来说国营农场不拥有生产工具）。苏联集体农庄的社员不少于 38 名，
144 而且有 3 485 公顷的播种土地。在改革后期，只有很少人努力通过使用“LINK”系统[①]降低生产组织规模和收入分配至更低层次，而且甚至这一努力也没有在苏联农业领域广泛传播。

① LINK 项目为联合国主持的连接各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系统。——译者注

**表 5.13　中国（1978）、苏联、美国和日本（1988—1990）的营养摄取（每天人均）**

| | 中国 | 中国占日本之百分比 | 日本 | 苏联 | 苏联占美国之百分比 | 美国 |
|---|---|---|---|---|---|---|
| 卡路里 | 2 311 | 79% | 2 921 | 3 379 | 93% | 3 642 |
| 其中 | | | | | | |
| 动物 | 142 | 23% | 616 | 949 | 86% | 1 107 |
| 植物 | 2 169 | 94% | 2 305 | 2 430 | 96% | 2 535 |
| 蛋白质（克） | 71 | 75% | 95 | 107 | 97% | 110 |
| 其中 | | | | | | |
| 动物 | 4 | 8% | 53 | 57 | 81% | 71 |
| 植物 | 67 | 160% | 42 | 50 | 128% | 39 |
| 脂肪（克） | 30 | 37% | 81 | 106 | 68% | 155 |
| 其中 | | | | | | |
| 动物 | 14 | 37% | 38 | 71 | 89% | 80 |
| 植物 | 16 | 37% | 43 | 35 | 47% | 75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509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896 页。

**表 5.14　1985 年苏联和中国的不同农产品的人均产出**

（单位：千克）

| | 日本 | 中国 | 苏联 |
|---|---|---|---|
| 谷物 | 144 | 364 | 734 |
| 植物油 | 0.4 | 6.3 | 6.7 |
| 肉 | 29 | 19 | 62 |
| 奶/奶制品 | 61 | 3 | 354 |
| 蛋 | 18 | 5 | 16 |
| 水产品 | 95 | 7 | 36 |
| 糖 | 8 | 4 | 30 |
| 水果 | 49 | 11 | 66 |

**资料来源**　中国农业部：《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89，第 706—707 页。

**劳动力：增长** 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农业人口的数量出现了停滞。但对中国来说，尽管采取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其总人口从1978年到1992年还是增长了2亿多，并且，在同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增长了1.3亿多，增速超过了43%。[①] 尽管通过农村工业化的成功实施吸收了一部分劳动力就业，农业劳动力数量在这一时期还是增长了6 500万之巨，增速为25%。人均土地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下降了大约1/4（从人均0.35公顷下降至0.27公顷）。两个国家开始进行改革时，都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是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结果。然而，相比苏联，中国在吸收劳动力就业上面临着更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在总人口规模较大的基础上人口还持续增长，而人口增长需要创造就业机会，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在日本的可比较的历史发展时期，其人口增长率要大大低于中国（在1850—1900年间，年增长率仅为7%），同时农田面积还在增长。在1900—1950年间，人口增长加速（至每年增长1.3%），但农田面积增加得也十分迅速（大约每年增长0.7%）。[麦克珀森（MacPherson），1987，第7章]

**劳动力：技术水平** 苏联农村劳动力中在技术上具有一定水平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苏联农村总劳动力的数量一直下降，与此同时技术人员的数量稳步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有140万“高水平和中等水平的农业专家”和420万司机和农用机器的修理工（李仁峰，1981，第498—499页），共计超过了农村总劳动力的22%。文盲劳动力的比重微乎其微。



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受到高水平专业教育的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仅仅为0.05%。只有8.8%的农村劳动力在中上等学校接受过教育。据统计，有21%的农村劳动力是完全文盲（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32页），来自20世

---

① 这一章的中国数据全部取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81、97—98、115页。

纪 80 年代中期的其他调查显示，28% 的农村劳动力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 244 页）。世界银行认为，“文化大革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农村的教育普及：“合格人才的数量，特别是高水平的，是非常稀缺的……”（世界银行，1981c，第 46 页）有理由相信，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农村的教育系统还没有从“长期关闭和反专业教育倾向”中恢复过来，并且目前的现实仍是，各种层次的技术人员都严重短缺。（世界银行，1981c，第 46 页）

### 相似性

**制度环境**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把他们的农业政策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之上，即农业就像工业一样，在农业生产过程的所有方面都有极大的可能实现规模经济。这是隐藏在集体农业背后的核心理性。尽管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规模要大于中国的生产小队，但即便是后者，其规模也远大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农场。而且，生产小队的生产组织和收入分配的形式都非常类似苏联模式。

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组织方法有严重的问题。（罗澜，198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超过三四个人的农场都是比较罕见的：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每一个农场平均只有 1.9 名员工。（罗澜，1988，第 41 页）研究发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进行监管有特殊困难。这个困难来自于农业生产整个周期过程中的任务的相继性特点（针对某一给定小块的农田来说，确定每个人的劳动贡献很困难），来自于较大区域面积上的农业劳动的空间分散性（这导致难以评估不同地块的劳动力要求），还来自于需要劳动力灵活应对的气候变化在农业生产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在完成耕作任务的大多数方面都存在较大的规模管理不经济（以员工数量来衡量，而不是资本数量）。然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辅助方面，存在大范围的规模经济，因此受益于互相合作，比如研究、灌溉、作

物喷施、加工和市场销售等方面。典型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在主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上以小单位生产为特征，但是在辅助活动方面存在大量的合作。

**表 5.15　苏联和美国农业的比较（1974—1975）**

| | 苏联 | 美国 |
|---|---|---|
| 农场员工 | | |
| 总数（1978，百万） | 27 | 4.1（年平均） |
| 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 26.3 | 3.7 |
| 国民总投资中的比重（1971/1975,%） | 26 | <5 |
| GNP 中的农业比重（%） | 17.6 | 2.6 |
| 播种面积（百万公顷） | 217 | 137 |
| 肥料使用（百万吨） | 15.0 | 17.5 |
| 农场机器存量 | | |
| 拖拉机：总数（百万） | 2.3 | 4.4 |
| 农场员工/拖拉机 | 12 | 0.9 |
| 农场卡车：总数（百万） | 1.3 | 2.9 |
| 农场员工/卡车 | 20 | 1.4 |
| 联合收割机：总数（百万） | 0.7 | 0.7 |
| 农场员工/收割机 | 40 | 5.9 |
| 产出比较 | | |
| 每公顷的谷物产出（50 公斤）：粮食 | 13 | 21 |
| 每公顷的谷物产出（50 公斤）：饲料 | 16 | 38 |

**资料来源**　李仁峰，1981，第 67 页；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6，第 578、585 页。

还有一些严重问题影响着农业经济绩效。这包括不适宜的定期保险、农业技术和生产组织上的中央决策，对农产品市场的过分政府管制以及农民在促进工业投入农业生产的选择上的无奈。中国和苏联经历了源自于上述问题的种种困难。

147　**资源浪费**　与合理经济地利用人力资源和资本相反，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农业生产的方式导致了大规模的资源浪费。苏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至少有14%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相比之下，在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一比例仅为6%，而且如果采用宽泛的界定，据估计这一比例会高达26%，中国在同一时期大约有71%的劳动力工作在农业部门，与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的比例相类似。（表5.2）

两个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只有通过吸纳大量的投资才得以推进。在苏联，农业部门吸纳国家总投资的比例从1959—1965年间的17%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的20%，与之相比，美国大约是5%。（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9，第40页；另外可见表5.15）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中国，农业投资大约占国家总投资的11%。[拉迪（Lardy），1983，第130页]然而，还有大量的投资是由集体自身所组织筹措的，因此，农业投资的最终份额可能要高于上述数字。世界银行估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农业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例大约为20%。（世界银行，1981a，第50页）农场和农庄对农业投入的购买呈现了迅速增长之势，从1957年到1978年平均几乎每年都为12%。（罗澜，1993a，第245页）农村对总的钢铁产品的消费比重从1957年的8%增加到1977年的17%，并且，在同一时期，农村对总的水泥产品的消费比重从9%增加到25%。（罗澜，1988，第60页）

**大型机械设备投入的重要性**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改革前的苏联，主要大型机械设备投入要远比中国大。在苏联的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困难就是如何设计一种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让个体农民能够继续安全有保障地使用大型机械设备投入，尽管那些设备不是他们的个人资源。

然而，中国有很多种可以较容易分开的小型机械设备投入，这些设备在其农业生产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包括：手扶拖拉机、机械打谷机和谷物脱壳机以及饲料粉碎机。与一个卡车或者拖拉机相对于苏联集体农庄相比，这些资产设备的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对于中国农民的平均收入来说是更贵重的。在中国改革的早期，许许多多重要的生产工具依然保留着集体所有权，比如在1984年，中

148 国还有超过一半的机械打谷机和超过 2/3 水泵归集体所有。（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 242、251 页）只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私人所有的机械设备资产的比重才成为主要的（到了 1990 年，私人所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已经达到农业机械总价值的 7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 251 页）

然而，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灌溉上所起的作用要远比以上小型设备重要。我们已经知道，灌溉在苏联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很小。但在中国，它却是农业高产出的核心贡献者，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的灌溉面积已经超过耕地总面积的 45%。在 1985 年，中国的 47% 灌溉面积由规模各异的“灌区”所组织并实施，“灌区”的规模从 600 公顷到超过 30 000 公顷不等。事实上，中国 28% 的“灌区”规模普遍为大约 7 000 多公顷。（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 256、265 页）此外，有 36% 的中国灌溉区域是由水库来完成灌溉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 256、265 页），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个体农民的资源。因此，在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维持农业生产效率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任务同样也是保持个体农民对大型农用机械设备的使用权，尽管那些设备不是个体农民的私有资源。

**农业产出的质量和多样性** 在中国和苏联的学术界，有大量的文献对低质量的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出的多样性对农业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研究。两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投入都承受着听命于遥远的非农民的办公室决策的苦果，因此导致农业生产多多少少地不符合当地的条件。两个国家都忍受着农业机械设备低质量和频繁损坏的苦果，这些农业机械设备都是在国有企业中生产并以卖方市场姿态加以供应的。在这两个国家，设计良好的工业改革可以通过更好的和更适宜的投入在大大降低每单位农业产出的资本需求上发挥较大的潜力。

**农产品的出售** 在苏联和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大部分都被国家强制性购买。一个设计良好的政策——即在生产什么产品上赋予农民更

大的选择自由——可以获得来自于更大的专业化分工所带来的收益。

**私人部门的角色** 在中国和苏联，对于农民的个人决策来说，私人部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领域。中国的私人部门经历了比苏联更多的荣辱变迁，在某一时期它曾受到严厉攻击。但是，正如苏联在大部分时间所做的那样，中国为私人农业活动留了一定的空间。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据估计约有 10%—20% 的社员收入来自于私人部门，这些私人部门建基于仍存有疑问的领域。（罗澜与怀特，1983，第 252 页）苏联农业的私人部门发展达到高峰时，它要远比中国农业的私人部门重要。比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些私人部门生产了苏联土豆总产出的 73%，蔬菜总产出的 75%，肉类产品的 67%，奶产品的 75%，蛋的 89% 和羊毛产品的 21%。（李仁峰，1981，第 373 页）后来这些私人部门生产的比重有了某种程度的下降，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数据显示，它还生产超过 2/3 的土豆总产出和大约 1/3 的蔬菜、蛋、肉和奶产品的总产出。（李仁峰，1981，第 384 页）因此，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农村居民都没有真正离开过私人农业生产。事实上，私人部门的农业生产活动是他们许多非常重要的食品的供给的主要源泉。



*含义*

在这两个国家，简单的制度变迁就会在大幅度地改善效率、释放劳动力和增大经济体中的就业。这些对处于改革进程中的共产主义经济体来说是很大的潜在意外收益。而且，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向工业供给原材料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改善，也可以通过激励人们改善自身的生活——甚至在一个相对发达的经济体中，比如像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苏联那样——来促进经济绩效的全面改善。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减少食品和原材料的进口来改善国际收支平衡。

最重要的和最简单的制度变迁就是把农田分配给个体家庭，允许家庭自主决策农业生产，允许他们在固定税率的制度环境下自主决策储蓄和投资。“土地制度改革”本身能够扭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规

模管理不经济，而且能迅速地改善农民激励。如果这种土地制度改革还伴随着农业生产投入的供给体制的变革和工业生产更多利用利润加以刺激的制度改革，那么，对于追逐利益的农业生产家庭来说，在选择农业投入的质量和种类上就会有更强的主动性。

最大的问题是大型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乍看上去，苏联农业普遍比中国拥有数量更多的大型农业设备，因此苏联的“整体依赖性”问题似乎更为突出。但是，中国也有着重要的“整体依赖性”领域，这种“整体依赖性”与苏联农业不同，即农业生产对排灌系统的高度依赖。甚至对于一个规模非常小的防止水流失的设备来说，都不是农业个体家庭的能力所及。改革后组织这些设备投入的方案原则上是不能模仿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部分的大型机械设备投入——从工程处理设施到联合收割机以及农作物喷施飞机——都被非农户拥有并且由专业的供给者租给个体农户使用，或者被农户以合作社的形式联合所有。原则上，通过土地合约程序，可以使得大部分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投入掌控在以利益为导向的合作社手中或国有的机器和灌溉公司，由它们完成保养，并方便给农户使用。

### 5.2.9 自然资源禀赋

依据土地面积，苏联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它的领土面积占世界总面积的29%还多。它拥有大量的木材储备（大约占世界总储备的1/4）、煤资源（大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2）、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它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世界排名第五的钻石储备，世界上第二大的铜、铁矿石、镍和锌的资源储备，同时还富有其他稀有的原材料。甚至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依据土地面积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然占有世界土地面积的13%，几乎是美国和中国的两倍。

中国也是一个大国。正如苏联一样，它拥有巨大的煤资源。然而，它没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由于煤炭资源在每单位能源产品上所需要的运输投资大，因此在改革期间，中国持续的对煤炭资源作为

主要能源的依赖已经成为其发展的重要负担。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 151
大量的外国投资被引入到南中国海的石油勘探，但至今仍然没有发现可观的储量。中亚是否输送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给中国还停留在推测层面。中国的木材储备相对于这个国家的规模来说是非常少的，而且，它的贵金属和矿产储备也不能与俄罗斯的储备规模相提并论。

改革期间，国际石油公司准备在中国进行投资勘探的意愿缓解了一些压力，在此条件下苏联也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以便使自然资源生产更加现代化并且有一个增长。需要的条件就是政治稳定、产权安全并能够确保投资收益。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发展路径，通过简单的制度变革，辅之以上述路径，就能够提高出口收益从而大幅度地扩大进口。

### 5.2.10 人口压力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遇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特定年龄组人群的高生育率的问题（国家没有控制生育的措施）。此外，它还面临一个稍大年龄组的一批人进入再生育阶段的特殊问题。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发展起来的确保基本需要的体制使得人口数量在没有国家强硬的控制人口再生产之措施的条件下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死亡率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但出生率却很高，在此期间，政府太过于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以至于没有分心给控制人口再生产的政策制定上。经过整个60年代，出生率维持在30‰以上，在1963年甚至高达4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90页）而且，这批人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进入了结婚年龄组行列。

20世纪70年代，中国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成功地提高了平均结婚年龄。此因素再加上有效避孕大幅度提升和惩罚措施的严厉都有助于迅速降低毛泽东时代后期的出生率（从1968年的36‰降低到1975年的2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90页）尽管在

整个20世纪80年代，结婚年龄和控制生育的人口的比例都保持了较高水平[①]，但由于再生育年龄的人口比重的迅速扩大也为全面控制生育带来了极大困难。

152 在20世纪80年代，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率，那么中国人口将会比实际增长得更为迅速，这给投资率和投资结构带来了较大问题，而投资率和投资结构反过来又会降低收入和产出的增长率。

### 5.2.11 隐性通货膨胀

改革期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要比毛泽东时代高，并且，其波动相当大（表5.16）。但是，与同样处于改革进程的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相比较（表5.16），或者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相比较（见第2章），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还是温和的。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更容易控制通货膨胀吗？

有人认为，叶利钦政府继承了一项遗产，即被压制的通货膨胀，这对于俄罗斯的改革来说是一个特殊困难。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即来自于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时期的被压制的通货膨胀，尤其是管制经济下供给短缺所导致的对商品和服务的过度需求。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在1976年的中国不比1985年的苏联低。当然，正如我们稍后看到的（第7章），在1985年之后的俄罗斯，被压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迅速加剧了，但这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直接后果。而这些改革政策反过来也是正统的转轨理论的基本主旨：经济改革需要政治民主化。

中国也有较大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构性压力，比如基础设施

---

① 从1980年到1987年，女人初婚的平均年龄为22岁，并且，采取生育控制措施的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51%增加到1988年的5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第134页）

的瓶颈问题，解决这些瓶颈问题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而且，瓶颈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功实现而加剧，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对见效缓慢的资本品的潮涌般的需求。

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改革期间有特别强的与许多分散的政府经济职能有关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没有对金融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或银行缺乏为了控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而控制货币供给的激励，这类似于“囚徒困境”，即个体行动的理性导致了集体行动的非理性。

总之，中国能够处理好经济快速增长和合理的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不能主要地被解释为继承隐性通货膨胀方面的好运气。经济加速、大规模的结构转型和通货膨胀的合理控制能够同时实现确实是难以完成的特殊壮举。



## 5.3 非经济因素

### 5.3.1 文化

中国是儒家文化的诞生地，而儒家文化是某些地区的工业化的强劲动力。中国至少有一些地方具有较好的企业家文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参见吴（Wu）等，即将出版］。而且，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之前，商业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取得了繁荣，这使得中国人在改革时期能够重新拾起他们对商业资本的强烈回忆。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这一事实重新激发了人们探讨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热情。长期以来，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用新教伦理来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这一问题被忽略了。儒家文化强调辛勤工作、教育、任人唯贤和等级制度，如果不是针对一个富有的国民经济体，那么，儒家文化符合人们对有效率的企业的认知。因此，许多人尝试用儒家文化来解释东亚的成功。

将中国纳入到这些国家的行列，即其增长可以用儒家文化来解释，这一想法是非常诱人的。当然，这种解释缓解了以政策选择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然而，这一看法存有诸多问题。

第一，“文化”不是一个给定的因素。人们会持续地以自觉和不自觉的方式对“文化”进行重构。比如，日本的工业协调“文化”不是自发出现的。相反，更常见的情况是，它是有意创造的产物。需要解释的是，日本古老的儒家文化为什么能够被重构和如何被重构为适应东亚工业发展的新文化。

第二，什么类型的儒家文化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森岛（Morishima，1982）认为，日本能够实现中国未能实现的现代化的原因是日本的儒家文化在对个人的教诲中强调等级和忠诚，这一点不同于中国和韩国，那里的儒家文化更强调多样性。而且，传统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由于根深蒂固的家族主义、裙带关系和腐败的积习，中国儒家文化的多样性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的确，列维（Levy）的经典描述认为，“在传统中国，生活的经济层面以及其他几乎所有的层面都以家族为导向，而且商业关系也建基于家族之上”（列维等，1949，第 12 页）。列维指出，中国的价值体系、以家庭为导向的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是反对现代商业公司的，因为它强调“特殊主义和实用主义”（列维等，1949，第 12 页）。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问题所引致的对经济前景的悲观主义是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中国的著作中的一个持久的话题。这使得许多观察者怀疑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进步”是否有基础，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是较为悲观的。

第三，在企业家“文化”遗产上，前斯大林经济体制国家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一些人所乐见的那样是如此明显的。正如之前的论述，俄罗斯在 1914 年之前的资本主义的大幅度增长不符合“俄罗斯主义”与资本主义文化不相容的论点。苏联充满活力的黑色和灰色市场显示，企业家文化在俄罗斯并没有被扼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企业家精

神”在俄罗斯的快速传播有力证明了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很少有国家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样试图完全禁绝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与“被痛打和被淹死的狗”联系在一起。

### 5.3.2 官僚体制的管理能力

中国和苏联都有悠久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历史传统。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庞大的党组织[①]，该党组织还与国家行政管理系统紧紧地交融在一起。不能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或者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要比苏联弱。也很难保持这样的论调，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队伍要比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苏联的共产党组织队伍更有专业效率。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组织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于在此期间，中国的发展是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专业标准的，对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这是更为普遍的一种现象（即强调“红”而不是“专”）。

中国具有较长的政治分析传统，该分析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中世纪的极大的技术突破以及没有经历工业革命，主要在于行政体系的抑制性权力［例如巴拉兹（Balazs），1964］。事实上，李约瑟（Needham）对中国科学和文明的权威分析表明这就是中国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 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抑制了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产生，因为在封建时代后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社会已经不适应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被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所代替，这个社会在西方没有与之类似的。我们把这个社会称之为亚细亚官僚主义，在这种体制下，所有的贵族，除了上天的儿子——统治整个国家并通过巨大的官僚机构向全体人民进行征税的皇帝——之外，都没有实质性的权力。（李约瑟，1969，第175—176页）

①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大约为3 800万，占总人口的3.5%，同一时期苏联共产党党员数量大约为1 800万，占总人口的6.7%。

20 世纪 80 年代充斥在中国国内外的大量的观点都让人感到，这个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压制的行政体系将会阻碍中国向成功的市场经济体发展。

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认为官僚机构是共产主义国家实现其改革政策的主要障碍。大多数的观察者都认为，由于改革会剥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因此官僚机构将尽力地阻碍改革，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阿斯伦德（Aslund，1991，第 14 页）将普遍认可的看法总结如下："改革会减小官僚机构的权力，故而大多数的管理者肯定会反对改革，因此，一个成功的改革必须打破反改革的官僚机构的权力……打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权力是改革的关键问题。"



然而，拥有一个有效率的和有竞争性的国家官僚机构几乎是解释自英国开始的每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的崛起的关键。如何处理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逻辑可能性。一种就是认为旧的官僚机构是没有希望的、不悔改的，本质上是反对任何改革措施的，并且试图破坏之。而另一种，改革者的路径是尝试改变旧的官僚机构的目标和运作方法。这包括渐进专业化过程、组织年轻化、引入更多的理性原则，使之成为官僚机构的道德伦理基础，而不是准宗教原则，以及赋予官僚机构成员在重构斯大林体制经济体过程中的中心角色。在改革道路上，党的成员对改革构不成较大威胁，而且，虽然他们的任务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发生较大变化，但他们依然保留着他们的尊严、地位并且还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回报。

中国领导层尝试采用第二种方法并且获得了广泛的成功。但是，如果认为中国的官僚队伍在以改革方式进行成功转轨的能力上优于苏联，那么这种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20 世纪 70 年代的许多观察者著作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以米勒（Miller）对戈尔巴乔夫所继承的苏联官僚机构的评价为例：

党的准军事化组织和传统使之成为领导者手中一个有效的和

持久的工具。它能培养出精力充沛的并具有无私忠诚的服务于转轨事业的官员队伍。它还包含上百万名能够坚定地贯彻命令的执行者，即便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命令。事实上，他们会接受对党实施外科手术的想法，如果这一手术是在他们自己的管理下进行的。（米勒，1993，第77页）

### 5.3.3 政治改革的强烈需求

政治后果不是政府可以选择的。一种论点认为，中国和苏联的政治后果不同不完全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是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使然。那方面的最重要的论述认为，政治后果一方面与民主的强烈需求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每一个国家分裂为不同政治实体的倾向不同有关（它们的“分裂”倾向）。



#### *民主的强烈需求*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是一个远比中国发达的城市化社会，这是不证自明的。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要比中国大。在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西方民主制度马上就要实现的看法可能远比中国更具普遍性。

然而，对于苏联国内外的许多观察者来说，苏联政治体制似乎是稳定的。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以相对完整的没有根本性破坏的形式生存下来。这一体制，甚至在后斯大林时期和后赫鲁晓夫时期，仍然是压制性的，仅仅允许在有限领域实现个人自由。进一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最近时期还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经历了巨大的动荡，“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期之内导致了广泛的政治混乱，几年里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苏联则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时期。而且，“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行动者是上百万的年轻人，他们受到鼓励，即要“敢于反抗”。

苏联人民在政治制度上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愿望可能比中国更具普

遍性，但是改革的期望并不高。把这种希望转换成热切期望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该政策涉及政治体制的开放（glasnost）与新思维（perestroika）。与之截然相反，中国领导集体几乎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中国近期的主要政治任务。一系列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运动意在降低政治改革的预期，在政治上较为活跃的人群里这种改革预期较为强烈。

*分裂倾向*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和苏联都是巨大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两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人口的相对规模有着较大不同。非俄罗斯的人口约占苏联总人口的一半，而中国非汉族人口仅占总人口的不足 10%。一旦苏联的少数民族人口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追求他们的独立，那么，苏联的情形要比中国发生同类事情时的情形困难得多。



成功的市场和收入的增长是导致民族差别消失的最强劲的力量。非市场的斯大林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口号下以一种“冰冻”的形式保持了民族完整性。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两个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体的分裂期望并不高。但是，民族领导人所追求的政策却是显著不同的：在苏联，政治新思维（perestroika）的氛围极大地鼓舞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期望。在中国，导致经济加速增长的改革战略通过提供就业、提高收入、鼓励移民离开少数民族区域和在商业中改变价值观等手段，淡化了民族主义者的情绪。

一个国家的有效的中央统治可能不仅仅是被民族主义所侵蚀。民族分裂和统一的周期性循环占据着中国的悠久历史，甚至在汉族内部也是如此。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中，在面对散沙般的分裂倾向时没有什么能比保持一个国家完整的需求更为强烈。

## 5.4 结论

这一章检验了在两国的改革计划开始实施时，留给两国领导层的

政治和经济遗产之间的诸多重要区别。这包括中国在人均土地、人均收入、城市化、工业化和科技方面的低水平。小规模工业企业在中国所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在俄罗斯所发挥的作用。所在地区的工业资产的结构的落后也为中国增长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有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更古老的企业家精神的传统。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比俄罗斯要小。中国拥有大量的可使用资本，这些资本掌握在海外华人手中。这些区别中的某些特点可能对中国是有利的，但许多都不是。很明显，总体来说，所继承的差别体制更可能说明的道理是，中国比俄罗斯获得了快速增长是由于中国选对了政策。



然而，两个国家也有很重要的相似性。有证据表明，两个国家在现代都拥有大量的企业家技巧之储备。两个国家拥有相对于它们的收入水平来说是教育良好的人口，而且，在这两个国家还有大量的未能全部实现的人力资源的生产力。计划体制经济体的基本的“计划”方法是相同的。农业和非农业机构的关键特征是相同的。两个国家的体制都使得相对大量的技术和资本存量锁定在军队部门。在每一个国家，经济体制都使得产出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潜在水平，即与现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可以实现的生产潜力相比，所实现的产出要小很多。在每一个国家，相对简单的制度变革就能给予经济绩效一个较大的初始改善，这个改善能够表现得像跳板一样，进一步推动更基础的制度变革和更大的经济绩效改善。换句话说，尽管两个国家存在着重要区别，但它们都拥有巨大的赶超可能性，就像大多数的前斯大林经济体制国家一样。

这一章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和苏联改革结果有差别的首要原因应该是政策选择的不同。这些政策既与狭义的经济问题相关，也与政治经济变化的关系相关。政策选择的不同本身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使然，这些历史因素使得实现斯大林经济体制转轨任务的路径有着根本的不同。

# 6　中国的改革

## 6.1　政治与改革

### 6.1.1　政治稳定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层对于政治稳定性的重视，主要是受权力之驱动："对党来说，保持权力是唯一的问题。"（《经济学家》，1992 年 11 月 28 日）该观点过于简单化。中国的领导层之所以重视政局的稳定性，是由于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同时，政局稳定本身也是其内在目标之一。

近代中国遭受了很多政治动乱（"大乱"）。19 世纪晚期，一系列的叛乱动摇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其中最严重的是 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该起义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内战，其"绝对的野蛮和混乱""在历史上鲜有可比"①（何炳棣，1959，第 238 页）。1911 年清朝崩溃之后是长期的内乱："从 1917—1927 年整整十年中，全国内战频繁……1928 年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战争不断……1936 年，国

① 据估计，中国人口从 1851—1871 年减少了 8 400 万之多。（珀金斯，1968，第 21 页）

共战争刚刚结束，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随即爆发。1945 年 8 月，国共继续内战。因而，在超过一代人的时期中中国很少有和平的局面。”（何炳棣，1959，第 249 页）战争导致政府不能积累财富，且其微薄收入的大部分也被用于军事目的。[①] 现代化主要在通商口岸的安全区域内进行。

政权的崩溃使得国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使得农业部门抵抗风险能力较差，进而无法应对饥荒情况。在 1877—1888 年中国西北部的干旱灾荒中，丧生的人口数字在 900 万—1 300 万之间；在 1928 年陕西省的大灾荒中，大约有 300 万人丧生。（何炳棣，1959，第 232—233 页）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由于洪灾反复，生命损失非常严重，其中最严重的是 1938 年的黄河改道，导致约 180 万人丧生。（何炳棣，1959，第 235 页）



中国的领导层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老人为主。邓小平是位非常卓越的领导人。他周围的人也都是卓越的资深政治家，比如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和杨尚昆。大多数评论者认为中国的“老人政治”对中国十分不利。人们经常将他们与苏联新一代的领导层作比较，比如戈尔巴乔夫（Gorbachev）、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叶利钦（Yeltsin）、波波夫（Popov）和索布恰克（Sobchak）。这些人，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来说，人们可以与之“做生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京的年长的统治者他们是不会上外国政客的当的。中国的年长领导干部经历了民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见证了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大跃进。这场灾难对错误的危险的“跃进”政策发出了严重警告。“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更值得人们反思。其“理想主义”的目标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破坏了经济并且威胁到了普通民众的安全。

当然，对权力的利己追求，是中国领导层决定进行政治改革的主

---

① 据估计，1928—1935 年间，政府支出的 40%—48% 用于军事。[费维恺（Feuerwerker），1968，第 58 页]

要动机。然而，在他们的方法中，一个虽无法确定但却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对中国所面临的选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中国确实像“一盘散沙”，极易分崩离析。

### 6.1.2 国家力量的战略诉求

领导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至少与政治稳定一样是中国领导层的目标。尤其是经历过一个多世纪的经济衰败与民族屈辱，中国更有决心建立一个强大的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体。大约2000年来中国一直是“中央王国”。它在欧洲之前完成了中世纪的经济和技术革命。

从鸦片战争的失败到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被迫开放，中国的屈辱不断升级。1895年，与日本的军事战争失败后，屈辱进一步扩大，同时也开启了19世纪90年代的瓜分进程，在此期间中国像“切甜瓜”一样被划分势力范围：“各种各样的欧洲国家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他们不公开进行，而像贼一样。他们开始像抢劫一具尸体一样打劫中国。”（列宁，转引自胡绳，1955，第112页）1900年借助于国外势力镇压义和团，这使得屈辱难以停止。而且，1911年之后，内战、军阀统治和土匪行为使中国每况愈下，民族屈辱又进一步加深。通商口岸由外国列强统治，普通中国人作为二等公民被对待。由于灾害席卷，在世界的眼中，中国已经成为“饥荒之地”[马洛里（Mallory），1926]。1937—1945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及其他的主要地区。



1949年以后，大跃进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在无政府状态下结束。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被看做是“政治疯狂”之地。在毛泽东领导期间中国取得了许多成绩，同时也在以他们原本所希望的方式实现经济现代化与提高生活水平这一进程中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处境孤立。即使在尼克松时期中美关系解冻后，中国仍然在世界事务中处于边缘地位。

从19世纪后期起，它的许多东亚近邻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现代

化，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尤其突出。这些内容经济力量的崛起使中国颇为尴尬。例如新加坡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城市国家，而韩国曾和中国对立。因此，他们的成功使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更有戏剧性。

让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以加强其世界地位同时恢复民族自信心，这一决心是促进改革的最强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召开，大会确定中国将要实行改革，并将此任务看做是“本世纪末之前使中国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长征”（中央委员会，1978，第10页）。

从内向的毛泽东式的政策，向一个以增长为导向、有国家规划的、依靠政治权威的、并且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政策的转变，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现代化战略相似，明治维新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孤立于世界的政策。改革同时也吸收了19世纪末以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以及后来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思想。邓小平对于三权分立的美国式民主之于“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潜在危害（邓小平，1987，第630页）的看法，与1903年梁启超在访问美国后所作的评论十分相似：

> （梁认为）从长期来看，（美国）个人利益对群体利益的逐渐替代只能导致国家不合作、容易产生冲突与不统一。梁认为这将使其无法与其他国家竞争……梁问道，难道国家为维持秩序而超越社会冲突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吗？在回答中，他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不能有所妥协：强有力的领导和强有力的国家……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要遵循的主要原则。[图伊（Twohey），1995，第2章]

### 6.1.3 国家强大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毛泽东逝世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

与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向无私奉献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变的理念不同，邓小平将实现经济增长作为第一重点，并接受了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的“实用主义”哲学，该哲学曾使邓小平及其支持者遭到了毛泽东的排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党必须将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第11页）

邓小平始终坚持，成功实施计划经济改革、保持和改善计划职能的唯一可行的政治方略是要坚持强大统一的党的领导：

>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①]（邓小平，1979，第49页）



中国领导层将本次改革视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中央委员会，1985，第520页），涉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领导层认为，这项复杂的任务与同时期的以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为终极目标的政治体制转轨不相容。他们深信，西方式的民主化将会导致政治解体甚至国家解体。

这种担心来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终结后都伴随着长久的混乱。它同时也来源于对革命之前的政治及“文化大革命”的记忆。它基于对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实际评价。而且，它也源于对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责任感：不能再次失败，要引导中国走向成功的现代化之路。邓小平的坚定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形成了

---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译者注

十分鲜明的对比：

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①]（邓小平，1979，第55页）



### 6.1.4 行政机构的专业化

在中国进入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时期后，年老的领导人不仅在党内占据着高层，而且在每个层级上也是如此。人们很快认识到，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是使这个庞大的行政机构专业化：

现在省委、地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六十岁以上的干部，其中不少还是七十岁以上的干部，政府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大体也一样……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五十岁左右的干部……（我们需要）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陈云，1981，第131—132页）[②]

行政机构现代化的尝试开始于毛泽东之后的早期，当时由邓小平

---

①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译者注

② 陈云：《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1981年5月8日）。——译者注

带头。[①] 其目的是让党内不具备较高技术资格的老干部退休。该行为与德国俾斯麦时期、日本19世纪末明治维新时期或者是新加坡和韩国在20世纪50年代时的行为非常类似。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都是建立一个专业的政府管理机构，让其对非选举出来的行政当局负责而不是对选举出的国会负责。在20世纪80年代，这有了缓慢但重要的进步："组织转变的速度，以及发生的相对容易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政府现在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以技术能力来对竞争政策的选择施加影响。"（哈丁，1987，第208—209页）[②] 至20世纪90年代初，与中国政府组织打过交道的人都发现，其能力水平已有了极大的进步。

改革期间，中国的行政组织成长很快，在政府和党组织内全职工作的人员数量从1978年的470万增加到了1992年的1 150万[③]（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表4.2），与此同时，党员人数则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3 500万增长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5 000万。虽然随着经济主体自主权的增加，政府的运作方法大大地改变了，但仍有大量的政府干预行为。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市场起作用的领域内仍有大量的政府干预行为，这使得市场有可能成为滋生腐败与滥用权力的土壤。尽管邓小平明令禁止"官僚主义"行为，认为应该克服之，但他在1980年时所作的阐述仍然贯穿了整个改革期间：

>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

① 专业化、降低规模以及让中国的政府官员进一步年轻化，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邓小平讲话的中心内容。

② 哈丁（1987，第204—211页）提供了一个关于技术官员比重大幅度上升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官员的平均年龄大幅度下降的仔细的描述。

③ 从广义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机构的人员的数量约达到了3 000万。

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①]（邓小平，1980，第84页）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更具有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历史传统。然而，中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一样分享了如下认识，即国家在经济生活中起中心作用，例如韩国与日本。疑问之处在于，官僚主义的负面影响与国家行为的正面影响在关键时刻能否取得平衡。

### 6.1.5 从极权主义到新威权主义

尽管保持了对政治生活的垄断控制以及对自由边界的严格控制，大范围的社会经济决定权还是从党的直接管理职能中释放出来。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向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韩国靠拢。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政治两种形式的“新威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一种形式将持续的威权主义看做是向以资产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企业经济快速转轨的车轮。该观点的主要口号是“硬政治，软经济”。这种观点认为，让转轨过程中的受益者，来控制群众的不满情绪——由于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失业及不平等而引致的——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政府操控让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转轨以一种可控制的、渐进式的方式实现，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威权主义。该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共识。在此过程中，对于变化的“社会容忍”水平在渐进式改革政策中受到了高度重视。而且，在该过程中，保持一个强大政府的主要原因在于能够确保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渗透到收入分配领域的底层，同时可以防止伴随收入与财富的急剧再分配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译者注

而带来的动荡。在此过程中，“公平”是制定政策时重点考虑的内容。这与简单化的、反对增长的毛泽东政策不同，然而，却同样致力于让民众分享进步的好处：

>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①]（邓小平，1984，第2—3页）

## 6.2 经济改革

### 6.2.1 经济思想

#### *计划与转轨*

联系到1976年之后的中国改革，那么在命令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在“转轨”到市场经济过程中利用了自发组织的方式。在这种观点下，增长差不多只是去除管制的成果。这同时也是认同中国“渐进式”方法优越性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

另一种观点将中国的加速增长看做是政府干预进而成功引领中国从一个“略穷”的国家到“中等收入”的国家的结果。该观点侧重于政府干预的积极影响，而不是将增长过程简单地看做是取消政策控制的结果。第一种观点则是侧重于从“比较转轨”的角度来分析改革过程。第二种观点则是通过比较经历大的结构转轨的国家的增长经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30日）。——译者注

历——无论其是否是共产党，来分析中国的增长。两种观点在评价中国转轨绩效时都是中肯的。

### 改革的警示与试验

从中国改革初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不得不与倡导“经济学的逻辑”与快速全面系统改革的专家们的建议进行角力。然而，尽管有无间断的内部辩论与各种相互矛盾的建议，领导层保持了一贯的路线，刘国光将其概括如下：

> 中外经济学家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改革经济体制必须是一揽子的，要改就得一下子全面铺开，要使新体制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协调配套，而不要一步一步点点滴滴地改……没有经过反复试验而逐步扩大就一下子全面推开一揽子的改革，那样弄得不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改革的具体实施，必须从试验开始，由小改到中改，由中改到大改，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因势利导，使全部改革过程能够健康地发展。……步骤上的划分使十分复杂的体制改革，能够在没有太多失误或避免了由于突然的和不切实际的改革所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刘国光、王瑞荪，1984，第 119—120 页）

这种渐进方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下一步改革进行之前，给领导者时间来反思每个阶段的问题、仔细考虑其结果：“体制改革的整个过程应该是缓慢、稳定、良好导向的，这将有助于领导者的精力集中于再调整上，同时确保改革的健康进行。”（刘国光、王瑞荪，1984，第 142 页）



“逐渐”一词在中国改革的政策文件中持续地重复出现。旧的斯大林主义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确定信念与另一种同样确定的信念——即改革必须“一步一步来”、“摸着石头过河”——交汇在一起。未经事先试验的快速改革会带来高风险，同时，过去的一个多

世纪的可怕失败，使得无论国内外受过教育的技术专家如何建议，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都决心要使改革缓慢进行。此外，在允许地方改革试验的同时，他们打算继续保持对整体进程的控制：

> 改革中的一切做法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经验……不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全国性重大改革的实施，由国务院统一部署。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进行改革的探索和试验，但一切涉及全局或广大范围的改革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能进行。[①]（中央委员会，1984，第 424 页）

所有的重大改革均是相同的步骤：地方试验与中央审查和批准相结合。中国的改革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官员与专家的大量劳动时间都花费在了调查、撰写报告、组织工作会议、讨论结果与监测新的政策实施上。这与正统转轨理论的简易方法相差悬殊。在后者那里，“政府改革”的任务仅是解除其对经济的干预而已。

多种因素可用来解释中国领导层对于改革如此谨慎的原因。有些人认为，与俄罗斯人的“喜怒无常与冲动”相比，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倾向于谨慎与试验。[②] 这个观察与中国亿万人民包括高干子女参与大型集体活动、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热情不符。以下几段对此进行了更为严肃的解释。

**体制改革的一致性目标的缺失**　即使是中国领导人中最严肃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几乎所有处于权力顶峰的人都认为命令式经济需要改革，但大家都不认为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适合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因而，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只有通过试验和系统演化，而不是通过普及一个先定的命题，才能在计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 年 10 月 20 日）。——译者注

② 这一观点我不止一次地在讨论我所给出的主题的研讨会上提出。

划与市场之间寻求到合意的平衡。

**谨慎可使维持党内支持改革的共识更为容易** 对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学习市场经济与信任市场的有效性牵涉到非常激进的新认知。从直接命令到逐渐依赖于间接的“经济”手段来引导经济发展，这些看似简单重复的说明，遮掩了很多表面上的改变。改革初期即是如此。[①] 较慢速的改革使得调整更为容易。那些立场坚定而且反对一举完成改革任务的同志之所以最后接受了经济体制的大转变，是因为他们逐步调整了自己的认识。因而，他们把技能与经验用于服务改革，而不是浪费在反对改革上。这种方法大大降低了改革争议尖锐化——如苏联发生的那样——的可能性：

> 我们不能通过把一些人叫“改革派”另一些人叫“保守派”把干部和群众分割开来。我们应当对暂时落后于发展形势的同志有信心，相信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对改革有更好的理解……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四川和安徽）带头：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公布以后，还有一些省徘徊、怀疑，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还有的看了两年才跟上。那个时候，中央的方针就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②]（邓小平，1987，第627页）

**中国已经历了一系列“跃进”政策的灾难**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后期，重新掌权的老人们经历了在政治经济上创造一个“大跃进”的尝试。1958年，毛泽东曾承诺，中国通过革命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可



---

① 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②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1987年6月12日）。——译者注

以在一夜之间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且可以在几年内实现显著的经济进步。“大跃进”以灾难形式结束，造成了极大的产出损失，同时数百万人因为饥荒而失去了生命。这让他们对西方与苏联国内的顾问给予苏联领导人的所谓激进政策可使生产力大发展的政策建议深感怀疑。

**20 世纪 70 年代时中国仍是一个穷国**　领导层深知，在低收入的国家里，政策错误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在大跃进时代被见证过了。这与苏联领导层的看法形成鲜明对比，苏联领导人无法想像事情会很快就变得相当糟糕。中国的领导集体不指望中国能马上创造出赶上美国或者是西欧的财富。相反，他们最希望的是避免灾难，希望通过谨慎的改革实现一些改善。随着中国逐渐繁荣，人们认为改革有所成效：“不怕慢，就怕站。”

### *收入低、人口多国家的计划与市场*

中国的老一代人都经历了市场经济。在一些人中，比如邓小平，他们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1949 年之前，生活在中国通商口岸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人，无不被市场的神奇力量所触动，同时也对社会的不公、剥削、潦倒与不安全感深感沮丧。[①] 此外，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国家可以采取很多方法来改善经济状况，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事实上，1950 年后，台湾地区将计划与市场相连接（“有计划的自由市场经济”），即来自于大陆的早年经验。（李国鼎，1988，第三章至第四章）中国的改革领导人从未幻想过“自由市场”可神奇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有市场高度失灵的第一手经验。俄罗斯的改革领导人对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一面——如财富分配的不均、普遍使用童工和卖淫、苛刻的工作条件、工作的不稳定和经济的大幅波动等——毫无准备。他们所幻想的“资产主义”，应当是像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或者西欧，而非 1914 年之前的俄国、同时期的巴西或印度。中国的领导人

① 前者可参阅罗斯基（Rawski，1989）和白吉尔（Bergere，1981），后者可参阅安德森（Anderson，1928）和甘布尔（Gamble，1921）。

没有此类幻想。他们在原始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生活过。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掌权的一代大多曾与毛泽东的政策进行过抗争，并因此而遭到过迫害。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斥责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并曾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应当对其经济政策的选择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实上，人们应当以他们是否成功实现经济及国民财富的增长来对其进行评价。陈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曾被大多数外国人认为是中国领导层的主要的“反对派”、“强硬分子”，曾因为偏好发挥市场更大的作用和个体激励与毛泽东抗争。[拉迪与李侃如(Lieberthal)，1983]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中国掌权的老人好似 20 世纪 20 年代倡导共产党领导下的混合经济［用布哈林（Bukharin）的名言来说，即是“社会经济沙拉”］的苏联领导人。陈云曾将自己比作是布哈林。中国的领导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同样使用了苏联共产党的布哈林一派所主张的经济实用主义。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和 60 年代早期，中国一直奉行宽松的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政策，而且这些人在推广这些措施上走在了前列。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苏联，新经济政策模型短暂复活，但随着政治情境变动，该政策被很快丢弃。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在通往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道路上有一个临时栖息处。在 1976 年后的中国，新经济政策则逐步转身成为更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的转轨手段。

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一致希望向更广大的东亚政治经济体的思想靠近。这个政治经济体从 19 世纪末明治维新的日本，延伸到孙中山和国民党（最初在中国大陆，随后在中国台湾）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的 173
韩国与新加坡。这一思想视政治体制为职能性的。能在一个敌对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更快地生产国民财富的体制被视为是最好的方案。从这个意义上看，在经济政策中，自由市场体制与斯大林的命令经济体制具有同等地位。更大量的思想源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在1947年国共两党内战的中期曾写道：

> 中国无法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竞争。因此，她必须对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及符合自身工业发展水平的经济计划政策。仅靠私有资本不足以大规模经营或是与信托及政府经营的外国企业竞争。这是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也使其不适用于中国。(蒋介石，1947，第279页)

从经济政策的含义上看，广义上的国家利益与坚决服从于国家利益的私人团体的利益是无法分开的：

> 西方经济学是私人企业或市场交易的研究，而中国的经济理论，则不仅限于私人企业或是市场交易，而是一个人民生活与国家防务的组合……经济学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的学问——将国家建设得富有、强大、健康以及心满意足。从本质上讲它是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学问。(蒋介石，1947，第243、248页)

按照这种观点，计划是低收入政府通过发展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1981年，台湾地区前经济部门领导李国鼎将台湾地区的做法描述如下：

> 虽然经济计划的价值仍然不被一些“自由市场”主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但不可否认，一些国家通过这样的计划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对那些经济平稳运行机制缺乏或不完整的国家，其对于经济计划的需求比发达国家更强……在面临国际市场的不确定以及国内经济结构转轨所导致的摩擦增加时，有效的经济计划将比以往更重要。

如果苏联改革领导人听取了李先生而不是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或者是科尔奈的意见，他们或许会对国家在大的结构转变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

### 独立决策

中国和苏联领导人看法不同的一个突出例证是国际机构的影响。布雷顿森林机构为苏联提供的政策建议，基本上与他们给一系列第三世界国家所制定的稳定与体制调整方案一致。随着苏联政治经济的解体，这些政策建议越来越多地以正式的条件要求的形式而出现。而这些主要机构在中国所遇到的境况是，政策制定者对自己迈向改革的务实性的政治经济方法的正确性充满信心。中国政府改革政策常常与这些机构的所谓的正统政策相悖。然而，中国政府的国家使命感是如此之强，用自己的实用主义方法来进行转轨的决心是如此坚决，以至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中国的改革给出激进的建议。事实上，人们认为，世界银行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几乎所有在中国部门工作的人员都被说服，他们相信中国对于改革的实用主义方法比该组织的其他部门的人员所信奉的方法更加合意。

### 公共部门的主导地位

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代，私营部门是被排斥的。在改革时期私营部门再次被允许存在，最初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但随着改革的慢慢深入放开的步伐逐渐加快。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拥有私人产权的私营部门的就业人数约为 5 500 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99 页）然而，这其中的大部分，约占 2/3，在小规模的非工业部门工作，而且主要是第三产业。我们接下来将看到，在 175
改革期间，公有企业的性质改变很大。当然，这些年来，国家通过逐步改革物资供应体系和国有金融部门，对各种规模的公共部门均给予

了优先照顾。①

在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经济在工业产出（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978年的78%下降至1992年的4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12页）然而，集体经济（即本地公有部门）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从1978年的22%上升至1992年的3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12页）因此，1992年，即自改革开始后的第14年，公有部门仍然占工业生产总值的80%以上。即使是在市场化程度最大的广州，1992年公有部门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达到了68%。②（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15—416页）广东的私营部门产出比重刚过5%，其他部门，主要是合资部门，通常与国有部门合资，其产出占工业产出（总值）比重刚刚超过2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15—416页）

因此，至少在第一个十年即改革的前半段时期内，企业家主要是受雇于国营企业。

### 6.2.2 价格改革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得出结论，即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央委员会，1984，第684页）。中国智库中有人主张迅速放开价格。（王小强，1993）然而，正如在其他方面的改革一样，经过激烈辩论后，政府决心谨慎地推行价格改革，因为

---

① 比如，1992年，在城镇工业部门中，只有大约130万人工作在个人拥有产权的私营部门内。相比之下，在合资企业中工作的人大约为240万，在集体企业中的大约是1 860万，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则超过4 500万。在同样年份的农村中，乡镇所拥有和村集体所拥有的工业企业的就业人员数量（4 300万）大约为就业于私营部门的两倍（2 030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9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第413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232页）

② 国有部门是35%，集体部门是3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415—416页）

“价格体系改革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国家经济”（中央委员会，1984，第684页）。所采用的使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的方法是双轨制，即在自由或浮动价格上出售商品的比例相对于在国家固定价格上出售商品的比例逐步扩大，同时后者的价格逐步向前者靠拢。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国家物价局控制的零售价格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约1/3，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放松了对零售价格的控制。而在批发市场，价格放开更为渐进。在1990年时，即改革的第十年，超过2/5的工业资本品仍按国家固定价格出售，在市场价格下出售的比例仅略多于1/3。20世纪90年代初期，市场价格改革进一步推进。到1993年，据称只有15%的工业资本品是在国家固定价格下出售的（表6.1）。例如，按国家固定价格出售的钢材比例由1984年的100%下降到了1992年的40%。1993年，大部分钢材的价格控制均被取消了，虽然国家仍控制着军事部门与国防工业、农业、水利与铁路的供给价格。[获多利企业财务公司（Wardley Corporate Finance），1993] 1993年，物价局的重要程度进一步下降，变为“二线”部门，其职能也收缩了。



**表6.1　不同类型价格的产品出售比例（%）**

| 年份 | 1978 | 1986 | 1990 | 1993 |
|---|---|---|---|---|
| 零售总额 | | | | |
| 政府定价 | 97 | 不详 | 29.7 | 5 |
| 政府指导价 | 0 | 不详 | 17.2 | 不详 |
| 市场调节价 | 3 | 不详 | 53.1 | 不详 |
| 农产品出售总额 | | | | |
| 政府定价 | 94.4 | 37 | 25.2 | 10 |
| 政府指导价 | 0 | 不详 | 22.6 | 不详 |
| 市场调节价 | 5.6 | 不详 | 52.2 | 不详 |
| 工业资本品出售总额 | | | | |

续表

| 年份 | 1978 | 1986 | 1990 | 1993 |
|---|---|---|---|---|
| 政府定价 | 100 | 64 | 44.4 | 15 |
| 政府指导价 | 0 | 23 | 18.8 | 不详 |
| 市场调节价 | 0 | 13 | 36.8 | 不详 |

**资料来源** 李平，1992，第17页；田原，1990，第143页；牛耕英，1994。

### 6.2.3 分权化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协调一致地贯彻来自中央机关的规划决策存在很大问题，而在一个如此庞大的体系中维持一个一贯的经济改革方案同样存在很大困难。管理协调好关键经济职能的谨慎分权化，以便控制住整个改革进程并且能对经济事务进行定期管理，这要求维持一个强大的和相对统一的共产党，即对于这些来说，维持一个强大的，相对统一的共产党是至关重要的。



对下级管理单位的决策分权是改革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包括金融方面——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税收自主权。而中央政府则逐步集中于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管理。[①] 这是对中央政府规划职能的重大转变。到第七个五年计划时（1986—1990），180个重点项目占用了政府大中型项目支出的3/4，其中91%是在能源、运输和原材料领域。能源与运输领域约占了政府资本总支出的一半。（世界银行，1990，第93—94页）

在20世纪80年代，投资资金的来源持续扩大，其中越来越多地

① 从现在开始，中央政府将逐步地减小金融投资的范围，并集中于能源、交通和新工业上。那些投资周期较短和具有较大相对收益的项目，尽可能地由主管当局或企业实施。（赵紫阳，1981，引自重要文件，1991，第229页）

来自于正常渠道之外，即来自于预算外。[①] 来自于中央政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政府收入”的比例在改革期间迅速下降。政府预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37%下降到了1991年的2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18页）同时，“预算外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31%上升到了1990年的8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35页）尽管仍在国家计划范围内，但预算外收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管制越来越少。[②] 因而，在改革期间，中央大大放松了对于资源配置的直接控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43%的国民收入都是来自于官方预算或者是受国家计划监督的“准预算”。[③]

在改革期间，地方政府从发展中得到了财政收入与心理满足，因而更有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世界银行总结到，在改革期间，地方政府的动机发生了转变：“地方政府的目标在于加强财政基础，制定投资战略以促进经济增长。两目标均可通过发展工业来达到。”

---

①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

| 年份 | 1978 | 1985 | 1992 |
|---|---|---|---|
| 国家预算 | 62.2 | 16 | 4.3 |
| 国内信贷 | 1.7 | 20.1 | 27.1 |
| 外国投资 | 4.2 | 3.6 | 5.5 |
| 自筹资金 | 31.9 | 60.3 | 51.2 |
| 其他 | | | 12.0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24页。

② 构成预算外收入的资金是“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和各个管理单位自我筹集，并用于国家所指定的范围的资金。这些资金是国家预算资金的有力补充……对这些资金的使用要纳入到国家计划的轨道，不能盲目扩张”。这些资金包括地方征收的工业、商业和农业附加税以及为地方公共工程所征收的附加税，还包括掌握在上级手中的用于能源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预算外资金。（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6章）

③ 如何把握相对准确地划分中央和地方所掌控的预算外收入的度，这是改革进程中的一个较为复杂的课题，包括核实征收预算外收入的各种名目。只有到了1994年，伴随着分税制的改革，才放弃了对预算外资金的控制。前者可能是后者得以实施的条件。

（世界银行，1990，第95页）中国多数省份均达到了大国规模。即使是一个县也有约50万人。随着市场经济的稳步增长，权力分散化让地方在国际竞争环境下，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到全国水平的意愿甚为强烈。



地方当局越来越致力于提高当地商品在国内其他地区和国际市场上的比重，以及吸引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国外的投资。在内陆，贫困地区政府甚至出资为移民开设培训课程，并为其提供移民工作机会。经济学家将此总结为："今天，无论你要去中国的哪里，最强烈的感觉都是他们要进行现代化与发展经济的决心。政府、党委、董事局的党代表：他们唯一的兴趣似乎就是外国投资、贸易与经济改革。"（《经济学家》，1992年11月28日）随着市场力量的壮大，地方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这些自主权从狭小的"经济特区"蔓延到了整个中国。①

各级政府执行的政策框架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共产党持续行权让这些政策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核心政策仍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在各级政府，这些政策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全社会投资的数字。每年每省的数字都由中央批准，由省政府来批准省以下各级政府（直至县政府）的数字。② 在毛泽东执政期间，只有特定单位或地方计划总投资预算内的相对较小规模的投资，才可不经上级特批。在改革期间，投资项目自主决策的相对比重稳步增长，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较大规模的项目仍需要上级的批准。

---

① "沿海地区大约有两亿人口，工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科学文教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历史上就与国外有广泛联系，在全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的探索和实践，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中央委员会，1985，第443—444页）参见《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1985年1月31日）。——译者注

② 我很感谢唐志敏（Tang Zhimin）对这一问题的调查研究。

### 6.2.4 人口

**增长**

在缺乏人口管制的情况下，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不得不面对两个问题，一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高生育率问题，另一是育龄人群人数过多的问题（中国20世纪60年代后高出生率的“引致”效应）。在改革期间，中国政府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增长……以逐步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国家建设……所有违反法律与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都应当坚决反对和阻止。”（赵紫阳，1981，第242—243页）



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人民公社时期成功提高了平均结婚年龄。这一点加上避孕措施的普及以及惩戒措施的实施，使得出生率在毛泽东时代的晚期大大降低。[①] 尽管结婚年龄和采取生育控制的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育龄人口比例的膨胀还是使得高生育率很难控制。[②] 虽然农村已经放弃了集体经济体制，政府依然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来控制农村人口出生率。（罗澜，1988，第192—193页）不遵守计划生育的村民将被罚款和/或得不到信贷、灌溉、电、化肥和其他农业投入品。这种制裁在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结果是，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出生率也大幅度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措施主要是给妇女放置宫内节育器、绝育和堕胎。

由于坚持推行计划生育，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时的生育率总水平的

---

① 出生率从1968年的36‰降低到1975年的2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90页）

② 女人平均结婚年龄从1980年到1987年维持在22岁，采用生育控制的人口比例从1980年的51%增加到1988年的5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9，第134页）

上升幅度非常小。[①] 1980 年至 1989 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仅为每年 1.4%（表 6.2）。[②] 如果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政府使用自由市场与个人选择的办法解决人口问题，那么中国的人口增长将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同。那样的话，到 1989 年中国人口将比其实际人口多 1.3 亿，甚至 2 亿。[③] 对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更多的资源投资到农业上。除此之外，较高的抚养比率也将使得投资远离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④]



**表 6.2　中国的劳动力增长**

（单位：百万）

| | 总人口 | 总劳动力 | 农村劳动力 | 农业劳动力 | 农村非农业劳动力 | 总的非农业劳动力 | 工业劳动力 |
|---|---|---|---|---|---|---|---|
| 1978 | 963 | 402 | 306 | 284 | 23 | 118 | 61 |
| 1991 | 1 158 | 584 | 431 | 350 | 81 | 233 | 100 |
| 2025 | 1 597 | (800)* | | | | | |
| 1978—1991 年变化（百万） | 195 | 182 | 125 | 66 | 58 | 115 | 39 |
| 每年百分比（%） | 1.4 | 2.9 | 2.6 | 1.6 | 10.2 | 5.4 | 3.9 |

**注释**　*假设参与率不变，利用世界银行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预测，结果只有小的改变，即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从 1990 年的 67.2% 下降到 2025 年的 66.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2，第 268—269 页）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4 章；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2，第 268—269 页。

① 出生率从 1980 年的 18‰上升到 1990 年的 2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14 页），而且这整整 10 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保持在 15‰以下（峰值是 1987 年的 16.6‰，到 1990 年跌落至 14.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第 14 页）

② 与此相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每年 2.7%（印度和中国除外）和印度的每年 2.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1，第 254 页）

③ 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和印度一样，那么中国在 1989—1990 年间的人口总数将会比实际人口高出 1 亿。

④ 中国在 1985 年的抚养比率（年龄低于 15 周岁和超过 64 周岁的人口占年龄在 15—64 岁之间的工作人口的比率）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与“中等的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 0.65，印度的 0.72 和其他“低等的人类发展指数”国家的 0.95 相比，中国的比率是 0.54）相比非常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第 166 页），而且抚养比率在整个 80 年代都在下降。每位工作人口中的非工作人口比率从 1978 年的 1.40 下降至 1989 年的 1.0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 89、133 页）

### 迁移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中国对于迁移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官方仍反对迁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后会给城市带来不稳定。政府保留了官方的户籍管理制度（户口）。除此之外，形成这种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人认为移民会使边远地区的耕种成本较高的耕地无人开垦，而这是不可取的。①

但是，改革进程——从指令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 20 世纪 80 年代移民政策迅速放宽。其主要原因是食品自由市场的增长非常迅速，而在此之前政府对食品配给是全面控制的。 181
此外，市场经济的增长及个人收入的天花板限制的解除增强了移民迁移动力，而收入增长则强化了这种能力。而且，越来越多的财政分权及地方政府增加当地收入的动机，使相对贫困地区的政府更有动力鼓励移民以改善当地的贫困状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人口流动的规模迅速增长，高约 7 000 万，主要是农村移民（班尼斯特，1992，第 20 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甚至超过这一数字。这种农村居民大量“盲目”迁移的现象得到了决策者与经常接纳移民的城市居民的广泛认同。在东部沿海城市，他们在火车站周围的大量聚集成为其突出特征。②

东部沿海地区的移民增加较快，很多移民来源于东部省份，大部

---

① 流行的官方观点认为中国的土地可开发资源非常少，因此所有的土地均需要继续开发，即使是最穷的农业土地也是如此。所以，当贫困山区的居民自发地向附近的发达的平原转移时，半官方媒体对于之前的已开发的山村土地的放弃表示惋惜，而不是高兴。[班尼斯特(Banister)，1992，第 22 页]

② 据报告，珠江三角洲（狭义上的）在 1989 年有 220 万移民工人，长江三角洲拥有 170 万，而环渤海地区拥有 180 万。（移民研究机构，1989，第 15 页）这些数据从绝对值上看比较大，但是和农村劳动总人口相比，即使在较穷地区，此比例也比较小。

分来源于这些省份的贫困地区。[①] 另外，一些贫困省区的大量移民进行了长距离迁移。然而，比起贫困省份或者是中国一些发达内陆省份如四川，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更快。[②] 事实上，很多长途跋涉的移民移出贫困省区就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③]

很多发达地区的居民将土地承包给贫困移民。但是，微观数据显示，这种承包在20世纪90年代规模并不大。[④] 富裕地区的居民不愿给移民永久居住的权利，担心因此将增加当地福利资源的负担。同时还有一个担心，即在私有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担心移民长期耕种将会获得事实上的所有权。

这种担心并没有影响对于从事农业的移民劳动者的需求。廉价移民劳动力使得富裕地区的农民能够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满足旺季的需求。不像其他很多贫困国家如印度那样，中国没有通过如设定最低工资或组织移民设立工会等来“保护”移民劳动者。在其他一些国家，这种保护移民权力的善意努力常常事与愿违，因为它鼓励了“资本密集型”发展的倾向，即以资本替代劳动力，进而减弱了对于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显然，这与中国情况不同。

---

① 瓦格（Vogel，1989）预测截至1987年，珠江三角洲——广州、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中的超过60%的总数达300万的移民工人都来自于广东本省偏远山区。（瓦格，1989，第265—266页）

② 城市“待业”人口的比例是度量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的合理的指标。官方数据显示，在内陆和贫穷省份的人口数量比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高很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90，第2部分）1989年中国城市的“待业”人口比例是2.6%，而在贫穷的甘肃省，该数值是5.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90，第49页）而且，在这些省区的贫穷地区，这一数据更高。例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省会兰州南部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这个数值不低于17.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90，第70页）

③ 参与扶贫工作的官员的粗略估计显示在1991年，四川大约600万移民，河南有300万移民，甘肃有300万移民。（个人交流，1991）1990年或1991年的调查显示有2 000万移民从中国西部移往东部。

④ 例如，一项对浙江省的10个农村的研究显示低于5%的移民在农业领域工作。（《农村政策调查报告》，1988，第28—30页）

### 6.2.5 储蓄和投资

182

改革期间，很多因素导致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尤其是在工业领域。这些因素包括：国家政治稳定；相对低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快速转轨中赚钱的机会（如服务行业、运输行业和房地产业）较多；以更有效的方式替代以前的对资源开发利用的不良方式从而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的丰富潜力；高需求增长所带来的良性循环；非农业领域有能带来高回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改革让当地人民有强大的动力来发展当地经济。与俄罗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对资本外流进行了严格限制，这种限制可以让储蓄仅仅投资于国内经济。

在整个改革期间，国内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非常高，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35%。[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多样化问题”（Various issues）] 在 1981—1987 年间，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 23%用于储蓄，相比之下，日本为 21%（1976—1982 年），美国为 8%（1976—1982）。（世界银行，1990，第 126 页）1991 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已达至 39%，投资率达至 3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 254 页）。据《世界银行报告》，真实的国际总投资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就非常高（1970—1980 年每年 7%），从 1980—1991 年累积达到了每年 12.4%；与此相比，一般低收入国家（包括印度和中国）约为每年平均 1.7%，中等低收入国家约为每年 -0.7%。（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 252 页）有相对高的国内总投资率的唯一国家是韩国（同期约为 13.0%）。不像指令经济下的高投资，在改革期间中国的高投资比例是对市场激励的反应。它更多地反应了“利益饥渴”，而非“投资饥渴”。

国家继续对国民收入在投资与消费间的分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尽管经历了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建立等一系列的组织变革，银行体 183
系仍然属于国家垄断，它们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信贷。在整个改革期

间，国有企业仍在信贷配给中享有优先权。①

### 6.2.6 国际经济

#### *概况*

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就被世界经济孤立。在改革期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世界经济一体化对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匆忙的无计划的一体化可能会导致较大的问题："改革开放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但必须谨慎执行以确保成功。"（中央委员会，1985，第441页）政府没有采用强调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正统的转轨理论所推荐的"紧密"一体化②，而是采取了有计划的、"有战略的"融入世界经济。③

#### *农业*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策者对食品尤其是粮食的世界市场依赖程度多少合适进行了激烈的讨论。长远来看，中国可能会从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中受益。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认为，对世界食品市场依赖程度过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对中国这么一个规模巨大且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在食品供给方面对世界市场依赖程度过高，外部冲击会大大降低其进口食品的能力，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扩大粮食产出：基础设施需要兴建，农业技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获得。

中国不能确定其制造品的市场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当时还不是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关于中国的出口问题传言不断，有人认为由

---

① 辛格和杰弗逊报告，在1993年的上半年，几乎9/10的工业总投资流入到了国有部门。[辛格（Singh）和杰弗逊（Jefferson），1994，第8页]

② 对中国政府融入世界的方式的详尽讨论可以分为两类，即"紧密"一体化和"战略"一体化，参见辛格（1993）。

③ "我们扩大和国外进行经济和技术交流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我们的自给自足能力和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胡耀邦，1982，第287页）

于中国的人权记录受到指控，中国不应当享受到美国市场的“最惠国”待遇。此外，政府对于免受世界食品价格的外部冲击的问题也较为关注。长远来看，粮食生产和分配中的技术进步将会降低世界粮食的价格，未来也是如此。然而，粮食价格也是不断波动的。[①]



由于世界粮食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下降，许多人建议增大粮食进口。尽管面临这些压力，中国政府对此依然十分保守。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一直对世界粮食市场保持较低的依赖程度。[②]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会推动和/或鼓励中国农民种植比自由市场条件下更多的粮食以保持粮食自给水平。这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然而，政府认为，在减少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方面，这种成本是值得的。

### 外债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国借贷持谨慎态度。其做法是“借贷谨慎的数量，保持审慎合理的债务结构，同时考虑到国家的财政、物质资源和偿还能力”（赵紫阳，1987，第658页）。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候，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较高，只要其愿意，便能非常容易地扩大对外借贷，然而，中国的外债占出口比例仍然偏低。[③]

中国对于外债的谨慎态度使其在决策过程中能完全独立。中国欢迎布雷顿森林机构——在改革早期中国就迅速加入该组织——提供建议，但不能附加条件。中国的改革路径与这些机构对其他国家所建议的改革路径，如俄罗斯与东欧，完全不同。

---

① 中国谷物进口的平均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和中期之前半段暴跌（在1981—1987年间下降了51%），在80年代后期出现了爆发性上升（1987—1989年间增长了67%）。（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1990）

② 20世纪80年代早期达到顶峰时，谷物的净进口总量占国内产出的4%，80年代中期中国变为谷物少量出口国，到了80年代末期，净谷物进口量只占到国内产出的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3—199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1990）

③ 例如1991年，此数值为87%，其他低收入国家（除印度和中国外）平均为308%，而中等收入国家的数值为160%。（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3，第284页）

### 外国私人投资

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不允许外国投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允许世界资本主义巨头对中国进行投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通过，标志着中国从毛泽东——斯大林式的孤立主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这是鼓励外国投资的众多法律之一。中国为吸引外国资本迈开了更大的步伐。与毛泽东时期对外国资本的敌视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政府认为“良好的投资环境”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及廉价劳动力”，将使得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赚钱”。[《北京周报》，1991，33（44）] 地方政府尽量避开中央政府的相关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至该区域。而且，中国在改革期间限制国际制造业资本通过直接出售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高度保护政策也间接鼓励了外国投资的增长。



由于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的储蓄率已经很高（见上文），因而吸引外国投资并不以补充国内储蓄为目的。相反，它是为了使中国能够在技术上迅速赶上。这包括进口制造业领域的现代设备的狭义上的技术进步。然而，也有更广泛的含义。外商投资的主要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①] 在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国的管理技术迅速传播，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具有为其他部门演示先进管理的广泛外部性。

外商投资企业牵涉本土供应链网络的各个环节，新的产品质量标准、生产方法和商业概念施用于供应链的网络之上。一份对于耐克运动鞋的全球商业研究发现，它直接雇用的仅有9 000人，但是有75 000人作为公司的独立分包商在进行工作。（《金融时报》，1994年8月

---

①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公司喜欢通过当地公司与广大的中国政府机构商谈，通过这个渠道，外商可能获得进入尚没有改革体制的国内市场的机会。对外商来说，他们通过中外合资企业这个渠道可以进入到一个非常陌生的文化体内，这个文化体允许持续的行政控制以及“婆家”管制，所谓婆家就是那些仍然管理中国工业企业的委员会和行政机构：通过合资进入中国这种方式是一种最有效的捷径，可以方便地获得许可、获得税收优惠、获得“目标”客户和所需要的大量资金。（《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

27—28 日）同样地，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软饮料行业的中外合资企业的研究发现，一个典型的工厂直接雇用的只有约 500 人，但有超过 100 个的工厂参与了最终产品制造的所需要的供应投入。这些企业总共雇用了超过 10 000 名“相当于全日制”的工人。① （罗澜，1994）

在共产主义经济体转轨的初期，外商投资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传递世界市场的商品需求信息，因为国内市场需求有限。对于来自于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不断增加）的资本来说，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据估计，内地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出口的比例从 1979 年的 7% 增长到了 1990 年的 36%。[宋（Sung），1991] 随着外资来源地域的扩大和总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加速增长，外国投资有了更重要的功能。这 186
个功能类似一个机车，即通过标准严格的公司审计和对界定清晰产权的需要，推动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进程。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谨慎增长，以及天安门事件后的中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外商投资步伐显著加快。至 1993 年，外商直接投资猛增至超过 1 110 亿美元，这是国外借贷总额的 10 倍（表 6.3）。至 1993 年中期，有报告称，有 135 000 的中国企业都有海外参与；有外商投资的企业产出占到了中国工业总产出的 6%。（《金融时报》，1993 年 9 月 15 日）而且，与直接投资相比，投机性资本流入较小。（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则少得可怜（1990 年至 1993 年间总共仅有 20 亿美元）。（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4，第 123 页）而投机性的投资则远远超过了该值。

① 把合资企业兼职工作的人员的生产投入按比例转换成“全职工作”的生产投入。

**表 6.3　1979—1993 年间中国经济的外国投资的增长**

（单位：10 亿美元）

| | 总的外国资本 | | 外国借贷 | | 外国直接投资 | | 证券投资 |
|---|---|---|---|---|---|---|---|
| | 合同额 | 实际利用额 | 合同额 | 实际利用额 | 合同额 | 实际利用额 | |
| 1979—1985 | 20.6 | 12.5 | 13.5 | 10.7 | 7.0 | 1.8 | 0 |
| 1985 | 9.9 | 4.6 | 3.5 | 2.7 | 6.3 | 2.0 | na |
| 1990 | 12.1 | 10.3 | 5.1 | 6.5 | 7.0 | 3.8 | na |
| 1993 | 122.7 | 36.8 | 11.3 | 10.8 | 111.4 | 26.0 | 1.19（1992）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 110 页；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第 204 页。

尽管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投资从绝对数量上看有所上升，但来自远东的投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投资通过香港渠道进入内地的比例迅速上升。20 世纪 80 年代，资本流入总额的约 3/4 是来自于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集中投资于东南沿海省份，尤其是广东和福建。这些省份的经济与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有活力的经济有效融合。随着后者经济发展中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鉴于当时大陆的商业环境
187 已与毛泽东领导的年代完全不同，因而资本从这些地区流向大陆邻近地区便很有意义。至 1990 年，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工厂出口额达到了国家总出口额的 13%。（宋，1991）

然而，海外华人资本的参与深度超过这一数字。除了外国直接投资，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都流入了本地工厂的贷款中，以帮助它们通过引进新机器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宋，1991）这些工厂为海外华人资本家进行组装运营。根据一种谨慎估计，1991 年约有 41% 的出口是来自于这类工厂。（宋，1991）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已经开始类似于新加坡的大规模版本：有大量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轻工业企业以及大份额的国外投资。

外国投资的爆炸式增长，是外国投资者对在中国投资之优点的积

极评价日益增加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投资在中国赶超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明显的日益重视。中国的资本流入是资本从老的工化业国家向远东地区流入进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一进程与欧洲及日本的经济衰退同步，进而导致了人们重新评估了全球劳动分工的前景。(《金融时报》，1994)

所有的外商投资都需经政府批准。而大规模的投资则需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在 1994 年，中央政府仍希望外国投资按其所计划的优先次序进行：

> 我们应当引导外商投资，使其与国家产业政策一致，指导其投资于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建设、重点工程项目以及提升现有企业的技术水平，尤其是投资于能够扩大创汇产品出口的企业。(陈锦华，1994)

为了进入中国庞大而迅速增长的市场[①]，波音公司首先要协助中国西安的主要中国飞机制造商，使其具备制造零部件、进而制造整个部件、最后生产整架飞机的能力。(《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为了进入中国汽车制造业，福特汽车公司首先要通过一系列的中外合资经营，为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技术能力提升进行若干年投资。



1978 年后，中国的发展战略与韩国及日本追求经济发展的战略截然不同，后者对于外国直接投资进行了严格限制。而中国政府则有信心控制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没有哪个单个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对此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如此之大，可以吸收几十亿的外国资本而不会动摇社会主义基础。"(邓小平，1984，第 5 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在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总资产、销售额及就业劳动力方面，中国所占份额增长迅速。此外，

① 据推测，中国在 2010 年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航班市场。

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中国的资本也迅速增加。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不太遥远的将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很有可能超过其“母国”市场。而且，随着中国的组织及个人越来越多地拥有这些公司的股份，其所有权结构可能会越来越“汉化”。在某种程度上，今天“基于”欧洲或美国的公司某天或许将“基于”中国，而其中国的董事和经理可能比世界其他地区的董事和经理更有影响力，这并不是异想天开。

*对外贸易*

**总体方针**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所一贯流行的传统智慧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对待国际贸易的态度是完全实用主义的。其方针与明治时期的日本、韩国等有很多共同点：“在对外贸易上，我们的原则是鼓励出口、根据需要组织进口。”[《北京周报》，1990，33（44）]

**促进出口** 增加出口收入在中国的现代化战略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我们出口创汇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水平，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规模与步伐的影响。”（赵紫阳，1987，第 657 页）外汇是“从外部引进技术，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和偿还国外贷款本金和利息”的需要。（中央委员会，1985，第 444 页）

最直接的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进行了一系列的贬值。[①] 至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官方与黑市的汇率差价已经消除。然而，改革期间对货币自由兑换一直处于犹豫和试验中。这与对货币兑换与经济改革的正统看法截然不同。各种复杂的、或多或少地受到严格控制的外汇掉期市场安排被引进了。同时也引进了一种同样复杂、并由国内出口者自主决策的具有实验性质的外汇留成制度。然而，过了十年、改革进行了一半后，人民币也没有实现自由兑换。

改革中的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出口，这与正统的贸

① 人民币（元）的汇率从 1981 年的 1.7 元∶1 美元下降到 6 元∶1 美元。

易政策改革理论截然不同。[①] 指定的优先出口部门可以保留较大份额的外汇。[②] 出口企业可以享受出口退税待遇及直接奖励。中国政府给予大型出口企业进口技术优惠待遇。努力构建大型的多工厂的企业集团的工业战略的部分目的，就是旨在建立起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先进企业相竞争的跨国公司。出口产业在技术升级方面得到了低成本的信贷，借助于国家直接控制的物流供应得到了较低价格的能源和原材料。中国出口商可以以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价格获得土地。大规模的、有可能成功的出口商越来越多地被允许可以独立地从事外贸，而不用再通过取代了旧斯大林体制下国营贸易单位的外贸公司。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以世界市场价格水平出口的制成品数量是零甚至是负值（休斯，1991；瓦格，1989）。中国政府相信，在未来的发展阶段中，这种出口的静态效率损失是低于技术增进所带来的进口的动态收益的，而这种经济价值并没有在价格上完全反映出来。



**保护**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维持了一系列保护性的措施。政府对保护政策的态度十分明确。[③] 其措施酷似工业化初期的韩国与中国台

---

① 为了鼓励出口和增加外汇收入，我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我们应该组织和扩大出口产品的供应。除了一些主要的国民经济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外，无论何时，如果出口和国内销售发生冲突，出口的需求应该优先。我们必须加强出口产品生产的基础，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应该建立具有明显特色的出口产品加工区，增加赚取外汇的能力。我们必须改善外汇分配的制度。我们必须建立出口发展奖励基金。对于在扩大出口和增加外汇收入方面表现突出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我们必须给予经济奖励。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运用价格、汇率和关税等经济杠杆鼓励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央政府，1985，第 511 页）

② 例如，在 1987 年，电机和电器的生产商允许保留 100% 的出口收益。

③ 保持外汇的积累和使用的平衡是一项困难的长期任务。我们必须强调外汇使用的经济效率，由此我们必须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并且增加我们赚取更多的外汇的能力。我们必须根据其原则调整进口产品的组合，并要侧重于电脑软件、发达技术和关键机械的进口。我们需要进口一些国内市场急需的产品和消费品。然而，我们不能支持超高的生产率或者通过长时期的进口原材料的方式使用大量的外汇。我们也不能通过进口大量的高级消费品刺激国内消费。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提高国内生产而不是盲目地进口，以便保护和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使用进口部件和零件的流水线工业时，我们必须逐渐改进我们自己的生产商。我们必须注意引进技术的应用、掌握和发展并且逐渐标准化。为了集中引导并控制此领域，国家必须制定国家进口和技术一体化的计划和政策，并制定一个许可制度，以避免重复进口和进口技术与国内研究发展的不协调。（中共中央，1985；主要文件，1991，第 511—512 页）

湾。李国鼎（K. T. Li）对于中国台湾贸易保护主义的评价与对中国改革派的保护主义的评价十分相似。

> 依赖于保护主义方法的代价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在台湾发展的早期，很明显，其工业不能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规模、技术与市场上进行竞争。没有合适的保护，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坚实的工业基础……结果，政府决定采用高关税政策和其他诸如进口管制与新工厂登记等非关税保护政策。（李国鼎，1988，第47页）

中国政府也认为这很“明显”，即一个技术上落后、尚未建立现代企业框架，尚未完成国内价格改革，尚未完全消除物资平衡计划体制，尚未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指令性经济，不可能在开放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它的整个工业部门几乎都是“幼稚工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到世界市场上进行公开竞争之前需要振兴的“状况不佳的中年工业”。

> 中国政府将中国外汇的很大部分用于其优先目的。数量限制的范围十分广泛，经常与特定商品的进口禁令有关。高关税政策贯穿于整个改革始末，[①] 以此来大力鼓励进口替代。[②] 此外，中国还采取了对特定类型的进口品进行严格检查的这类贸易保护措施。（瓦格，1989，第375页）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希望加入关贸总协定，且很有希望被邀请成为关贸总协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希望或者能够坚持的保护水平进行了广泛讨论。当然，如果中国要执行关贸总协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仍是未知的。



---

① 例如，1991年中国对于啤酒的进口征收了120%的从价关税（中国发展金融，1993），并且对大多数的产品，例如石油产品、石化中间体、树脂、塑料和合成纤维，征收的关税比率为进口价格的9%—80%。（美林证券，1993）

② 例如，摩托车零部件进口征收的从价关税为35%—120%，关税税率按照进口的部件占最终产品的比率不同而上升。[贝尔（Bear）、斯特恩斯（Sterns），1993]

对于第一个十年和中国改革进程的前半段来说，中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与贫穷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政策截然不同。中国的缓慢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式的国内体制改革能够在不受来自外国生产者的开放性竞争的威胁下得以进行。

### 6.2.7 农业

*改革*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府开始对集体农业改革进行了谨慎的试验。最后的统一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到 1983 年才完成，在此期间对改革方案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辩论与摸索。

**土地所有权与分配** 耕地是中国改革中最重要的资产，影响了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中国经历了土地的“去集体化”浪潮。但土地私有产权的建立并没有随之而来。（朱玲，1992）由于中国共产党试图阻止地主阶级的出现，因而不允许对土地进行购买和出售。直到 1994 年，共产党仍“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央委员会，1994，第 24 页）。农村公社保持了土地所有权，决定农民对于土地的承包与经营。它努力确保农户平等地拥有土地，而乡政府从土地上取得李嘉图租金以用于公社的目标。通过共产党，中国依然控制了土地的去集体化。耕地不通过自由市场流转，使得地方分配不均。耕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基于地方的人均平等的土地承包合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涉及 8 亿人，但过程非常有秩序，而不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土地争夺战。

**劳动过程** 伴随着土地改革，一场农村劳动过程的革命也在进行。 192
农村经济的所有主要决策权都回到了农户的手中。

**非土地的资本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地方政府是几乎所有农业机械的名义所有人，但是它并没有将所有农业机械立即私有化。相反，在 20 年代 80 年代早期，几乎所有小的“集体”生产工

具都被出售给了个体农民①，而大型生产工具则没有。最初，农民无力购买②，然而，随着收入的迅速增加，农民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在所有的农业机械中，个体农户的拥有比例迅速上升。③因此，农业机械私有化的进程是渐进的，是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而进行的，而且是逐渐从小型生产工具向大型生产工具发展的。另外，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一些农业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关键大型资产（比如灌溉系统），个体农户仍无法购买，其所有权仍归当地公社。

1978年以前，灌溉几乎都是由国家或者集体组织负责的。随着耕地的去集体化，20世纪80年代期间个体农户和家族的自主灌溉迅速增长。④ 随着个体农户生产资料的增加和集体部门生产资料拥有量占比的下降，用于其他目的的农户集资越来越多；同其他的农业活动一样，集体灌溉日益减少。⑤ 在改革之前，村级以上的水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由国家水库中的一小部分所提供的灌溉在总灌溉量中的占比超过2/5，超过10万立方米，

---

① 1984年，单个家庭拥有超过90%的大车和超过80%的小型拖拉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42页）

② 1984年，“集体”部门仍然拥有56%的大中型拖拉机、51%的脱粒机、48%的农场卡车和65%的排灌机械。（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42页）

③ 截至1988年，农民拥有大中型拖拉机的比例上升至65%，脱粒机的比例上升至74%，农场卡车的比例上升至68%，浇灌机械的比例上升至5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68页）

④ 浇灌机械的占比（从马力这个指标上来看）在1984—1988年间从35%上升至5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42页；1989，第268页）国家和市场合资公司供应和出售的水泵机组的数量由1980年的51万台迅速上升至1988年的110万台。（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87页）单个家庭拥有的总存量的份额由1984年的39%上升至1988年的6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42页；1989，第268页）

⑤ 许多人认为在进行农业改革之后，当地政府从农村经济中获得收益的能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获得了增长，农村净收入中的集体提留比例从1983年的4.6%上升至1987年的10.6%，家庭贡献于集体提留的收入占单个家庭净收入的比例由1984年的3.3%上升至1989年的4.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90页；1986，第221页；1990，第393页）

而诸多小水库，大部分是集体经营的，灌溉量占比仅为1/3。①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减少了对水利的投入，认为日益繁荣的农村经济可使农民承担较大比例的水利资金。② 迅速增长的农民收入使得农民储蓄也快速增长，中央政府认为其足够用于农村资本形成所必需的融资。政府没有料到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农村非农部门的爆炸性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储蓄。③ 这项政策后来被正式承认为一个错误，并在1990年至1991年间被大幅扭转。④



虽然个体农户、集体与地方的投资迅速增加，但国家活动仍然是重要补充："我们将发展多元化的服务组织，以符合农民需要，并且这个服务组织源自于一个服务网络，该网络包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农民自己的协会，如专门性技术服务方面的协会。"（中央委员会，1993，第24页）事实上，随着个体农户积累的增长，村、乡镇及合作经营农户所提供的投入也大幅度增长，该投入远远超

---

①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对于超过10万立方米的水库来说，大约占水库总数的0.4%的水库灌溉了41%的土地，同时8万多个小水库多数为集体所拥有，灌溉面积占总灌溉面积的33%—3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201页；1990，第35页）除了这些"小"水库，中国还拥有几百万个微型水库（1982年有630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01页）

② 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水利设施投资在总预算中的份额由1983年的最高峰时的1.63%下降到1988年的0.87%，实际上，费用在1983—1989年间已经下降了大约1/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93—295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254页）如果考虑到预算支出中的资本建设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零售价格所带来的贬值，那么在1983—1989年间又下降了22%。

③ 1989年，个体农民的存款占了信贷合作社的84%，但是52%的贷款来自于农村非农企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668页）

④ 中央政府在水库工程中的花费在1987—1990年间上升到了超过50%（1987年47亿元，1990年为73亿元）。（《北京周报》，1991年1月28日—1991年2月3日，第17页）

过了个体农户所能提供的数量。[①]（农业部，1991）扩张资金的主要来源是提供服务的费用收入和地方政府的补贴，一般是来源于非农部门。（见下文）直至1990年，个体农户仅提供了23%的耕作机械、30%的排水灌溉、15%的植物保护、48%的种子供给以及3%的兽医服务。（农业部，1991）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农业体制的结构变化，在个体农户活动与国家或村集体活动之间的平衡方面，类似于现代日本的路径。毋庸置疑，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尤其是依赖于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水平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区域间差异很大（见下文）。

**信用**　在大多数贫困国家中，各种因素导致了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尤其是较贫穷但有潜在效率的农民，依赖于非正式的高息贷款，从而抑制了投资水平，同时也使得较穷困的农民依赖于传统放债人。

在改革期间，中国农民储蓄及农民收入增长迅速。[②] 绝大部分的储

---

① “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中国农业提供的各种服务的增长（每个村的平均值）

| | 1986 | 1990 |
|---|---|---|
| 社会化的犁地机器服务组织所服务的地区（亩） | 1 053 | 1 377 |
| 社会化灌溉服务组织所灌溉的地区（亩） | 1 128 | 1 361 |
| 社会化的种子服务组织提供的种子重量（吨） | 8.4 | 11.4 |
| 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种植保护地区（亩） | 1 811 | 2 174 |
| 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的化肥总量（亩） | 87.4 | 123.3 |
| 社会化服务组织治疗的动物数量（个） | 6 627 | 8 451 |

**注释**　此数据来源于对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西藏和台湾除外）的205个县的5 389个村的调查。

社会服务组织包括：

（1）乡镇技术部门（农业技术站、农业机械站、植物保护站等）；

（2）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服务公司、服务站、组成村民委员会的队和村民小组）；

（3）不同的特殊服务组织（包括特殊协会、研究协会、合作服务组织、特殊家庭和不同形式的合作组织）。

**资料来源**　农业部，1991。

②　整个20世纪80年代，农民的存款占他们收入的比例为13%—1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12页）

蓄被存放于官方机构。如农村信用合作社、中国农业银行。[①] 官方信贷机构较为安全，即使是在毛泽东之后，“高利贷”依然受到管制。在20世纪80年代，官方信贷机构的信贷增长迅速。[②] 信贷分配往往容易滋生寻租，尤其是利率普通低于市场出清水平时。然而，在一个贫困的农村经济条件下——比如中国农村，在鼓励农民储蓄、为农民阶层提供资金方面，纯粹的私人信贷不可能像大的国有机构和准国有机构那样成功。



**市场：农产品出售**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私人贸易已经合法化[③]，但在整个80年代，农产品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仍是强制采购的，包括最重要的粮食、棉花和食用油中的较大部分。[④] 即使在90年代早期，重要商品的相当一部分，特别是粮食和油料作物，仍然通过准强制合同被国家采购。但是，对于很多商品，农民可自由选择销售渠道。[⑤] 然而，部分由于强制收购、部分由于私人购买渠道扩张速度有限（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批发市场往往需要大批投资，而且具有较高的风险），大部分农产品（甚至有些是自愿出售的）还是要通过国家渠

---

①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从1980年的270亿元（农民人均15元）上升至1989年的1 670亿元（农民人均263元）。

② 农村信用合作社中的未偿还贷款额由1980年的32亿元上升至1989年的1 095亿元（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668页），而中国农业银行中的未偿还贷款额由1980年的190亿元上升至1988年的830亿元（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93—295页）。两个机构中的未偿还贷款额由1980年的人均34元上升至1988年的人均315元（实际增加了近4倍）。

③ 1978—1989年间，城市中的市场数量从一个可以忽略的水平上升至13 000个，而乡村中的市场数量从33 000个上升至超过59 000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94页）1978—1989年间，农村自由市场的实际贸易额大致增加了5倍。（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94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250页）

④ 1988年，95%的棉花、91%的谷物、80%的食用油还是通过国有商业渠道或准国有的“供销合作社”渠道销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60—161页）

⑤ 例如，1988年，只有57%的猪肉、63%的茶、36%的鲜鸡蛋和42%的水产销售通过国有或准国有的销售渠道销售到非农部门，而在1978年，这些产品的所有的产出都通过国有或准国有代理出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60—161页）

道进行销售。[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业商品化进展迅速[②]，市场经济对于农业的影响日益增加，其表现是农业市场相关人员迅速增长。[③]

**市场：农产品购买** 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的农业投入都是集体从国家供给网络中购买的。个体农户对于购买决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经常导致生产资料供应不当（如声名狼藉的三轮两铧犁），同时供应商也几乎没有提高产品质量的压力。随着个体农户逐渐取得了农业投入品购买的决策权，农业投入品供应商的压力也开始增大。然而，国有和准国有的“供销合作社”，仍然是将农业投入品销售给农民的主要渠道，尽管它们的作用有一些局限性，尽管农产品通过自由市场进行再销售的数量开始增长。[④] 这导致了分配上的腐败（因为在国家价格水平下经常存在着对农业投入品的过度需求，即农业投入品定价较低）。然而，它也提供了村干部制裁村民的重要渠道，这种制裁使得村民遵守相关政策，以符合当地的或国家的利益要求（例如：纳税、集资及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相对价格**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国家提高了从农户手里采购农产品的相对价格。[⑤] 然而，面对进一步改进的政治限制（由于要控制城市食品价格的上涨水平），从农民的视角来看，“价格剪刀差”的改进步

---

① 农户出售给非农部门（这些非农部门不属于国有渠道）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5.6% 上升至 1989 年的 19.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94 页）

② 农户产出通过市场交易所获得的价值占总收入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40% 上升至 1989 年的 5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7、94 页）

③ 供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数量从 1980 年的 268 000 人上升至 1988 年的 394 000 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广西回族自治区摘要，1949—1988》，1989，第 17、20 页），农村中在“运输、通信、邮政和电信”等非农领域的总工作人员数量从 1980 年的 220 万人上升至 1989 年的 610 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51 页）

④ 1988 年，仍然有几乎 100% 的化肥、杀虫剂和除草剂以及将近 3/4 的“手扶拖拉机”通过国有商业渠道或供销合作社出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 187、271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74—75 页）

⑤ “价格剪刀差”（农户购买价格指数占工业产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比率）在 1978—1980 年间，以每年 13%—14% 的速度向倾向于农业生产方向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 7 部分）

伐在20世纪80年代大大变慢了。[①]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允许副食品整体零售价格，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比粮食价格有一个更快的上涨。[②] 对大多数副食品来说，其国家价格与自由市场零售价格之间的差距已经逐步减小[③]，但粮食和食用油的国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价差还很难缩小。[④] 至1991年，中国的价格制定者大幅度提高了谷物的国家零售价格（提高了约50%）和食用油的国家零售价格（提高超过了100%）。严格的政治控制、对价格上升的逐渐熟悉以及真实收入的大幅提高，三者使得农户在面向自由市场价格生产上前进了一大步，而且没有什么异议。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政府提出大多数城市的食品价格要进一步市场化，甚至连粮食的价格都要“基本自由化”。然而，需要对城市食品价格上涨过快进行干预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例如，1993年至1994年的冬天，粮食价格的意外上涨，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发出指令，要求通过“行政和经济的双重措施”来控制粮食价格。（《中国经济文摘》，1994年夏，第22页）

### *改革政策的结果*

**投入** 尽管非农就业迅速上升、人口增长迅速下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在1978—1991年间还是上升了660万（提高23%，表6.2）。同时，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80—1992年间减少了4.5%。[⑤]

---

① 平均年度提高率在1980—1989年间下降了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7部分）

② 肉蛋的平均零售价格在1983—1989年间上涨了157%，与此同时水产品价格上涨了197%，而谷物价格上涨了7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251页）

③ 1980—1988年间，水产品的平均价格差从59%下降到22%，肉蛋从22%下降到14%，新鲜蔬菜从65%下降到1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79页）

④ 仍然是在1988年，食用油的价格差为70%，谷物的价格差为9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175页）

⑤ 从1980年的9 990万公顷降低至1992年的9 540万公顷。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51页；《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229页）由于中国耕地严重短缺，因而以上
196 变化的后果尤其严重。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国家建设的压力随着城市的发展而日益增大；其次，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一半原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土地由于植树和向畜牧业转化而改变了性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51页）20世纪80年代排水和灌溉面积大致保持在4 400万—4 500万公顷，而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到了1991年则上升到了4 860万公顷。（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70页）而排水与灌溉区域的人口比例则从1980年本来已经很高的45%上升到了1992年的51%。[①]（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70页）

没有灌溉和排水，就不可能使用绿色革命技术来扩大生产区域。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灌溉率和粮食产量较高，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中国的农业战略中，至少有一部分需要涉及扩大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灌溉面积，特别是中国西北地区，灌溉率、化肥使用情况、粮食单产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这些是贫困地区，是尤其需要国家投资来扩大灌溉区域的地方。但事实上是，在1980—1988年，甘肃省的有效排水/灌溉面积实际上下降了1.6%，而陕西省则下降了1.2%。

---

① 灌溉质量的证据比较模糊。机器灌溉的灌溉面积所占比例从1980年已经较高的56%上升至1988年的5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64页）其他官方指标（水运、土壤侵蚀和盐碱化问题已经解决的区域）在20世纪80年代也显示了提高。（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3，第201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50页）然而，在80年代后半期，由于自然灾害，农作物每年的损失都超过了平均水平。在1985—1989年，由于自然灾害引致农作物损失超过30%的区域平均为2 300万公顷，1981—1984年间则为1 660万公顷。（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89页）同样，由于自然灾害影响使得农作物没有受到严重损失的区域占总的区域的比重，从1981—1984年的48%缓慢上升到1985—1989年的5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389页），这说明产生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是正常的天气状况循环。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248页；1989，第273页）

在毛泽东领导的后期，中国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迅速增加：在1957—1975年间，农业生产资料销售的年增长率为11.4%（表6.4）。在80年代早期（1980—1985），增长率下降至每年3.5%，但在1985—1992年间又增加至每年6.2%（表6.4）。农业固定资产及当期投入在改革期间增长也很迅速：1978年至1993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6.8%，化肥为8.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57、70页）至80年代后期，中国每公顷化肥使用量已上升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的两倍（表6.5）。

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土地利用格局的急剧转变，农业固定资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①] 许多大型的不适用于小块土地的生产资料几乎没有增长甚至下降了。[②] 然而，其他更适用于新结构的农业生产资料，增长则十分迅速。[③] 同时，随着非农部门的增长，固定资产的增长也很快。[④] 与农业运输设备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特别快，反映了改革期间的农业商品化的加速。[⑤] 至1990年，据估计约有40%的农业活动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

① 本段中的数据，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9，第262页；1993，第243页。

② 例如，大中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没有增长，大中型拖拉机的数量在1985年到1990年间下降了5%。水稻插秧机的数量急剧下降（从1980年的82 000台到1988年的14 000台）。

③ 小型和手动拖拉机的数量从1980年的190万台上升至1990年的700万台，脱粒机的数量从1980年的250万台上升至1988年的450万台，而小型收割机的数量从1980年的74 000台上升至1988年的210 000台。

④ 例如，农业用的渔用机动船的库存从1980年的61 000只上升至1988年的265 000只。

⑤ 农用拖拉机的库存从1980年的140万台上升至1988年的590万台，机动运输船的库存从1980年的108 000只上升至1988年的319 000只，胶轮大车的数量从1980年的3 500万辆上升至1988年的6 600万辆。

**表 6.4　中国农业的投入产出增长率**

| | 年平均增长率 | | | |
|---|---|---|---|---|
| | 1957—1978 | 1978—1992 | 1980—1985 | 1985—1992 |
| (a) 农业生产资料（实际）* | 11.4 | 5.5 | 3.5 | 6.2 |
| (b) 农业产出净值** | 1.4 | 5.4 | 8.5 | 3.9 |
| (b) 对 (a) 的比率 | 1:8.1 | 1:1.0 | 1:0.4 | 1:1.6 |

**注释**　* 当期价格经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平减。

** 按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34、242、611 页。

**表 6.5　每公顷的化肥消耗量**

**（1970 年 1 月和 1991 年 2 月，每公顷耕地的植物营养克数）**

| | 1970—1971 | 1991—1972 |
|---|---|---|
| 低收入国家* | 91 | 403 |
| 中国 | 410 | 3 043 |
| 印度 | 137 | 752 |
| 埃及 | 1 312 | 3 437 |
| 中等收入国家 | 363 | 585 |
| 韩国 | 2 450 | 4 517 |
| 高收入国家 | 1 022 | 1 160 |
| 英国 | 2 631 | 3 171 |
| 荷兰 | 7 493 | 5 807 |
| 日本 | 3 547 | 3 837 |

**注释**　* 不包括印度和中国。

**表 6.6　中国主要食品的人均产量**

（单位：公斤）

| | 粮食 | 油菜籽 | 肉类 | 水产品 | 水果 |
|---|---|---|---|---|---|
| 1978 | 319 | 5.5 | 9.0 | 4.9 | 6.9 |
| 1980 | 327 | 7.9 | 12.3 | 4.6 | 6.9 |
| 1985 | 361 | 15.0 | 16.8 | 6.7 | 11.1 |
| 1990 | 393 | 14.2 | 22.1 | 10.9 | 16.5 |
| 1993 | 387 | 15.3 | 27.4 | 15.4 | 25.6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 17 页。

**产出** 毛泽东执政下的一个较长时期，中国农业产出（净值）的真实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4%（1957—1978）。（表 6.4）在 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随着全国范围内的体制变迁，农业产出呈现出了爆炸式的增长。[①]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增长稍为放缓。然而，即使在 80 年代的后半期（1984—1991），农业产出（净值）的真实年平均增长率仍保持在全国人口增长率之上，是毛泽东时代增长率的两倍。（表 6.4）

在改革期间，一个强大持续的趋势是非传统种植业的产出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传统农作物的产出增长率。[②] 短短 10 年内，中国畜产品产量在农产品产出中的比重从 1/5 上升到了近 1/3。[③] 这说明农民收入水平大大增加，使得农民的饮食结构得到了改善，其所反映的是在市场机制下，不同产品间的相对盈利能力发生了改变。整个改革时期，即从 1978 年至 1991 年，肉类产品的人均产出从 9 公斤上升到了 27.4 公斤，水产品的人均产出从 4.9 公斤上升到了 15.4 公斤，水果的人均产出从 6.9 公斤上升到了 25.6 公斤。（表 6.6）

关于中国的粮食产量规模，人们存在着很大争议。据报告称，人均粮食总产量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未能上升（表 6.6），而肉类、水产品和蛋类的人均产出均上升较快。而且，1989 年的大型畜禽总产量比 1985 年增长了 1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 373 页）所有这些动物数量的增加都需要饲料，其中最重要的饲料就是粮食。报告称个人粮食总消费在 1984 年至 1990 年间比较稳定，约

---

① 实际总产值在 1980—1985 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53 页）

② 从 1978—1991 年间，农产品产量的年增长率为 5.9%，而畜牧业为 8.9%，副业的增长为 12.7%，而渔业为 10.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55 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33 页）

③ 传统农作物生产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现价）从 1980 年的 71.7% 下降到 1991 年的 57.2%，而畜牧业从 18.4% 上升到 26.4%，渔业从 1.7% 上升至 5.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55 页）

在 26 000 万—27 000 万吨范围内。解释这一现象的部分理由是牛肉和羊肉占肉类总产量的比重相对于猪肉有所上升。这意味着放牧类动物与粮食饲养类动物的比率在 80 年代有所上升。另一个理由是猪肉比例上升的省份为四川，而四川饲养生猪所用粮食的数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 然而，也有可能是农村改革后，畜禽所消费的粮食可能低于官方报告所说的数字。

**效率** 改革期间，每公顷耕地上的农作物的真实产出总水平大约上升了 3/4。[②] 农业总产出净值的年人均增长率从 1957 年至 1978 年间的仅 0.3% 快速上升至 1978—1991 年间的 4.3%。（农业部：《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 14—15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23、48、98 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难找出一个有意义的衡量中国农业资本产出比的方法。[③] 然而，中国改革看起来似乎中止了资本生产率的长期下降的趋势。在 1978—1992 年间，农民购买农业投入品的年平均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从 50 年代末期以来的约 11.4% 的长期增长下降到了每年大约 5.5%，而这一时期的农业产出净值的真实年平均增长率则从长期趋势的约 1.5% 迅速上升到了超过 5%。（表 6.4）

**农村收入与贫困** 随着非农产业的迅速增长，农业收入在农村总收入中的比例从 1978 年的 69% 下降到了 1992 年的 36%。（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5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 54 页）然而，即使在 90 年代早期，农户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于农业[④]，这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动了农村收入

---

① 关于这个观点和之前的观点，我就对安德鲁·沃森（Andrew Watson）表示感谢（个人交流）。

② 每公顷耕地上的农业产值在 1978—1985 年间上升了 31%，在 1985—1992 年间又上升了 3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第 171 页；1993，第 188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238 页）

③ 至少是因为不可能分辨农业和非农业生产所用的农村资产的比率。

④ 1991 年的比例为 61.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307 页）

的增加。事实上，在 1978 年至 1991 年的整个改革期间，真实的农村人均消费年平均上升了 6.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277 页），这是非常出色的。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早期，得益于简单的、设计巧妙的体制变迁，农村经济的巨大潜力被释放，这使得农村收入快速增长。正是在这一时期，收入增长速度达到了最高水平。①

农村收入快速增长效应的扩散和政府支持贫困地区的明确政策，使得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贫困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世界银行估计， 200
仅仅 10 年，中国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总人口数目就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 27 000 万下降到了只有 10 000 万（表 2.3）。② 下降主要集中于 80 年代的早期和中期，这与农业产出与收入增长最高的时期是一致的。

**社会稳定** 20 世纪 30 年代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稳定。土地改革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中国农村最主要的资产——土地的平等使用权。它为农村的弱者提供了保障，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时，土地可以转租。农田使用权的相对平等是农村家庭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持续较低的主要原因③。由于村民平等共享主要的生产资料，因而公共活动更易实施。它为农村甚至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等主义的基础。

### *结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农业部门试验性地摆脱了行政“计划”。中国的农业体制果断地摆脱了斯大林主义，走向了日本式的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路径，而不是自由市场。在开展超出个体农户能力之外的活动方面，国家和集体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从整体表现上来评价

---

① 1978—1984 年间，农村的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2，第 277 页）

② 对地方的研究，例如莱昂斯关于福建省的研究，指出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巨大成就：“除非福建不怎么具有代表性，否则中国确实在广泛的领域内进行了反贫穷的战争——它确实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莱昂斯，1992，第 64 页）

③ 农村家庭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1 上升至 1985 年的 0.26。（赵，1990，第 193 页）

这些体制，那么改革的成绩无疑是突出的，农业产出的迅速增长为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提供了有力支撑。1978 年以后，农村改革中市场力量与国家行为的结合，适用于一般亚洲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农业市场失灵的情况。虽然 1984 年之后的农业产出增长水平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国家及中国过去相比，增长并不慢。此外，随着收入的增长，农业经济的很多部门由于需求模式的转变增长也非常迅速。

国家对于价格及市场的持续干预受到了战略、政治考虑，尤其是维持社会稳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而且，从广义上讲，政府确实只得到了相对的价格权，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半段，农民也有足够的激励来为农业进行大量的储蓄及投资，从而维持农业产出的增长率高于人口增长率。



中国的农村改革方案，将原来在不合理的斯大林体制下所潜藏的增长效率与产出的潜力极大地释放了出来。它为经济改革取得广泛成功奠定了基础，为生活水平与需求的提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提供了支撑。

### 6.2.8 工业

#### 政策概览

**投资** 高水平投资（见以上）的很大比例都陆续进入了工业部门。[①] 这种较高的投资率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资产每六至七年即可翻番，“这种技术改造步伐让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相提并论”［伯基（Burki），1993，引自辛格（Singh），1994］。

**科学和工业**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科学造成了巨大损害，改革时期则见证了中国的科学高等教育水平的迅速提升。科研基础因改革而发生迅速转变，目标是以最快的方式尽可能地从现有的科学资源中

① 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率在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为 45%，而在第七个五年计划为 5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24 页）

获利。从改革早期开始，政府即允许并鼓励科学的快速商业化。①

这大大动摇了研究机构开展工作的原本相对孤立的基础。原来主要从事能立即产生实际利益的应用研究项目的研究机构，根据指示要“通过承包国家计划的研究项目、完成其他单位的委托研究项目、转让科技成果、以合资企业方式进行技术开发和出口业务以及提供咨询服务等，赚取收入并积累资金”（中央委员会，1985，第 451 页）。由国家向这些机构提供的业务费用将逐年减少，其目的是“使大多数机构在三至五年内实现自力更生”（中央委员会，1985，第 451 页）。国家将其研究资金转移至基础类项目的研究。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被鼓励与工业界建立联系，甚至建立自己的小企业。改革期间，工业产出的增长步伐十分迅速，因而在各行各业对于应用类科学家工作的需要也飞速增加。以利益为目的，将科学与商业连接的激励迅速增长。



作为生产过程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呈良性循环互动，即产出增长使得资本品需求增加。而这种资本品在科学界则为“人力资本”。这反过来又提升了经济对产量与生产力提高的应对能力。

### 国家工业政策

从表面上看，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中国工业与 1976 年之前相比，其变化似乎很小。“国家”仍然是大部分工业资本品的“所有者”，并支付了大部分的工业税。② 然而，事实上国有部门内部及国有部门在工业中的角色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物资供应** 国有企业决定其产出组合及投入供给的权利自 80 年代初逐步扩大，与此同时，随着自由化的步伐加快，非国有部门进展得

---

① 知识产业作为一种新的行业开始出现。技术市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成果以纯粹的行政手段进行无偿转移的方式应该被取消，支持利用技术市场来进行交易，这些技术市场可以让生产技术的流动更加畅通。（中央委员会，1985，第 453 页）

② 中国的“独立核算部门”大概与其他国家的“有组织的”部门相似。1992 年，它占工业总产值的 7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419 页）在同一年，这个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占固定资产总值的 78%，产生了 69% 的税前利润，产生了 77% 已付税。（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419 页）

更快更远。随着 80 年代中期的价格改革的加速，国家取消了集中物资供应，但遵循了相同的增量改革方法。随着作为市场核心的信息系统的逐步到位，新的投入品供给网络不断演化。至 1986 年末，受指令计划指导的工业品数目从 120 种减少到了 60 种。不过，大部分生产资料仍由国家分配：1986 年，61% 的生产资料是通过物资平衡供给体系分配的。[郭建中（Guo Jiann-Joong），1992，第 116 页] 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物资供给分配规模持续减小。至 80 年代末，只有 1/5 的工业品是直接由国家计委分配（董辅礽，1990，第 66 页），尽管生产资料的数字依然远远高于消费品。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尽管指令计划的范围收缩了，同时价格逐步自由化，但指令计划仍在国家工业部门具有重要作用。例如，1990 年国有广州造船厂的钢材分配，在其所获得的钢材中，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的钢材供应比例为 86%，而其价格低于市场水平 46%。至 1992 年，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在造船厂的钢材供应比例已降至 59%，且价格仅低于自由市场价格 19%。根据 1993 年的预测，造船厂用钢的国家分配比例将降至 36%，且价格低于市场价格 18%。[百富勤融资公司（Peregrine Capital），1993] 而在某些关键领域，通过物资平衡体系提供的投入供给比例甚至更高。例如，1992 年上海石化仍能直接从国家分配中获得其原油的 97%，而价格大大低于世界价格水平。（美林证券，1993）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游国有企业的大多数生产依然按照国家计划来进行。例如，1992 年之前，几乎上海石化的所有产出均由国家定价。而到 1992 年，该比例下降至 59%，1993 年该比例的预测值为 37%。（美林证券，1993）马鞍山钢铁公司仍是沿袭着其在 1993 年的情况，即国家规定每年的“指令性的生产要求，以及在此要求下的生产组合及钢铁产品销售额”。（获多利企业财务公司，1993）主要钢铁产品中的某些特定商品仍在“国家的集中控制框架下”。（获多利企业财务公司，1993）

**外国投资**　从以上可以看出，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公共部门行业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大，而在90年代急剧加快。

**竞争**　国有工业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具竞争性。从改革早期开始，非国有部门就开始同国有部门竞争，其中最为激烈的竞争发生在小规模与低资本的企业竞争之中。从上面可以看出，至90年代早期，大多数的工业产品的分配和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这导致了很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利润率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经济业绩，而不是官方决策的体现。

**表6.7　中国工业企业（公司）的数量**

（单位：千家）

| | 年份 | | | | |
|---|---|---|---|---|---|
| | 1957 | 1965 | 1978 | 1985 | 1991 |
| 总计 | — | — | — | 5 185 | 8 092 |
| 其中 | | | | | |
| (A) 乡级及以上 | 170 | 158 | 348 | 463 | 506 |
| 其中 | | | | | |
| 国有 | 49.6 | 45.9 | 83.7 | 93.7 | 105 |
| 集体 | 119.9 | 111.8 | 264.7 | 367.8 | 391 |
| 其他 | — | — | — | 2 | 11 |
| (B) 乡级以下 | — | — | — | 4 722 | 7 586 |
| 其中 | | | | | |
| 城乡 | | | | | |
| 个体 | — | — | — | 3 348 | 6 385 |
| 其他集体 | — | — | — | 1 374 | 1 200 |
| 乡级及以上 | | | | | |
| 大型 | — | — | 1.2 | 2.3 | 4.3 |
| 中型 | — | — | 3.2 | 5.6 | 10.6 |
| 小型 | — | — | 344.1 | 455.3 | 491.6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207—208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70页。

**企业规模结构** 相对于成立初期的规模，工业规模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是由于设计，部分是由于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非国有部门的企业的增长过程分两个阶段。在国有部门中，国家集中计划的力量用于相对少的大中型规模的企业。它允许小规模企业衰落以及被非国有行业（见下面）迅速超越。从 1978—1991 年，每一种类别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个数都增长了大约 250%，而小规模的国有企业，增长率仅有 43%。（表 6.7）1980 年至 1992 年国有行业产出增加了 150%，同时国有行业企业的总个数仅增长了 45%。（表 6.7）

在每个行业内，国家计划者越来越想将生产集中于能更好实现规模经济的企业。例如，在摩托车行业内，1989 年国家制定了一项战略来调整产业结构。该战略计划的目的主要是通过集中 19 个指定生产商，来提高国内生产水平。这些指定的生产商，国家保证其能源供应，并分配了足够的能够进口零部件的进口许可证，给予融资优惠。从 1983 年至 1992 年，摩托车产量从 29 万辆上升至 19 800 万辆，而企业的个数却从 100 个下降到 80 个。（贝尔和斯特恩，1993）



在改革期间，非国有部门的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几乎完全反映在小规模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出的份额上。非国有部门的比重，包括集体、个人及外国投资部门，由 1978 年的 22% 迅速上升至 1992 年的 5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412 页）然而，这几乎完全是小规模国有企业完成的。大中型规模工业部门几乎是全部国有，其比重在改革期间保持不变，约为 43%（表 6.8）；“正规”部门的比重甚至更高（表 6.9）。事实上，小规模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出（总值）中的比重从 1980 年的 36% 下降到了 1991 年的不足 10%。①

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根据企业设立规模的标准来看，中国工业产出结构逐渐向印度靠拢。在这两个国家中，国家仍在大型部门中占主

---

① 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 212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70 页。

导地位，而让非国有形式的工业组织在其他经济规模较低的产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部门中，大量的企业仅生产较小规模的产出。

**生产的部门划分** 国家越来越集中于“上游”活动，使小规模非国有企业或已经租赁的小规模国有企业进入“下游”生产。在上游行业中，国有企业在总产出中的所占比重非常高，如石油精炼、有色金属、化学纤维，煤炭、化工和机械制造行业。（表 6.10）1989 年，正规部门中的约 26 000 个大中型企业（刚好超过工业企业总数的 6%）生产了工业总产值的 6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0，第 5 部分）国家允许非国有企业在经济规模小的部门中的所占比重迅速增长。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比重在诸如印刷、家具、木材、草制品、皮革制品，塑料制品、食品、金属制品、建材、饮料等行业中的比重低于 5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1990，第 5 部分）毛泽东之后的改革时期内，非国有企业正是在这些部门增长最为迅速。



**表 6.8 不同类型企业的产出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当前价格，%）**

| | 1980 | 1985 | 1991 |
|---|---|---|---|
| 总计 | 100 | 100 | 100 |
| 大型 | 25.1 | 25.3 | 28.1 |
| 中型 | 18.1 | 17.0 | 15.5 |
| 小型 | | | |
| 乡级及以上 | 56.8 | 47.5 | 38.3 |
| 乡级以下 | 不详 | 10.2 | 18.1 |

**注释** 此处的规模标准在不同的部门中有所不同。在很多部门中，标准是基于企业的生产能力。例如在钢铁行业，“大型”企业是指生产能力超过 1 000 万吨的企业；“中型”企业是指生产能力在 10 万—1 000 万吨之间的企业；“小型”企业是指生产能力在 10 万吨以下的企业。在别的部门中，标准取决于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 212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70 页。

**表 6.9　正规部门中不同规模的企业产出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

| | 1980 | 1985 | 1991 |
|---|---|---|---|
| 大型 | 25.1 | 28.2 | 34.3 |
| 中型 | 18.1 | 18.9 | 19.0 |
| 小型 | 56.8 | 52.9 | 46.8 |

**注释**　正规部门是指乡级及乡级以上的企业。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 212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 70 页。

**表 6.10　1990 年中国国有部门在不同行业产出（总值）中的比重（%）**

| | | | |
|---|---|---|---|
| 家具 | 12.4 | 橡胶 | 68.1 |
| 有色金属 | 17.8 | 运输机械 | 71.3 |
| 塑料制品 | 21.8 | 饮料 | 73.3 |
| 金属加工 | 26.0 | 饮料 | 74.6 |
| 木制品 | 42.5 | 化工 | 77.9 |
| 电机 | 48.7 | 煤矿 | 78.8 |
| 建筑材料 | 51.2 | 食品 | 79.5 |
| 纺织 | 56.5 | 化纤 | 84.5 |
| 仪器 | 61.2 | 黑色金属 | 86.6 |
| 电子器件 | 66.0 | 石油炼制 | 96.4 |
| 机械 | 67.5 | 烟草 | 96.5 |

**注释**　数据仅针对“独立核算”企业。1990 年这些企业生产了工业总产值的 78%。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1。

207

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在改革时期大大加快。据报告称，1968—1992 年，轻工业（实际的产出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几乎为 1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58 页）然而，在一个像中国这样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这样的增长只能通过同期的重工业的快速增长以及为轻工业提供投入品来达到。

因此，轻工产品产出的繁荣往往来自小规模部门，与此同时，重工业部门也走上了同步快速发展的道路。例如，石化行业的三大“上

游”产品是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和塑料。这些投入品主要由国有大型“上游”企业所生产。合成纤维用于生产纺织品、帆布、服装、麻布、绳索和渔网。树脂和塑料可用于制造胶片、容器、薄膜、电缆护套、家居用品、玩具、电器、汽车零部件和建筑涂料。

据报告称，重工业总产值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在1978年至1992年几近11%。（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8页）对范围很广的“上游”产品产出的增长详细研究（表6.11）表明，毋庸置疑，绝对高增长发生于大型的、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中国经济“制高点”。在这些部门中，“企业家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科学的联合应用。而且，这些部门通常要求较高的单位产出资本，要求有相对于轻工业更大的厂房规模和时间更长的酝酿。自相矛盾的是，一个在共产党指令体系下表现出较强的重工业偏向的经济体，在改革期间继续要求重工业的产出能够快速增长。改革时期的部门之间关系已经从不平衡的重工业增长转移到了平衡增长，而不是强调轻工业而忽略重工业的增长。事实上，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在世界钢铁产量的排名已由第五位升至第四位，在世界煤产量的排名已从第三位升到了第一位，世界原油产量排名从第八位升至第五位，世界电力产量排名从第七位升至第四位，世界水泥产量排名从第四位升至第一位。（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901页）



**大型的多工厂企业**　支持工业集团的想法成为政府改革国有工业的主旨计划：我们的目标是形成有竞争力和自主管理的工业巨头。（姚建国，1992）政府认识到有必要减少不经济的小厂的贡献，降低巨型工厂的一系列投入品的内部生产程度。然而，它同时致力于维护大公司和大工厂的核心作用：“事实是，大规模生产是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姚建国，1992）工业企业集团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一个关键手段。

**表 6.11　中国某些产业的产品产量**

| 项目 | 单位 | 1980 | 1992 |
|---|---|---|---|
| 化纤 | 10 000 吨 | 45 | 213 |
| 纱 | 10 000 吨 | 293 | 508 |
| 布 | 10 000 万米 | 135 | 191 |
| 牙膏 | 百万只 | 783 | 2 257 |
| 医药品 | 千吨 | 40 | 281 |
| 塑料制品 | 10 000 吨 | 114 | 537 |
| 家用冰箱 | 10 000 台 | 5 | 486 |
| 家用洗衣机 | 10 000 台 | 25 | 708 |
| 电扇 | 10 000 台 | 724 | 6 837 |
| 电视机 | 10 000 台 | 249 | 2 868 |
| 录音机 | 10 000 台 | 74 | 3 232 |
| 机动车 | 10 000 辆 | 22 | 107 |
| 摩托车 | 10 000 辆 | 5 | 205 |
| 电话机 | 10 000 个 | 176（1984） | 1 982 |
| 塑料 | 10 000 吨 | 90 | 331 |
| 采矿设备 | 10 000 吨 | 16 | 37 |
| 石油设备 | 10 000 吨 | 6 | 19 |
| 化工设备 | 10 000 吨 | 7 | 24 |
| 电力设备 | 10 000 千瓦时 | 419 | 1 297 |
| 数字控制机床 | 台 | 1 613（1984） | 7 450 |
| 滚珠轴承 | 10 000 套 | 22 755 | 77 456 |
| 内燃机 | 10 000 马力 | 2 539 | 9 253 |
| 生铁 | 10 000 吨 | 3 802 | 7 589 |
| 钢铁 | 10 000 吨 | 3 712 | 8 094 |
| 轧制钢 | 10 000 吨 | 2 716 | 6 697 |
| 水泥 | 10 000 吨 | 7 966 | 30 622 |
| 玻璃板 | 10 000 标准箱 | 2 771 | 9 359 |
| 硫酸 | 10 000 吨 | 764 | 1 408 |
| 煤炭 | 百万吨 | 620 | 1 116 |
| 石油 | 百万吨 | 106 | 145 |
| 电力 | 10 亿千瓦时 | 301 | 754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10 部分；1986，第 15 部分。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 4 部分。

政府确定了50多个曾经非常成功的龙头企业。他们将成为其他工业集团的榜样，而且是国家支持的目标。（姚建国，1992）这些企业大多是重工业部门。[①] 它们大多都有自己的母公司，且它们中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投资了新企业或购买了子公司。母企业是“对本集团整体业务的管理工作负责”，“负责人事管理”并“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姚建国，1992）子公司可以通过“与母公司缔结承包合同或租赁给母公司”的方式加入集团。（姚建国，1992）

到1991年，中国有将近7 000个企业集团。有些是“紧密结合”，有些是“半结合”，有些则较为“松散”。有时国有企业集团会集结在一个知名品牌之下，从而形成一个或多或少正式的纵向一体化的公司。 210
有时会与前任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横向融合。企业通常的方式是与科研院所相结合。有先进技术的城市企业通常会与乡镇企业联合或将其成为子公司从而产生纵向一体化的公司。乡镇企业通常接管土地密集型、污染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的那部分的生产过程，而城市企业则协助提高乡镇企业的技术水平。沿海企业经常与能为其母公司提供原材料的乡镇企业联合。最后，大企业可以经常通过简单地“随时随地地通过扩张和吞并使其投资资金获利”的方式实现扩张。（李源潮，1992）

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是广州的万宝电器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小厂，拥有300名员工。到1991年，它已成长为一个多工厂的企业，拥有员工超过10 000名的企业，以及超过10 000台冰箱的年产量，从而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八个冰箱制造商之一。

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数十个”大型电器生产企业集团的建立，

---

① 55个关键工业企业集团的分布如下，机械制造和电子：16；冶金：4；纺织：1；能源：7；通信：2；化学：4；建筑材料：4；林业：4；航空航天：6；对外经济贸易关系：2；医药：2；民航管理：3。（姚，1992）

包括上海的金星电器集团、江苏的熊猫电器集团、北京的牡丹电器集团。中国的黑白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电风扇和熨斗，产量也从微不足道的水平，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在此过程中，大工业集团凭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受益。1990 年中国的家电行业出口了价值 20 000 万美元的商品，且其出口范围不断扩大，包含了日益复杂的产品。中国产品已经开始打入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一些市场。例如，中国在 1988 年向美国出口了 800 000 台电风扇。①

万宝电器集团提供了一个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集团的例子。更典型的是，那些通过重组出现的大型企业。例如，政府选定的八大机动车辆生产商构成了中国汽车产业改革的核心。汽车产业中的“八大”却占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生产的汽车产量的 85%。东风汽车集团是在排名靠前的几大生产商中的湖北省第二汽车厂的基础上形成的。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它“接管”了大约 300 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子公司根据公司的指导重新生产，母公司同时也是其新技术引进的渠道。它们重新进行一系列的专门生产，如组装、特殊用途车生产及特殊投入品生产。（姚建国，1992）



除了调整汽车生产的主要事务，国务院的中国国家汽车委员会将超过 2 400 个小规模汽车零件制造厂进行了重组，使之成为大约 50 个制造集团。（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1992）

在轻工业行业，一份关于宁波和丰纺织厂的详细案例研究（姜晓明，1993）显示，多工厂企业的出现是适应企业层面的激励以及与雄心勃勃的地方政府合作的结果。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和丰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日本产业常见的复杂的三层结构的集团。第一层面的合并进程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并过程逐渐变得更加正式。到了 80 年代末，和丰纺织（纤维）厂已与三家布厂及一家印染厂、宁波工商银行和浙江省纺织高等专科学校通过纵向一体化实现

① 这段信息来自《北京周报》，34（23），1991 年 6 月 10—16 日。

正式合并。该集团有一个共同的董事会，他们协调生产、营销和公司的成长。此外，该公司与乡镇企业有第二层面上的合资，这也是在改革早期即已开始。和丰公司已经投资了相关领域内的六家乡镇企业，并成为其部分资产所有人，享受与其投资成比例的利润份额。最后，企业还有第三层面的合作，即主要是和有更多非正式关系的企业一同经营服装。

20 世纪 80 年代，在饮料行业出现了工厂和公司总数激增的态势，这些工厂和公司的生产质量较低、生产过程较危险并且以中间投入品成本较高的方式进行生产。国家轻工业部制定战略，邀请选定的跨国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并协助业界实施技术现代化进程以及全面的生产组织结构的调整。重点主要是创造四个大型品牌的软饮料企业，同时消除大量的小规模生产者。（严晓谦，1993）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该行业的企业结构发生了非常迅速的改变，四家主要的公司所占领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①] 每家公司都建基于中心工厂的特许生产体系，该中心工厂为遍布全国的特许灌装厂提供浓缩液。

一份关于国有的广州造船厂（百富勤融资公司，1993）发展壮大的详细记载显示：在改革期间，基于所有制正式结构的逐渐出现，多工厂的企业集团是如何快速发展的。所有制正式结构的出现得益于日益增长的市场机会。到 1993 年，国有的广州造船厂拥有六个与其有业务关联的子公司的部分股权，还与其他四家企业有项目分包协作关系。（表 6.12）随着改革的进行，最初松散的关系逐渐变得更为正式。

**产权**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政府表达了“搞活国有企业”的方法构想，即不通过“私有化”来提升其业绩。（参见陈锦华，1994）然

---

① 它们是广东的健力宝集团、天津的金美集团和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的合资公司。

**表 6.12　1993 年广州造船厂的子公司**

| 名字 | 成立时间 | 所占股权（%） | 主要业务 |
|---|---|---|---|
| 广州造船厂集装箱厂 | 1982 | 100 | 集装箱制造 |
| Masterwood Company Ltd. | 1992 | 75 | 家具制造 |
| 江门市新会区广船南洋船舶有限公司 | 1993 | 70 | 拆船 |
| 广州海珠区光华机械厂 | 1990 | 65 | 机械制造 |
| Maring and Industrial Ltd. | 1992 | 25 | 特殊船供应（油漆服务） |
| Contech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Company | 1985 | 22 | 集装箱检修服务 |

**资料来源**　百富勤融资公司，1993。

而，产权并不是“黑白分明”的“国有”或者“私有”。相反，这里
213 的产权是包含很多复杂因素的层次广泛的权利，这些权利附着在资产使用和收入流上获取，同时也附着在行使权力和享受资本有效使用所带来的威望上。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之后，国有部门中的产权扩张缓慢但逐渐地进行，这种扩张得以进行是因为经济因素，而不是中央政府官员以及原来向他们汇报工作的地方人员。这一期间，在中国国有工业部门内部，逐渐出现了一群机构法人企业家，他们开始资本运作，通过提高雇用他们的机构的经济利益来改善他们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演化过程中，法律和准法律的变化与那些企图在每个阶段违反其规定的低层次代理人的自发行为发生了复杂的交互（iteration）。

随着中央政府努力改善国有工业绩效，很多渠道得到了发展，代理人通过这些渠道提高了他们对于国有资产的使用权。物资供应体系逐渐瓦解。因此，经理们能够逐渐从让企业（这些企业的资产由他们来管理）获利的渠道来购买投入品。他们也逐渐能决定自己的企业的产品组合，同时也可以在对他们的企业最有利的市场中出售产品。广告与销售部门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存在的。现在它们又重新回到了生活当中。价格体系逐渐形成，经理们从而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定价自主权。

在 1994 年时，国有企业无权辞退冗员。然而，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在雇用额外员工时的自主权利越来越大。尽管还有很多限制，企业员工工资条上的奖金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经理人分配这些奖金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大。①

虽然受无数法规的限制，但企业经营者在提高资本及分配受企业控制的财产所产生的收入方面的权利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 1992 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近 47% 是“自筹资金”。（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146 页）相应的，在国有企业中，直接由国家预算所分配的固定投资比例缩小到了 16%。除了提高企业自主活动所产生的资金的分配的独立性之外，国有企业还还将其固定资本需求中由银行贷款满足的部分提高了 30%，外国投资满足的部分提高了 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146 页）



在资本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工厂之间投资的自发出现。最初，工厂之间的联合仅仅是初步的、非正式的。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联合则变得更为广泛与正式。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国有企业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交叉持股的国有公司，而且这种行为受到了政府政策的明确支持。

除了企业自筹资金或者/和向银行借贷资金之外，国有工业企业至少有一大批投资资金是来自各种国家官方机构，这些机构利用他们的财政资源创造了更多的资本。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一个典型的大型新产业投资项目将涉及几个机构投资者。该项目的资本通常可能由企业的工厂或者是企业本身、外国合资伙伴、国有银行以及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等联合提供。参与投资的机构或多或少都对最大化投资的回报感兴趣。这种体制是走向联合股份公司的一种探索

---

① 奖金占工资单的份额从 1978 年 2.3% 增加到 1992 年的 2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 127 页）

方式。

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仍然对发展一种主要基于股票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工业产权体制持谨慎态度。虽然股票已在上海和深圳获准，但发行公开交易的股票的行为仍受高度管制。至1993年底，只有大约150家公司获准在两个股票市场发行股票。许多非法和半合法的流通股发行都是在改革期间发生的。然而，整个改革期间的大部分资本仍然采取了在股市和流通股之外的机构投资的形式。

在国家所有制的框架下，资本的产权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体制不断发展演化成这样一种体制，即主要是基于多样化机构投资者的多种所有制，这些机构投资者中各种“国有”机构占据着主导。个体所有制非常少。此外，正如上面看到的，国有工业部门中的资本使用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各种各样的股东对于经理的选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经理能够良好地运用资产，让那些机构投资者能够从他们的资产投资中获得高额的回报。国有企业的经理越来越多地因为他们的商业才能而被选择，因为这意味着扩大了企业为机构投资者创造收益的可能性，而这些企业隶属于机构。管理人员的报酬也越来越多地是他们的商业才能的反映。



在过去十年和改革的前半程，谈到国有企业的“有组织的私有化”进程并不是一种幻想，国有工业资产管理权使用上的最重要的限制，是不能进行裁员，并且，政府要维持业绩不佳的国有企业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继续经营的承诺。

**劳动力市场** 在国有部门中，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非固定”的工人的人数（从1978年的1 000万至1988年的2 400万）及比例（从1978年的14%至1988年的24%）迅速上升。（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1987，第28、33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89，第203页）这种类型的劳动者与国有企业的雇员相比，拥有更少的权利和更低的

平均工资。（在工资差异方面，参见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工资统计年鉴》，1949—1985、1987，第171页）

国有工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速度比非国有工业部门要慢得多，同时也不如第三产业。[①] 而且在国有工业部门，新进入者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利润更高、成长更快的公司。非国有部门中就业增长最快的是在有外国投资的各类公司中，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部分的总人数仍然相对较少。[②]

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的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相对于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非常迅速（1978—1989年，国有企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1%），但该水平仍然低于同期拉美国家的水平。（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41页）中国的劳动力仍然缺乏独立性和防御性的工会，且不能够像民主国家那样对工资增长进行讨价还价。

**结果** 中国实验性和演化性的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许多问题。尽管在1987年通过了破产法，但只有极少数的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获准破产。到1993年，有超过30%的国有企业亏损（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85页），因此需要优先获得大量的公共资金以供这些企业维持生存。工业企业的亏损额与缴纳利税的比率从1985年的仅2%上升到了1993年的30%。（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2，第82页；1994，第85页） 216

---

① 不同部门的工作人数

（单位：百万）

| | 1981（1） | 1993（2） | （2）/（1）的百分比 |
|---|---|---|---|
| 国有工业 | 34 | 46 | 135% |
| 非国有工业 | 24 | 61 | 254% |
| 第三产业 | 59 | 123 | 208% |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年鉴》，1981，第107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20—21页。

② 1985—1992年间，各种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的雇员的数量从43.6万人上升到280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109页）

不依靠严格的市场规律来约束资本投资的投资决策已经扩散和普及。银行信用的分散化助长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但对于这些分行来说没有相应的负责其资产负债表表现的责任。而且，银行分行的借贷行为严重地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

部分国有工业的改革为腐败提供了一个温床。而市场为追逐利润的企业不按计划体制方式进行生产提供了强大的激励。在决定产出比例——包括国家强制计划所占比例、企业保留利润的比例以及涉及与对外贸易相联系的权利的复杂分配比例——时，一个复杂详细的谈判结构演化出来了。这些谈判经常伴随着贿赂，而且，以中国普通公民的收入标准来衡量的话，一些单位或个人可以从贿赂中获得的收入是非常多的。

国有工业的整体增长相对缓慢。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急剧下降（见上文）。市场力量在非国有部门中所起的作用更早而且更有力量。对很多观察者而言，这提供了很多国有部门效率相对较低的证据，同时也显示了国有工业“折中”改革的高成本。

然而，也有很多能够起到弥补作用的积极结果。国有工业的亏损主要存在于在转轨进程中有着特殊问题的部门。1991 年，国有工业的 98.9% 的亏损来自于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烟草和军事部门。[《北京周报》，35（26），1992 年 6 月 29 日第 6 版] 而且，如果将大型国有企业在住房、卫生、教育、失业工资、伙食补贴等方面的支出从资产负债表中移除的话，那么“亏损”的程度将大大下降。在西方，这些保障工作主要是由国家或个人负责。利润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越来越重要的目标。各个地方政府积极扶持和推动它所控制的企业努力增加利润，而且这种逐利的动机日益增长。价格日益由市场所决定。为了应对经济环境的骤然变化，企业及地方政府的行为的确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改革期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迅速增长。增长的大部分来自于国有部门。即使是在广东省，也是毗邻香港的国有企业引导了 1986 年之

后的（该省的）出口增长，1987 年其份额约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83%。（瓦格，1989，第 374—375 页）通过参与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国的国有工业部门的运营方式有了显著的改进。中国的出口表现非常突出，并通过进口的快速增长为国有工业提供了一种技术升级的方法。中国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总进口量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每年 20 亿美元增长到了 1993 年的 450 亿美元。（戴维，1986，第 332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 106 页）大部分的新技术都被引入到了国有工业部门。中国政府的出口激励与静态的资源效率的考虑相悖，但是有巨大的动态效益。

国有企业规模结构的合理性有了改进。非国有部门的工业产值所占比例的迅速增长基本上是以小规模国有部门为代价的。[①] 大规模国有部门的增长比率与整体工业部门的增长比例大致相同（即十分迅速）。事实上，大型工业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仍保持在 25%—26%。（表 6.8）

杰弗逊（Jefferson）等人的细致估计（1992）显示，国有部门年人均真实产出值增长率在 1980 年至 1988 年间约为 5.2%（表 6.8）。更重要的是，他们估计国有企业中单位资本的实际产出值也在增长，同期约为每年 2.1%（表 6.13）。这表明，国有工业部门的资本生产率的原来的长期下降趋势有一个明显的反转。（杰弗逊等，1992）

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逆转了工业增长的部门格局：从 1952 年至 1978 年，重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4%，而轻工业则为 9%；而在 1979 年至 1990 年，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10%，而轻工业则为 14%（产出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89，第 11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

---

① 小规模的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从 1981 年的 35% 下降到 1989 年的 1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 220—223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0，第 68 页）

1991，第3页）

**结论** 中国避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快速解决”方法。这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领导者的“保守派”认为，放弃国家工业所有权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但是，如果说这是唯一甚至是主要的解释，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同样的领导人也允许将市场力量引入到农民的生活中。根据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思维，这是更为危险的，因为农民占到了总人口的3/4，而且他们被认为是拥有落后的政治思想，那些思想是随“小商品生产”而来的。它也允许竞争、营利以及集体制企业的快速增长。它允许个体商业的快速增长。它允许国家工业部门剥离掉一批小企业，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家资本在工业中的比重。它鼓励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工业。它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对国际贸易的敌视态度。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的领导层认识到了“休克疗法”的危险性，并希望避免这些问题。



**表6.13 1980—1983年中国工业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增长率**

**（年平均，不变价格）**

| 国有部门 | | 集体所有制部门 | |
|---|---|---|---|
| 劳动力 | 5.21 | 劳动力 | 12.13 |
| 资本 | 2.14 | 资本 | 4.49 |
| 原材料 | 2.06 | 原材料 | 3.21 |

**资料来源** 杰弗逊等，1992，第247页。

## 农村非农企业

**政策** 在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给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建议是：“通过直接销售给个人、合作社或者其他人的方式将小企业进行迅速私有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第2、27页）但是中国采取了一条不同的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将建立和运营小企业的行为合法化，并且完全私有的部门发展非常迅速。到了20

世纪90年代初期，在私有的农村非农企业中工作的人员数量已经达到无法忽视的4 700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9页）但是，在农村集体所拥有的企业中工作的员工数量更多，大约有5 900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9页）而且纯粹私营的企业多数都是小规模的小商品生产，主要位于工业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并且这些企业可以以少量的固定资产运营。[①] 在1992年，集体制企业占领了乡镇企业的“制高点”，它所雇用的人数占到了整个农村企业雇员人数的63%[②]（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9页），它所占的固定资产（包括农业部门资产）占总资产的53%（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272页），而且在非农业资产份额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农村集体所有的部门甚至比城市的部门还要大。在1992年，农村集体部门的产出值是城市部门的产出的2.2倍。（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09页）



中国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字面正常意义上的合作联营不同，即每一个企业都由它的所有者运营。相反，他们像国有企业一样，只不过这个“国有”的“国”指的是当地的社区（乡或村），每一个社区都有很多家企业。[③] 这些当地的小的公有企业由资产管理的代理机构——“农村企业局”监督，并向地方政府负责。

中国的乡镇政府就像小的“民族国家”，他们对利用市场并通过克服市场困难以推动经济发展很有兴趣。不像由单个工人联合组成的联营企业，此种企业的兴趣通常是如何限制扩大就业、限制再投资和最大化工资。中国的地方公有制导致了企业管理者的竞争性行为，甚至

---

① 农村个体企业中的57%的雇员是在非工业部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9页）

② 农村工业反过来占了农村非农产出的绝大部分，在1992年，它占农村非农总产值的7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第71页）

③ 1992年，每个乡平均有12个企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7页）

使得他们有更大的动力追求利润。为了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为居民提供生存机会，地方政府作了一系列努力来克服市场失灵[①]，包括企业融资，对当地工人进行培训和再培训，改善公众健康供给，收集与提供信息以及对当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等。[②]

在快速调整产品以适应市场方面，农村非农部门比国有企业更灵活。在改革阶段，竞争性的要素和产品市场在农村非农部门迅速形成。工会几乎不存在和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导致农村工资有很大的向下压力。反之，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总数长期都是确定的，工作的节奏也较慢；而农村非农企业的工作人口主要是第一代，缺少国有部门工人有的优势和组织能力。由于罢工可能会损坏整个社区所拥有的集体企业的绩效，因此罢工在社会上不被认可，甚至是一种让人蒙羞的行为。农村非农部门的产品市场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了自由化。在 1986 年，非农企业的 70% 的原材料主要是从市场购买的，超过 2/3 的产品的销售价格都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经济研究所，1987，第 11—13 页）



改革极大地改变了农村集体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最重要的体制改革就是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约，而合约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盈利目标的确定。

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地方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农业在过去 10 年里快速增长，但非农部门所出现的爆炸式增长意味着它在农村产出的比重迅速上升——从 1980 年占农业总产值的 31% 上升到 1992 年的 6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0，第 33 页；《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 54 页）非农企业在吸收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上的能力也是很突出的，而且，这方面做得越成功，地方领导者从他们的社区那里赢得的赞誉和从上

---

① 这当然与腐败行为并不矛盾。

② 当然，做这些事情的能力在不同地区差别很大，主要是与发展非农经济的成功程度有关系。

一级的政府那里赢得的认可就越多。非农企业在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贡献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①] 他们不仅缴纳利税，而且还要求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税来对地方社区做出实质性的贡献。[②] 因此，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兴趣在其管辖范围内确保非农企业的利润进一步扩大。

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社区企业的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地资本市场的一些重要决定都是由政府直接制定或者与金融机构的地方经理合作制定的。[伯德（Byrd），1990，第 9 章] 地方政府为非农企业部门找到了盈利投资的新机会，同时也要承担新建企业的风险。地方政府还有关闭集体企业的最终决定权以及转移人力和物质资源到社会其他使用者那里的权力。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深入参与，中国的非农部门的发展不可能像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初期那样得到快速发展。"（伯德，1990，第 358 页）

**结果** 如果正统的转轨理论中的关于产权和经济激励之间关系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将会预料到，不管中国农村非农集体企业的运营环境发生怎样的改变，他们都不能成功经营。与预期的停滞不同， 221
20 世纪 80 年代见证了非农企业的快速发展现象，而公共部门多在这些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 1978—1992 年间，非农企业的雇员人数由 1 700万上升到 6 300 万，而且，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 22%。（表 6.14） 222
乡镇企业部门在中国原材料产品生产上的份额由 1985 年的 17% 上升到 1990 年的 25%。（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 65 页）在 1978—1992 年间，丝绸产品产值占国家总产出的份额由

---

① 1992 年，乡镇企业将其净收入的 22% 上缴国税，并将其 29% 作为"集体提留"以继续扩大业务，从而将会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 197 页）

② 例如，1993 年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使用了 141 亿元留存收益用于"扩大再生产"，而运用 164 亿元用于"乡村建设"，包括为村福利、教育和小城镇建设提供支持，而且还用另外的 38 亿支持农业。（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3，第 71 页）另外，在缴付国税之前，还有 10% 的企业净收入被扣除以支持农村各种建设项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94，表格注脚，第 71 页）

11%上升到43%，食用油所占比重由30%上升到86%，机制纸和纸板所占比重由10%上升到50%，原煤比重由15%上升到38%，水泥比重由5%上升到34%，砖瓦比重由66%上升到84%。（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161页）

除了就业和产出的增长，在1985—1990年短短的5年时间中，中国乡镇企业的出口产值由17亿美元增加到96亿美元；而且它们在快速增长的中国产品出口中的占比由4.8%上升到15.2%。（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65页）中国乡镇企业部门的出口在低收入国家的世界总出口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的所占比例由1985年的3.2%上升到1989年的8%（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1，第65页；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7，第220页；1991，第230页），可见，在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增长。由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绩效出现了如此显著的改善，西方国家的研究团队不得不开始研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然而，直至现在还几乎没有针对公共部门主导的出口爆炸性增长的原因所进行的严谨的外部调查。

**结论** 中国的经验表明，由于农村非农部门的分割性，社区所有权可以成为克服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方法。而私有化则被证明在促进这些部门的增长上所起的作用很不重要。主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竞争性的企业运营环境，而且，建立了在促进企业盈利上具有强烈的意愿的资产管理的代理机构。中国农村的公有企业可以看做是“地方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中国的地方政府能够在大范围内从农村的非农部门中获得收益，因此，与那些通过私有化小企业来承担集体企业所承担的提高整个社区生活水平的社区福利支出的方法相比，中国的地方政府处于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

**表 6.14　中国乡镇企业工业部门中的产出和就业人口的增长**

| | 1978 | 1992 | 年平均增长率（%） |
|---|---|---|---|
| 人口（百万） | 17.3 | 63.4 | 9.7 |
| 总产值（指数，固定价格） | 100（a） | 1 745 | 22 |
| 增加值（固定价格）* | 100 | 967 | 17 |
| 某些产品的产出 | | | |
| 电力（亿千瓦时） | 28.7 | 163.8 | |
| 煤（百万吨） | 100 | 424 | |
| 化肥（百万吨） | 0.38 | 0.38 | |
| 农业税（亿） | 6.7 | 11.3 | |
| 水泥（百万吨） | 3.3 | 103.8 | |
| 砖（十亿） | 73.0 | 495.5 | |
| 预制水泥（百万平方米） | — | 91 | |
| 丝绸产品（百万米） | 69.2 | 1 048.1 | |
| 纸/纸板（百万吨） | 0.4 | 7.9 | |
| 皮革制品（百万件） | 348（1985） | 739.7 | |
| 电风扇（百万台） | — | 32.1 | |
| 日用瓷器（十亿件） | — | 1.5 | |
| 集中供暖散热器（百万件） | — | 138 | |
| 盐（百万吨） | 1.5 | 5.3 | |
| 糖（百万吨） | 0.18 | 0.41 | |
| 食用油（百万吨） | 0.54 | 5.61 | |
| 成品粮（百万吨） | 53.9 | 390.0 | |
| 艺术和手工艺制品（十亿元） | 0.37 | 2.62 | |
| 饲料（百万吨） | — | 27.7 | |
| 卫生瓷（百万件） | — | 117 | |
| 啤酒（百万吨） | — | 1.3 | |
| 服装（十亿件） | — | 3.3 | |
| 罐装食品（百万吨） | — | 1.2 | |
| 丝（千吨） | 3.9 | 34.1 | |

**注释**　*由农村零售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 395 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4，第 73 页。

### 工业改革的总体效果

改革的三个重要结果说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快速提高了
223 市场力量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每一个结果都证明，中国找到了生产要素向取得高回报率的工业活动进行转移的方法。

**区域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影响下，工业增长的区域模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借助于地区优势，一般而言东部沿海的工业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0，第449页）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中部和南部的沿海省份取得了异常迅速的工业增长速度：1979—1989年，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可比价格）每年可以达到17%—21%。（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90，第50页）这些快速发展的工业省份的人口达到2亿，基本上是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3倍，比巴西人口还要多1/3。同时，工业产出结构发生较大的区域转变。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5个沿海省份的工业总产出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22%上升到1992年的38%，但传统的工业核心省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辽宁的占比则由1978年的36%下降到1992年的22%。（表6.15）发展最快的省份是那些非国有企业占比最高的省份。

**表6.15 中国某些省的工业总产值的所占比重的变动（以不变价格计算）**

| 省市 | 工业产值比重（%） | | 不同所有制下的工业产值比重*（%） | | | |
|---|---|---|---|---|---|---|
| | 1978 | 1992 | 国有 | 集体 | 私人 | 其他 |
| 福建、山东、江苏、浙江 | 23.8 | 38.0 | 31.9 | 49.2 | 6.7 | 12.1 |
| 辽宁、上海、黑龙江、北京、天津 | 35.6 | 21.5 | 60.3 | 27.1 | 3.1 | 9.6 |

**注释** *非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49—1985，第144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49—1985，第144页；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3，第415页。

**工业部门之间的盈利能力均等化** 在改革进程开始时，利润率（利润和税收除以资本存量）在不同的37个工业部门之间差距比较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工业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差距出现大幅度缩小。诺顿估计工业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变异系数由1980年的0.78下降到1989年的0.44。（诺顿，1992，第28页）他认为这个巨大的改变主要归功于大幅降低高利润行业的壁垒，因而降低了这些部门的利润率。 224

**国家和集体部门回报率的均等化** 杰弗逊等人在1992年的研究中发现，改革期间国有和集体工业部门之间“正在发生向跨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回报收敛之方向的稳健移动”：

> 工业改革带来了新的利润留成制度，同时也促进了国家计划体制之外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投资活动的发展。这些变化都允许集体企业和小规模国有企业进行资本积累，尽管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国家资金。这个过程缩小了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资本密集度的差异并且导致了部门间收益的均等化。（杰弗逊等，1992，第256页）

### 6.2.9 结论

#### *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环境*

**政治稳定** 维护政治稳定是改革政府的一个必须坚守的信念。维护政治稳定也就意味着恪守承诺维持原来的政治体制，主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官员腐败行为，但维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稳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使国家保持着有效的财政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稳定意味着管理经济组织的规则是可以进行理性预期的。投资者可能面对众多官僚的责难，但是一旦商定，合约的安排将是相当安全的。 225

**改革战略的清晰**　改革战略的总体特征在早期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动摇在改革中运用经验主义原则的承诺，同时，优先考虑实用主义的政策追求，那些政策将导致产出和收人的成功增长。因此，经济代理人在作决策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合理稳定的基础（参照系）。

**伦理基础**　在整个改革期间，政府保持着对以伦理基础为核心价值观的公开承诺。这其中的首要便是民族主义。与东欧和苏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来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因为支持个人主义而被遗弃。相反，一系列政策都公然说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其核心利益。个人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服从于国家整体繁荣的利益被反复地强调。

第二个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一致公开承诺。对没有市场、强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在改革开始之后就被抛弃了。此后，“社会主义”形成了两个概念。首先，通过市场的使用来规划经济的增长。其次，合理控制个人激励以预防一个集中大量个人财富的具有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崛起，相反的，为那些缺乏有利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提供机会。这些价值观以及他们被适度有效地实施于各种各样政策中的事实，确保了在改革期间一个合理有效的经济增长利润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分享。此外，与苏联的旧价值观破裂形成的尖锐矛盾不同，“社会和谐”的概念在改革期间还是获得了很好的保持。这通过心理影响直接改善了人们的福利，同时还有助于通过为公民提供广泛的参与感加固了社会的稳定。

改革下的阶层结构可能被认为是迈向某种类型的官僚市场经济，在这种结构下，个人的激励会在集体的框架下显著地被伤害，而且国家将在积累过程中占据中心位置。这种以官僚机构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一个象征就是在1993年进口汽车的99%是由机构账户支付的。[严(Yan)，1994，第67页]

**通货膨胀**　改革赖以发生的环境的最后一部分是政府对通货膨胀

的态度。一方面，政府不准备牺牲增长以实现对零通胀的追求。然而，它同样关注不要让通货膨胀率上升到足以威胁社会稳定和将投资从有形资产的投资转移到投机性投资的程度。其结果是经济增长的波动模式脱离了计划经济模式，同时一旦利率越过了一个关键的门槛，政府便准备介入以使通货膨胀大幅度地降低，主要是通过直接控制政府消费的方法。另一方面，国家控制通胀率的能力既取决于国家机构在提高税收收入上的有效性，同时也取决于抵抗利益集团借助于政府消费扩大通胀的压力的能力。

### 供给

中国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实验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发生。首先从农业部门开始，然后很快扩展到“集体”的非农部门，并逐渐开始在国有部门也发挥作用。在整个改革时期直至现在，政府明确表示，大部分的财产权利将以某种公共所有的形式保留。同时，政府也努力寻求一种改善资产使用的方法，即通过合约安排转让公共财产的使用权，作为报答，公共财产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分享收益。一旦被详细说明，这些使用权就可以为使用资产的当事人提供合理的安全程度。合约安排将为经济代理人提供一个关于分割来自于公共财产使用所获得的收入流的安全预期。价格自由化沿着“双轨制”方向稳步地推进，并且最终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实现资本品的价格自由化。同时，物资供应体系也在逐渐地自由化。然而，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内生产者仍然被有效地保护以防止国外竞争的影响。

这些逐步引进的、实验性的改善计划经济供给的改革有助于以不同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在国家管理和资产管理的每一个层次，利益都成为非常重要的目标。直接负责资产管理的人开始有更大的兴趣在他们的控制下去尽量增加固定资产存量的附加值，同时，降低每单位产出的资产使用量。比例越来越大的资本增量通过向高收益项目的流动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因此，在边际的意义上，资本

开始流向高收益的地区、部门或者企业。这样来自投资的收益不仅改善了，而且储蓄率和投资率也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许多因素促成了这一点。这些因素包括：国家的政治稳定，相对低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在迅速重构时获得利润的巨大机遇（如服务部门、交通和住房），利用现有资源雇用廉价劳动力，比以前更有利可图的巨大潜力，以及高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从极端的技术落后开始，中国开始了迅速的技术进步。这之所以能够实现首先是因为出口收入的快速增长。出口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能使增强产品竞争力的技术进口快速增长，政府在它的进口管制上允许这些产品具有优先权。其次是国内生产者实现自身技术进步的激励不断扩大。[①] 再次，也是越来越重要的原因，那便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是通过外国私人投资吸收技术。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向市场和利润的转变使得劳动力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中的中坚仍然留在国有企业里，同时，他们中的差者停留在亏损的企业中，国家继续补贴这些亏损企业而不是冒社会可能爆炸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会随着企业的倒闭而来。然而，即便在国有部门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现有的部分工人和新参加工作者受雇于大量的产出急剧增长的国有企业，并且进入那些能够吸引大量资本的地区和部门。而且，由于工人进入长期被忽视的部门工作，比如到小规模的非农企业中工作，这使得总体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甚至大量的非农工人都没有加入工会。刘易斯的增长模型随着非农就业——这些非农就业能够产生大量的用于再投资的人均盈余——的快速增长而成立，而且不会受到对雇用条件有制度性限制的劳动力市场的妨碍。



### 需求

在整个改革期间，中国经济仍然受到高度保护。国内生产者可以

---

① 在相似的发展阶段中，中国与日本一样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借鉴和适应国际技术上，而不是进行基础性的研究。

确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们在大多数领域内的竞争对手来自于中国内部。在改革期间，国内需求的特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步开放，所有产品的消费者都能够有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并且逐渐地成为更有鉴别力的购买者。表现最明显的是在消费品市场。在改革期间，大量的消费品质量明显上升，许多质量改善难以通过统计显现。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产品种类的短缺，产品设计不受关注，耐用消费品可靠性低以及没有需求的产品大量堆积。在改革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反转。消费者通过市场来表达他们对比较好的产品的偏好，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追求利润的生产商开始作出反应。例如，我们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服装生产的原始数据。虽然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还是不能充分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福利水平的极大提高。然而，这些需求的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消费品的生产，同样的过程也开始影响到资本品的生产。随着市场力量慢慢开始起作用，资本品的购买者的需求开始转向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代表更物有所值的产品。那些繁荣且增长最快的企业往往生产的是那些更物有所值的产品，即在某种意义上说，不论是价格、设计，还是耐用性和能源消耗，都被认为是品质卓越的。

改革试点期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需求上的高增长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随着粮食质量的显著改善，人们远离粗粮追求细粮，从而使得粮食需求大量增加。随着收入的增长，对优质食品的需求超过了对作为食品的主要来源的粮食的需求。在整个改革期间，对房屋的需求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所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都可以预料到，如果他们能够增加个人收入，这将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增长来源，因为在计划经济中房屋为其他的发展目标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在改革的早期阶段，对工业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的主要来源是相对简单的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电风扇和缝纫机。随着改革的深入，需求的增长转移到工业产品的新一波浪潮，如彩电、冰箱、音响设备、

移动电话、汽车、空调和时尚服装。满足这些庞大且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国内生产者的需求，促进了农业部门，轻工业部门进行大量相关投资。

然而，在一个封闭经济体系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的满足需要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有一个大量的和相应的增长。国内生产者对某些产品的需求，例如钢铁、水泥、化工、化学纤维、塑料、种类繁多的机器产品以及运输设备，都在改革期间出现了跨越式增长。

因此，在中国改革进程中，供给与需求之间发生了持久的共生。制度的增量变革释放了中国经济潜在的生产力，正如发生在所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系中的潜力释放一样。这使得收入有了初始的增长，收入增长反过来又产生了对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需求又进一步促进这些活动的投资增长，这些增长反过来又可以促进了资本存量的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改善。然后又依次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进一步刺激需求、投资和生产率的增长。该经济体，用一个评论家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了“计划外的增长”①。

---

① 诺顿，1994。

# 7　俄罗斯的改革

## 7.1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经济问题的恶化

### 7.1.1　政治

*风险评估*

苏联在年老的领导层领导下进入了 20 世纪 80 年代。[①]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任的新一代领导者完全是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而且没有经历过苏联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的动荡过程。他们的大部分工作经历都在相对稳定的战后恢复时期、后斯大林增长时期以及最后的后赫鲁晓夫停滞时期。他们没有经历过经济和社会的崩溃。他们唯一的设想是苏联的改革可能会引致一个多多少少的快速发展的过程。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最初制定的政策，在几年之内竟导致了国家的解体，使国家蒙羞、国民穷困。这与毛泽东去世后，中国领导人高度关注风

① “最高领导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老龄化，继任者将不可避免地对这个领导层进行大规模的替换，而且要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跨度内完成。”［比亚勒（Bialer），1983，第 400 页］

险防范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执政后的最初几个月，戈尔巴乔夫似乎很乐于在传统的政治体制内，并且仍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并试图引入新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尚未考虑成熟。但是，在他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他已经确信在重要的经济改革之前需要一次政治生活的转型。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安德罗波夫领导下的苏联科学院中开始出现“新思维”（novoe myshlenie）理论，该理论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重要的
231 影响。[米勒（Miller），1993，第 4 章] 这项研究的主要特征是重新开始自由研究外国思想。这使得苏联深受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苏联和美国的一流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也迅速发展。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核心政策顾问都曾经在美国的一流学府，例如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在那里，他们吸收了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正统观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是新思维的中心理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这位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和戈尔巴乔夫改革（perestroika）的主要设计师之一[①]，后来认为：

> 我们需要真正的经济改革和自由的国家经济。消除国家垄断后，自由经济将会通过自身的发展带来的常识以支持自由思想，维护开放（glasnost）和民主。社会将从政治和经济的协同作用中获益。没有这些改革，民主的前进力量会很弱，不能扫清我们生存空间里的封建主义死灰复燃的瓦砾和新的活生生的偶像崇拜。无论这些东西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将会是可怕和残忍的。（雅科夫列夫，1993，第 79 页）

---

① 雅科夫列夫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曾是苏共宣传部的领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之后，他再次成为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1987 年还成为中央政治局成员。他在 1958—1959 年间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交换生；1973—1983 年，他是苏联驻加拿大的大使。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观点对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某些领域进行过度干预的行为十分抵触。他们在所有国家都强烈支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本质价值，不论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仅仅在最近几年，通过评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历史和重新分析 19 世纪后期以来东亚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发现了国家在发挥着更加复杂的作用之后，“新政治经济”才开始在美国主流的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初步的立足点。[例如，迪约（Deyo，ed.），1987] 然而即便在今天，这也不是主流观点。主流的正统观点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价值制度，因为，共产主义制度敌视私有制、利润驱动和竞争的个人主义，支持合作和平等的原则。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领域推出了大量的关于苏联经济绩效的批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主流作品来源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U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这些作品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他们的叙述很有价值。然而，几乎毫无例外地，他们中没有人明确地指出如果开始这个重要的改革，那么苏联制度怎样才能最好地转轨或者转向何种模式。大量作品的潜在观点就是苏联制度的唯一替代制度就是美国的制度。换句话说，这些作品有一个含蓄的政策推荐，即解决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深层次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法是直接转换成西方（例如，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



由于受到美国输入的观念的强烈影响，“新思维”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认为苏联制度已经彻底毁坏，需要被推翻。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前领导者，雅科夫列夫认为苏联制度的前途暗淡：

从历史上看，（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社会制度，它实际上消灭了农民、贵族和商人阶级以及企业家阶层，以及神职人员、知识分子和知识界。它是墓地十字架的播种机，是“历史的鼹鼠”，从利沃夫（Lvov）到马加丹（Magadan），从诺

里尔斯克（Norilsk）到库什卡（Kushka），它挖掘了大量的坟墓；它通过各种各样的压迫和生态学上的野蛮行径剥削人类……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一个巨大的魔力矿井，几乎摧毁了世界；它是一个受无情的意识形态幻想束缚的反人类的观念，那种意识形态幻想隐藏了它在知识和经济上的无能。（雅科夫列夫，1993，第70页）

而且，在雅科夫列夫以及在整个新思维的认识中没有人考虑到转轨的战略问题。他们只是讨厌现在的制度，并且全都十分羡慕“西方”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这个西方的意思主要就是指美国，而非德国或日本，更不用说瑞典。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十年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美国“赢得了”冷战，而他们持续的批评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这种观点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很大。他的改革的核心观点就是改革可以使苏联重新返回文明世界。米勒谨慎地描述了这个群体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

233

> 由于其看待和接受的人权逻辑与众不同，而该逻辑对他领导的政权的主要设想有所歪曲，戈尔巴乔夫注定是不同寻常的。“新思维”当然……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工作。他的贡献是将那些发起这个思潮的分散和疏离的知识分子聚到一起，将持不同政见者的亚文化变成一个制度，并制定了一个实现此制度的战略。（米勒，1993，第206页）

实际上，“开放”（glasnost）这个词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化联系十分紧密。俄语中用“otkrovennost”表示“开放”，而“开放”（glasnost）通常是被反对苏联政权的批评者意指“向公众公开以前的保密信息”，特别是关于苏联历史上侵犯人权和官方对苏联历史进行有意歪曲

的事实。（雅科夫列夫，1993，第 103 页，见脚注）

在戈尔巴乔夫于 1985 年 3 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之前，没有任何背景显示他将会带领苏联远离共产主义。米勒认为在戈尔巴乔夫成为第一书记之前，他只是一群“急躁的‘少壮派激进分子’法院官员”中的一员，他是“苏联统治阶级的一个代表”，有许多他自己的局限性。（米勒，1993，第 64 页）米勒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法律学位或者他与苏联的民族差异对他的思想有多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在利用爱国主义来获得晋升和政治支持方面也比较传统”（米勒，1993，第 65 页）。戈尔巴乔夫既没接触过农业经济学家尼科诺夫（Nikonov）的思想，也没有接触过安德罗波夫（Andropov）的“智库”的研究员，更没有参与对波兰的团结运动的组织内部分析，而戈尔巴乔夫作为有资格的共产党政治局成员，是必须参加这个会议的；而且在他作为农业部长期间所作的工作中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标记。（米勒，1993，第 64—67 页）

没有任何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严谨研究能确定他是否是在任职的第一年就形成了他的革命观，还是“他私底下原本就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只是等待机会扔掉自己保守的面具”（米勒，1993，第 65 页）。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他执政后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他的政策与他的非常有影响力的直接前任和支持者——安德罗波夫（Andropov）相比没有多大的变化。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历史回溯，人们普遍认为，1986 年春夏时期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重要的转折点：

> 表面证据显示，他在 1986 年党代会之前没有任何变化。在他成为第一书记之后，他最初的政策是标准的修修补补、反反复复的苏联政策。合并各部建立大型国家农工委员会的举动显示了他将重组作为灵丹妙药的传统思想。反对酗酒的运动治标不治本。共产党的新计划和新条例以及他在 4 月的全体会议和在第 27 届大

会上的演讲也是小心翼翼和没有风险的……他的新观点只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才开始在他的公共声明中显现。[①]（米勒，1993，第65页）

仅仅在1986年夏天之后，开放和改革的明显特征才开始显现：

>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很明显已经改变了他的战略……他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的语言变得很激进。现在，戈尔巴乔夫的重点已经转向了民主化以及努力与反对改革的势力作斗争。（阿斯伦德，1991，第33页）

没有任何评论者能确定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将以前的保留想法公之于众的程度。但是他们都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导致他公开支持开放的主要原因。米勒对于他的思想的改变以及和切尔诺贝利的关系评论如下：

> 我认为1985年之后的公开声明中显现的变化代表了他思想上的真正改变……总之，他被别人认为是在自言自语，为了进步他也需要自言自语，而且不害怕不被人相信……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在1978—1988年的工作期间，从他面临的大量不同的和印象深刻的工作以及解决这些工作的办法提示和相互关系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应该询问是什么催化剂刺激了他的思想？……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是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他好像在（1986）年5月的某个时间跨过了他自己的卢比肯河。[米勒，1993，第64—70

① 霍斯金（Hosking）的严谨考证工作给出了大体相似的历史描述。（霍斯金，1992，第457页）

页，《公职的影响》（*The impact of office*）]①

霍斯金在关于苏联历史的权威考证中也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推动1986年夏天的开放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

> 1986年夏秋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不只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的内容上都逐渐并且明显地发生了真实的变化……政策的重点从制度的加强转变成激进的改变……也许1986年4月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的爆炸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生动地显示了这个秘密而松散的不负责任的中央行政经济的致命和危险的缺陷。切尔诺贝利使人们认识到受限制的开放引起了国际上的敌对以及国内的恐慌。（霍斯金，1992，第457页） 235

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还是党内的普通成员都十分反对经济改革。然而，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了它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两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如何进行改革的蓝图。两个国家的领导层中都有许多人担心经济改革的后果。在改革的初期，两个国家的领导层中同意和反对改革的力量是否一样还有待讨论。戈尔巴乔夫没有尝试通过逐渐引入经济改革计划，以此来慢慢地赢得领导层和党内普通成员的对于最终改革的支持。他决定在巨大的经济改革之前，首先推动政治改革。由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导致的耻辱，使得苏联高层对于开放政策的反对暂时地得到缓和了。

戈尔巴乔夫的经典著作《改革》（戈尔巴乔夫，1988）的内容是空

---

① 公元前49年，恺撒带领军队跨过意大利和高卢（现在的法国，过去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的一段天然边界卢比肯河，回到罗马与庞培将军作战，刚刚渡过河，恺撒就说“骰子已掷出”意思是木已成舟，已没有后路。后来人们把这种只能向前、没有退路的情况叫做“跨过了卢比肯河”。——译者注

洞的。这与邓小平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相对应的中国改革时期）的演讲中的清晰的洞察力和坚定的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戈尔巴乔夫的著作的更为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表面上显得更加“现代化”和“西方化”。这本书没有具体、清晰的政策建议。取而代之的是改革的空洞的理念，这使得社会的各个阶层开始怀疑现存制度的正确性。在他的改革进程初期写就的作品中，戈尔巴乔夫表述了他的希望如下：

> （1986）年 1 月的全体会议的主要观点，即对于实现改革的任务和保护社会免于出现过去的错误的道路来说，是发展民主。这是改革进程不可逆的主要保证。社会越民主，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确定的信念，我们不会抛弃它。我们将会推进经济、政治和党自身的民主。大众的创造力是改革的决定力量。没有任何别的更有力的力量。（戈尔巴乔夫，1988，第 63 页）

236

*开放*

改革的最直接的切实结果是信息、广播和出版的巨大的自由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意识形态混乱时期，大量的新团体出现。新的真实而独立的公民社会以爆炸性的速度迅速发展。成千上万的非正式团体（neformaly）诞生。一系列的私营公用事业团体，从极左的团体到极右的团体都开始迅速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强大的绿色运动，这显示了苏联的全面生态灾难。长期压抑的宗教得以重见天日。大量的对于苏联历史的重新评价开始出现，例如重新审视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出现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和原因等基本问题［戴维斯（Davies），1989］。公开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开始形成。无法预料的罢工运动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开始出现，这转变了工业关系。

这些发展反过来与对共产党的信心和效率的下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或者良性循环，取决于每个人的观点）。高涨的批评浪潮迅速破

坏了苏联共产党的自信和效力。社会团体的迅速增加快速取代了苏联共产党腾出的空间。这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对比非常鲜明。在中国，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思想，但是共产党领导层十分坚决地维护共产党组织的威信和效力。中国共产党在所有的机构中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武器。

1990年的五一劳动节游行是苏联知识分子的生活气氛的转轨程度的恰当表现，在过去，劳动节游行的内容可能就是苏联军队的有秩序的年度检阅：

> 这个队列包括了哈里克里希纳宗教小派（Hare Krishna）、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者的成员，站在前面的是俄罗斯扎格尔斯克的东正教修道院的僧侣，他们高举一个几乎和真人大小一样的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画像，（向站在指挥台鸟瞰红场的）戈尔巴乔夫高喊“米歇尔谢尔盖耶维奇，耶稣复活了”。（《国际先驱导报》，1990年5月2日） 237

### 消灭执政党

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似乎没有决定对党发起攻击。无论他最初的目的是什么，非正式团体的快速发展都对党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通过容忍和鼓励非正式团体的发展，他（戈尔巴乔夫）拥有了一个绕过共产党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工具。通过对他们的开放，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氛围，在这个氛围中，每一个党的工作者都变成‘阻止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官僚’。”（米勒，1993，第128页）

有一点可以肯定，1988年春天戈尔巴乔夫确实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直接向列宁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即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发起了攻击。在当年所开始的几个改变中，最重要的开始是致力于建立一个通过自由和竞争选举而形成的议会，这个议会可以同意或反对立法的通过，任命或者解散行政长官。该决定的做出及其在1989年开

始的实施革命性的影响。米勒对此影响总结如下：

> 至少从1988年以来，党员已经察觉或者被明确告知，1989年选举之后：选举和议会的竞争性投票与权贵阶层的惯例不相容；基于事务的自由投票与党的操纵和纪律不相容，因此与民主集中制不相容；修改宪法必须表示（至少）要公开至今为止的秘密活动。（米勒，1993，第84页）

1989年选举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虽然仍然有很多共产党员当选，但是许多最重要的党内人物失败了："这是一个伤人至深的象征性的耻辱：它包括了对大城市，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克麦罗沃或阿拉木图等地的高级官员的完全清除。"（米勒，1993，第116页）



而且，苏联的转轨是在1989年东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东欧革命本身就是改革的直接结果。苏联发动的改革对东欧的社会意识产生了相似的影响。而且，戈尔巴乔夫希望苏联"返回文明世界"，明确要求苏联政府不应该像1968年那样进行干预。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的迅速下台是摧毁苏联共产党信心的最后的推动力量。

1990年2月，苏联共产党删除了宪法的第四条，正式结束了它的垄断权利。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不再是政治制度、国家组织和公共组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不再"决定社会发展总的前景以及苏联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方针"，也不再"指导苏联人民的巨大建设活动以及担当实现共产主义胜利所需的有计划的和有系统的角色以及理论上的实体角色"。

之后不久，一个新的苏联总统的非党职位被设立。总统被赋予了像美国宪法规定一样的横扫一切的权力，例如解散政府的部长、中止政府法案的效力、颁布总统令和延迟苏联高等法院的立法。戈尔巴乔夫的职位在1990年3月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从而也完成了他从

党的领导向国家公务员首领的转变。[①]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的攻击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者的某些想法与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非常相似。早在改革进程的初期，即在 1987 年 10 月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一次演讲中，他说：

>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想让你们理解为一个口号——就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一样——炮轰司令部。不，同志们，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引自米勒，1993，第 82 页）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革命更加有效地破坏了苏联共产党的统治。米勒审慎的评估得出：“直接的证据有力地证明他故意给共产党找麻烦：批评它、鼓励反对它、削弱它然后抛弃它。”（米勒，1993，第 127 页）在 1989 年 7 月的一次党的领导成员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嘲弄了他们对于已经见证的变革的恐慌：



> 革命并不舒服……我们用自己的政策鼓舞它。你觉得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不明其理吗？……一些同志认为苏联权利的转移相当于宇宙的毁灭。即使你认为它是一个毁灭，那也是扭曲的宇宙的毁灭。（引自米勒，1993，第 82 页）

他奚落那些犹豫的同志的方式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毛主席对待那些在 1955 年集体化之前很紧张的同志一样：“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

---

① 最初的协议是，总统由国家通过选票来进行选举，但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宪法之手巧妙地避开了这一途径。

了。’”[①]（毛泽东，1955，第184页）

官僚机构掌握着任何试图进行现代化或进行一次大的结构变革的钥匙。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被一个巨大的、非常保守的官僚机构统治着。改革只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退休计划、职业化、精简化的方式缓慢地改变党的性质，并将党的工作从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转变到间接干预。这需要有一个有着清醒头脑的领导，而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耐心工作。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公开面对公众的监督、向公众说明以及承受公众压力来迅速改变官僚机构的行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这个方案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家和政客的一致赞同：

> 改革确实削弱了官僚机构的权利，毋庸置疑大多数行政人员都会反对改革。因此，成功的改革必须打破反对改革的官僚机构的力量……破坏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利可能是改革的关键问题。除了使其面对强烈的公众压力和开放的民主化，从而平衡官僚主义的权利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而且，如果企业负责人敢于做出独立的决定，那么就需要某种程度的制度多元化。如果没有开放的，对于不正确的数据进行独立批评的社会，任何合理而正确的信息的完全流动就很难实现。［阿斯伦德（Aslund），1991，第14页］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可以在党的领导层中联合起许多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领导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共产党政治局中有许多人认为“如果要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必须进行更加激进的改革”［史密斯（Smith），1993，第99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之前，一个有先见的评论家，史蒂夫·科恩（Stephen

①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译者注

Cohen）就认为在党的领导层中出现改革联盟的可能性很大：

> 自上面开始的改革的成功……需要苏联官场上的改革者和保守者的联合……这种联合是有可能的。在布拉格之春时，一位捷克官员称："我们当中的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界限不太明显。"……迹象显示苏联内部已经孕育了变革意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农村的贫穷、工业产出的降低，社会的酗酒风、堕胎和离婚等常见现象的反应。（科恩，1986，第156页）

很显然，这种联合需要把最初改革的政策限定在非常谨慎的政策的基础之上。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最终，改革中的效果推动改革联合的重心朝向更加激进的方向。改革需要时间和耐心，不是"大跃进"。

米勒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代表了西方一些不明情况的社会科学家的意见：

> 苏联共产党的失败可以看做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成就……独裁的政党被破坏，而且几乎没有机会重组……这的确是戈尔巴乔夫最重大的成就。（米勒，1993，第205页）

雅科夫列夫对米勒的判断的回应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转轨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从上到下的政策的诱导性改变： 241

> 那些年的向开放的转变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更多的是由改革和它的发动者的理念指导，而不是直接的需要……改革的思想已经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孕育了很久。但是党的上层领导开始实践了此事……变革仍然要保持党本身和它在过去的十年中创造的一切，在大多数国家党仍然要对社会有绝对的统治权。（雅科夫列夫，1993，第104、212页）

### 民族主义

也许改革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摧毁苏联的国家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开放使得公开表达民族主义情感合理化。它允许群众公开表达对于中央政权的不满，并将长期隐藏的苏联错误对待加盟共和国的创伤公开化。这对民众的影响更加剧烈，因为这些事件已经被掩盖了很长时间而得不到公众的讨论。苏联共产党的统治意愿和能力的降低提供了一个逐渐膨胀的无法控制的环境，这个环境又助长了这种情绪。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非正式团体得到了发展，它就是反对中央政权的国家人民阵线。对于民族主义所遭受的来自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错误对待的历史批评变得越来越强烈。1990 年的公众选举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被完全打败，在新的地区议会中出现了许多反共产主义、反联合主义者的代表。因为戈尔巴乔夫容忍合理的辩论以用来重新理顺中央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这给民族主义情结创造了空间。这又与中国的领导人在改革阶段拒绝支持任何重新界定国家和地方省市之间的关系的政治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

民族主义增长的最后的最强有力的奋争是 1990 年的决定，该决定允许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可以在本国国内重新建立议会制度。选举本身和议会的持续辩论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十分热烈的氛围。《金融时报》的昆廷·皮尔（Quentin Peel）用下列术语描述了这种情况：

> 除了戏剧性这个术语之外，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苏联共和国以及它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乱象……在过去的三年中，苏联国家的不可动摇的团结性，创造人类苏维埃的计划，共产党和部长们对 15 个共和国和 100 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事物的中央控制都遭到了削弱，以至于上述这些概念不再被人提起或使用，除了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互相屠杀的时候。（《金融时报》，1990 年 3 月 12 日）

---

① 实质上，中央和地方省市之间的经济关系确实已然发生了改变。

苏联时期的最后几个月的“向正确方向的转变”是苏联走向解体的最后一次挣扎。在1991年的第11个小时，戈尔巴乔夫领导了苏联的完全毁灭，他试图通过削减经济改革的开支、重新建立军事和克格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尝试重新建立中央政权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支持重新确立中央控制的最后努力。这项运动在“八月政变”时达到顶峰。他希望中断联合条约的进程（它将要把苏联从统一的国家变成松散的联邦），改变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程。政变的失败加快了被设计的用于阻止这项进程的过程。苏联共产党被中止了。克格勃的新任命的领导所接受的主要命令就是解散它。加盟共和国以较快的速度转向完全独立，因为大多数共和国已经宣布他们完全独立。苏联于1992年1月1日，在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完全消失了。

这与中国的对比非常鲜明。改革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大多数人希望扩大能够被国际接受的国家边界。国家统一是中国政府坚决拥护的政策。中国通过暴力保持国家统一的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愤怒批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忘记了他们自己的通过暴力斗争创造和维持国家统一的历史。他们完全无视“民主的”印度有着同样的暴力维持国家统一的行为。



1991年8月政变的失败，导致大量的权利从莫斯科转移以及很多加盟共和国正式独立，它们中的许多国家至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是俄国的一部分。“俄国”从一个拥有15个成员国，290万人口的国家变成一个有15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和14个新独立的国家。这既不是根据政治团体和语言团体把印度分成许多独立的国家的自然的过程，也不是在19世纪美国北方通过浴血奋战成功保持国家统一的美国分成两个国家的过程。

### 7.1.2 经济

*经济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对于市场经济没有直接的了解。

苏联在冷战中的对手是美国。美国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典型，位于苏联的政策制定者的意识的最前沿。而且，美国的社会科学和基金主导了非共产主义政治经济领域的思想，这个领域包括学术期刊和国际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主导的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甚至转向到反政府的立场。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受到苏联的没落和中国的崛起的影响，再加上日本和新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美国的主流社会科学家才开始认识到政府的作用比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描述的情况要更加复杂。

苏联的知识分子不太愿意承认东亚和他们自己的政策制定有某种关系。从仁慈的出发点上看，这主要是源于他们历史上与中国有关系："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国，大多数的苏联官员不想复制中国……直到1986年年中之前，中国改革在苏联国内还遭到了强烈的攻击。"[戈德曼（Goldman），1992，第61页]一个不太仁慈但是更加准确的观点是将这个现象归因于种族主义。[①] 大多数苏联人不愿意相信有任何东亚国家，包括日本，会在任何地方超越他们，并且可以教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对"西方"非常入迷，特别是他们的主要的敌人——美国。



### *在传统制度内的改变*

戈尔巴乔夫执政早期的主要方法是简单地延续安德罗波夫时期（1982—1984）的"强制"政策。投资政策方面的目标就是通过减少消费的份额以提高投资率。增加机器的折旧率，以提高现代化的水平和提高分配到新机器的投资份额。通过提高机器制造业的投资，工业技术的进步本应该加快。但这些行为导致了"短缺"和囤积的严重化。

---

① 这方面的最突出例子是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这个演说提到"黄祸论"（这一说法是西方对来自亚洲的威胁尤其是中国的威胁的一种污指）和斯大林对中国人的污蔑态度，斯大林的污蔑态度记载于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

产品质量缺陷仍然存在。（阿斯伦德，1991，第 75—77 页）

一场严格的反酒精运动被发起。这场活动的成功进行，表明了作为行政机构的党的持续力量。从 1985—1987 年间，白酒的销售量下降了 60%。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与酒精有关的犯罪和事故有了明显的下降，醉酒上班的行为也有很大的下降。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实施更加“强制”的政策（见以上）以改革经济的做法导致了产品质量的持续下降。从 1986 年开始，通过行政立法的形式进行了一场严格的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但是，不合格产出的废品率的大幅上升对物资平衡计划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从而使得这场运动很快被放弃。

变革被引入到工资制度，目的是通过扩大工资差异以及给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提供更好的回报，以提高工资对人们的激励作用。“晓基诺”（Shchekino）实验允许企业在减少劳动力的同时保持同样的工资规模的做法变得非常普遍。

这些变革对于改善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缺陷没有任何作用。他们代表了在旧体制内的最后一次改革的尝试：“这些努力的无效使（人们）认识到传统的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进行经济改革。”（阿斯伦德，1991，第 88 页）

### *基本制度改革的开始*①



#### 领导层的观点

1987—1988 年间，苏联的领导层普遍一致地认为需要改革基本体制。但是在转轨的速度和最终的目标上还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事实上的不确定性。这一点毫不奇怪。对经济改革的讨论热度与中国改革的相应时段领导层中出现的情况相似，那个时段大约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两

① 在写作这一部分时，我发现阿斯伦德对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的非常谨慎和博学的记载是非常有用的。当然，我非常不同意阿斯伦德所作的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间关系的全面评价，也不同意其对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的经济改革的可取特点的评价。

年时间里，那时，中国自己认识到在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革是死路一条。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Schevardnadze）是苏联的激进派。然而，即使他们也没有想到要进行一场比匈牙利在 1968 年，以及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改革实践更激进的改革。确实，谢瓦尔德纳泽于 1972—1985 年间在乔治亚发起的改革和赵紫阳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在四川省发起的改革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即便是苏联领导层的“保守派”，例如雷日科夫（Ryzhkov）和利加乔夫（Ligachev）似乎也支持基本体制的改革，但主张应该以比较缓慢的步伐进行改革并保留社会主义因素的强势作用，例如资产的集体所有权。实际上，雷日科夫是重要改革——最著名的是在企业管理，外商投资的合资企业的推动以及经济特区的建立等方面——的发起者。

**党与经济**

自 1987 年以来，领导层迅速改造了党与经济的关系。官方目标发生了转变，即从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间接干预。党中央的人员发生了迅速改变，在中央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中一个几乎全新的部长团队和关键官员得到了提升。该计划是为了减少党员干部参与经济的行政管理。确实，只在 1988 年就削减了大批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从 20 人减到 9 人，主要是阻止官员干预经济管理，省委员会的人员也进行了相似的削减。（米勒，1993，第 128 页）而且，他们公开声明要求党员机构的专业化，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已经改变的作用。



**企业改革**

**服务业的实验**　这项改革始于戈尔巴乔夫参加选举之前的 1984 年，开始在波罗的海省份和乔治亚广泛传播，但是允许迅速扩展和普及到国家的许多地方。服务业的扩展通常需要较少的资本，并且还能填补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的市场空白。这个部门的企业被允许自由经营，只需要上缴约定的利润，其他的利润自己保留。服务企业允许与更低一级的单位甚至个人签订不同的契约。这个实验的成效非常

显著："这显示了与勃列日涅夫经济的分野。它认为需要引入新的经济思想……实验性的联营、租赁和个人企业通过实验合法化。其经济成果非常好。"（阿斯伦德，1991，第96页）

**工业和农业的自我融资实验** 这个计划于1985年在萨米（Sumy）开始实施，截至1988年，它已经扩展到占工农业产出值的60%的企业。其实质是合约制度，企业允许保留合约规定的利润比例，并根据中央规定的制度，分成不同类型的资金。参与的企业仍然限定在国家供应委员会（Gosnab）的材料供应系统内，并遵循国家规定的价格。但是，这些在改革中的内部矛盾，激发了新的讨论，促使经济学家寻找全部贸易和价格制度的改革。人们逐渐认识到对斯大林经济体的改革是一个无缝之网，它包括了所有关键的制度，企业运行是其中一部分。

**农业试验**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合约制度在农业领域的拓展是缓慢的，但也有重要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领导层存在巨大的分歧，他们有的希望土地私有化，有的希望像中国一样保留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些地区，最著名的是波罗的海地区，土地租赁发展很快。1989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租赁期长达15年，并且在使用期限内为承租人提供保障。1986年，农产品强制交货被固定在5年之内。计划外的产量，土豆、水果和蔬菜的总计划产量的30%允许生产单位在他们自由选择的市场上自由出售。与中国农村改革相比，这一政策的一项较大不足是没有提供一个清楚的合约机制，对于承租的农民使用大型机械，例如喷水机、拖拉机、收割机和处理机器的途径没有明确规定，在苏联农业生产中它们大部分都是大型机械。缺乏农民可以使用这些服务的条件的清楚的规定，农民选择土地租赁制度将会是非常冒险的。

**关于国有企业的法律** 这项法律颁布于1987年7月，它通过10条政令总结了经济制度的主要作用（包括计划、原材料供应、价格和银行），所有这些都对国有企业的运行有着潜在的影响。制定法律的目的是取代通过国家订购来吸收企业全部产出的方式，逐渐减少企业产出中的国家优先订购部分的份额。198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

宣布，制定法律的目标是把国家在企业产出上的采购份额从接近100%降低到1989年的65%—75%。到1990年降低到50%—65%。（阿斯伦德，1991，第129页）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实施上的失败与法律规定出台的速度一样快，这“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指责国家计划委员会及其各个分支部门的在改革实施上的失败”（阿斯伦德，1991，第128页）。确实，许多企业拒绝接受和法律相矛盾的指令。通过国家供应委员会的原材料供应注定要逐渐减少。国家供应委员会的领导（沃罗宁）在1985—1989年宣布到1987年通过市场批发而分配的产出份额（物料平衡计划制度外的产出）将会从1988/1990年的60%增加到1990/1992年的75%/80%。（阿斯伦德，1991，第131页）

虽然国家供应委员会（Gosnab）不想实施这个提议，但是在改革方向上，已经达成共识，并且非常清晰。价格将通过引入中央固定价格、协商价格和市场定价的混合制度的方法进行改革，尽管准确的步伐和他们之间的平衡关系还不明确。虽然法律提高了破产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破产发生的情况很少。1987年后期，第一个拥有私人所有权的合资股份公司出现，其实质是国家和股东的合资企业：“他们的创立具有基层群众运动的特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为之铺垫……很奇怪的是在苏联的新闻上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的抵触。在1990年6月19日，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合资股份公司的法律。”（阿斯伦德，1991，第137页）



外贸部在1986年被剥夺了在这个领域内的垄断权利，同时新的部长被任命，而且几乎清除了所有的高层。（阿斯伦德，1991，第140页）到1988年，有权参与外贸的协会组织扩展到200个，到1990年已将近2 000个。地方政府的作用上升很快，他们都试图推动本地区的外贸业务。从1986年开始，出口企业允许保留出口收益的（30%—50%）部分份额。1990年，卢布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70%）。从1986年开始，允许设立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资企业。外商投资的实验

逐渐展开，但是到1988年中期，只完成了66个合资企业协议。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末期，苏联已经申请加入关税贸易总协定，并且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敌意有所缓和。到1990年，苏联政府和主要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可以联合“对苏联的经济进行细致研究，并为它的改革提供建议，以期建立一个西方经济可以有效地帮助支持这一改革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1页）。

**个体劳动者的行动法律**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苏联经济中已经存在一个大规模的私有部门。它的主要领域是合法的农村自留地和私下贸易，非法的、未注册的私有服务的提供（车、家用电器、鞋和房屋的修理），批发贸易中的黑市交易。据估计，多达30%—40%的个人收入来自这些私有部门。关于个体劳动者活动的法律显示了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的转变。这种态度转变使得个人企业可以在某些领域运营（尤其是在手工业和消费服务业）：“大量的私有活动突然变得合法了。”（阿斯伦德，1991，第165页）这些部门的个人有权利合法地采购材料、出租房产，改变他们产品的市场价格。合法的私有企业需要负担适度的税率。到1989年为止，合法登记的个体劳动者大约超过了30万。

**关于合作企业的法律**



合作企业法于1988年5月通过。这是1987—1988年间的整个“改革浪潮”中最宽大的一项立法。合作企业有自己的法律保障。他们自我管理，自我融资。政府鼓励他们和国有企业竞争。[雷日科夫（Ryzhkov），《真理报》（*Pravda*），1988年5月25日，引自阿斯伦德，1991年，第170页] 他们可以自由地购买原材料并根据可以维持生产的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正式注册一个合作企业最少需要3名成员，但是没有上限限制。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允许雇用劳动力，“但这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因为他们可以以合约为基础雇用无限

多的成员”（阿斯伦德，1991，第 170 页）。虽然合作企业针对他们的收入只需缴纳较低的税收，但是这些税收直接上缴到地方政府，这样就给了地方政府支持合作企业发展的激励。这项法律包含了大量的“非常自由的”条款，例如允许合作企业发行股票或债券，允许其选择银行，建立银行，允许合作企业与其他合作企业联合，并参与外贸。

在此项新制度实施后的仅仅两年时间内，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 15 万个，其雇员超过了 500 万（占总劳动者人数的 3.7%），生产了占国民收入 7% 的产品。而且，合作企业开始吸引来自国有工厂和政府各个部门的技术工人。（米勒，1993，第 103 页）这一现象与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很类似。

合作经济的快速发展让那些仍然担心完全私有制的领导人接受了市场和竞争的观念。在漫长的物资短缺时期，合作企业总是可以利用巨大的市场缺口获得利润：“他们一旦感觉到市场机会，就会跑到那里，开始工作。”（阿斯伦德，1991，第 172 页）毫不奇怪，在领导层内部和人民中间出现了大量辩论，这些辩论较为普遍地关注合作企业的作用。

### *政策争论的激烈化*

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时间仅有六年。最初两年的特点是继续应用旧的改革方法。严肃的体制改革在 1987—1988 年之前没有开始。以上概述的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的较短的一段时间内的经济改革政策是小心而实际的。他们似乎想把苏联经济体制引致到与中国同时期的改革即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80 年代早期的改革道路上去。

关于改革速度和方向的讨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的几个月更加激烈。继续进行渐进式改革的主张，在 1989 年 10 月的阿帕尔金（Abalkin）计划及后续计划里被总结出来。这个计划是在 1990 年后期由雷日科夫（Ryzhkov）、阿帕尔金和瓦连京·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提出的。这个计划没有明确地表示致力于真正的市场经济，致力于由

市场决定的价格和多种所有权形式，但他强调了转轨的速度应该持续谨慎，不承诺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恰恰相反，改革的实质是允许新的所有权形式的发展和努力提高国有资产运行效率的一种联合。这个计划使人们很容易回忆起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制度构造。确实，它具体化了一个拥有管理市场经济的总体制度框架的国家的持续的、强有力的经济作用。（阿斯伦德，1991，第 206—229 页）

苏联改革发生的背景是东欧的大规模经济和政治转型。激进的改革者受到波兰改革以及与西方经济学家联系的快速增长的极大激励。激进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快速增加，他们主张仿照波兰模式——以大规模的、快速的私有化作为改革的主要部分——进行更加激进的改革。

渐进式改革和“第三条道路”的概念逐渐受到苏联国内外的嘲笑。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例如雅诺什·科尔奈认为历史和逻辑都证明了这条道路有问题。激进的改革者认为现在的改革道路没有任何总体逻辑的指导，这项制度将要走向何处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努力渐渐地失败了。但是经济学家，例如珀金斯（1988）的关于中国改革的平衡的、积极的评价却被完全忽略了。

在这个背景下，政府内的“激进”经济学家集团做出了两个紧密 251
联系的计划，目的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快速完成改革。这个计划的实质被 1990 年 2 月出版的第一阶段计划的作者所指明：“结果证明，渐进式转轨的时机已经错失，而且局部改革也已经被匈牙利、南斯拉夫、波兰和中国的经验证明是无效的。”（引自阿斯伦德，1991，第 207 页）这个集团的最重要的成果是 1990 年 9 月向政府提交的著名的莎塔林计划（Shatalin Plan）：莎塔林计划的实质是快速的稳定化和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轨，同时要伴随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向加盟共和国的普遍授权。这个 500 天的转轨计划非常详实和具体。（阿斯伦德，1991，第 208 页）

与令人悲哀的“折中道路”的“保守的强硬路线者”相比，这些计划受到了西方专家的广泛欢迎。安德斯·阿斯伦德——一位非常有

知识的苏联专家和苏联政府顾问——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 莎塔林方案很难说是完美的。特别是该方案坚持进口替代，并且坚持极度的保护主义。而且，从它的原则和基本意图来说，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家很难与莎塔林方案在争论的主要焦点上保持一致……莎塔林方案表明了对经济体制快速改变的必要性的理解力，以及重新架构苏联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的意愿。如果经济持续下滑，渐进主义等同于延长经济苦难。因此，体制的迅速变革是维护人民的福利所必需的，人民的福利只能通过将来的资本主义来推进。（阿斯伦德，1991，第221页）

我们很难准确评估西方顾问——例如阿斯伦德、萨克斯、雷亚德——的影响程度，也很难准确评估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的观点的影响。[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然而，至少他们增加了政府中希望通过“激进的”、“彻底的”方法解决苏联经济问题的人的信心。



在戈尔巴乔夫政府的最后几个月，由于管理层主要受到担心改革的政治后果的保守派的影响，激进的建议没有被政府政策所采用。政策上主要还是强调谨慎的经济改革。“激进”的方案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实施。

### 结果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绩效持续恶化。官方估计在1985—1990年间，国家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甚至比20世纪80年代初的数值还低。非官方估计认为，到1987年，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所有的估计都承认1990年的增长率已经变成负值。（阿伦德，1991，表7.11）事

---

① 参见V部分的讨论，题目为《改革的替代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16—19页）

实上，由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格里高里·哈宁（Grigorii Khanin）所完成的审慎评估认为，国民收入在1990年降低了13.5%—14.5%。［引自史密斯（Smith），1993，第35页］大家普遍认为，国民收入在1991年又下降了15%，这使得1989—1991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共降低了30%，这一下降甚至超过了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下降值。（史密斯，1993，第35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考虑1991年之后的下降时要考虑到下降的起点。

一个事实上已达成共识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经济改革的失败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三心二意和强硬路线者对“庄重”的体制改革的阻碍。换句话说，提高经济绩效的失败证明了，解决苏联经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的正确方式是莎塔林式的激进改革。这是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所学到的经验。

然而，现实更加复杂。真正尝试体制改革的时间很短，总共持续了大概只有3年时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计划也算不上完美，但是已经持续了15年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苏联改革的背景非常混乱，至少是政治革命和国家分裂。尝试改革的阶段实际上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后果。

最重要的经济影响是物资供应制度。尽管致力于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判断是大部分的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已经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10页）崩溃的原因实质上是政治。在科尔奈的著名分析中，通常情况下，物资平衡计划体制很可能减少供给和需求的不当配合，对吸出和囤积会产生较强的压力，而且企业和地区会保持自给自足。这个脆弱的机制被改革带来的持续的政治动乱粉碎了：



> 1988年以来的连续3年时间里，中央实施计划分配制度的能力已经崩溃。苏联共产党强制实施向国家交货，而且那个机制也

已经完全失效。结果是，企业拒绝以低价向国家输送产品，而是以市场价格将产品出售给任何他们想出售的人。本来开始想与中国的改革一样，即通过增量改革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最终却将自己导向至中央分配机制的崩溃。社会协作协调机制的崩溃极大地影响了国有企业，并很有可能导致了1990年和1991年的持续的产出下降。[布兰查德（Blanchard）等，1993，第42页]

共产党位居计划进程的核心，但改革已经极大地减少了计划体制下的党员的数量。而且，那些仍然在计划活动中工作的党员的信心受到了“开放”的严重摧残。更严重的是，改革急剧地改造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报告中指出：加盟共和国的政策制定已经逐渐有了自治的特点。在物资缺口增加的环境下，加盟共和国逐渐变得不愿意和其他国家交易，除非是实物交易……这个自治倾向以及加盟共和国之间增加的实物交易近来已经在各国边境贸易的控制的建立上反映出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0，第10—11页）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贸易作用非常大：除了俄罗斯共和国外，每个共和国和其他共和国之间的贸易交换额占该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1%—41%，而俄罗斯共和国占11%。（表7.1）共和国之间的贸易的瓦解对国家产出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是巨大的。其净结果就是工业产出和效率的严重下降。

一个密切相关的结果是政府财政状况的下降。国家能力的急剧下降对税收和支出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成员是党员干部的税收征缴机关的士气和规模都恶化了，从而降低了政府收税的能力。另外，工业产出的恶性循环降低了企业上交合同利润给国家的能力。国家外贸状况的恶化减少了政府外贸税收的收益。而且，加盟共和国逐渐拒绝向中央政府上缴税收。共和国政府的预算收入从1985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8%下降到1989年的44%。（阿斯伦德，1991，表7.9）

**表 7.1　加盟共和国在苏联国家中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1990，%）**

| | 外贸 | | |
|---|---|---|---|
| | 总值 | 地区间 | 地区间占总值的份额 |
| 亚美尼亚 | 8.4 | 25.6 | 90.1 |
| 阿塞拜疆 | 3.9 | 29.8 | 87.7 |
| 白俄罗斯 | 7.3 | 41.0 | 86.8 |
| 爱沙尼亚 | 2.9 | 30.2 | 91.6 |
| 乔治亚 | 8.9 | 24.8 | 85.9 |
| 哈萨克斯坦 | 3.5 | 20.8 | 88.7 |
| 吉尔吉斯斯坦 | 2.3 | 27.7 | 85.7 |
| 拉脱维亚 | 1.4 | 36.7 | 88.6 |
| 立陶宛 | 5.5 | 40.9 | 89.7 |
| 摩尔多瓦 | 3.0 | 28.9 | 87.7 |
|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 | 8.3 | 11.1 | 60.6 |
| 塔吉克斯坦 | 5.9 | 31.0 | 86.5 |
| 土库曼斯坦 | 5.6 | 33.0 | 92.5 |
| 乌克兰 | 9.0 | 23.8 | 82.1 |
| 乌兹别克斯坦 | 8.5 | 25.5 | 89.4 |

**注释**　国家贸易数值是按照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大规模贬值之前的汇率计算。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2，第 121 页。

在开支方面，逐渐虚弱的政府意味着它越来越不能不顾作为国家产出一部分的收益的下降，而去维持那种要保持一定消费水平的需求。政府十分担心允许国有企业破产的后果以及企业资不抵债的公然增长，因此它维持一定的开支用以冲销企业的损失，使企业不致负债。而且，在通胀逐渐增加和物资严重短缺的环境下，政府持续增加食物补贴以维持社会稳定。这些举措的结果是，国家开支占国民产值的比例由 1985 年的 50% 上升到 1989 年的超过 52%。

财政危机加剧了。财政赤字从 1985 年的占 GDP 的 2.3% 增加到 1988 年的占 11%，而赤字几乎全部是由苏联中央银行（Gosbank）承

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1991，7）这对货币供应增长的影响是十分严重的。货币供应的增长从 1981—1985 年间的年度平均增长率约 7.5% 上升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的 15%，这同时伴随着实际产出的下降。（阿斯伦德，1991，表 7.6）面对消费品的持续短缺，货币供应增长进一步加剧，同时消费者的不满也日益增加。

政治变化对外贸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原材料出口占据了苏联的硬通货商品出口的大部分份额。但是在这段时期，外汇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在原油生产、出口数量和外汇收入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减少。[①] 这部分地反映了由于非投资领域的花费的份额上升导致国家对于投资的普遍压缩（国家预算中的投资份额从 1985 年的 9.0% 下降到 1990 年的 4.3%）。（阿斯伦德，1991，表 7.8）然而，这也反映了工业的战斗性的增长，在这种战斗性中，矿工凸显了重要性，与此同时，也反映了原油生产共和国不愿意让其产品出口，因为中央政府将会因此获得硬通货。

苏联从西方获得的硬通货收入从 1984 年的 210 亿卢布降至 1990 年的 170 亿卢布。（阿斯伦德，1991，表 7.10）与此同时，控制进口也完全走向失败。它没有用国家有限和下降的外汇集中进口那些非常重要的产品，这个越来越倒霉的中央政府突然大量增加进口是为了安抚国内消费者："进口导向型政策看起来好像是为了缓解人们对于消费品的
256 不满。"（阿斯伦德，1991，第 198 页）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外贸状况的急剧恶化，外债总额从 1985 年的 290 亿美元上升至 1989 年的 540 亿美元。（阿斯伦德，表 7.10）苏联现在持有的外债比例和拉美国家相当，而这种高外债比例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它失去了独立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因为它现在需要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 戈尔巴乔夫的"成就"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这就需要

---

① 需要注意的是，从 1986 年开始，世界石油价格下降的趋势已经反转。

改革基本体制以便改善制度的运行方式。在传统的体制内通过增加更多的压力来修补经济，不仅没有改善局面，反而加重了恶化。但是，该体制拥有巨大的尚未使用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存量的产能。而且，这个国家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能建立正确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它会拥有获得快速发展的巨大潜力。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领导层希望通过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战略，最终取得好的结果。仅仅在几年时间内这个方法的好处已经从中国的经验中明显地显示出来，而且休克疗法的危险也同样从东欧的经验中看到了。这个有助于增加领导层对于这个战略的正确性的信心。

但是，成功的经济改革需要政治稳定和有效的政府。这些是保持政府的财政能力和维持财政稳定的必需品。这也是政府可以在计划经济转轨过程中发挥计划作用的必须的条件。而且，这也可以让政府保持社会的和谐，同时减少转轨所导致的社会混乱。

戈尔巴乔夫政权继承了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偏好“革命”的不同政见者的运动限制在很小的知识分子范围内。而且，苏联拥有一个强有力行政管理机构——共产党组织。前任政府对少数派的严肃处理表明民族主义者运动对于民族独立自由有较低的期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开放政策改变了持不同政见的少数派的思想和国际社会对于民族政策的恶意态度。他们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毁灭，同时也没有建立稳定和有效的民主体制，他们导致了从 18 世纪开始就已经存在的国家的破灭。

这些改变对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其影响完全超过了 1987—1988 年间的有限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时代留给其后任的是一个陷入灾难性失控的政府、社会和经济。很难想像那个在 1991 年继承权利的新俄罗斯政府或者任何形式的共和国可以在多年之内收拾好这个局面。事实上，继任的政府采用的政策使局面变得更加糟糕。

## 7.2 俄罗斯联邦的改革

俄罗斯现在变成了一个更小的国家。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比苏联更有可能取得较快的发展。这个国家现在的民族构成更加统一。它已经甩掉了大部分收入低、人口增长速度快和种族局势紧张的中亚国家。俄罗斯联邦有着比苏联更高的平均收入。它拥有苏联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它拥有西伯利亚地区，这个地方拥有大量未标明的资源。俄罗斯联邦有大量的优质农田。俄罗斯工业资本的约 2/3 都得以保存，拥有超过 2/3 的工业产出能力。它拥有包括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地区以及乌拉尔地区的后共产党时期的工业生产增长的主要区域。它不再为东欧的事情负责。

俄罗斯很明显陷入了严重的国家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可能支持计划转轨战略，在此战略中，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像许多国家的战时一样困难被相对平均地分担。俄罗斯并不缺少这样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应该仔细考虑命令体制的有计划改革和渐进式改革战略[①]，包括对建基在苏联工业良好基础上的工业战略的深思熟虑的建议[例如费尔兹曼（Fal'tsman），1993]。然而，这些言论被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骑士攻击”所淹没。

### 7.2.1 政治

#### *中央和地方*

苏联共产党的倒台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改变。1990 年，俄罗斯的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政府都进行了选举。发生这种情况的背景是共产党虽然已经建立但正处在分裂之中，而同时没有其他

① 比如见卡宁（Khanin），1993a。

任何的政党制度可以替代。在地方层面的选举上，大部分当选者都是党员，尽管他们拥有不同的见解，而且经常敌视共产党。地方代表的当选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而不是对某一具有清楚的方案的政党的支持。两个时代之间的地方执政人员具有高度的延续性。而且，尽管共产党已经瓦解，但是作为一个中央机构，它仍然在地方的实权人物中保留有强大的人际关系网。而且，作为新生事物的选举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有到他们已经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发生巨大转变时，选举才真正实现。代表选民的政党纲领没有显示出任何变化。在选举的时候，政党和选举纲领都已经不复存在。

苏联共产党的倒台以及物资平衡计划制度的瓦解改变了国家资产的实际的所有权性质。中央失去了对大量的国家资产的直接控制。资产的实际控制权由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和那些在企业工作的人员手里。

### 民族环境的改变

在一个分裂的政治环境中，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政府的道德风气也江河日下。任何当权的个人都没有激励按照服务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行事。社会规范瓦解了，其他的当权人也不可能在其行为中把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在高度不稳定的道德和政治环境中，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改变，个人以牺牲社会的利益而获得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经济体，银行体系和整个国家都出现了很多恶人，而且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普通公民已经屈服了，他们偷窃国有资产，从事黑市交易，诈骗，收取保护费。很显然他们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和黑手党有关系。俄罗斯是如此混乱和贫穷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老老实实地活下去……“你们西方人可能称这个为腐败，但是我们俄罗斯称为 nishinstvo，这个术语表示一个人由于非常贫穷而失去了一个人的羞耻感和道德界限，”一个

莫斯科的警察局长在那漫长的自由年代开始后的第一年这样说。[斯特林（Sterling），1994，第 81 页]

这不是因为俄罗斯人特别愤世嫉俗或者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使他们变得自私，而是因为缺失法律规范。为了能以服务社会的方式运行，必须存在一个能创造责任和信任网络的法律规范。然而，这些规范随着与旧制度的快速决裂而被摧毁。

### *有组织的犯罪*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经济衰退和 1991 年后的苏联解体使得法律和秩序遭到迅速破坏。警察部队的士气以及政府向其成员支付工资的信心都出现了下降。随着旧的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道德环境急剧变化。以前的公众道德的仲裁者——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在几年时间里，社会氛围从致力于集体主义和社会保障变为高度重视个人主义，社会对于弱者的保障急剧减少。生活水平的广泛下降和贫穷的增加也促使了道德评价的变化，因为彻底的绝望使得很多人走向犯罪。据报道，在改革期间，自杀率从 1986 年的 7.4‰上升到 1991 年的 15.2‰，到 1992 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 22.8‰。[爱尔曼（Ellman），1994，第 332 页] 1992 年的自杀率水平使得俄罗斯确定地成为高自杀率的国家，因为这个自杀率大约是美国的 2 倍，也高于其他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巴西。（爱尔曼，1994，第 333 页）

一件更加难以评价的事情是非法组织的重要程度，简单地说就是指“黑手党”的重要程度。强大的犯罪集团在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已经存在，他们主要是在黑市活动。这些集团集中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的私有财产，因此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有着独特的获利优势：“当俄罗斯
260 在 1992 年开始向市场靠拢时，这些犯罪集团是少数几个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他们不仅有机会像黑手党在意大利南部所做的事情一样暗中破坏现有的结构，而且他们甚至会在重建过程中买下整个国家。”（《经济

学人》，1994 年 7 月 9 日）

改革期间，他们通过犯罪获得财富的最重要的一条渠道是借助于原材料的出口，包括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另外，出口的物品还有在武装部队处于完全混乱和幻灭时期所拥有的大量武器。而且，毒品的产量和出口也在飞速增长。

政府的政策也助长了这种趋势。第一是“合资企业”，建立合资企业的本来意图是：“外国专家和资本”与本国的国有企业联合并通过合资企业的方式使某些部门“现代化”。这导致了某种原材料的生产和交易被垄断。第二是授予企业开发某一地区的某一自然资源的权利。第三是许多稀有铁矿石出口需要出口许可证。直到 1994 年，叶利钦仍然拒绝取消最重要的一个产品——石油的出口许可制度：

> 由于他最近的决定与其在 7 月 1 日前所承诺的不一致，即没有废除原油出口配额，政府承诺反对滥用职权的改革的可信度受到质疑。这个可以增加税收和减少腐败根源的重要的制度改革，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至少推迟到 1995 年 1 月……这对某些利益集团来说只是放弃很少的利益，叶夫根尼·亚辛（Yevgeny Yasin）教授——波利斯·叶利钦总统的主要经济分析师——这样解释。（《金融时报》，1994 年 7 月 16—17 日）

那些能从政府官员处获得必需的出口许可证的人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第四是政府将许多原材料的购买价格维持在强制的低价格水平，最突出的是原油，表面上是为了确保工业的关键原材料投入维持在可以负担的水平上。实际上，这为套利提供了便利。

大量的，并且其中许多是非法的原材料和贵金属的出口在这段改革时间里发展起来。1993 年，原材料出口中原油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占了俄罗斯出口额的 80%。通过特许权，许可证和合资企业，从这个 261
大规模的交易中获得的巨大的横财被转移到小部分人手中。在改革的

前几年，许多财富通过这种方式大量集中。这些人中包括安德烈·丘古耶夫斯基（Andrei Chuguyevsky），他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中的一员，他赢得了俄罗斯的大型铜矿乌多坎（Udokan）的特许权。（《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这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与英国在伊丽莎白执政时代发生的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非常相似，那时一些贸易公司获得了垄断的特许权。［道布（Dobb），1947，第 5 章“资本积累和机制”］

一些作者认为犯罪组织，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犯罪组织是这个过程的核心。有一种论断认为：“在俄罗斯的黑手党所涉及的职业中，至今为止最大的是通过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狡猾的欺诈来掠夺经济利益……一个崩溃的国家向国际世界敞开了大门……一大批国外的利用动荡局势谋利的人、投机者和各种各样的蛇头在俄罗斯开始向往西方时立刻出现了。”［斯特林（Sterling），1994，第 93 页］该论断认为大规模的黑手党团伙已经控制了俄罗斯的大部分经济生活：“毫无疑问，这个被称为黑手党的政治—犯罪的联合体实际上将会控制莫斯科，全俄罗斯以及其他共和国的生活。”（斯特林，1994，第 88 页）1993 年，叶利钦自己声称：“有组织的犯罪已经成为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引自《经济学人》，1994 年 7 月 9 日，第 19 页）叶利钦在其所承认的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报告中绝望地指出：“俄罗斯是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或报摊都需要向敲诈者交钱。”（引自《经济学人》，1994 年 7 月 9 日，第 19 页）

### 以政治为中心

新俄罗斯的前两年半的政治主要是总统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随着新宪法中的权利划分的斗争，重新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行政机构的任务被完全忽略了。这是个巨大的灾难。国家在经历了巨大的国家危机后进行恢复性经济重建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朝鲜战争后的韩国（1953）或者 20 世纪 60 年代与马来西亚分裂后的新加坡等，都以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行政机构作为它的中心任务。

1990 年 3 月，俄罗斯在相对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了议会。议会中没有为特殊利益集团保留特殊席位。老的遴选过程——即由地方选举委员会判断哪个候选人可以进入投票表决——在 1990 年被取消了。任何被居民提名的候选人，或被某一工厂和机构选出来的候选人都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选票上。到 1990 年，公众对共产党官员的敌意上升到最高点。如果候选人在选票上写明反对共产主义那么就有极高的机会获胜，即使他们以前是共产党员。到 1990 年，共产党已经变成一个宽泛的教会，其中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市场主义者、右翼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大部分成员，可能有 2/3 的成员倾向于市场改革，而不是试图将时钟倒回至斯大林主义体制经济时期，尽管大约 85% 的成员是名义上的共产党员。①

选举没有为选民提供一个清晰的选择。现在没有一个大型的、稳定的政党可以给选民一个清晰的选择。选举实质上面对的是拥有很少的选举知识的大众。几乎每一个俄罗斯人都希望“改革”。但是“改革”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案。有意义的投票需要对替代选择有清晰的鉴别。

议会自身在 1991 年春天开始设立行政总统的职位。当叶利钦在 1991 年 6 月被选为俄罗斯的总统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或政治纲领。他被选为总统主要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和他代表了一个戈尔巴乔夫的替代人选的事实：“叶利钦的主要优势当然不是他的主张更有诱惑力，而是人们对于戈尔巴乔夫的憎恨。很难想像一个人可以同时被每一个人，从教授到看门人，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反犹太主义者反对。叶利钦呈现的不是‘仁慈的沙皇’（或者更准确的词‘聪明的专制君主’）而是人们除去戈尔巴乔夫的愿望。”［卡加里特斯基（Kagarlitsky），1992，第 117 页］“八月政变”以来，叶利钦很明显没有建立政党或与任何政党合作。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1994 年秋天），他试 263

① 参见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在《卫报周刊》（*The Guardian Weekly*）上所作的详细介绍（1993 年 3 月号）。

图将自己独立于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团体的激烈争论之外。

**国际社会**

1990 年后很短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突然试图公开实施经济改革的休克疗法方案。叶利钦刚成为独立的俄罗斯的总统，就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休克疗法是正确的道路。他任命年轻激进的顾问，例如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在他周围担任高级职位。国际组织在形成政策建议中也拥有了持久的重要作用。来自于组织——例如福特基金和瑞典政府——的外国援助计划提供了独立顾问，例如安德斯·阿斯伦德、理查德·雷亚德、戴维·利普顿、杰弗里·萨克斯这些人与叶利钦的国内经济学家亲密合作并制定经济政策："此举基本上是对俄罗斯政府的一种技术支持。"① （阿斯伦德，引自《转轨》，vol. 3，1992 年 11 月 10 日，第 5 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团队也紧密地参与其中。采纳这些建议者的建议是获得资金支持的正式条件。许多倾向于更加谨慎和渐进的转轨过程，并且认为政府要发挥重要作用的改革者被排除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他们被认为是"反对改革的强硬派"。

许多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和强大的外国顾问团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外国专家带着西方经济体的高技术水平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拥有高收入、顶级的计算机、昂贵的衣服以及解决其他病态经济体的许多问题的经验。在俄罗斯陷入令人绝望的危机时，需要有巨大的能力才能抵御住这些专家所提出的吸引人的思想。与那些遵循"自由市场改革"路径的人——那些人有希望获得西方机构组织的访问学者奖金或者其他报酬，这些奖金和报酬是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政策立法的潜在约定的一部分——谈论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制定圈内的知识分子的买办思维并不是想入非非、胡言乱语。

国际顾问和叶利钦任命的俄罗斯人都十分支持经济政策上的激进

---

① 参见《转轨》，vol. 3，1992 年 11 月 10 日，第 5 页。

的“休克疗法”道路。这使得曾经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倒数第二个阶 264
段流产的“500 天”计划获得实施。

### 叶利钦和议会的冲突

对于叶利钦来说，不幸的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代表希望改革经济，但他们不赞成实施叶利钦的“休克疗法”。因此，这段时期充满了针对经济计划的持续的斗争。这影响到了对部长的任命、预算、允许的预算赤字和基本的经济改革立法的颁布。

“八月政变”之后的两年内，叶利钦和议会之间的冲突逐渐增强。1993 年 3 月，叶利钦宣布了他的忽略议会并由总统令加以管理的打算——“无论用什么有意义的语言讲，这都是选举的专政……这是鲍里斯·叶利钦的第 18 个雾月，无论在何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将会是立刻的愤怒。”（乔纳森·斯蒂尔，《卫报》，1993 年 3 月 28 日）叶利钦放弃了直接面对，但最后在 1993 年 9 月/10 月的时候，通过首次暂停议会并凶狠地攻击俄罗斯议会大厦“白宫”的方式再次奋力向前。

西方政治领袖全部支持暂停议会以及后来的暴力攻击俄“白宫”，这个过程中大约有 200 人被杀。镇压议会与叶利钦是否具有进行快速的经济改革的能力之间有清晰的联系，因为议会中的“强硬派”几乎全部宣布将会阻碍这个改革。人们普遍认为，议会不能代表俄罗斯民众的观点，因为该议会是在共产党倒台之前和苏联政治解体之前选举出来的。西方力量的领导者、大型国际组织的领导层以及西方的大众媒体对于冲突和解决方案的解释都出奇的一致。1993 年 9 月 25 日，暂停议会之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的财政部长召开会议“表示他们强烈希望”上周的政治发展将会“帮助俄罗斯在市场改革道路上获得决定性的突破”。部长们“称赞了叶利钦总统的致力于追求市场导向的改革的决心，他们认为这将会给俄罗斯人民 265
创造更好地未来，并使俄罗斯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金融时报》，1993 年 9 月 27 日）。

攻击过后不久，俄罗斯财政部长就访问了华盛顿并“鼓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希望就前三个月严重偏离轨道的经济政策做出决定性的改变”（《金融时报》，1993 年 10 月 6 日）。1994 年政府经济工作计划中宣布了大量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贸易和能源价格的自由化、加速私有化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方面”（《金融时报》，1993 年 10 月 6 日）。政府有信心在 12 月的选举中出现倾向于改革的大多数，这将使受到顽固的议会延迟的休克疗法方案顺利通过。

经过对议会的攻击之后，叶利钦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巩固他自己对权力的掌控能力。这些措施包括取缔反对派的报纸和许多政治党派（这些党派都是在当年的后半年的选举前出现的），在大众媒体上安排自己任命的人员，并试图迅速改变地方政策的性质，通过命令地方委员会解散，并将权力移交给“莫斯科委派的地区行政长官”，直到选举结束。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叶利钦拟定了一部全新的宪法。宪法赋予了总统对于议会（重新命名为杜马）的广泛的权利。总统有权任命总理，即使议会反对，仍然可以让其担任该职位。如果议会对政府投不信任票，那么总统仍旧可以在职 3 个月，如果议会重复这样投票，那么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总统可以否决任何由下议院的简单多数通过的法律，然后需要下议院的 2/3 多数的同意才能再次通过。宪法在当年后半年的（少于 1/3 的总选民）公民投票（选民的 53%）中，以最微弱的简单多数（少于投票人数的 60%）的投票通过。

### *1993 年 12 月的选举*

与所有西方预期完全相反，1993 年 12 月的选举给叶利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政党的选择比 1990 年的议会人民代表的选举相比更加清晰。现在代表与西方政党相联系的观点变得更加明了。由叶戈尔·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的选择”是激进经济改革的旗帜和典型。亚博卢（Yabloko）也承诺激进的改革，并且很显然有可能与人民的选择相连合。前者收到了 14% 的人民的投票，而后者只收到了 7% 的投票。这

对于叶利钦和激进改革者是一次羞辱性的打击。其他政党的吸引力主要为一个更加缓慢的经济改革方案，更多地关注社会贫苦人群的利益，例如共产党、劳动党和“俄罗斯妇女”等，他们收到了28%的选票。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巨大的，超过25%的人赞同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他的方案很模糊，承诺重塑俄罗斯的强权，结束犯罪和腐败，并“使每个公民获得良好的生活”。对于日里诺夫斯基的投票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同意继续进行激进的改革。最基本的是，他们对于前几年的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使俄罗斯遭受到的侮辱，以及对大多数的民众造成的苦难表示伤心。这显示了大多数西方领袖、西方媒体以及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很难了解的深层次的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准备支持给心爱着的那个改革者的政府的贷款”现在“已经消耗殆尽”（《金融时报》，1993年12月14日）。

### *暂时的撤退*

12月选举出现了惊人结果之后，叶利钦好像突然改变了他的道路。政府中的“休克疗法”的支持者或者被免职或者主动“辞职”，最主要的是盖达尔（第一副总理）和弗约多罗夫（财政部长）的离开。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离开，政府顾问团队中的杰弗里·萨克斯和安德斯·阿斯伦德也辞职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说新道路只包括了“西方市场经济因素”，而且向西方经济方式的呆板转变“导致的坏处大于好处”。（引自《金融时报》，1994年1月22—23日）他说新经济计划应该建立在“我们国家、人民和俄罗斯传统的特征之上”（引自《金融时报》，1994年1月22—23日）。

事实上，撤退只是暂时的。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最重要的变化——公共财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到12月选举为止事实上已经不能撤销了。叶利钦的职位已经被新的、更加权威的宪法所加强。而且，他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领导层和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并争取实施

"休克疗法"的转轨："西方国家应该继续支持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转轨……（叶利钦和他的同伴）的西方朋友必须支持他们继续进行改革，因为只有改革可以给人民带来经济利益的希望，这可以鼓励俄罗斯人抵抗共产主义怀旧心理的和国际分离主义。"（《金融时报》，《领导》，1993 年 12 月 14 日）最重要的是，他继续引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制定的政策，这个政策鼓励叶利钦和他的主要顾问，在 12 月选举的结果所导致的最初的震惊减弱之后，继续实施他们的改革道路。

### *前景和回顾*

在本书写作期间（1994 年秋天）情况仍然非常不稳定。很多国家在向"疯狂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进程中动荡不安。大多数人的收入遭受了巨大下降。大量不平等的私有化过程出现了（见下文）。法律和秩序被破坏了。每个人的生活比共产党执政时期更加不稳定。但是，没有出现社会崩溃，政治暴力的水平相对较小。确实，1994 年至今仍然相对平静。这种平静可以归因于 1992/1993 年人们面对大量发生的巨变时感到疲惫和困惑。其他分析家认为变化使得许多人对于政治组织没有清晰的蓝图，这些本可以鼓励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行动。新的"全民社会"仍然正在形成。

1994 年秋天，反对派在议会承诺了一个"长期的炎热的秋天"（《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4—25 日）。几乎所有的民意测验都显示"民主主义者的转变，民族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增加和保持，如果不是党的或个人的"（《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4—25 日）。但是，事实是反对派当时缺少清晰的可信的替代战略。国家机器已经支离破碎，拥有很少的资产，除了控制货币供应外，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政府拥有清晰的简单的改革前景，并且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的心理支持。在政府的思想中，既然已经走了这么远，那就没有理由再回头了。它希望最糟糕的情况可以很快过去。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情况很危险。更严重的潜在问题可能比过去几年显示出来的还要遭。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政治前景的可能的转变方式会很难预料。转变的可能性包括曾经出现的国家军事独裁和分裂成更小的国家，这会使得俄罗斯回到与 15 世纪相似的政治前景。这个也不是俄罗斯陷入可怕泥潭的最坏的结果。在一个更小的政治单位中，更容易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机构。小单位内的既得利益者的分歧缩小可能使合作的行动更加容易实现。

### 7.2.2 经济

#### 战略

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周围的国际顾问团队的影响只能靠猜测。但他们在叶利钦改革方案制定中的作用却已经非常清晰。主要的战略目标就是试图最终实施在戈尔巴乔夫当权时期被搁置的休克疗法（500 天）。这个政策由叶利钦在 1991 年 10 月 28 日的俄罗斯议会上的演讲中作了概括的论述。更加详细的内容刊发在“俄联邦经济政策备忘录”中，它构成了俄罗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的意向函的基础：

> 在 2 月的备忘录（和其他政策文件）中简略陈述的政策构成了向市场经济快速转轨的基本支柱（价格自由化，取消官僚机构对于经济活动的限制，国家工业的私有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以及请求西方经济的援助）。此政策由杰弗里·萨克斯提出，……他曾经是波兰和俄罗斯政府的主要的顾问。这个建议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支持，波兰政府在 1990 年 1 月采用的政策中也模仿了这项政策，这个政策被广泛地称为“休克疗法”。（史密斯，1993，第 177 页）

这个改革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快速地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就连价格稳定的重要性也被认为是第二位的。理查德·雷亚德，叶利

钦政府改革时期的亲密顾问评论说：

> 1992 年，俄罗斯重新发现了资本主义——该世纪的最主要的事件之一。但是许多人说改革失败了，因为通胀依然严重。这个思路是有缺陷的。俄罗斯的改革的目标是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价格稳定是另外的东西——任何政府都要制定的目标之一，不论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盖达尔团队的主要目标是经济的私有化。如果他们想获得较早的稳定，他们应该在几个月内被赶出办公室。他们妥协是因为他们面临权衡。（雷亚德，1993，第 15—16 页）

### *价格自由化*

按照正统的转轨理论的要求，大多数的价格在 1992 年 1 月 1 日已经摆脱了政府的控制。事实上，只有能源供应的价格受到中央政府控制，同时某些产品的价格，例如房屋、公共交通和一些食品的价格仍然由地方政府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第 5 页）在引入价格的改革方案时，叶利钦总统说：

> 现在到了进行彻底的、严格的和毫不犹豫的行动的时候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起点。情况非常紧急……一次性的市场价格的转变是一个困难的、被迫的，但是必须使用的方法。……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会有半年的困难时期，但是价格会在之后降下来，产品将会充满消费市场。像我在选举前的承诺一样，经济将会稳定，生活水平将会在 1992 年秋天逐步提高。[引自瑞基思基（Rakitskii），1994，第 32 页]

### *国际贸易*

叶利钦政府继承了“复杂的多重汇率、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不同的控制配额和有限的外币储备机制以保护可兑换的货币”（史密斯，

1993，第 188 页）。政府迅速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目的是使国际贸易和支付制度的自由化。1992 年 11 月，国家建立了面对居民的经常账户可兑换的制度，卢布允许相对自由的浮动（即存在一个“管理浮动”，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银行间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狂跌，俄罗斯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低于 500 美元[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85 页）

在 1992 年的一段时间内，根据正统的转轨理论，俄罗斯的出口领域几乎完全自由化。数量限制被废止，许可证几乎完全免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1992 年中期，新的关税结构被引进，大多数产品的关税在 5%—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但是，随着国内危机以及卢布的贬值程度的加深，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并没有增加出口和增强大多数国内工业的竞争。然而，这却增加了生产商对于他们的未来市场的担忧，因此破坏了投资前景。1994 年，增加有效的保护的压力大幅度增加。

几类重要产品的出口需要配额。这些产品包括原油、油气和其他碳氢化合物、天然气、非金属、制造非金属和合金的原料、硫黄、煤炭、磷灰石、氨水和木材。这些在表面上是为了控制国内价格。出口权主要不是通过招标，而是“大部分由经济部门直接向一些企业或地区销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39 页）而且，1992 年 6 月之后，出口这些“战略物资”需要办理许可证。战略物资的定义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广泛，包括重要的原材料、能源和贵金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39 页）另外，政府自身开始重新直接参与出口操作，用卢布直接从国内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并由国际经济关系部门直接决定哪个企业可以向国外出口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39 页）

---

① 当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的人均国民收入仍是较高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大约为 3 400 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85 页）

271 这些出口控制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免受资源劫掠。实际上这为那些在世界市场上掌握购买和销售稀缺产品的权利的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通过套利获利的环境（参见上文）。

### 农业

从第5章可以看出，苏联的农业部门雇用了绝大部分的劳动力，同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农业部门占据了总资本的绝大部分。我们也可以从中国经历看出，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是由农业部门的成功改革提供的。即使是在收入较高的前苏联的农业也是改革的关键部门：1991年，食品占据了苏联消费支出的约2/5的份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69页）。轻工业的最重要的投入是由农业提供的，工业的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来自农业部门。即使在美国，估计有占比多达38%的劳动力都参与到农产品的生产、处理、存储和销售等过程。[奈非多夫（Nefedov），1994，第52页]

但是，1991年之后，农业部门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与工业部门不同，叶利钦政府执政之后，农业政策出现了急剧的变化（见下文）；在1993年10月，总统通过法令最终实施了将集体和国有农场分割为私有的个人农场之前，农场的所有权领域的政策仍然不明朗。（世界银行，1994，第26—27页）在这个时期，农业土地的所有权领域出现了长期的斗争。1990年，苏联通过了一项法律，这个法律规定了将农场由国家所有向乡村集体所有的转变方法。大多数乡村集体都通过一种或另外一些形式完成了转变。这项法律也赋予了农民从集体土地和其他资产中获取他们的股份，以及建立他们的私有农场的权利。

但是，很少有农民能够这样做。到1993年为止，只有8%的农业土地属于私人所有。（世界银行，1994，第42页）在一些村庄，乡村
272 政府拒绝允许一些人从村资产获得他们的份额，然后离开。但是，其他因素似乎更加重要。对于私有土地可以流转的条件，有许多立法经常互相矛盾，这反映出关于该事情的讨论的激烈程度。对于出租或销

售土地、限制农业资产大小、土地向亲属遗赠、使用土地作抵押以及在农场中的雇员的工资等各方面都增加了条件。而且，政治氛围是否会变化，整个立法体系是否会被推翻等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克赛立夫（Keselev），1994，第 75 页] 直到 1993 年 10 月，对土地所有权的严格恪守的制度框架才最终建立。

在叶利钦执政的最初三年，很多时间浪费在讨论所有权的问题上，而没有致力于提高资产运营的方式。像中国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国家不需要通过拍卖的方式或者像俄罗斯一样，通过将土地所有权向村民赠与的方式进行土地的私有化。经济可以通过与农民个人签订合同的方式让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从而获得改善。而且，这种方法可以防止乡村资产所有权产生两极分化，并且可以保护村庄通过使用村民的土地获得资金。

但是，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不是阻止农民离开集体和国有土地而建立个人私有土地的主要因素。缺少使用机器的途径和资本是促使农民离开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1994，第 3 页）土地比非土地资产更加容易分割。据报道，1993 年新出现的私有农场中，每 100 个农场中只有 23 辆卡车和 55 辆拖拉机。（克赛立夫，1994，第 75 页）

在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 1992 年年中所作的一项调查的反馈中列出了以下的阻止农场增长的因素（括号中为回答的百分比）：农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的高价（80%）；特殊装备、建筑材料、种子、化肥和其他技术物资资源的短缺（66%）；信贷的高利率（51%）；土地法和农业法的长期的不确定性（46%）；获得信贷的困难（45%）；缺少对农民的法律保护（42%）；缺少公路和交通，以及水、天然气的供应网络（41%）；集体/国有农场领导权的阻碍（23%）；农村人口对于个体农场的反对态度（15%）；农民缺少特殊的知识（15%）；医疗、儿童上幼儿园和上学、缺少商店等的苦难（14%）。（克赛立夫，1994，第 75 页）

与中国农村改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际上俄罗斯政府没有努力 273
发展一种为农民提供大型机械的有效方法。相反他们的政策设想是如

果所有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所有其他问题将会按部就班地解决。这种方法在农业部门比在工业部门更加不合适。不论是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农业的特征是存在着大量的市场失灵。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俄罗斯的农业部门需要在机器供给和服务方面进行广泛合作，因为这些合作超过了个体农场的能力。中国农村改革则在耕地直接经营的水平上保持了基础设施的共用和合作，并且寻求提高供应的有效性的方法，当然也不是完全成功。这些在合同制度下慢慢出现。对于俄罗斯在这方面的巨大失败的唯一可以指责的地方是由于经济情况的艰难导致政府缺少资源。如果俄罗斯的农村有丰富的非农业资本，那么尽管这些资本有许多不合格和质量上的错误，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改善供给的关键是改变现有的向农民提供生产要素的供应方式以便使之更有效。

然而，不幸的是，在改革期间，俄罗斯的农业领域有许多比制度缺陷更为严重的问题。20 世纪 20 年代的价格自由化时期，对农民不利的跨部门贸易条件被允许。农场生产的产品具有相对的竞争力，但是更加垄断的工业原材料的供应使得农业部门的供给价格有了相对较大的增加。（奈非多夫，1994，第 56 页）

而且，还有许多严重的需求方面的问题。改革时期的平均收入伴随着人均消费农产品的迅速减少而下降。大部分的“优良的”食物产出，例如牛奶、鸡蛋、鱼、肉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急剧下降。（表 7.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第 87 页）劣质的食物代替了质量较高的食物。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逐步下降后，谷类和土豆的产量开始增加。（表 7.2）很自然地，当食物产出急剧下降时，下降的幅度比非食品的轻工业产品要小，因为消费者用基本食物的消费代替了非必须的非食物的消费。

但是，对于非食物的农业产品（工业投入品）的需求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逐渐贫穷的消费者用食品代替了他们的消费篮子中的其他东西，对于非食物产品的需求，例如鞋类和纺织品的需求甚至

274

比对于食品的需求下降程度还大。（表7.3和表7.4）因此，对于工业投入品——例如棉花和羊毛——的需求和产出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表7.2）

**表7.2　俄罗斯的主要农产品的产出**

| | | 年度最大产量 | | 1991 | 1992 |
|---|---|---|---|---|---|
| | | 年份 | 产量 | | |
| 肉［（屠宰后）畜体的重量］ | 百万吨 | 1989 | 18.9 | 17.4 | 15.1 |
| | 指数 | | 100 | 92 | 79 |
| 牛奶 | 百万吨 | 1990 | 101.5 | 94.9 | 84.8 |
| | 指数 | | 100 | 93 | 84 |
| 蛋 | 10亿个 | 1988 | 81.4 | 76.4 | 67.5 |
| | 指数 | | 100 | 94 | 83 |
| 羊毛 | 千吨 | 1989 | 472 | 435 | 384 |
| | 指数 | | 100 | 92 | 81 |
| 谷物 | 百万吨 | 1978 | 218 | 155 | 191 |
| | 指数 | | 100 | 71 | 88 |
| 土豆 | 百万吨 | 1973 | 102 | 62 | 71 |
| | 指数 | | 100 | 61 | 70 |
| 原棉 | 百万吨 | 1980 | 9.1 | 7.8 | 6.5 |
| | 指数 | | 100 | 86 | 71 |
| 糖用甜菜 | 百万吨 | 1976 | 99 | 65 | 59 |
| | 指数 | | 100 | 65 | 59 |
| 向日葵籽 | 百万吨 | 1973 | 7.4 | 5.6 | 5.5 |
| | 指数 | | 100 | 76 | 75 |

**资料来源**　奈非多夫，1994，第53页。

令人毫不吃惊的是，由于面临产权的不确定、农业大型投入的供应制度的无望和不合时宜、大多数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下降以及跨部门贸易条件对农业部门的不利，农业部门对非农输入品的需求有了急剧下降。仅仅在一年时间内（1991—1992），独联体（CIS）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产出下降了25%，割草机和马铃

薯收割机的产出下降了34%，亚麻收割机的产出下降了50%。（奈非多夫，1994，第56页）但是，相对于农业机械的需求下降来说，更加使人担心的是对化学肥料的需求的下降。独联体的化肥产出从1988年高峰时期的3 530万吨下降到1992年的1 930万吨。（奈非多夫，1994，第55页）而且，大约1/3的产出是出口。（奈非多夫，1994，第55页）

275

表7.3　1992年2月俄罗斯的工业产出指数（1989年取100）

| | | | |
|---|---|---|---|
| 汽车 | 97 | 成型木材 | 75 |
| 电视机 | 80 | 纸张 | 80 |
| 洗衣机 | 100 | 棉纺织品 | 90 |
| 鞋 | 78 | 合成纺织品 | 63 |
| 机床 | 75 | 黑色金属（铁） | 70 |
| 卡车 | 80 | 水泥 | 80 |
| 拖拉机 | 60 | |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1992，第14页。

表7.4　俄罗斯所选产品的产出（%）

| | | | |
|---|---|---|---|
| 植物油 | 93 | 牛奶 | 42 |
| 冰箱 | 95 | 机床 | 61 |
| 电视机 | 89 | 化学纤维 | 69 |
| 汽车 | 99 | 纺织品 | 50 |
| 天然气 | 96 | 鞋 | 44 |
| 石油 | 77 | 拖拉机 | 50 |
| 钢铁 | 77 | 录像机 | |
| 肉 | 65 | 录音机 | 84 |

**注释**　数据为1993年产出占1991年产出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Goskomstat）。引自《经济学人》，1994年1月15日。

## 非农部门的私有化

从前一节可以看出，由于苏联共产党的下台以及物资平衡计划体

制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早期，对于工业资产的实际控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资产使用和来自这些资产的收入分配的更多控制权已经转到经理和地方政府的手里。

经过激烈的讨论，私有化法案最终在 1992 年 7 月获得通过。叶利钦在私有化方案中表达的官方的民粹主义者情怀如下：“我们需要上百万的所有者而不是上百个百万富翁。”（引自威尔，1993，第 2815 页）这是激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核心部分。私有化过程中的大多数援助 276
是由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有部门投资分支提供。（《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产生了像俄罗斯政府的顾问——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所骄傲宣称的“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的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政府的一个月的私有化程度比撒切尔夫人在十年内的私有化的程度都大”（理查德·雷亚德引自《金融时报》，1993 年 10 月 6 日）。据估计，到 1994 年年末，大约 70% 的国有资产将会转移到私人所有，而 70% 的工人将会在私有部门工作。（《金融时报》，1994 年 6 月 20 日）

**中小企业**[①] 这些企业的“私有化”采取了和大型企业完全不同的方式。俄罗斯联邦共有超过 100 000 家小型企业和大约 130 000—140 000家中型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48 页）几乎所有的小型企业都集中在零售、消费服务和公共饮食业。然而，在中型企业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制造业企业。[②] 在私有化之前，这些企业中的大部分都由市政府所有，因此私有化的过程是由他们主持的。

私有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高速进行。私有化或者通过招投标完成或者通过拍卖完成。在地方的私有化过程中“雇员可以按照十分优惠的条件购买他们的公司，包括以 30% 的折扣赢得投标或拍卖和三年

---

① 小型企业是指自 1992 年 1 月 1 日起雇员少于 200 人，登记的固定资产少于 100 万卢布的企业。中型企业指的是自 1992 年 1 月 1 日以来雇员人数在 1 000—2 000 人之间，登记的固定资产在 100 万—5 000 万卢布之间的企业。

② 我没能查到准确的数据。

内支付75%的购买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48页）。据记录显示，大部分（约60%）的私有化的企业由“他们的工人”集体购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48页）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雇员没有能力支付低达25%的款项，他们只是作为私人投资者的代表，这些投资者希望以给雇员的低价的优惠条件购买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48页）而且，因为缺少足够的财政资产，普通市民很少可以参加对大多数的，不是集体出售给工人的中小企业的投标。

很明显，我们很难调查犯罪者在多大程度上参加了私有化的过程并从中获利。然而，大家广泛同意的意见是犯罪者确实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此大的资产转移发生在法律和秩序大规模解体的时期。一种对莫斯科的资产私有化的描述如下：

> 私有化的规则随时改变，经常遇到有特别偏好的官员，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没有可以表达意见的资金。在大约一个星期内，黑手党控制了整个城市……在那里，一般的行贿在财产接收过程中失效了，黑手党必须实施小小的暴力手段。为了得到首都最受欢迎的国营食品和家庭用品商店，他们只是将所有参加投标的雇员，整个下午锁在家里……最后，莫斯科的资产只卖了2亿卢布，而该城市的预期收益是16亿卢布。当被问及对整个盗窃事件的态度时，城市委员会私有化委员会的领导反应是：“为什么不呢？如果黑手党可以维持法律和秩序，出售商店的食物和清扫地板，那么我将支持黑手党。”（斯特林，1994，第86页）



**大型企业**　大型企业私有化的第一步是将他们迅速转换成能够公共交易的股票和董事会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公司”。最初从技术上说，他们属于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GKI）所有。私有化将“国有”资产的分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不同的选择决定，总

值大约为公司股票价值的 50%—60%，包括分配给全体公民的股份，每个人配发 10 000 卢布的凭证，他们可以选择购买企业或者只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出售。另一部分包括的股份将会免费或以一定的折扣卖给企业的经理和工人。这个过程有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公众对于 20 世纪最重大的变革过程完全没有准备。通过对当时第一次分发的私有化凭证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民众对于私有化凭证的目的和性质的解释的大部分都不太理解："人民读到、看到和听到的材料都是抽象化、理论化的。宣传的目标群体是初步接触到市场制度的官员或者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但是普通的居民对于怎样处理他们收到的私有化凭证都非常迷惑。"［塔普利娜（Tapilina）等，1993，第 27 页］

第二个问题是私有化的理想形式明显有利于工人/经理全面收购。而且，由于股份通过拍卖向外人出售的事实，增加了此过程中的工人/经理收购前景，因为"内部人员"有很大的优势，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关于企业前景的知识，而且他们自己可以通过从企业资金中预付他们的贷款而增加他们对于企业的控制。通过对 1993 年进行的自由化的案例研究发现，在部分私有化过程的公共拍卖中，"内部人员"持有公司所有权的事例大幅增加。［巴克（Buck）等，1993］工人/经理收购有利也有弊。这创造了多样性的激励，即不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为了风险的最小化。这样会为了使该组织的现有人员的人均收入最大化，而导致最低程度地增加雇员。一名参与过该过程报道的世界银行的官员称："私有化是朝向私有公司卖出的一步，但是这些'私有化'的企业即使在五年内也不会像西方的私有公司一样。"（引自《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

第三，这个制度有许多内在的不公平因素。这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允许社会的一部分人相对于那些没有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他们现在获得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他们"的企业的实际拥有人的利益。大部分的资产免费或者以极低的折扣（已经被

低估的价格）分配给他们，他们只是占了总人口的一半的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至少有一半的成人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不包括罪犯、军队的军人、官员以及服务部门的工人："私有化方案的三个主要变量'显示俄罗斯政府对于工人和经理的极大的慷慨不是出自改革者的'善心，而是对政治现实的承认。"（布兰查德等，1993，第67页）

第四个问题是私有化发生在企业、公司或工厂的层次。这个与创造国际性的有竞争力的多角化的大公司有很大的不同。在计划经济的垂直链条下运行的结构陈旧的工厂中形成一个合理的、有竞争力的公司需要很长时间。在一个前共产主义经济体中建设有竞争力的公司不仅需要转变之前工厂里的许多生产单位，同时还要创造和其他业务相关的新联系，以便凭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利。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计划机构可能需要发挥必要的作用。纯粹的"被动的"私有化，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崩溃的条件下，不可能迅速建立一个可以与大型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竞争的公司。



第五，资产估价在实际运作上有困难。在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不稳定的情境下，同时在一些重要的价格仍然被政府控制的条件下，私有化的资产的价值很难确定。例如，私有企业的资产价格的关键决定因素是该企业直接面对国外竞争的程度。在1991—1992年进口完全自由化的最初阶段之后，俄罗斯政府又迅速重新引入了关税，但是该时期（1992—1993）关税仍然在一个普遍较低的水平。1994年早期，政府宣布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制造产品征收"严格的"关税。这个与中国持续而明确地承诺通过长期的转轨阶段来保护工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六个问题是为了给内部人员提供资金支持，出现了低估资产价值的现象。大量的证据证明，在私有化过程中有许多与资产的长期价值的合理估计相比明显低估的资产。（巴克等，1993；布兰查德等，1993，第71页）这导致了巨大的收益被新的所有人所有，大部分的份额都被"内部人员"获得。这批来自西方的外国顾问遇到了与他们国

家完全不同的情况。近年来在他们国家，在一个相对有效的法律框架内，出现了相对规模较小的、有序的私有化过程。在俄罗斯，私有化的资产价格由当地政府机构决定。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这个政治化的过程主要是指当地政府，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前共产党成员，他们和工厂的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资产价格的主要方面正是由他们决定。而且资产价值的估价，像后戈尔巴乔夫时代的俄罗斯的其他社会过程一样，是在一个没有相关法律的框架下发生的。即使存在相关法律，也不会有任何效力，因为公共安全机构已经瓦解：克格勃处在“一种贫穷和被清理的状况中”，而军队则为了应对“陈旧的电话、老式的巡逻车、没有天然气、没有电脑、没有经费的”的境况而顾不上其他。（斯特林，1994，第 87 页）

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在政府的最高领导层中也出现了政治腐败的现象，这种事例可以从前莫斯科的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Gavril Popov）的例子中看出：

> 1991 年 11 月，市长（波波夫）实际上将首都的一个完整的地区签字给了一家名为 UKUSO 的法—俄合资企业，而他和市经济部长被指责拥有该公司 40% 的股份……“十月”区包含 400 万平方米的高质量的物产，从广大的高尔基（Gorky）公园到 Gagarinsk 广场，其中有学院、修道院、医院和 22 000 居民，包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个地区的价值大约为 300 亿美元，而 UKUSO 仅仅以 10 美元/年的价格承租了 99 年……波波夫最终被免职了，但是从来没有被带上法庭，因为像前苏联的 250 万政府官员一样，他有官方的无条件的豁免权。（斯特林，1994，第 86—87 页）

280

维克多·爱里有特金（Viktor Ilyutkin），杜马安全委员会的主席称犯罪者现在控制了私有企业的 81% 的投票权。（引自《经济学人》1994 年 7 月 9 日，第 19 页）我们很难定义“犯罪”，甚至很难获得关

于这些事情的准确信息。然而，可以非常确定的是私有企业的部分重要股权已经多多少少带有犯罪因素。许多俄罗斯的“投资基金”只是“黑手党”活动的代表，“从投机活动获得的资金可以购买公司的股份以便获得管理权”。(《金融时报》，1994 年 4 月 5 日)

第七个问题是私有化发生在经济大规模的崩溃之时，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这会导致个人投资的短视和较高的投机动机。这种情况与饥荒时期的状况非常相似（森，1982），为了应对消费物资的短缺，越来越多的穷人大规模地处置资产。1992 年 8 月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2/5 的被调查人不知道怎样处置他们的私有权购买凭证，另外 2/5 的知道如何使用的人都打算“卖掉他们的购买凭证并用所得的钱购买需要的商品”。(塔普利娜等，1993，第 36 页）私有化购买凭证的供过于求导致其价格不断下降，这正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可以迅速积累严重被低估但长期价格较高的资产的原因。不论是私有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穷人，他们都为了短期的生存而以大大低于其长期价值的价格出售他们刚刚获得的股份。据报道，仅在 1993 年，就已经有 1/4 的公民
281 在公开市场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出售了他们的私有化购买凭证。(威尔，1993，第 2815 页）购买凭证以低于票面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几乎从购买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49 页)。尽管资产被大幅度低估，自由化购买凭证的交易在 1993 年年中的价格大约还是其票面价值的一半。(《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然而，随着价格水平的高度通胀的普遍到来，购买凭证的名义价格剧烈下降。实际上，在购买凭证发行后的一年时间内其价格下降了约 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49 页)

这个过程导致了高度集中的投机股权形式迅速出现，因为数量很少的新富有个人和投资公司①可以在私有化企业中迅速积累股权。这和

① 到 1993 年 1 月，俄罗斯约有 100 家得到许可的投资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 51 页)

大众凭证计划的鼓吹者对股权广泛分配的形式的天真想像非常不同。例如，大家熟知的是到 1993 年底，独自一个人［本杜基泽（Bendukidze）］按照当时的汇率仅仅用了 300 000 美元，就收购了大型的乌拉马许（uralmash）钢铁联合企业 28% 的股份。[①] 另外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制造伏尔加牌（Volga）汽车的吉斯（GAZ）工厂的董事利用国家专用的投资的课税扣除取得了对该公司的控制。他和 15 家代理公司签订了协议在公众拍卖中购买股权，从而控制了该公司的 30% 的股份。（《金融时报》，1991 年 2 月 23 日）据报道，财政部副部长曾经说俄罗斯的陈旧的法典没有包括任何对于吉斯董事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处罚的规定。（《金融时报》，1991 年 2 月 23 日）然而投资公司和大的个人投资者的目标不是运营这个他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俄罗斯面对困难环境时所购买的公司，或者从事他们知之甚少的业务，而只是简单地剥夺公司的资产。那些有机会积累资产的人一般都能以低得惊人的价格购买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

到 1994 年年中，公众对于私有化计划的支持已经崩溃。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被调查的人认为私有化是“法定的行窃”。大约 1/3—1/2 的回答者相信私有化是“为了钦点干部和罪犯的利益”。（《金融时报》，1994 年 5 月 9 日）

**资本原始积累**　负责私有化的副总理安那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说：“私有化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创造。”（引自《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这的确是私有化过程的结果。然而，新资产阶级的性质和英国伊丽莎白执政时的“抢劫时代”出现的资产阶级有很多相似之处（霍斯金斯，1976），而与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共财产自由化的凭证计划的热情鼓吹者所梦想的广泛分散的资产阶级化的形式有很大不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俄罗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而这个过程在西欧经历了几个世纪，因为资本主义所有权是从封建主义

282

① 私人通信。

中诞生的。马克思关于这个过程的著名的描述在俄罗斯私有化期间被广泛引用：

>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瓦解释放了前者的元素……这个所谓的原始积累不是其他什么而只是将生产者和生产方式分离的历史过程……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它最臭名昭著就是，征服、奴役、抢劫、凶杀（主要是暴利）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经济的曼妙编年史中，自古以来一直是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权利和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唯一的致富方式，现在只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根本不是田园牧歌式的。（马克思，1887，第 714—715 页）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的原始积累方法根本不是“田园牧歌”。这种方法使国家出现了巨大的资产分配的不平等，国家在此基础上走向了资本主义。像往常一样，经济学的“美好世界”简单地把这些看做是“给定的”经济制度的变量。并且，经济学家也把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离奇的不平等当成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差异的结果，是市民实践他们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可以轻松地忘记原始积累发生时的气味。由于“有点微臭的”想法已经过时了，那么他们可以习惯经济过程的客观分析。马克思的描述似乎可以像描述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一样描述俄罗斯现在的情况：

> 283 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中的作用和神话中的原罪的作用相同…… 很久以前，存在着两种人，一种人勤劳、聪明，并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外一种人懒惰、无赖，享受着物质生活，更严重的是生活放纵……因此，前者走上了积累财富的道路，而后者除了他们的生命没有其他可以出售的东西。从这个原罪的日期开始，大多数的贫穷的人，尽管他付出了所有的劳动，到目前为止

> 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出售，但少数人尽管很久没有工作，但是他们的财富还在持续增加。（马克思，1887，第713页）

许多俄罗斯的分析家，包括从中获益的新资本家认为这段时期具有“原始积累”的特征：

> 俄罗斯从1991年年末开始的改革被赋予了很多准确的名字：“改革者的突破”（B. 叶利钦），“跨入市场”（E. 盖达尔）和“针对人民的经济灭绝”（A. 鲁茨科伊）。这场改革也被称为“抢劫和被抢”。一个更加准确的科学的定义是资本的原始积累。（瑞基思基，1994，第32页）

快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使我们很奇怪地想起了霍斯金斯（W. G. Hoskins）关于修道院在16世纪的英国消失的评论：“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教堂冒领俸禄是英国历史上最基本的分配方法之一。一些人称之为严重的渎圣……更加现代一点的历史学家平静地称之为大转移；我倾向于称它为大掠夺，把它视为富人们共谋以联邦的名义获取他们自己的财富，不论他们公开或私下表示信仰何种基督教，当政治风向突然转变时，他们便从一边扭动到另一边。”（霍斯金斯，1976，第122页）

**什么样的资本主义？** 仅仅是私有权的建立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私有权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背景下存在，其中一些形式比其他形式更有利于它的发展。俄罗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创立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任何先例可遵循。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在现代 284
世界的和平环境中发生快速和无视法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在国家经济严重崩溃时产生——的例子。已经实施的市场经济被称为是“东方市场”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如果有乡土气息的市场特征在经济生活中不被肯定，那么将不会在“以后”出现任何形式

的成熟的文明——得意洋洋的犯罪的亚文化将会击倒文明的市场并使之窒息，而且会成为我们长达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的独特的经济基因。（斯塔利科夫，1994，17）

### 房屋

房屋自由化进行得并不快，可能是因为它是所有的私有化中最敏感的一部分。然而，在1992年，大约8%的住宅已经私有化了，其中的大部分都“无偿交给了居住的房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50页）住宅私有化的最快的过程记录出现在莫斯科，仅仅在1992年一年时间内，20%的住宅已经通过这种方式私有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第50页）这种私有化的方式表示当地政府放弃了增加租金或出售资产而获得收入的可能性。而且，这为那些前共产党官员提供了巨大的利益，因为这些房屋的分配与政治权利相匹配。因此，一方面位于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中心的拥有住宅的（虽然很小）党的前高级官员，收到了在国际市场价值可能为200 000美元的住宅。另一方面，在市郊的国有工厂的看门人，由于他们只有一个脏的，位置差的单人小屋，因此只会收到很少的财富。而且，更加贫穷的人将更有可能出售或抵押他们的资产以便在现在的困境中生存。

### 共和国之间的贸易的崩溃

苏联的工业结构，由于存在较高的大型专业化工厂的分工，使得各地区间存在相对较高的贸易。（表7.1）前苏联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平均占据了每个共和国的29%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但这只占了俄罗斯联邦的11.1%。相比较而言，欧共体内部之间的贸易比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1%。（世界银行，1991，第121页）

由上可知，苏共的倒台以及苏联分裂成独立的政治体使得共和国之间的贸易突然下降。这对那些主要依靠共和国之间贸易的共和国事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工厂不像“灰泥”一样，不能立刻有效地从为一个远方的工厂生产原料转为生产完全不同的产品。而且，一旦贸

285

易瓦解，许多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例如大部分的俄罗斯工厂只能在自己的全部生产能力之下运行，因此会提高生产成本。而且，他们发现很难获得他们现有工厂的原材料供应。这需要等待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和支付的重建。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共和国之间的极低的经济联系意味着，它的问题与大多数独立共和国——例如白俄罗斯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相比要稍微轻一些。

### *通胀*

“八月政变”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最后几年的允许通胀增速的政治压力加剧。这与大多数的拉美国家的形式相似（多恩布什等，1991），政府不能有效地收税，不能抵制住压力，即不能继续实施大规模的预算花费以便使境况不佳的企业在衰败的经济环境中生存，以便防止出现大量失业的政治危险。亚历山大·安德鲁耶夫（Alexander Khandruyev），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副行长，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完全停止信贷，那么我们的政府明天就会面临大规模的罢工。（引自《金融时报》，1993 年 5 月 27 日）

叶利钦政府在 1991 年 8 月之后已经认识到他们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恶性通货膨胀。然而，直到 1993 年与 1994 年之交，他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采取严格的决定，控制政府花费，限制通胀。理查德·雷亚德，俄罗斯政府的顾问之一，坦率地指出了这个事实：“民主排除了实施中国方法的可能……当工人可以罢工，而生产者可以自己制定价格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通胀力量的释放表明，如果他们遇到任何程度的财政和货币限制，将导致实际需求的下降，从而导致产出的下降。”（雷亚德，1993，第 26 页）按照雷亚德的观点，鉴于这种转轨的 286
政治环境，唯一的解决通胀问题的方法是放开失业率，让其有一个大幅度的上升：“在西方，失业水平决定通胀压力的程度，在俄罗斯好像也同样正确。现在需要充足的失业率以控制通胀。”（雷亚德，1993，第 28 页）

这种观点的矛盾之处是它获得了独裁主义的或多或少的明确支持。只有“皮诺切特风格”（Pinochetstyle）的政府才可能拥有严格限制政府花费，并接受失业率迅速上升的后果的政治意愿。这是1993年宪法努力实现的本质：即建立一个拉美的皮诺切特风格的新独裁主义的框架。尽管议会的大部分议员试图阻止这种措施，但是在新宪法下，只有总统可以在必要时，通过该措施以结束大规模私有化和控制货币供应，即使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失业。

这个争论已经回到了原地。西方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的原因是为了结束苏联的独裁统治。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引入“真正的改革”。现在这个论点成为：“只有在独裁的宪法下，‘真正的改革’才能到达他们理想的终点。”

尽管在1993年选举中出现了反对叶利钦的投票，俄罗斯议会既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党派也没有出现支持政府的多数派。而且，由于在私有化计划中积累了太多的动能，以至于不可能考虑转变它。急速的变化以及之前几年的政治斗争的精疲力竭已经使议会中的反对派完全泄气。而且，俄罗斯政府面临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的强大的压力。俄罗斯政府只有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目标，才能有机会获得迫切需要的资金。俄罗斯现在不再拥有独立的经济政策。它已经降到陷入深重债务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且需要被迫遵守国际组织制定的条件，忍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部长的讲话：

> 在一次与七国集团领导的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上，俄罗斯的官员被告知他们必须承诺在1993年将财政赤字减少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并减少货币当局的信贷规模的扩大……“我们必须决定俄罗斯的预算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德国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先生说。根据英国官员的说法，这得到了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大臣的回应，他说俄罗斯如果想获得更多的帮助，那么必须维持他们的改革政

策。(《金融时报》，1994 年 4 月 25 日)

这段时间，俄罗斯的货币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米歇尔·康德苏（Michael Camdessus）评论说：“几个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认为俄罗斯没有货币政策”和“没有预算等”。然而，现在俄罗斯拥有“非常严格”的高利率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停止分发信贷补贴。各种机构为了打压通胀也准备就绪。(《金融时报》，1994 年 4 月 22 日）通胀水平从 1993 年的每月 20% 下降到 1994 上半年的每月 10%。

1994 年夏天，俄罗斯政府受到了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压力，要求其保持严格的货币政策，要求其保持金融稳定并严格限制国有工业的预算。1994 年如山的国内企业贷款危机被广泛认为是跨越卢比肯河（Rubicon）而走向“市场经济”道路的最后一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参与，试图支持政府下决心面对不可避免的破产浪潮，这将是延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4 年早期所要求的政策的结果。如果政府坚持这些政策，将会带领已经陷入衰退的国有工业应对最后的致命一击。预示政府已经对国内游说集团的放宽货币政策让步的踌躇的信号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愤怒碰到了一块儿：“这些都令人非常不安，”一名官员说，“他们破坏了康德苏先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今年春天制定的游戏规则。”(《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19 日）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大的压力，以及明显的需要控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政府下决心沿着他们选择的限制通胀和“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的道路前进。政府的财政能力萎缩严重。而且，由于经济大萧条，税收基础已经大幅萎缩。1994 年的税收收益大约只占计划数量的一半。 288
而这个无情的降低通胀率的逻辑使得政府开支出现了进一步的大幅削减。

这种局面只是巨大的悲剧之一。上个十年的连续的政治和经济选择是严格按照正统理论要求所进行的转轨：政治改革，然后立刻是价

格改革，“紧密”地融入世界经济，快速地大规模地私有化。这些政策将俄罗斯带到了一个关口，在这个关口上所谓的俄罗斯经济需要应对的最后的致命一击有着荒诞的逻辑。在给定的条件下，这些条件正是遵循正统的转轨政策的结果，没有其他方式降低恶性通货膨胀。没有这些，已经陷入可怕的泥潭的经济很难出现增长。然而，贯彻这些政策，将会使苏联经济遭受最后的致命一击，并迫使大量失去定期工资的人在“非正式部门”走向贫穷。

不仅仅是工业受到了影响。为了保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政府的约定，政府“在每一项支出上都削减了开支……俄罗斯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卫生、社会保障、法律和秩序、教育等都缺少资金，由于拼凑、受贿或者就是放弃，这些领域的负责人被大大削减……苏联的大型组织（像莫斯科国立大学和波修瓦芭蕾舞团）已经变成废弃之处”（《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4—25 日）。

*外国投资*

新俄罗斯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呈现了显著的失败。报告显示 1993 年总的投资额只有 15 亿美元，到 1994 年，预计的数字下降到了 10 亿美元。截至 1994 年年中，报告显示的累积投资额只有 27 亿美元。（《国际先驱论坛报》，1994 年 6 月 28 日）报告显示中国仅在 1993 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就达到 220 亿美元。（《金融时报》，1994 年 1 月 24 日）有许多原因导致了俄罗斯如此差劲的表现。

经济前景暗淡。甚至连圣彼得堡的副市长，乐观主义者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在一次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告诉采访人说他认为“经济危机”最快也不会在 1996 年之间结束。（《金融时报》，1994 年 5 月 17 日）这一系列的事件很难吸引外国投资者向一个工业崩溃的城市进行长期投资。

经济环境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确定，包括一些关键的因素，例
289 如未来的保护水平。而且，即使到了 1991 年之后，法律框架还反复地

变化："从外国投资者的观点看，运行条件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变化是改革的最基本的缺点。"［阿斯塔波维奇和格里高耶夫（Astapovich and Grigori'ev），1994，第88页］

对外国直接投资最有吸引力的领域是石油和天然气。国际石油公司早已对俄罗斯的投资前景垂涎三尺，对他们来说，那是"他们的最后的重要的勘探机会之一"。然而，价格仍然受到控制，并且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所有权是不清晰的，同时随着"不确定性的普遍化，以至于不知道谁应该对猖獗的腐败负责"。工业领域的税收政策是"惩罚性的，并且总是在变化"。因此，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流入工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受到了嘲讽。原油产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6亿吨的峰值，降到1993年的3.5亿吨："没有什么比增加石油出口，这项至今俄罗斯最大的出口盈利项目，更有助于俄罗斯度过今后几年的经济风暴。不幸的是没有谁可以看得更远。"（《金融时报》，1993年5月27日）

对于外国投资来说，任何事情都以未来政府的政治趋向为转移。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立后的大部分的时间里，政治情况非常不稳定。外国投资者担心一个极度民族主义的政府上台后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由于和普遍的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相连的政治和商业风险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发展的不完善使得西方公司取消在俄罗斯的投资的可能性很高。"（阿斯塔波维奇和格里高耶夫，1994，第86页）

另外，法律和秩序的破坏以及集团犯罪增加的简单事实，使得运营的环境变得非常困难和危险。外国投资者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庭生活的状况比在大多数的国家都更加危险。

1991年至今，确实出现了外国投资，这些投资主要是组合投资和投机投资，原因主要是卢布的世界价格的大幅度的贬值使得俄罗斯的资产按照国际条件来说不可思议地便宜。雷亚德间接地解释了一个命题："股份非常便宜。如果你花1 000美元购买'凭证'，并和一份股份组合进行交换，你将会拥有每年可以产生20 000美元产出的资本（按照当前的汇率）。相似产出数额的股份在伦敦股票市场将会值5 000

290 美元。”（雷亚德，来自《金融时报》，1994 年 6 月 3 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莫斯科分行的领导对于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世界最大的综合能源系统的股票私有化的价格的评论是：“一家相似的生产同样千瓦数的公司在美国可以值 490 亿美元，在中欧可以值超过 300 亿美元。在这里，它只值 2 亿美元。世界对于俄罗斯资产的极度的廉价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引自《金融时报》，1994 年 4 月 5 日）据报道，到 1994 年秋天为止，每月大概有 2 亿美元的外国“投资组合”出现在俄罗斯。（《金融时报》，1994 年 9 月 24—25 日）这些不可能都是纯粹的“外国”投资。部分无法鉴定的资本是俄罗斯“生意人”重复利用的资本。他们用卢布购买资产（核燃料、贵金属、原油、天然气、药品和军火）通过合法或者经常是非法出口来获得收益，然后将获得的收益“再投资”到“外国”生意。接下来他们通过外汇途径购买卢布，然后用卢布购买低价资产的方式在俄罗斯“再投资”，接下来开始又一次的循环。便宜的卢布、价值低估的资产以及与不成形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诱惑对于投机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鉴于现在的卢布汇率，国外和国内的投机者发现购买资产然后出售就可以获利。出现有效的经营者和公司控制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阿斯塔波维奇和格里高耶夫，1994，第 99 页）

这与中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高且稳定的贸易保护下，中国国内需求持续增长了大约 15 年的时间。政府制定了合理的稳定的外商投资法律。政治经济的大框架非常清晰而且相对稳定。国家拥有十分有效的法律和秩序，这使得国家相对安全。

改革没有给俄罗斯带来资本的净流入，反而毫无疑问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净流出。在国家内部，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大众购买力不断下降、长期的政治环境呈现出巨大的不稳定性，大部分的投资资金掌握在少数的投机者手中，所有这些因素深深地损害了长期投资。大多数的资本外流是非法的。一项关于 1992 年的谨慎的估计表明，将近 1/2 的流出俄罗斯的资本是通过非法出口的方

式。[卡宁（Khanin），1993a，第19页] 即使政府希望加强监管，它也没有紧密监管国际资本运动的有效途径。国际金融协会估计在1993—1994年间至少大约有10亿美元/月的资本流出俄罗斯。(《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然而，由于“缺少俄罗斯政府的支持”，该协会无法完成其关于资本迅速流出俄罗斯情况的调查。该团队中的一名调查员说：“毫无疑问，我们报告的最终结果比预期的更加政治化。”(《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20世纪90年代早期，伦敦许多高价房都是由俄罗斯的个人购买，虽然“公司”和个人购买的界限很模糊：“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ir Gusinsky），最大的建设集团的领导，购买了伦敦和葡萄牙的地产，并注册为公司所有，以减少赋税。他说他特别喜欢切尔西地区。”（引自《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卡瑞尔（Carrier），一家奢侈品商店称：“在去年他们的俄罗斯顾客增加很多，他们购买手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通常都用现金。”(《金融时报》，1994年2月2日）

291

**结果**

**投资** 20世纪90年代早期，投资水平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1/2。（表2.6）卡宁估计仅在1992年，投资又下降了50%。(卡宁，1993a，第19页）这种下降速度在进入到1994年之后又增速了，据报道仅在1994年上半年，投资又下降了27%。(《金融时报》，1994年7月14日）极高的通胀、组织——这些组织曾经可以有效地使用新资本——的分解、需求的崩溃以及巨大产能过剩的出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投资的急剧下降导致了国家资本存量的加速陈旧。俄罗斯不是像中国一样迅速现代化其资本，后斯大林改革的最初10年的资本逐渐变得过时并逐渐恶化。

**贸易** 俄罗斯的改革方案与中国对比鲜明，俄罗斯的改革未能产生一个可以成功地在世界市场竞争的经济制度。记录在案的国家出口的美元价值从1990年的约630亿下降到1994年的350亿（预测）。

[史密斯新法院（Smith New Court），1994］俄罗斯与中国不同，中国可以迅速扩大出口升级工业技术水平，而俄罗斯进口价值的暴跌速度甚至超过了出口的价值下跌速度，从 1990 年的 8 400 万美元下降到
292 1994 年的 3 000 万美元（预测）。（史密斯新法院，1994）设备进口量仅在 1992 年就实际下降了 40%。（卡宁，1993b，第 15 页）

**产出** 在苏联解体之后，原本表现较差的经济绩效完全瓦解。产出直线下降，据报告显示，国民经济净值下降到 1989 年水平的 60% 之下。（表 2.6）一些估计显示有更大的下降。例如，卡宁认为 1992 年的国民产值低于 1989 年的一半。（卡宁，1993a）1994 年，预测国民生产净值将会再次下降 16%—18%。（《转轨》，1994 年 7 月—8 月）

能源需求急剧下降。俄罗斯的石油产出从 1985 年的 1 090 万桶/天下降到 1990 年的 700 万桶/天。（《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19 日）而且，原油的实际出口也呈现相同的趋势。国内原油需求仅在 1993 年就下降了 19%。（《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19 日）

1993 年，工业产量下降到 1989 年水平的 70%（表 2.6），并且在 1994 年将会再次下降 25%—28%（《转轨》，1994 年 7 月—8 月），这导致 1994 年的总产量仅为 1989 年水平的一半。即便是这种产出水平还主要依赖 1994 年企业间债务的巨大上升，而这种情况肯定不可能持续维持。

随着固定投资的下降，生产资料工业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截至 1993 年，机械工具的产出下降到了 1991 年水平的 3/5。（表 7.3）例如，1994 年上半年，机械工业的产出下降超过了 44%。（《金融时报》，1994 年 7 月 14 日）据推测，机械制造工业的产出在全年将会下降 42%—44%。（《转轨》，1994 年 7 月—8 月）

现在的情况不是将旧的重工业部门的“朽木”通过“外科手术”一次性切掉。现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产出都同时出现了很深的衰退现象。主要工业消费品的产出急剧下降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1994 年一季度，糖、鞋类、纺织品和衣服的产量”（《金融

时报》，1994 年 5 月 9 日），在 1991—1993 年大幅度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 1/3—1/2。（表 7.4 和表 7.5）

俄罗斯正在经历猛烈的后工业化运动。据报道，截至 1994 年上半年，服务部门的产出在 GDP 中的比重超过了 50%。（《金融时报》，1994 年 7 月 14 日）工作向服务部门转移是工业部门崩溃的必然结果。制造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暴跌。大部分的劳动力把他们的工作和相对应的收入重新定义为企业的压榨。1993—1994 年间，大部分的制造业已经停止向劳动力支付工资或者只是间歇性地支付工资。虽然从技术上说大部分的劳动力仍被雇用在国有企业，但是大部分的劳动力已经永久性地或者暂时性地转移到服务部门。



**表 7.5　中国和苏联的零售价格指数（年度变化百分比）**

| 年份 | 中国 | 苏联 |
|---|---|---|
| 1978 | 0.7 | 0.7 |
| 1979 | 2.0 | 1.4 |
| 1980 | 6.0 | 0.7 |
| 1981 | 2.4 | 1.4 |
| 1982 | 1.9 | 3.4 |
| 1983 | 1.5 | 0.7 |
| 1984 | 2.8 | −1.3 |
| 1985 | 8.8 | 0.7 |
| 1986 | 6.0 | 2.0 |
| 1987 | 7.3 | 1.9 |
| 1988 | 18.5 | 2.3 |
| 1989 | 17.8 | 2.3 |
| 1990 | 2.1 | 5.4 |
| 1991 | 2.9 | 98.4 |
| 1992 | 5.4 | 1 292 |
| 1993 | 13.0 | 1 226 |
| 1994 | — | 457* |

**注释**　* 为预期。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 237 页；《北京周报》，1994 年 8 月 14—20 日，卷 37（11）。苏联，联合国：《欧洲经济概览》，1989—1990，第 392 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4 年 5 月，第 119 页。

**雇用结构**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俄罗斯经济崩溃对于实际收入的负面影响被明显夸大了，因为这种看法忽略了服务部门雇员的大量上升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之所以有所忽略，是因为这些方面的数据很少。这种观点完全误解了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俄罗斯服务部门活动增加的性质。事实上，这种观点只是简单的同义反复：如果工业领域的正常的工资雇用崩溃，并且“社会安全网”还不存在，那么为了生存，人们必须在服务部门工作，尽管那样做意味着，他们每天站在街角很多小时等待乞讨。“社会安全网”很难在俄罗斯存在。例如，1992 年基督徒行为研究和教育机构（CARE）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俄罗斯的平均养老金水平低于世界银行估计的最低的营养维持水平。大部分接受调查的人有慢性病或牙齿的问题，这些病会影响他们的进食。[引自爱尔曼（Ellman），1994 年，第 341 页] 在如此低水平的“社会安全网”下，任何有劳动能力可以出售的人都被迫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这些部门基本上只能是服务部门，因为无论工业和农业都没有扩大投资和增加雇员。



大部分的新的服务部门所包含的活动都是拥有很少的资本，非常低的劳动效率与收入，没有有效的劳动法的保护，那些受雇用的人都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并且犯罪和恶性行为还是新的服务部门的主要活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近来的服务部门的扩张相比，在新俄罗斯出现的这种服务部门和不发达国家的需要较高的劳动力的服务活动的非正式部门更加相似。很难想像在制造业崩溃的俄罗斯，可以存在大规模的高收入的繁荣的服务业。

**平均收入** 随着产出的崩溃，实际的平均收入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据估计 1991 年的平均实际收入仅仅是 1986 年的 74%，而到 1992 年 8 月，平均收入仅是 1986 年的 57%。（瑞基思基，1994，第 40 页）卡宁估计在 1991—1992 年间，个人消费下降了 29%。（卡宁，1993b，第 14 页）世界银行估计仅在 1992—1993 年间，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 1/5。（引自威尔的报告，1993，第 2811 页）这些当然都只是粗

略的估计。平均收入的下降可以从市民大众消费品——包括基本工业消费品，例如，鞋和纺织品（表7.3和表7.4）、优质的食品——在产出（表7.2）上的急剧下降以及购买食物的消费金额的变化上反映出来。据估计食物消费在平均收入中的所占比重从1986年的33%上升到1991年的45%，在价格自由化之后的1992年2月跃升至77%，而这只是当年8月份的57%。（瑞基思基，1994，第40页）



**收入分配** 随着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出现大规模的不平等，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了。俄罗斯的《经济新闻报》（*Ekonomikai zhizn*）估计，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已经从1991年12月的4.5倍上升到两年后的1993年12月的11.0倍（引自纳吉，1994，第1154页），并且到1994年中期上升到了13.0倍（《转轨》，1994年7月—8月）。在这样动荡的时期数据当然会有问题。公平而有经验的观察家对此差距有很深的印象。阿历克·诺夫在他最后几篇文章中的一篇中写道：

> 一个社会学家不需要批评俄罗斯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人们通过交易，通过购买东西然后再出售而变得富裕。原始积累？但是这应该尾随着生产资源方面的累计投资。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巨大的利润都已经存入外国的银行或者贴上了各种各样的外国的标签。（诺夫，1994，第46页）

随着绝对贫困人口（见下文）的增加，新资本家阶级的实际收入暴涨。《新闻周刊》估计在1993年，大概100 000人口（总人口的0.6%）的收入等于或大于2 000美元（1993年2月15日）。《俄罗斯商业日报》（*Kommersant*），一家著名的商业报纸进行了一项调查，该调查显示300万俄罗斯人（约总人口的2%）可以生活在相当于欧洲中产阶级的水平。（引自威尔，1993，第2813页）然而，新富阶层中的最富有的人一定没有出现在不准确的数据统计里，他们的收入主要通

过增加新的城郊大房子和进口昂贵的消费品来显现。随着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的出现（仅在莫斯科大约就有 300 000—400 000 人），进口的奔驰车的消费量也剧增，俄罗斯购买的新的顶级车型比整个欧共体的还要多。（引自威尔的报告，1993，第 2813 页）

296

**贫穷**　大家普遍承认的一点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绝对贫困人数有了巨大增长。（参见爱尔曼，1994，第 341 页）《劳动报》估计在 1993 年，大约 150 万（10%）的俄罗斯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另外超过 4 000 万的人口（大约为总人数的 1/3）的生活水平在贫困线之上一点点。（引自威尔，1993，第 2813 页）在 1993—1994 年间，贫困的规模急剧增加。俄罗斯劳动部的生活水平中心所报告的贫穷人口的比例从 1993 年第四季度的 29% 上升到 1994 年第二季度的 39%。（《转轨》，7 月—8 月，1994）

**公众健康**　公众健康保障措施急剧下降。国家在卫生保健方面的预算大约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4% 下降到 1993 年的刚刚超过 1%。（威尔，1993，第 2812 页）仅仅在 1991 年，政府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实际花费大约下降了 39%。（《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26 日）事实上，大部分的获取健康服务的渠道已经私有化了，因为需要接受健康服务的人从政府获得报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们多数都通过黑市获得服务。实际收人的减少，公众健康服务保障的下降以及深深的心理迷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死亡率的大幅度上升。

最近的一次严谨研究表明，自从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共和国的死亡率迅速上升，情况非常严重”：1991—1993 年间，俄罗斯的总死亡率上升了 26%。（爱尔曼，1994）结果到 1993 年，俄罗斯的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到了约 59 岁，此寿命比 1987 年下降了 6 岁。（爱尔曼，1994）1993 年，俄罗斯的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到了中等收人国家以下的水平，大约等同于印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水平。（爱尔曼，1994，第 352 页）作者对这个“显著的现象”的解释如下：

通过对主要对象进行临时的、假设的以及必须的理论分析，可知苏联解体后的独立共和国的分年龄组的死亡率和疾病增加的最终原因是：贫困，苏联时期的国家失败，随之而来的后苏联时期的国家遗弃；医疗人员和医疗器械的资金不足，药品和其他医疗供应的缺少，医疗服务费用支付的引入；公共卫生的变坏，食品污染和饮用水的质量；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迷茫；工作周的长度的增加；黑帮战争、内战以及主要国家间的军事冲突所导致的致命冲突。（爱尔曼，1994，第 352 页）



**心理危机**　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的前景暗淡。苏联转轨的步伐和性质让大多数市民经历了深深的迷惘，导致了很严重的心理后果。中央经济数据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国家遭受的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危机，而且还有社会心理的危机。这些冷漠、玩世不恭、失望的心理现象比通胀和产量的下降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危机。（引自爱尔曼，1994，第 148—149 页）该创伤的政治后果是支持日里诺夫斯基，反对叶利钦顾问的自由改革计划。人们不再抱有幻想，例如在圣彼得堡，这座经济改革的先锋城市的城市委员会在 1994 年 4 月的选举中几乎被废除。出席者只达到要求总数的 25%，投票也延长了一天。（《金融时报》，1994 年 5 月 17 日）

**人力资源**　由于国家的住房、卫生保障、饮食和教育等情况的急剧下降，人力“资本”迅速消耗殆尽。劳动力有效地完成任务的能力因为广泛传播的心理迷惑而降低，甚至向极端个人主义方向的道德价值观的转变降低了合作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大多数的资本主义组织来说是良好运转的必要条件。

然而，人力资本消失殆尽有着更为简单的原因。大量的拥有特殊技能的人为了生存已经将他们的技巧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活动。大批人从报酬较少或没有报酬的公共部门转到经常是毫不相关的其他私有经济中，因此他们受到的大部分的训练都被浪费掉了。而且，由于衰败

的国内经济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减少，出现了大量的技术移民。1993
298 年，大约有超过400名俄罗斯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为韩国经济的繁荣作贡献”，而且有更多的人被邀请到韩国。（斯塔利科夫，1994，第17页）据推测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大约有25万拥有高技术的工人离开独联体。（斯塔利科夫，1994，第18页）

**前景**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俄罗斯的经济从停滞走向深深的衰退。1991—1993年间，苏联遭受了现代世界任何国家在和平时期都没有经历过的最严重的萧条。1993—1994年间，经济呈现了自由下落的局面。三个研究苏联经济的一流的智库在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认为更加严重的是苏联经济的储蓄水平，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前景是伴随“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失业”的“经济生产的完全崩溃”。（《金融时报》，1994年5月11日）

俄罗斯政府和他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眼中的光明”是假设通胀水平可以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并且货币保持稳定，那么经济大约在1996年可以重新增长。《金融时报》的观点认为：“如果认为俄罗斯在这个千年结束之前能够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那完全是乌托邦式的幻想。”（《金融时报》，1994年9月24—25日）但是，这最多是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希望。而且，即使该希望最后真的成功了，那么也是以近十年的失败、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巨大的困苦和阶级结构的巨大不平等为代价的。

### 7.2.3 总结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民族国家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毁灭。这个变化实际上是由苏联领导层的令人吃惊的错误政策导致的。反过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现代苏联历史中的深层力量加以解释。这种政策选择也表明了冷战的最后阶段，苏联政府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政府面临的巨大压力。而且它更多地受到了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研究苏联的专家机构相联系的人所带来的影响，很多戈尔巴乔夫

周围的关键人物都隶属于这些机构。苏联政府的倒台几乎受到了西方媒体、西方学术界特别是西方政客的一致欢迎。推翻共产主义国家是正统的转轨理论的核心构件。 299

一旦国家机构瓦解，那么留给任何继任政府的选择将会大量减少。留给 1991 年的苏联政府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困难使得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很难为国家制定一个成功的经济战略。

1991 年 8 月之后的政治困难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政府很难追求任何形式的持续的政策。新的议会制度的构成使得不可能就连续的经济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政治的变化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财政能力，这导致了极高的走向通货膨胀的内在倾向。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开始瓦解。这深深地破坏了财产权利的安全性，并使得任何向私有化的分配都会受到犯罪力量的影响。政府的信心被苏联的政治分裂、执政党的下台以及东欧的共产主义的迅速瓦解破坏了。而且，政府急切地想得到国际资金的支持。这些事件推动政府向国际组织寻求制定经济计划的建议。

被采用的方法导致了所有可能中的最坏的结果。以价格的迅速自由化和迅猛的高速私有化为特征的“休克疗法”发生在一个没有有效的法律和秩序框架或者没有强大的政府行政能力的背景下。这个过程也发生在一个恶性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能力垮台的经济条件下。这个时期（1992—1994）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将转轨中的人的成本最小化，而是将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速度最快化。政府认为这个制度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一个非常清楚的观点认为，为了创造一个有效的可以促进增长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值得付出短期的成本。正如副总理索斯科韦茨先生指出的一样，由此产生了一个残忍的而且是极不平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并导致“在完全混乱的情况下创造市场”（《金融时报》，1994 年 8 月 23 日）。迅速私有化的政策受到大多数外国顾问以及与政府官员有联系的国际资本家的强烈支持。

由于没有一个连续的有效的政府机构，1991 年 8 月之后，任何的 300

共产主义经济转轨战略在俄罗斯都不可能成功。由于缺少政府机构，所以俄罗斯不可能按照“东亚”道路进行转轨。然而，叶利钦政府的最初的方向以及从国际组织中得到的建议都是放弃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国家的瓦解被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最伟大的成就。只有在1993—1994年经济开始自由下落的时候，俄罗斯才重新开始建立获得了西方明确支持的“强大的政府”。

苏联的共产主义转轨的灾难表明，试图将整个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全面跳跃是一个很荒唐的行为。该行为的结果是大部分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并且产生了巨大的资产和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俄罗斯的经济情况不可能永远恶化。乐观主义者认为经济将会在几年之内开始稳定。如果通胀水平低，政治保持稳定，那么经济甚至也可能在20世纪末的时候实现合理的增长。然而，即使对前景乐观的人士都认为这段时间付出的代价将会延续大约15年的时间，因此代价将会很高。政策选择是产生这种结果的核心的原因。不幸的是，苏联的经济制度如果进行一系列的渐进改革，很可能有巨大的提高的潜力。这完全不需要在提高之前，经历一段“手术”和产出急剧下降的时期。然而，如果要成功实施这些政策需要有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机构。而且，对前景“乐观”的人士可能是错误的。俄罗斯可能仍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下降的过程，政治制度很有可能出现新的转变。

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的讲话中指出，如果共产党下台，中国将会陷入巨大的政治动荡。在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民主运动人士认为这是最愚蠢的，最起码通过提出危言耸听的危险以延长这个恶劣的政权的存在时间是十分有害的。[①] 政治的正确和充满热情的行为不是制定政策的良好的基础。

---

① 在我与一些中国人的争论中，由于我认为可能的政治动荡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以及那些听起来自由但将导致政治动荡的政策会对中国的普通民众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我经常被攻击。例如，在1990年11月纽约举办的“中国社会的未来”的争论中（《中国社会的未来》，纽约，1993），以及在1992年5月4日牛津联盟主办的活动会议的争论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计划经济的脆弱，特别是在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庞大的帝国。在这些国家，不可能通过谨慎的、有控制的改革逐渐释放政治控制的“安全阀”。我们从俄罗斯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十几年前人们想像的政策选择。稳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只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获得发展，人民习惯了稳定的民主社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不幸的是，政治动荡在促进重塑斯大林体制的市场经济发展之前创造了最坏的条件。

## 8.1 总结

### 第1章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慢慢地放弃了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转向民族主义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强调在集体框架内利用个人的企业家精神。改革利用了旧制度的潜在能量，从而开始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外的增长的良性循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而在俄罗斯，改革迅速摧毁了旧的政府机构，但是未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后续政府；允许创建一个高度不平等并且令人深深迷惘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由此导致的产权不平等将会是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生活的基本参数。改革使得投资和工业产出急剧下降，经济滑坡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上变得前所未有的衰落，事实上俄罗斯的政策是在主要的国际资本机构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后，俄罗斯就出丑了，它已经完全不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这本书包含了两个明显的反事实论断。第一，若俄罗斯选择不同的政策将会促使其产出实现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第二，若中国选择不同的政策将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灾难，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大幅度下降。

俄罗斯有很多人对于用“中国方案”解决俄罗斯的深层问题很感兴趣。本书中的分析没有简单地推导出俄罗斯应该跟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一条使用现存的共产主义机构，在统一的民族国家领导之下，对现存的公有资产进行重组，从而促使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轨的道路。中国道路开始于增长的良性循环的建立，由此导致经济绩效在一系列的相互作用中得以不断提高。而在俄罗斯，政府结构瘫痪了，民族国家瓦解了，公有资产所剩无几，经济陷入了深深的衰退。任何人想要完全重构旧的民族国家、旧的管理机构和原来的公有经济都是天真的幻想。仔细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中国改革道路将与国家的改革策略的制定相关。但是这一研究与俄罗斯现在的情况关系不大。俄罗斯的方案需要从现在的条件出发重新思考。与“自由市场”和“民主”对解决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的回答相比，“中国道路”并不是对解决俄罗斯现存的灾难性状况问题的更好回答。



第 2 章

比较改革政策下的经济绩效是十分令人激动的。这两个国家的几乎每一项主要指标都完全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动。在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评论者都预测这种增长不久将会消失殆尽。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的经济繁荣几乎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持续到现在。而且，所有的涉及生活质量的主要的经济指标，都随着产出和实际收入的加速增长而出现了大幅度的改善。而在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早期领导下的惨淡的经济绩效在他的执政后期变得更加惨不忍睹。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不亚于一场灾难。产出明显下降。外商直接投资避开俄罗斯涌向中国。最重要的是，生活水平指标出现了急剧下降，同时死亡率大幅度上升。本书的余下部分试图解释和评估这种比较。

第 3 章

一些对于后共产主义时期改革的后果提出批评的评论者都认为或

暗示共产主义制度最需要进行的是对其进行彻底调整以便大幅度提高其经济绩效。其他人则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在发展的早期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现在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①]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理论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缺陷。而且，在两种情况下制度的问题都非常大，然而，这两种体制还都没有处在崩溃的边



缘。冒险的改革实验不能作为拯救这个制度于危难边缘的有效的方案。这两个国家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促使它们免于出现滞胀。问题是：改革的进程应该通过何种方法，以什么速度以便达到什么目标？最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应该有着怎样的关系？

*第4章*

本章在原理上评估了那些如何改革共产主义体制的论断。在中国开始改革之前，很少有研究成果涉及这个主题。大量关于共产主义体制的著作中的“政策”内容都是简单地比较共产主义体制的缺点与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换句话说，他们推荐的“政策”的潜在意图即是：“建立资本主义体制和西方的民主制度。”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关于共产主义体制改革的基本原理的文献还很少。仅仅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9年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被推翻之后，大量的研究“转轨”的文献才开始出现。这些文献不仅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有关，还与仍存的共产主义国家，如苏联、中国以及很少被提到的亚洲的小的共产主义国家有关。[②]

---

① 这个观点与改革家的“笑话”类似。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回答：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转轨阶段。

② 这些“小”国家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都真是很小。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中国之外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的总人口大约为1.2亿人，相比之下，欧洲共产主义国家的人口为1.1亿人（如果包含南斯拉夫则为1.34亿人）。越南的人口数量几乎是波兰的两倍（6 500万 vs. 3 800万），缅甸人口（大约4 000万）也比波兰人口多。在所提及的转轨经济的文献中，占绝对多数的是关于东欧国家的书籍和文章，然而亚洲除了中国之外的共产主义国家拥有同样多的人口，长期来看，其经济将会好于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

在西方文献中，很快达成了一种大的共识[①]，而且这些共识对当时的共产主义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文献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原则和英国殖民主义经济原理的结合。这个正统的转轨理论建立在若干核心命题的基础之上。

正统的转轨理论认为只有在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之后才能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这个理论认为推翻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合意的，因为它通过给予公民政治自由而提高了他们的福利，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这有“双重福分”，因为人们相信这是执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的唯一方法。对于民主的本质和作用上的优点的信念致使国际组织把向民主的转移，作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较差的经济绩效的方法。

大多数“转轨”经济学家认为只有迅速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实施改革的共产主义国家才会快速提高他们的经济绩效。这个被推荐的政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指导下以一种简化的和更加极端的“稳定和结构调整一揽子方案”形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正统的转轨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实用主义经济学家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支撑了大英帝国的经济政策。转轨理论披上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外衣。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价格自由化、废除保护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这些政策和另外一个论断几乎分不开，即渐进的“折中的”体制改革方案是一条注定走向经济失败的道路——甚至会出现比计划经济更坏的后果。而结合了计划和市场的优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被最有影响力的改革“理论家”，例如科尔奈所嘲笑，这些嘲笑并被那些影响力稍弱的人物模仿。

“正统的转轨理论”的缺点非常明显。它低估了共产主义政府引领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能力。它低估了在反共的革命后产生稳定

---

① 在此过程的初期，共识中的最明显的例外是加尔布雷斯（1990）和瓦尔特（1991，1992）的完全不同的观点。

的政治环境的困难。这个问题在拥有较大的地区差异的大国特别突出。正统的转轨理论低估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在维护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公民安全方面上的作用：共产主义“法律”和共产党的管理机构总要好于法律的缺乏和犯罪的扩大。正统的转轨理论极大地低估了试图实施快速改革可能导致的巨大问题。它未能预测到，政府在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复杂纠结时期（在这一时期市场可能出现了“失灵”）所起到的各方面的作用。这些“失灵”既体现在增长和稳定的实现上，也体现在资产和收入的分配上。可悲的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休克疗法条件下的快速私有化所导致的资产分配后果。

本书的主题是比较了中苏两国的各自领导层对于正统的转轨理论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而产生的结果。这些共识观点不仅仅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院派社会科学家所推崇。他们在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最著名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正式建议和非正式的



影响中都具有关键的作用。他们在国内的社会科学家和政策“智囊”开始独立思考选择方法的时候都非常重要。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使在中国，正统的转轨理论在政策顾问中的影响也随着国际社会的飞速传播而迅速扩大。对于那些被送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西方大学进行学习的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抵御更富有的和更有经验的老师的思想需要极大的知识分子勇气。他们的大多数老师都轻视社会主义和计划。他们还认为中国的改革“经济学”是原始的，中国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政治探求上是不道德的。

中国的领导者顶住了这些压力，采取了与正统的转轨理论完全不同的政策。中国的经济政策被普遍认为是“死路一条”。中国所使用的政治方法使大部分的国际社会希望惩罚，因为中国没有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正统的政治行为标准行事。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亲密的顾问在他们的政治改革和随后的经济改革中都完全接受了主流改革家的观点。在叶利钦统治时期，甚至更加鲜明地拥护正统的转轨理论。

**第5章**

在改革开始的阶段，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巨大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结果？事实上，两国体制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多不同。这些差异包括：地理位置、人均收入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小规模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渊源程度、在海外的本国公民手中所掌握的资本、农村的人口压力、科学团体的相对大小、文化前景以及少数民族的相对大小。然而，两国在很多领域也有本质上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包括：组织关键工业的方式、工业结构中重工业的相对重要性、相对于国家的收入水平的大众受教育程度的水平、在现代化阶段显示出的企业家能力、军事部门的相对重要的作用以及相对于现存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说的相似的巨大的落后。在这两个国家，如果巧妙设计体制改革，那么在持续提高经济绩效上都有很大的潜力。



体制中的许多不同按逻辑上推理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一个设计巧妙的改革方案实施后，中国能比苏联有更好的表现，但是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改革后的非凡的成功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其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历史遗产。它在促使经济增长上的主要不利因素包括：大部分工业处于边远内陆地区、相对于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的较低的科技人员的水平、小规模的技术落后的工厂在工业产出所占份额相对较大、人均耕地水平低和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许多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的优势的因素，例如海外华人中的大量资本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都是因为中国采取的政策才使得他们成为优势因素。没有对于非农部门的投资刺激的政策，随着农业的劳动力产率的下降，大量快速增长的农村人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麻烦而不会是优势。如果没有有利的政策，海外华人资本也不会在中国投资。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像苏联一样被破坏，那么投资到中国的海外华人资本将会是现实所发生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第6章**

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倾向于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

对于旧的政治制度的保留滋生了腐败。然而维持一个强大的政权使得国家可以在财政上相对有效，这意味着对于政府管理经济组织的规则可以更加理性地预期到，并且合约安排会更加安全合理。中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实验，并给予可能导致产出和收入增长的产业以优先发展的政策。经济代理人通过一个合理稳定的经济参数来作出他们的决定。



政府维持了对于核心的民族价值的公开承诺。政府没有放弃先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倾向于个人主义。个人利益和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都从属于共同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共同的繁荣前景的利益。“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慢慢地被重新定义而不是被抛弃。1994 年，中国政府仍旧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一，“社会主义”被定义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第二，它被定义成个人激励与在个人资本积累方面的限制的一个结合。第三，它被定义成为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员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这些价值观和与此相关的政策确保了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增长的收益可以合理有效地共享。“社会和谐”在改革过程中得以保持。这些通过心理作用直接有益于公民的福利。它还通过在共同奋斗中给予公民参与感而加固了社会的稳定。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使用权”的转移换取根据合约内容分配的收入，从而改善公有资产的绩效。价格自由化沿着“双轨制”路线谨慎地实施。同时，物资供应体系也逐渐自由化。然而，即使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国内生产商还受到免于国外竞争的保护。这些逐渐引入的，实验性的供给方面的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资本开始流向这些有着高产出的地区、部门和企业。不仅投资的收益改善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也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在关于就业条件的制度约束并没有妨碍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下，随着能够产生大量的可用于再投资的人均剩余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快速增长，“刘易斯模型”开始起作用。从极度的技术落后起步，中国开始了快速的技术进步过程。出口收益的快速增长使得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改革使得国内生产

商在实现他们自己的技术进步上有越来越大的激励。[①] 私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整个改革阶段，中国经济都维持了高度保护。国内生产商能够确信，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大多数领域他们面临的主要竞争者来自于中国国内。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渐开放，所有产品的消费者能够越来越自由地进行选择，并且越来越变为更加有鉴别力的购买者。这在消费品市场上更加明显。各种不同的消费品的质量在改革过程中有了明显的提高，其中许多都不能反映在统计数据中。同样的过程开始影响资本品的生产。成功并且增长快速的企业通常是那些企业——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在若干意义上，不论是价格、设计、还是耐用性或者能源消费方面，都被认为是上乘的。个人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导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人们从最初的对于粮食需求的大幅度增长转向至扩大对于更高品质的食物需求。在整个改革阶段对于房屋的需求保持了较高水平。在改革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工业消费品的需求的增加的主要来源是那些相对简单的耐用品，例如，自行车和缝纫机。随着改革的发展，人们对于工业品的需求转向了新一代的工业产品，例如彩电、冰箱、高保真的音响设备和时装。国内的生产商迎合了这个巨大的高速增长的需求，由此引致了在农业部门和轻工业部门的相应的投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为了满足对于这些产品的需求，就需要相应的资本品和中间投入品的投入。从而国内生产商对于钢铁、水泥、化学品、各种机械和运输机械的需求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

需求和供应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共同促进现象。体制的逐渐改革释放了像所有的共产主义经济体一样的中国经济体中原存的潜在的生产能力。这促进了最初的收入的增加，从而带动了消费品和资本品的需求的增加。

---

① 与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的日本一样，中国更多的是集中于引进和实施国际技术而不是进行基础性的科研。

由此刺激了在这些领域内的投资的增长，这又导致了资本存量的现代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刺激需求、投资和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出现了“计划外增长”。①

第7章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政府管理机构和民族国家的毁坏。这主要是苏联领导层的错误的政策选择所造成的结果。这反过来受到当代苏联历史的深层力量的影响。这种政策选择也与冷战后期苏联受到的巨大的直接压力有关。一旦政府机构倒台，任何继任政府的选择余地将大大减少。在1991年遗留给俄罗斯政府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困难使得它很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制定成功的经济战略。1991年8月之后的政治问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很难追求任何的一贯政策。新议会的组成结构使得它很难就一个一贯的经济政策达成一致意见。政府的财政能力由于政治变动的影响而大大削弱，由此产生了一个内在的高通胀率倾向。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已经开始遭到破坏。这削弱了产权的安全性，并且导致任何朝向私有化的分配结果都会严重受到犯罪势力的影响。由于苏联的政治解体，苏联共产党的被推翻以及东欧共产主义的迅速垮台导致政府的信心支离破碎。这些情况迫使政府转向国际组织以寻求如何形成其经济计划的建议。



苏联政府选择的道路产生了所有可能结果中的最坏的结果。“大爆炸”式的价格瞬间自由化和快速私有化在一个没有有效的法律和秩序框架或者政府行政力量的条件下发生。同时，还发生在经济高通胀和政府财政能力崩溃的背景下。政府在这个私有化时期（1992—1994）的主要目标不是转轨的成本的最小化，而是使资本组织创造的速度最大化。政府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资产阶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观点认为，为了创造一个有效的和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成本

① 诺顿，1994。

是值得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与政府官员有密切关系的外国顾问和国际资本家圈子中的大部分人的强力支持。由此导致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一个完全混乱的环境中创造出了市场”［索斯科韦茨先生（Mr. Soskovets），副总理，引自《财富时代》（*Financial Times*），1994 年 8 月 23 日］。没有一个连续有效的政府机构，在 1991 年 8 月以后任何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战略都不可能在俄罗斯取得成功。没有这个机构，苏联不可能实现“东亚”的转轨道路。政府机构的破坏被普遍认为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最大的成就。



苏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巨大灾难表明，试图通过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整体大跃进来实现转轨是愚蠢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大部分苏联人的生活水平都急剧下降，同时出现了经济权利和资产分配的极为不公平。苏联的经济状况不可能持续恶化。但是，衰退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这一成本已经非常大。政策选择是导致这个结果的主要原因。可悲的是，苏联的经济体制在一个适合的渐进改革方案下本会有巨大的增长潜力。苏联不需要在经济改善到来之前经历一段“手术”时期以及产出的急剧下降和生活水平的降低。然而，这些政策的成功实施需要维持一个强大和有效的政府机构。

## 8.2 对于经济原理和经济政策的含意

### *演化与革命*

通过一项政策试图实现对所有的社会—经济生活参数的全方位改革，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提高经济体制绩效的方法。波普尔的实验原则更为合理。自然科学为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向导。矛盾的是，俄罗斯抛弃共产主义的行动和其在 1917 年走向共产主义的行动很相似。两者都是大规模的革命性的“历史主义者”的实验，他

们试图通过一次跳跃就进入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前苏联共产主义结束的方式与其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式很相似：它由乌托邦的革命创造并通过乌托邦的革命结束。很难想像通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选择不同改革道路的结果不会增强那些像波普尔一样的学者对经济政策的演化方法的支持。



当经济生活的主要参数都是给定时，经济学家已经通过模型化和统计调查方法极大地深化了他们对一些相对微小的问题的理解。然而，当他们在考虑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更好地向一种制度转轨，以便为他们长期饱受痛苦的公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的时候，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忘记了在关于这项重大的事件上他们自己的分析没有教给他们自己多少东西。相反，他们还是带着极大的自信从他们对于相对小的问题的改进的理解人手争相建议，如何才能最好地改革政治体制。他们从自己特殊研究领域的复杂进人到宏大领域的简单的一般中，关于这些领域，他们通常只拥有极有限的知识，而且对于这些领域来说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对他们也没有起到好的影响。关于经济生活的参数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深层次问题都超出了大多数经济学课程的范围。它们牵扯到尝试理解文化、政治、心理和社会结构与经济互动的方式。这个分支学科正逐渐地被排挤出经济学。[①] 这被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到目前也就是共产主义转轨才能被称作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 计划、指令和市场

“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大多数的指责源自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方法中的“计划”的错误判断。共产主义经济没有计划，它是一种指令经济（命令经济），是一种至少与资本主义一样，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行的一种反常的经济。通过对中国和

① 这一结果甚至被主流的美国经济教育委员会报告所承认。（报告，1991）

俄罗斯改革的经验的对比可以确定在某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有效的计划是经济成功的必备条件。特别是在转轨阶段，共产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好的计划。这些必须的计划的作用对于大多数处于改革中的共产主义国家来说都有一些相似之处。计划的作用包括：需要政府谨慎地进行改革实验，需要政府协调各种改革方案的相互关系，需要政府通过调节市场力量的增长对不同的社会团体的影响而维持社会的稳定，需要政府在引入市场力量的同时保护国内的产业，需要政府支持强大的新公司使之可以参与国际竞争，需要政府为交通、健康、教育、运输和电力生产的必要投资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源，需要政府重构公共资产的使用以防止出现资产所有权的不公平分配，需要政府保持公众对转轨的参与和对于复杂的转轨的理解。但是，转轨中许多必须的计划的作用也具有国别的差异，例如，中国需要政府控制人口的增长和保持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



不幸的是，苏联的改革政府混淆了计划和指令的关系，它毁灭了指令经济但是未能建立一个从指令经济转轨的计划。中国政府意识到在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计划。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丁伯根（Tinbergen，1964）、查克拉波尔迪（Chakravarty，1987）和罗易（Lowe，1965）所使用的词语——“计划”的经典意义。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计划的程度和方式也不一样。市场在增长、分配和环境方面上的失灵在某些情况下会比其他情况下更多一些。即使在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的实例中，例如1949年以来的香港地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在对其进行仔细观察之后也表明政府的干预程度要比一般人所认为的更多一些。自由市场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为国家提供成功的大规模的结构转轨的方法。好的计划应该能识别出在特定国家所发生的独特的市场失灵，然后提供灵活而实际的解决方案以解决之。

### *转折点和因果关系的累积*

关键之处的正确或错误的政策选择会导致正面或负面的巨大的因果累积过程，反转这一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进程现在可以视为处于紧要关头。如果选择了不同的政策，完全有可能产生与实际结果完全相反的结果。错误的政策可能使中国无限期地后退。中国在1949年之前以及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实有效地证明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相反的，正确的政策可以解放苏联经济的巨大的生产潜力，并促使出现一个加速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一旦走上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与众不同的道路，整个政治和经济的良性和恶性的循环过程即开始建立，而这种循环过程将会促使各个国家沿着各自的轨道前进。

一方面，中国最初的成功，释放了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反过来又激发了需求的增长，由此导致了新的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这些又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大了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促进了更进一步的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所有的这些又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而社会的稳定反过来又鼓励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

另一方面，俄罗斯最初的释放潜在产能政策的失败以及在摧毁旧体制的同时没有产生起作用的新体制，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严重的衰退。由此导致的需求下降，极大地挫败了新投资，从而破坏了挣工资的就业机会，这迫使那些不能在发放定期工资的部门就业的人转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非正式”部门，从而阻碍了技术的进步。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导致了极大的社会动荡，从而进一步阻碍了投资。

### *需求的作用*

在内战萧条时期或内战萧条后产生的那一代经济学家很自然地非常关注于经济的需求。在战后阶段，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转向关注供给。正统的转轨理论完全忽视了需求的作用。他们简单地认为改革国家面

对的是无限制的世界需求，国内需求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过程的不同有力地说明了在一般和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式的经济改革战略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内部需求，这使得它有可能通过增长调整经济，从而摆脱计划。通过对需求带动的新的和更高生产率的活动进行投资就能提高生产率，那些旧的企业可以慢慢萎缩，而不是无情地作为“外科手术”的一部分加以关闭。“中国道路”的转轨过程是以增长为动力，即通过快速扩大使用新技术的总资本存量的市场份额来提高生产率。俄罗斯道路则极大地限制了需求，从而使得产生利润的总资本存量快速萎缩。



### *保护幼稚产业*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需要保护他们的幼稚产业免于受到发达国家的竞争。然而，“幼稚”产业的构成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幼稚”产业不仅仅包括在某时间之前不存在的产业，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产业。完全过时的，在国际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的，但是正处于现代化和重组过程中的“老”产业，也被认为具有“幼稚”产业的特征。一个本不具备竞争力，在开放的国际竞争条件下有可能会破产的产业或者它的一个部门，如果给予保护将会变得更加有竞争力，那么给予保护就是比较合理的。逐渐增加的竞争力可以通过该产业自身面对国内变化的市场竞争做出反应而获得，也可以通过政府所实施的举措而获得。幼稚产业提高竞争力的措施包括外资、投资新技术、改变管理实践、提高产品的设计、改变产业结构规模和改变产业空间位置。如果没有完全地和迅速地向国际竞争开放本国市场，所有这些措施在一个认真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很快出现。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产业部门中实际上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如果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次性地向国际竞争全面开放，那么今天能够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变得

更加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将不会存在。

经过数十年彻底的免于国内和国际竞争的保护，完全向国际竞争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见证了他们产业的大部分都遭到了破坏。但是从长期来讲，在国内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公司可能会对变化做出积极应对，同时通过产业本身和政府的努力来适应可能发生的情况，多数产业将会在保护中变得更加具有竞争力。换句话说，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选出合适的工业部门实行幼稚产业保护的理念是合理的。计划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确定从长远来看将会变得具有竞争力的幼稚产业，并采取措施支持他们，从而使他们成功。

316

*所有权*

大量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转移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如果在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建立之前就匆匆进行，那么就不可能公正地完成。另外，它可能容易产生一个阻碍投资的资产所有权结构。并且，在从指令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体中，经济绩效的大规模提高不需要产权的私有化。公有资产可以借助于激励设计，即通过以合约获得使用权的方法来使产权被有效地使用，从而实现经济绩效的大幅度改善。在小规模企业中，地方公共所有权可以与有效使用公共资源的激励相匹配。在农业部门，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在土地的公有产权框架内实现。中国可能最终会走向私人产权形式的经济。但是差不多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似乎还可以通过主要是资产公有的所有制形式获得经济绩效的持续提高。

通过再三反思发现这些并非不可思议。资本主义体制的大部分产业也是在没有私人所有权的直接刺激下，提供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强烈激励。资本主义的本质更多的是合约的存在——这些合约约束拥有资源的经理人，使之能有效地利用资源，而不是使用资源的经理人对拥有这些资源有直接兴趣。大部分的农场和小零售店都是从所有人处租用的。大公司的大多数经理是被适合的合约和非金钱的动力所激励的，

而不是所有权。即使资本家的经理人拥有股份，他们自己的表现也与他们所拥有的股份价值的增加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所拥有的股份占总股份的比重很小。



现在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产权体系都能与有效的经济绩效相匹配。在“全民”和个体私有产权体系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权体系安排，这能或多或少地促使使用这些资源的经理人有效地使用它们，以便获得收益，而且经理人能在他们的支配下让资源的价值增大。

### *财富的分配*

个人“选择自由”的神话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每天的现实不断地打击这种选择自由的天真的观点——相信选择自由的人认为生活机会由选择的自由所组成，更不用说不同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机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大量的经济学家著作中，生活机会和从经济机会中获益的能力的阶级差别的来源被人们很容易地遗忘了。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创造的新的巨大的不平等的阶级结构如此明显——也就是说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清楚、生动地说明了在所有社会里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阶级差别的重要性，这些阶级差别决定了人们生活机会的不同。人们的“自由选择”完全受限于他们的阶级地位。

### *利益扩散*

发展经济学中的“左派”一贯观点和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的研究都证明，“利益扩散”理论行不通。从这个观点上看，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主要途径是再分配。另一方面，大多“自由市场”分析的一贯主题表明增长是确保“基本需要”的最好方式。

设计不合理的再分配政策，例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许多政策，损害了增长所需要的激励，而且，从长期来看，还会阻碍大众将其收入增加到某一水平之上。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改革显示，

快速的增长通过市场为穷人创造了改善他们福利的巨大机会。但是，它也显示了通过制定再分配政策可以比通过自由市场更快速地提高人
318 们的福利，同时可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激励。然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的灾难显示，如果产出的下降足够大，即使是最平等的再分配制度也不能避免人们福利的巨大下降。

在俄罗斯的改革方案下，巨大收入再分配过程出现了，处于底层的占总数量1/10的人口的收入被剥夺。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的1/10左右的人口以极快的速度变得更加富裕，而且，随着产出和平均收入的灾难性的衰退，他们快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和财富份额。由于产出下降和在收入分配中最底层的1/10人口的收入被再次剥夺，这一分配过程与“利益扩散”理论完全相反。公平分担经济衰退的负担，例如在英国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样，可以极大地降低底层人口所承受的痛苦。

### *好政府与经济绩效*

“好政府”逐渐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绩效的重要力量。[雷诺兹(Reynolds)，1985] 然而，人们倾向于把“好政府”等同于民主政府。这从西方政府帮助非洲政府的例子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进程的对比生动地说明了这种观点的不适当。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对中国的管理比戈尔巴乔夫政府或叶利钦政府对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管理更好。引领改革的中国政府与他们的俄罗斯同僚相比能更好地选择和贯彻“好的”政策，以释放体制的生产潜力并增加广大人民的福利。

### *人权、政治选择和经济政策*

在东欧剧变之前，狭义的政治权利特别是一党独裁专制的结束，
319 在这些国家的国内外都是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些人认为政治改革是主要的政策目标，不论这个目标的实现的结果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福利有什么影响。这些“资本主义的必胜主义者”认为，这是70年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成功的结束。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巨大胜利，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个甜蜜的报复。

其他人认为政治改革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生活会有巨大的提高，这个使人兴奋的“最终获得自由”被认为是公民福利函数中的最重要的项目。共产主义国家如苏联的许多人都秉持这个观点。

其他人认为政治改革将会导致经济绩效和大众收入的大幅提高。其中一些人认为这会很快就发生，而其他一些更加理智的人认为这些国家在实现增长之前需要经过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然而，“人权”除了选举权和言论自由之外，还包括许多其他的权利，包括食物、住房、安全就业、健康服务和个人安全等诸多权利。现在我们可以比改革之前更加清楚地看到，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狭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方面的人权在某一时刻存在着一个权衡。

政府经济政策的选择和选举权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即使在相对稳定的民主国家里也有很多困难。一个很明显的难题就是政党的纲领包含了范围广泛的政策：既有经济政策，也有非经济政策。一个政党当选可能是因为大多数选民支持它的非经济政策而不是经济政策。在得票多数当选的制度下，很有可能政府由少数选民支持并且实施了一项大多数选民反对的方案。然而，政府建议实施的改变越大，政治选择和民主之间的问题就越大。

在“自由公平”的选举中，“投票权”在选民被给定的条件下只有选择的意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中，竞选纲领几乎都是包括一些渐进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是可以合理预测的。在现代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上的最激进的变化可能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撒切尔夫人统治下的英国。成功的保守党政府的纲领无疑是“激进的”，但仍然是渐进和相对可以预测的。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工会立法和国有工业的私有化。结果和其宣言中的预测是接近的。

为处于改革进程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选民提供的选择范围越大，选民需要面对的结果就越不可测。选民无法计算革命性的制度转轨计划

对于国家和个人的所有影响。而且，改革计划越革命，在下一次选举之前政策发生逆变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选民失去了选择的意义，仅是在黑暗中投票，对于管理他们的选择只有模糊的感觉。这样是否更加“民主”是值得怀疑的。

政治改革之前，在保证就业、低房租、较低的或免费的教育和健康的供给，食物补贴以及有效的法律和秩序的情形下，大多数公民在他们的福利函数中可能会赋予政治自由以更高的重要性。然而，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收入下降、就业无保障以及社会秩序崩坏，他们的选择偏好被极大地改变了。如果他们在政治改革之前知道这将导致大部分人的经济和政治灾难，那么他们对于改变的支持就会大大降低。

# 参 考 文 献


Abramowitz, M.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46, no. 2, pp. 385 – 406.

Acs, Z., and Audretsch, D. (eds) (1993) *Small firms and entrepreneu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s, Z., and Audretsch, D. B. (1993) "Has the role of small firms changed in the US?", in Acs and Audretsch (eds), (1993).

Agarwala, A. N., and Singh, S. P. (1958)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genbegyan, A. (1988) *The Challenge: The Economics of Perestroika* (London: Hutchinson).

Amalrik, A. (1980) *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expanded edit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87) *China: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of prisoners*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Amsden, A. M. (1989) *Asia's Next Gia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A. M. (1928) *Humanity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

Aslund, A. (1990) "Gorbachev, Perestroika, and Economic Crisis", *Problems of Communism*, January-April, pp. 13 – 41.

Aslund, A. (1991) *Gorbachev's struggle for economic reform* (London: Pinter).

Aslund, A. (1992) "Aslund urges stronger Western involvement", *Transition*, vol. 3, no. 10, November.

Astapovich, A., and L. Gregoriev (1994) "Foreign investment in Russi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10.

Avrich, P. (1970) *Kronstadt*, 1921 (New York: Norton).

Balazs, E. (1964) *Chinese civilis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anerji, A. (1994) "Food shortages in Rus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no. 19,

May 7.

Banister, J. (1987)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anister, J. (1992) *Demographic aspects of poverty in China*,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Baran, P. (195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ardhan, P. K. (198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in India* (Oxford: Blackwell).

Baring Securities (1991) *Shenzhen-China's economic superpower?* (Hong Kong: Hong Kong Research).

Barnett, D. (1974) *Uncertain passage: China's transition to the post-Mao er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Bater, J. (1987)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in Kaiser (1987).

Bauer, P. (1981) *Equality, the Third World and Economic Delusion* (London: Weidenfield and Nicolson).

Bear, Stearns and Co. Inc. (1993) *Ek Chor China Motorcycles Co. Ltd.: Prospectus* (New York: Bear, Stearns and Co. Inc).

Bergere, M-C. (1986)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gson, A. and S. Kuznets (eds) (1963) *Economic trends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rgson, A. and D. Levine, (eds) (1983)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s the Year* 2000 (London: Allen and Unwin).

Berliner, J. (1983)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Bergson and Levine (1983).

Bialer, S. (1983) "Politics and priorities", in Bergson and Levine (1983).

Blackwell, W. (1983)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 in the Tsarist period: An overview", in Guroff and Kasterson (1983).

Blanchard, O., M. Boycko, M. Dabrowski, R. Dombusch, R. Layard and A. Shliefer (1993) *Post-Communist Refor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lanchard, O., R. Dombusch, P. Krugman, R. Layard and L. Summers (1991) *Reform in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orenzstein, E. and M. Kumar (1991) "Proposals for privatis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MF Staff Papers*, vol. 38, June,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3).

Boserup, E. (1981)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Brown, H. P. (1986) *The origins of trade un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A. and M. Kaser (eds) (1978) *The Soviet Union since the Fall of Khrushchev* (London: Macmillan).

Buck, T. Filatochev, I., and M. Wright (1993) "Buy ou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n industry", Notting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Finance, Discussion Paper.

Bukharin, N. and E. Preobrazhensky (1969) *The ABC of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1920.

Byrd, W. (1992) *China's industrial firms under refor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rd, W. (1990)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Ownership", in W. Byrd and Q. 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Byrd, W. and Q. Lin (1990) *China's Rural Industry*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rd, W. and O. Tidrick (1987)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rr, E. H. (1979)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rom Lenin to Stalin*, 1917 – 1929 (London: Macmillan).

Carr, E. H. and R. W. Davies (1969)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1926 – 1929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1978) "Communiqué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1984) "Decision on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1993) "Decision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tructure". *Beijing Review*, vol. 36, no. 47, Nov. 22 – 28.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and the State Council (1985) "Summary of the forum on the Changjiang Delta, Zhujiang Delta and Xiamen-Quanzhou Triangle in Southern Fujian", 18 February,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Chakravarty, S. (1987)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Indian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dler, A. D. (1990)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ng, H. J.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Chang, H. J. (1994) "Heaven or hell? Interpreting the Korean experience", manuscript, Cambridge.

Chang, H. J. and P. Nolan (1995) "Europe versus Asia: Contrasting paths to the reform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ang and Nola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Against the mainstream* (London: Macmillan).

Chang, H. J. and P. Nolan (eds) (1995)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es: Against the mainstream* (London: Macmillan).

Chapman, J. (1963) "Consumption", in Bergson and Kuznets (1963).

Chen Derong (1993) *The contract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Chin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Doctoral Thesis.

Chen, Jihua (1994)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3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ijing Review*, vol. 37, no. 15, April 11 – 17.

Chen, Kang, G. H. Jefferson, T. G. Rawski, H. Wang, and Y. Zheng (1988) "New estimates of fixed investment and capital stock for Chinese state industry", *China Quarterly*, June, no. 114.

Chen, Kang, G. Jefferson, and I. Singh (1992) "Lessons from China's refo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6, pp. 201 – 225.

Chen, Yun, (1981) "Training and promoting young and middle aged cadres is our urgent task",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Chenery, H. *et al.* (1974)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eung, Steven N. S. (1986)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Hobart paper 94 (London: IEA).

Chiang, Kaishek (1947) *China's destiny* (London: Dennis Dobson).

Clague, C., and G. C. Rausser (1992) *The emergence of market economies in Eastern Europe* (Oxford: Blackwell).

Cohen, S. (1986) *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hn, S. H. (1982) "Sources of low productivity in Soviet capital investment", in USCJEC (1982).

Conquest, R. (1986) *The Harvest of Terr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1975)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public of China (1989)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1989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ai, Yannian (1994) "Spotlight on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Beijing Review*, vol. 37, no. 9, Feb. 28 – Mar. 6.

Dasgupta, P. (1990) "Well-being and the extent of its realisation in poor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vol. 100, no. 190, pp. 1 – 32.

Davie, J. L. (1986)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in USCJEC, 1986.

Davies, R. W. *Soviet history in the Gorbachev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9).

Deng. Xiaoping (1979) "The necessity of upholding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in the drive for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Deng, Xiaoping (1980) "On the Reform of the system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Deng, Xiaoping (1984)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 – 198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Deng, Xiaoping (1987) "We shall speed up reform", June 12,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Derbyshire, J. D. and I. Derbyshire *World political sytems* (Edinburgh: Chambers).

Deyo, F. C. (ed.)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ie Lo (1995) "Economic theor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type system: The challenge of the late industrialisation perspective", in Chang and Nolan (1995).

Dobb, M. (1966)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ong, Fureng (1982)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Xu Dixin (ed) (1982).

Dong, Fureng (1990) "Reform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reform of ownership", in Nolan and Dong (1990).

Dong, Fureng, C. Lin and B. Naughton (1996) *China's state 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London: Macmillan).

Donnithorne, A. (1972)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ien and Unwin).

Dombusch, R. and S. Edwards (eds) (1991) *The Macroeconomics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89) *Economic Handbook of xiangzhen qiye* (1989) (Beijing: Xin Shidai Chubanshe).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7), *Reports on the organisation and growth of China's xiangzhen enterprises*, Economic Research Materials, no. 7.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2) *CIS: Country Report (former USSR)*, no 4.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91) *Poland: Country report*, no. 1.

Edwards, S. (1992) "Stabilisation and liberalising policies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Latin American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in Clague and Rauser (1992).

Ellman, M. (1991) "The contradictions of perestroika: The case of agriculture", *Europe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18, pp. 1 – 18.

Ellman, M. (1994) "The increase in death and disease under *katastroik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8, no. 4, pp. 329 – 356.

Ellman, M. and M. Kantorovich (1990)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Routledge).

Erlich. E. (1985) "The size structure of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and enterprise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9, pp. 267 – 295.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4) *Economic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London: EBRD).

European Community (1991) *The largest groups at world and community level*, mimeo.

Fal'tsman, V. (1993) "Russia's industrial strategy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8, December, pp. 23 – 41.

Fan, Q, and M. E. Schaffer (1991) "Enterprise reforms in Chinese and Polish state-owned industries". Research Programm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STICERD).

Feshbach, M. (1983) "Population and labour force", in Bergson and Levine (1983).

Field, R. M. (1992) "China's industrial performance since 1978", *China Quarterly*, no. 131, September, pp. 577 – 607.

Fields, G. S. (1980) *Poverty, Inequality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eleke, N. S. (1991) "The liberalisation of trade and payments in Eastern Europe", *New England Economic Review*, March/April,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2).

Findlay, R. (1988) "Trade, development and the state", in Ranis and Schultz, (1988).

First Boston, Merrill Lynch, and Salomon Brothers (1992) *Brilliance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 Prospectus* (New York: First Boston, Merrill Lynch and Salomon Brothers).

Friedman, M. (198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lection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2).

Galbraith, J. K. (1990) "The rush to capital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5,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2).

Gamble, S. D. (1921) *Peking: 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George H. Doran Doran).

Gao, Shangquan (1992) "New operating mechanism", *Beijing Review*, vol. 35, no. 24, June

15 – 21.

Gatrell, P. (1986)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 – 1917 (London: Batsford).

Goldman, M. (1992) *What went wrong with* perestroika? (New York: Norton).

Gomulka, S. (1989) "Shock Needed for the Polish Economy", *Guardian* (London), 19 August.

Gomulka, S. *The theory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London: Routledge).

Goodman, D. (ed.) (1981) *Beijing Street Voices* (London: Marion Boyars).

Gorbachev, M. (1988) *Perestroika* (London: Collins).

Government of India. Planning Commission (1961) *Third Five Year Plan* (New Delhi: Government of India).

Granick, D. (1967) *Soviet metal fabricating* (Madison and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Grossman, G. (1979) "Notes on the illegal economy and corruption", in USCJEC, (1979).

Guo, Jiann-Joong (1992) *Price reform in China*, 1979 – 86 (London. Macmillan).

Guo, Shuqing. *et al.* (1990) "On accumul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Research* (*Jingji yanjiu*), January, no. 1.

Guroff, G. and F. V. Kasteson (eds) (1983) *Entrepreneurship in Imperial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hn, F. (1984) "Reflections on the invisible hand", in F. Hahn. *Equilibrium and macro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lliday, J. (1975)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apanese capitalism*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Handelman, M. (1994) *Comrade Criminal* (London: Michael Joseph).

Hanson, P. (1978) "The import of Western technology", in Brown and Kaser (1978).

Harding, H. (1987)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Hay, D. and G. S. Liu (1992) "Cost behaviour of Chinese state-owned manufacturing enterpises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1979 – 87", Applie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134,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He, Xin (1990) "Scholar discusses democracy and other issues", *Beijing Review*, vol. 33, no. 34, 20 – 26 August.

Heston, A. (1983) "National Income", in Khumar and Desai (1983).

Hicks, G. (ed.) (1990) *The broken mirror* (Harlow, Essex: Longman).

Hinton, W. (1991) *The privatisation of China* (London: Earthscan).

Hirschman, A. (1977) *The passion and the interes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o, Pingti (1959)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and T.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sking, G. (1992)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 – 1991 (London: Harper Collins).

Hoskins, W. G. (1976) *The Age of Plunder*, (Harlow: Longmans).

Hu, Sheng (1955)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Hu, Yaobang (1982)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modernisation",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Hughes, A. (1993)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small firms in the UK: the 1980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Acs and Audretsch (1993).

Hughes, H. (1991) "Constraints on export growth: foreign or domestic?". Mimeo.

Hurd, D. (1990) Speech at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London, 6 June.

IMF (1993) *Russian Federation*, Economic Review, no. 8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1994)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y.

IMF, World Bank, OECD and EBRD (1990) *The Economy of the USSR: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aquemin, A. *et al.* (1989) "Horizontal mergers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uropean Economy*, no. 40, May.

Jefferson, G., T. Rawski and Y. Zheng (1992)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0, no. 2, January 1992, pp. 239 – 266.

Jefferson, G., and Xu Wenyi (1991) "The impact of reform on socialist enterprises in transition: structure, conduct and performance in Chinese industr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5, pp. 45 – 64.

Jiang, Xiaoming (1993) *Property rights an economic reform: A case study of the Hefeng Textile plant in Ningbo*, Cambridge University Doctoral Thesis.

Johnson, C. (1990) "Foreword", in Hicks (1990).

Kagarlitsky, B. (1992)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monolith* (London: Verso).

Kaiser, D. H. (ed.) (1987) *The workers'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nnett, D. and M. Lieberman (eds) (1992) *The Road to Capitalism* (Orlando, Florida: Dryden Press).

Khanin, G. I. (1993a) "The economic crisis in Russia: Possible ways out",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2, pp. 23 – 27.

Khanin, G. I. (1993b) "Russia's economic situation in 1992",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7, pp. 6 – 24.

Khumar, D. and M. Desai (eds) (1983)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selev, S. (1994) "The state and the farmer",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10, pp. 67 – 81.

Kitching, G. (1983) *Rethinking socialism* (London: Methuen).

Korbash, M. (1984) *The economic "theories" of Maois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Kornai, J. (1980) *Economics of shortage*, 2 vol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Kornai, J.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Visions, hopes, and re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4, pp. 1687 – 1737.

Kornai, J. (1990)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Kornai, J. (1992) *The socialist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Kreuger, A. (1992) "Institutions for the new private sector", in Clague and Rausser (1992).

Lake, D. A. (1988) *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l, D. (1983)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ane, D. (1978)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the USSR* (second edition) (London: Martin Robertson).

Lardy, N. and K. Lieberthal (eds) (1983)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Lardy, N. (1983) *Agriculture in Moder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yard, R. (1993) "Stabilisation versus reform? Russia's first year", in Blanchard *et al.* (1994).

Lester, W. (1813) *The happy era of one hundred millions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merchant, manufacturer, and the Englishman's recognised right to an unlimited free trade with India* (no place or publisher).

Levy, M., and Kuo-heng Shih (1949) *The rise of the modern Chinese business class*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Lewin, M. (1975)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 (London: Pluto Press).

Li, K. T. (1988)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London: Shepheard-Walwyn).

Li, Ping (1992) "Price reform the progressive way", *Beijing Review*, vol. 35, no. 18, May 4 – 10.

Li, Renfeng (1981)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Soviet Agriculture* (*Sulian nongye tongji huibian*) (Beijing: Nongye chubanshe).

Li, Yuanchao (1992) "Enterprise groups in China: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trend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ummer, pp. 5 – 15.

Liberman, E. G. (1971) *Economic method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duc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Lin, C (1981) "The reinstatem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today", *China Quarterly*, March, no. 85, pp. 1 – 48.

Lipton. D. and J. Sachs (1990a), "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vol. 1,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2).

Lipton, D. and J. Sachs (1990b), "Privatisation in Eastern Europ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no. 2, reprinted in Kennett and Lieberman (1992).

List, F. (1983) *The natur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1837. (English edition; London: Frank Cas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W. O. Henderson).

Little, I. (1979) "An economic reconnaissance", in W. Galenson (ed.),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Taiwan*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ittle, I. (1982)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u, Guoguang, and Wang Ruisun (1984) "Set-up of production", in Yu Guangyuan (1984).

Liu, Nanchuan, Chen Yichu, and Zhang Chu (1988) *Seventy years of Soviet economic growth*,

(*Sulian guomin jingji fazhan qishi niari*) (Beijing; Jijie chubanshe).

Liu, Shaoqi (1939) "How to be a good communist", in Liu, Shaoqi (1980).

Liu, Shaoqi (1945) "On the party", in Liu, Shaoqi (1980).

Liu, Shaoqi (1980) *Three essays on Party-build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Liu Suinain, and Wu Qing (1986) *China's socialist economy* (Beijing: *Beijing Review*).

Lowe, A. (1965) *On economic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Row).

Lukichna, L. (1993) "On poverty and defining the subsistence minimum",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8, pp. 74 – 85.

Lyons, B. (1992) *China's war on poverty: A case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1985 – 1990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Macmillan, J. and B. Naughton (1991) "How to reform a planned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8, no. 1, pp. 130 – 143.

Macpherson, I. (1987)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c.* 1868 – 1941 (London: Macmillan).

*Major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1 (*Major Document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llory, J. W. (1926)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Mao, Zedong (1949) "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June, in Mao (1971).

Mao, Zedong (1955) "On the coope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July, in Mao (1971).

Mao, Zedong (1959) "Critique of Stalin's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Mao (1971).

Mao, Zedong (1971) *Selected Readings from the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o, Zedong (1977)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Marx, K. (1887) *Capital*, vol. 1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veling and Moore edition, 1967).

Merrill Lynch (1993) *Shanghai Petrochemical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Merrill Lynch).

Miller, J. (1993)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end of Soviet power* (Houndmills: Macmill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1982) (ZGNYJJGY), *Outline of China's agriculture* (*Zhongguo nongye jingji gaiyao*) (Beijing: Nongye chubans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198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China's xiangzhen enterprises*, (*Quanguo xiangzhen qiye tongji zhaiyao*), (Beijing: Xiangzhen qiye b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1989) (ZGNCJJTJDQ) *Statistical Record of China's Rural Economy*, 1949 – 1986, (*Zhongguo nongcun jingji tongji daquan*),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1991) "China's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 of co-operative organisations in China in 1990",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ongye jingji wenti*), no. 8 and 9.

Mo Yan-ren (ed.), (1987)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China).

Morishima, M. (1982) *Why has Japan succeed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urrell, P. (1992) "Evolutionary and radical approaches to economic reform",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 25, pp. 79 – 95.

Myrdal, G. (1956)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Cairo: National Bank of Egypt).

Naughton, B. (1992) "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 *Modern China*, vol. 18, no. 1, pp. 14 – 41.

Naughton, B., 1994,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edham, J. (1954)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edham, J. (1969) *The grand tit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Nefedov, V. (1994) "The agro-industrial complex of the CIS",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7, no. 2, pp. 50 – 62.

Nelson, R. and S. Winter (1982)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iu, Gengying (1994)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1994", *Beijing Review*, vol. 37, no. 2, Jan. 10 – 16.

Nolan, P. (198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Nolan, P. (1993a) *State and market in the Chinese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Nolan, P. (1993b)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eform of Stalinism: The Chinese puzzl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lan, P. (1993c) "The causation and prevention of famine: A critique of A. K. Sen",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 21, no. 1, October.

Nolan, P. (1994a) "Democratisation,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reform: The case of China and Russia", *Democratisation*, vol. 1, no. 1, Spring.

Nolan, P. (1994b) "Economic reform,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Chinese beverage industry", mimeo.

Nolan, P. and Dong Fureng (eds) (1990)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its fu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Nolan, P. and G. White (1983) "Urban bias, rural bias or state bias?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0, no. 3, April.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h, D. C. and R. P. Thomas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e, A. (1968)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Nove, A.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Nove, A. (1994) "Once again on concepts of socialism".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7, no. 2, June, pp. 41 – 49.

OECD (1972)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Paris: OECD).

Office of the Mayor of St Petersburg (1991) *St Petersburg: Business Plan.* Produc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Mayor of St Petersburg by Coopers and Lybrand in association with Scottish Enterprise and the

Leontief Centre of St Petersburg.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eregrine Capital (1993) *Guangzhou Shipyard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Peregrine Capital).

Perkins, D. H. (1968)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 – 1968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erkins, D. H. (ed.) (1977) *China: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rkins, D. H. (1988) "Reforming China's econom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6, June, pp. 601 – 645.

Perlamutrov, V. (1994)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or an economic catastrophe?",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7, no. 2, pp. 24 – 40.

Phelps Brown, H. (1983) *The Origins of Trade Un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pes, L. (1977)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Harmondsworth: Peregrine Books).

Plant, R. (1986) *Equality, Markets and the State* (London: Fabian Society).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Beacon Press).

Popper, K. (1957)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opper, K. R. (1960)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rais, S. J. (1981)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ybyla, J. (1990) "A broken system", in G. Hicks (ed), *The broken mirror: China after Tiananmen* (London: Longman).

Prybyla, J. (1991) "The road from socialism: Why, where, what and how",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L, January-April.

Rakistkii, B. (1994) "The condi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Russia",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10, pp. 32 – 43.

Ranis, G. and T. P. Schultz, (1988) *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Rawski, T. G.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1991)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9, September, pp. 1035 – 1053.

Research Group on Migration and Employment of China's Rural Labour (1989) "The current situation or rural employment in China and prospects",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ongye jingji wenti*), no. 7 (117).

Reynolds, B. (ed.) (1987) *Reform in China* (London: M. E. Sharpe).

Reynolds, L. G. (1985)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 1850 – 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skin, C. (1987)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zinski, W. (198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flections o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1949* (London: Collins).

Rosenberg, N., and L. E. Birdsell (1986) *How the West grew rich* (London: I. B. Tauris).

Rueschmeyer, D., E. H. Stephens, and J.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1961) *Ru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Rural Policy Research Department, Zhejiang Province (1988) "Transfer of rural workforce in Zhejiang",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Nongye jingji wenti*), no. 1 (97).

Sachs, J. and W. T. Woo (1994)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vol. 9, no. 18, April.

Schapiro, J. (1970)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London: Methuen).

Scherer, F. M. and D. Ross (1990) *Industrial marke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thir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Schram, S. (1974)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Schroeder, G. (1979) "The Soviet economy on a treadmill of "reforms"", in USCJEC (1979).

Schroeder, G. (1982) "Soviet economic 'reform' decrees on the treadmill", in USCJEC, (1982).

Schroeder, G. (1983) "Consumption", in Bergson and Levine (1983).

Schurmann, F. (1964)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Transition or beginning? ', *China Quarterly*, no. 17, January – March, pp. 65 – 91.

Schurmann, F.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s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n, A. K. (1981) "Public a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3.

Sen, A. K. (1982)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en, A. K. (1989) "Food and freedom", *World Development*, vol. 17, no. 6, 769 – 81.

Shen, Liren and Dai, Yuanchen (1990) "The formation, shortcomings and origins of "the economy divided by dukes and princes under the emperor"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ingji yanjiu*), no. 3, March.

Shmelyev, N. and V. Popov (1990) *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sing the Soviet economy* (London: I. B. Tauris).

Singh, A. (1993) "The plan, the market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UNCTAD, Discussion Paper, December, no. 76.

Singh, I. (1991) "Is there schizophrenia about socialist reform?",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July-August).

Smith, A. (1976) *The Wealth of 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nnan Edition).

Smith, A. (1993) *Russia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Smith New Court Securities (1994) "What tune is Yeltsin dancing to?", February, Russia/Ukraine/Kazakhstan.

Staley, E. and R. Morse (1965) *Modern small industr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McGraw-Hill).

Starikov, E. (1994) "A bazaar not a market",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7, no. 2, pp. 14 – 23.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4 – 1993) *Chinese Economic Yearbook* (*Zhongguo tongji nianjian*) (*ZGTJNJ*)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4 – 1994) *Statistical Survey of China* (*Zhongguo tongji zhaiyao*) (*ZGTJZY*)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5),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ese industry*, 1949 – 1984 (*Zhongguo gongye jingji tongji ziliao*) (*ZGGYJJTJZL*) (Beiji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5 – 1993) *Chinese Rural Statistical Yearbook* (*Zhongguo nongcun tongji nianjian*) (*ZGNCTJNJ*)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6 – 1993) *Economic statistics on Chinese industry* (*Zhongguo gongye jingji tongji nianjian*) (*ZGGYJJTJNJ*) (Beiji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7)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ese labour and wages, 1949 – 1985* (*Zhongguo laodong gongzi tongjii ziliao*) (*ZGLDGZTJZL*) (Beiji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7)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China, 1950 – 1985* (*Zhongguo guding zichan touzi tongji ziliao*) (*ZGGDZCTZTJZL*) (Beiji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9) *Guang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 (*Guangdong sheng tongji nianjian*) (*GDSTJNJ*) (Guangdo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9)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population* (*Zhongguo renkou tongji nianjian*) (*ZGRKTJNJ*) (Beijing: Kexue jishu wenxian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89)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 China's supply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1949 – 1988* , (*Zhongguo gongxiao hezuoshe tongji ziliao*) (*ZGGXHZSTJZY*) (Beijing: Zhongguo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90) *Jiangsu statistical yearbook, 1990* , (*Jiangsu sheng tongji nianjian*) (*JSSTJNJ*) (Jiangsu: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1990) *Compendium of historical statistical materials 1949 – 1989* (*Lishi tongji ziliao huibian*) (*LSTJZLHB*) (Beijing: Tongji chubans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1991) "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1990". *Beijing Review*, vol. 34, February 22.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various years)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ese labour and wages* (*Zhongguo laodong gongzi tongji nianjian*) (*ZGLDGZTJNJ*) (Beijing: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teinherr, A. (1991) "Essential ingredients for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MOCT-MOST*, no. 3, pp. 3 – 29.

Sterling, C. (1994) *Crime without Frontiers* (Lond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Stem, N. (1989)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vol. 99, September, pp. 597 – 685.

Stewart, F. (1985) *Planning to meet Basic Needs* (London: Macmillan).

Stokes, E. (1959) *The English Utilitarians and Ind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Su, Shaozhi (1988) *Democratisation and Reform* (Notingham: Spokesman Books).

Sung, Shangqing, and Chen Shengchang (1984) "Set-up of production", in Yu Guangyan (ed.) (1984).

Sung, Yingwing (1991) "The reintegration of southeast China", unpublished ms.

Surinov, A. (1994) "How are we living? The dynamics of the population's money income in 1992",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10.

Szamuely, L. (1974) *First models of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Budapest.

Taplina, V. S., T. I. Bogomolova and A. R. Mikheeva (1993) "What should one do with a voucher?", *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vol. 36, no. 7.

Taylor, L. (1988) *Varieties of stabilisation exper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aylor, L. (1994) "Economic reform: India and elsewhe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9, 20 August, pp. 2209 – 2211.

Therborn, G. (1977) "The rule of capital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New Left Review*, no. 103, May-June.

Tian, Yuan (1990) "Prices", in Nolan and Dong (1990).

Tidrick, Gene and Chen Jiyuan (1987) *China's Industrial Reform* (Washingt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nbergen, J. (1964) *Central Planning*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rotsky, L. (1977)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1934.

Twohey, M. (1995)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hD thesis, forthcoming.

United Nations (UN) (199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UNCTAD).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1990 and 1992)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ion for Europe (1993) *Economic Survey for Europe*, 1992 – 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USCJEC (1975) *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76) *Soviet ec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78)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79) *Soviet economy in a time of change*, 2 vol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82a) *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82b) *China under the four modernisation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USCJEC (1986) *China's economy looks towards the year 200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Vogel, E.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de, R.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lker, K. (1965) *Planning in Chinese agriculture* (London: Frank Cass).

Walters, A. (1991) "Misapprehensions on privatis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sights*, vol. 2, no. 1. Reprinted in Kennet and Lieberman (1992).

Walters, A. (1992)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Clague and Rausser (1992).

Wang, F. (ed.) (1988)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s of xiangzhen qiye* (Beijing: Xin shidai chubanshe).

Wang, Hao (ed.) (1990) *Research into economic efficiency in different branche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Zhonguo guomin jingji gebumen jingji xiaoyi yanjiu*) (Beijing: Jingji guanli chubanshe).

Wang, Jiafu (ed.) (1988) *TV Lectures on knowledge of xiangzhen enterprise economic law* (*Xiangzhen qiye jingji falu zhishi dianshi jingzuo*) (Beijing: Zhongguo zhengfa daxue chubanshe).

Wang, Xiaoqiang (1993) "Groping for stones to 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rice reform against the 'Big Bang'". Cambridg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DPET 9305.

Ward, B. and R. Dubose (1972) *Only On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Wardley Corporate Finance (1993) *Ma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 Limited* (Hong Kong: Wardley Corporate Finance).

Weir, F. (1993) "Russia's descent into Latin Americ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Special Number, vol. 28, no. 51, 18 December 1993.

White, G. (ed.) (1988)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East Asia* (London: Macmillan).

Williamson, C. (1960) *American suffrage: from property to democracy*, 1760 – 18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1981a) *China: Socialist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81b) *China: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nex D: *Challenges and achievements in industr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81c) *China: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nex C: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81d),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nex B: *Population Health and Nutri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85)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90) *China: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Industrial Growth under Decentralised Socialis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92a) *Russian Economic Reform: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Structural Chang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92b) *China: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1990*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Bank (1979 - 1994)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WDR*) (Washington, D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 Bank (1994) *Land Reform and Farm Restructuring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nviron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u, Dixin and Wu Chengming, (eds) (1985) *China's Capitalist Sprouts* (*Zhongguo zibenzhuyi mengya*)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Xu, Dixin *et al.* (1982) *China's search for economic growth*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Yakovlev, A. (1993) *The fate of Marxism in Russia*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n, R. (1994) "To reach China's consumers, adapt to Guoq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 - Oct.

Yao, Jianguo (1992) "Experimenting with enterprise groups", *Beijing Review*, May 11 - 17, vol. 35, no. 19.

Yavlinsky, G. *et al.* (1991) *500 Days: Transition to Market*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artially reprinted in Ken net t and Liebermann (1992)].

Yotopoulos, P. (1989) "The (rip) tide of privatisation: Lessons from Chile", *World Development*, vol. 17, no. 5, pp. 683 - 702.

Yu, Guangyan (ed.) (1984)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s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Zaleski, E. (1980) *Stalinist planning for economic growth*, 1933 - 1952 (London: Macmillan).

Zhang, Leying (1991) "Evaluat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of encouraging foreign investment in manufacturing", Londo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Zhao, Renwei (1990) "Income distribution", in Nolan and Dong (eds) (1990).

Zhao, Ziyang (1981) "Principles for future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Zhao, Ziyang (1987) "Advance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ajor Documents* (1991).

Zhdanov (1934) "Soviet literature - the richest in ideas, the most advanced literature", August, in M. Gorky et al., *Soviet Writers' Congress* 1934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Zhu, Ling, and Jiang Zhongyi (1993) "From brigade to village community: the land tenure system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4, December, pp. 441 - 462.

Zong, Huaiwen (1989) *Years of Trial, Turmoil and Triump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索　　引*


Abalkin，阿帕尔金，250
agricultural sector，农业部门
　China，中国农业部门，48，51－52，125，137－150，200－201；
　international economy，国际经济中的中国农业部门，183－184；
　reforms，中国农业部门的改革，191－195；
　results of reform policies，中国农业部门的改革政策的结果，195－200
　Entrepreneurship，中国农业部门的企业家精神，122
　labour force，中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119，125
　latecomer advantages，中国农业部门的后发优势，113，114
　Russia，俄罗斯农业部门，125，137－150，271－275
　experimentation，俄罗斯农业部门的实验，246－247
　transition period，转轨时期的农业部门，92－93
alcohol，Russia，俄罗斯酒，244
Andropov，Yuri，尤里·安德罗波夫，233，244
arbitrage，套利，271
arms race，军备竞赛，42
Aslund，Anders，安德斯·阿斯伦德，23，81，155，251，263，266
asset valuation，资产评估，279
authoritarianism 权威主义，26
　"new"，新权威主义，74，166－167
automobile industry，汽车工业，210－211

bankruptcy，破产法
　China，中国的破产法，215－216
　Russia，俄罗斯的破产法，247，254－255
beverage industry，China，中国的饮料工业，211－212
"Big Leap"，跳跃，55－57
birth control，China，中国的生育控制，179
black market，黑市，122
Boeing，波音，187－188
Borenzstein. E.，伯恩斯坦，76－77
Bukharin，N.，尼古拉·布哈林，172


---

* 索引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Bureaucracy，官僚结构
administrative capacity，官僚机构的管理能力，154－156
professionalisation，官僚机构的专业化，165－166
transition period，转轨时期的官僚机构，58－59，60

Camdessus，Michael，米歇尔·康德苏，287
capital accumulation，资本积累，102－103
China，中国的资本积累，50－51
Russia，俄罗斯的资本积累，17，40
capital flight，Russia，俄罗斯的资本外逃，290－291
capital goods，资本品
China，中国的资本品，10－112，140－141，192
Russia，俄罗斯的资本品，17，141，274
capital markets，资本市场
China，中国的资本市场，214
latecomer advantages，资本市场的后发优势，115－116
censorship，审查制度，29
Central Office of National Accounting，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中央办公室，32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中央统计办公室，3
Centralisation，集中化，46，47
Chartists，宪章派，65
Chen Yun，陈云，31，35，161，172
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34－235
Chernonmyrdin，切尔诺梅尔金，266－267
Chiang Kaishek，蒋介石，163，173
China，中国，302－311
"catch-up" capabilities，中国的赶超能力，110；
economic factors，中国赶超能力中的经济因素，111－152
non-economic factors，中国赶超能力中的非经济因素，153－158
economic performance，中国的经济绩效，10－16，23
economic reform，中国的经济改革，224－229
agriculture，中国农业的经济改革，191－224
decentralisation，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方分权，176－178
economic ideology，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经济观念，167－175
international economy，国际经济视野中的中国经济改革，183－191
population，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人口，178－181
prices，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价格，175－176
savings and investment，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储蓄和投资，182－183
focus of study，关于中国的研究重点，1
need for reform，中国改革的需要，24，52－53
economics，中国改革所需要的经济学，39，45－52
politics，中国改革所需要的政治学，25－26，27－34，35
politics and reform，中国的政治学与改革，160－167
significance of study，关于中国的研究意义，1－2
themes of study，关于中国的研究主题，3－5
transition orthodoxy，中国的正统转轨理论，54
economics，中国正统转轨理论中的经济学，76
politics，中国正统转轨理论中的政治学，70，72
China National Automobile Committee，中国国家汽车委员会，211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中国国家

造船公司，203
Chubais，Anatoly，安那托利·丘拜斯，282
Chuguyevsky，Andrei，安德烈·丘古耶夫斯基，261
civil war，Russia，俄罗斯内战（1917－1921），26
Clarke，Kenneth，肯尼斯·克拉克，287
class conflict，阶级冲突，64－65
class structure and privatization，阶级结构和私有化，105－107
climate，气候
China，中国的气候，136
Russia，俄罗斯的气候，136
Cohen，Stephen，史蒂夫·科恩，240
collective farms，集体农庄，192
size，集体农庄的规模，143－144，145
collectivisation，集体化，31
deaths，集体化的死亡数量，30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
China（CCP），中国共产党
control，中国共产党的控制，70
need for reform，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需要，25－6，27－28，33－34
psychological effects，中国共产党的心理效应，15
Russia，俄罗斯共产党
at centre，位于核心的俄罗斯共产党，261
control，俄罗斯共产党的控制，70
destruction，俄罗斯共产党的瓦解，237－241，245，253
at local level，地方上的俄罗斯共产党，258
need for reform，俄罗斯共产党对改革的需要，25，26－27，28，33，34
competition，竞争，203
Confucianism，儒家思想，153－154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人民代表大会，261－263
conflict with Yeltsin，人民代表大会与叶利钦的冲突，264－265
constitution，Russian，俄罗斯宪法，265，286
consumption，消费
China，中国的消费，12，48－49
Russia，俄罗斯的消费，17－19，41
co-operatives，合作，248－249
corruption，Russia，俄罗斯的腐败，277，279－280
counter-revolutionary revisionists，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33
credit，信用，192－319
crime，犯罪，19，259－261，276－277，289
culture，文化
China，中国文化，15，29－30，33－34，35，161
"catch-up" capabilities，中国文化中的赶超能力，153－154
and education，中国文化和教育，116
Russia，俄罗斯文化，29
"catch-up" capabilities，俄罗斯文化中的赶超能力，154
currency convertibility，货币可兑换性，78
China，中国的货币可兑换性，189
Russia，俄罗斯的货币可兑换性，270

Dasgupta，P.，达斯格普塔，63，67
decentralisation，地方分权，46，47，176－178
defence，国防
China，中国的国防，136
Russia，俄罗斯的国防，42，136
Demand，需求
China，中国的需求，228－229
importance，需求的重要性，104－105
role，需求的作用，314－315
Russia，俄罗斯的需求，273－274
Democracy Wall，Beijing，北京的民主墙，

236
Democratization，民主化
arguments for，民主化的争论，60－64
mass demands for，民主化的大众需求，156－157
problems，民主化的问题，64－74
demography，人口统计学，39－40
Deng Xiaoping，邓小平，35，161，163－166，172
Outlook，邓小平的观点，23，300
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
democracy，发展中国家的民主，66－67
foreign investment，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115
structural change，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86－87
diaspora，离散，112
diet，饮食
China，中国的饮食，142－143，198
Russia，俄罗斯的饮食，20－21，143
Dongfeng Automobile Group，东风汽车集团，210－211
Donnithorne，Audrey，奥德利·东尼索奈，132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经济研究所，34
Education，教育，116－118，145
Efficiency，效率，199
Employment，就业
China，中国的就业，50
Russia，俄罗斯的就业，293－294
engineering skills，工程技术，102
enterprise groups，企业集团，209－211
entrepreneurship，企业家精神，119－123，154
ethical issues，伦理问题
China，中国的伦理问题，225
Russia，俄罗斯的伦理问题，258－259
evolutionary approach，institutional economics，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方法，57
exchange market，外汇市场，189
experimentation，China，中国的实验，168－169
exports，出口
from China，来自中国的出口，10，185，187，216－217
from Russia，来自俄罗斯的出口，260－261，270－271
extra-budgetary revenues，China，中国的预算外收入，177

famine，饥荒
China，中国的饥荒，31，48，160
Russia，俄罗斯的饥荒，31
Fertilisers，化肥
China，中国的化肥，196，197
Russia，俄罗斯的化肥，274－275
fissiparous tendencies，分裂倾向，157－158
Five-Hundred Day programme see Shatalin programme，“500天计划”参见“沙塔林计划”
Floods，洪水，160－161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公司，188
foreign debt，外债
China，中国的外债，184
Russia，俄罗斯的外债，255－256
foreign trade，外贸
China，中国的外贸，188－191
Russia，俄罗斯的外贸，255，270－271，291－292
Friedman，Milton，米尔顿·弗里德曼，61－62
Fyodorov，弗约多罗夫，266

Gaidar，Yegor，叶戈尔·盖达尔，263，266
Galbraith，加尔布雷斯，91
“Gang of Four”，“四人帮”，1，10
gas，natural，天然气，289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

关贸总协定，190－191
geo-political location，地缘政治，111－112
gerontocracy，China，老人政治，中国，161
glasnost，开放（俄），1，233，234－237
Gomulka，Stanislav，斯塔尼斯拉夫·哥穆尔卡，76，83，113
Gorbachev，Mikhail，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communism，overthrow，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推翻，62，63
economic reform，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244，245－246，249－250，251－252，256－257
outlook，戈尔巴乔夫的观点，23
political reform，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1，10，230－242
Gosnab，国家供应委员会，246，247
Gosplan，国家计划委员会，247
Great Leap Forward，大跃进，15，31，45，161
Great Purges，大清洗，30，35
“green” movement，Russia，俄罗斯的绿色运动，42
grey market，黑市，122
Guangzhou shipyard，广州造船厂，211
Guomindang，国民党，14
Gusinsky，Vladiir，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291

Hahn，F.，汉，84－85，89
health，Russia，俄罗斯的健康，19，296－297
heavy industry，重工业，125－127
Hefeng Textile Plant，和丰纺织厂，211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116－118
Hong Kong，香港
economic power，香港的经济力，162
re-exports，香港的再出口，185
Hosking，G.，霍斯金，234－235
Hoskins，W. G.，霍斯金，283
Housing，住宅
China，中国的住宅：
demand，中国的住宅需求，228－229
investment，中国住宅的投资，51
Russia，俄罗斯的住宅，284
human resources，Russia，俄罗斯的人力资源，297－298
human rights，人权，319
China，中国的人权，15－16
Democracy，人权中的民主，60－61，73－74
Russia，俄罗斯的人权，22－23
Hungary，匈牙利
market socialism，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75－76，88
New Economic Mechanism，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55
reform “from above”，匈牙利的来自上面的改革，62

illiteracy，文盲，145
Ilyutkin，Viktor，维克多·爱里有特金，280
import substitution，进口替代，190
imports，进口
to China，中国的进口，217
technology，中国进口中的技术，137
to Russia，俄罗斯的进口，270
technology，俄罗斯进口中的技术，137
income distribution，收入分配，317
China，中国的收入分配，13－14，199－200
Russia，俄罗斯的收入分配，21，295－296
incomes policy，收入政策，69
India，印度
democracy，印度的民主，66－67
diaspora，印度的离散，112
economic performance，印度的经济绩效，11，12

economic reform，印度的经济改革，84
nationalism，印度的民族主义，71
world economy，世界经济中的印度，77－78
industrial sector，工业部门
China，中国的工业部门，48，51－52，124，125－137
politics，中国工业部门的政策，201－218
results of reform，中国工业部门的改革结果，222－224
rural non-farm enterprises，中国工业部门中的农村非农企业，218－222
Russia，俄罗斯的工业部门，123－124，125－137
self-financing，俄罗斯工业部门中的自筹资金，246
structural reform，工业部门的结构改革，97－102
industrialisation，工业化，64－65
inequality，不平等
China，中国的不平等，13－14
Russia，俄罗斯的不平等，21
infant industries，幼稚产业
protection，幼稚产业保护，315－316
transition period，转轨时期的幼稚产业，59－60，105
infant mortality，婴儿死亡率
China，中国的婴儿死亡率，49
One Child Family Campaign，中国一个家庭一个孩政策中的婴儿死亡率，15
Russia，俄罗斯的婴儿死亡率，42
Inflation，通货膨胀
China，中国的通货膨胀，152，226
Russia，俄罗斯的通货膨胀，152，285－288
Innovation，创新，136
insider dealing，内部交易，93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国际金融研究所，290－291
international economy，国际经济
China，中国的国际经济，183－1891
Russia，俄罗斯的国际经济，248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国际金融公司，27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86－28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关系，42，263－264
inter-republican trade，collapse，共和国之间的贸易萎缩，284－285
inventories，存货，39
investment，投资
China，中国的投资，51－52，111－112，182－183
agriculture，中国的农业投资，147
foreign，中国的外国投资，184－188
industry，中国的工业投资，201，203
Foreign，外国投资，63，70，114－115
Hungary，匈牙利的外国投资，88
Russia，俄罗斯的投资，40，112，244，291
agriculture，俄罗斯的农业投资，147
foreign，俄罗斯的外国投资，288－291
“invisible hand”，看不见的手，84－85
Irrigation，灌溉，141，148，192，196

Japan，日本
agricultural yields，日本的农业产出，141－142
capital goods industries，日本的资本品工业（生产资料工业），102
Japanese occupation of China，日本占领中国，14－15，162
Jefferson，G.，杰弗逊，224
Jinxing Electrical Appliance Group，金星电器集团，210
joint ventures，合资企业
China，中国的合资企业，185

Russia，俄罗斯的合资企业，248，260

Kang Youwei，康有为，163
Kashin，卡申，32
Khandruyev，Alexander，亚历山大·安德鲁耶夫，285
Khanin，Grigorii，格里高利·卡宁，17，19，252，291，292，294
Khrushchev，Nikita，尼基塔·赫鲁晓夫，43
Kirov Engineering，基洛夫工程，129－130
Kornai，Janos，雅诺什·科尔奈，55，58，62－63，75－76，174，250，253
Kritsman，克里茨曼，37－83
Kronstadt uprising，喀朗斯塔得起义，27
Kudrin，Alexei，阿列克谢·库德林，288
Kumar，M.，库马尔，76－77

labour force，*劳动力*
  China，中国的劳动力，215
  democracy，劳动力民主，68－69
  education，劳动力教育，116－118
  growth，劳动力增长，144
  motivation，劳动力激励，119
  skill level，劳动力技能水平，144－145
latecomer advantages，后发优势，112－115
Layard，Richard，理查德·雷亚德 263，269，276，285－286，289
leadership，Russia，俄罗斯的领导层，44
Lee Kuanyu，李光耀，163
Lester，W.，莱斯特，84
Levy，M.，列维，153－154
Li，K. T.，李国鼎，173－174，190
Li Xiannian，李先念，161
Liang Qichao，梁启超，163
Liberman，E. G.，利伯曼，31，32
life expectancy，预期寿命
  China，中国的预期寿命，15，16
  Russia，俄罗斯的预期寿命，16，296
Ligachev，利加乔夫，245
Lin Biao，林彪，35
Lipton，David，戴维·利普顿，80，81，263
liquidationist view of economics 经济学的虚无主义者观点，31
List，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3
Liu Guoguang，刘国光，168
Liu Shaoqi，刘少奇，27－28，35
living standards，生活水平，73－74
  China，中国的生活水平，12，13，119
  Russia，俄罗斯的生活水平，41－42，119
lumpy farm input，大型农场投入设备（灌溉），147，150

Maanshan Iron and Steel Company，马鞍山钢铁公司，203
mafia，黑手党，259－260，261，277
manufacturing sector，制造部门，81－82，97－101
  employment distribution，制造部门的就业分布，131
Mao Zedong，毛泽东
  cultural revolution，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33，34
  death，毛泽东逝世，1，10
  dictatorship，毛泽东执政，28
  economic problems，毛泽东时期的经济问题，45－46
  ridicule of comrades，毛泽东对同志们的异议，239
market socialism，市场社会主义，75－76，88
marketing，销售，194－195
marriage，average age of，平均结婚年龄，179
Marx，Karl，卡尔·马克思，282－283
mass demands for political reform，政治改革的大众需求，156－158
mass line，群众路线，45
material supply，物质供应，202－203
May Day Parade（1990），五一劳动节阅兵

(1990), 236 -237
media, 媒体, 72
migration, 移民
China, 中国的移民, 180 -181
Russia, 俄罗斯的移民, 297 -298
Miller, J., 米勒, 156, 232 - 233, 234, 237 -238, 239, 240
Ministry of Light Industry, 轻工业部, 211
minority groups, 少数民族, 157 -158
mortality rates, 死亡率
China, 中国的死亡率, 12, 15, 16
Russia, 俄罗斯的死亡率, 16, 22, 41 - 42
motivation, labour force, 劳动力的激励, 119
motorcycle industry, 摩托车工业, 204 -205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跨国公司, 115
multi-piant firms, 多工厂企业, 98 -100
China, 中国的多工厂企业, 209 -212
Multiple Cropping Index, 复种指数, 141
murder rate, 谋杀率, 19, 259

national income, 国民收入
China, 中国国民收入, 47, 48
Russia, 俄罗斯国民收入, 17
national power, strategic pursuit, 追求综合国力的战略, 161 -163
nationalisation, Russia, 俄罗斯的国有化, 35, 36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China, 中国的民族主义, 225
and democracy, 民族主义与民主, 70 -71
Russia,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241 -243
natural gas, 天然气, 289
natural resources, 自然资源, 150 -151
Naughton, B., 巴里·诺顿, 224
Nemchimov, 涅姆钦诺夫, 31
New Economic Policy, 新经济政策, 25
New Thinking, 新思维, 229 -231, 232, 233
newly industrialising countries, 新兴工业化国家, 65 -66
Nikonov, 尼科诺夫, 233
non-farm sector, 非农部门
China, 中国的非农部门, 218 -222
Russia, 俄罗斯的非农部门, 275 -284
Nove, Alec, 阿历克·诺夫, 295
Novozhilov, 诺沃日诺夫, 31

oil, 石油, 260 -261, 289
One Child Family Campaign, 一个家庭一个孩运动, 15
Opium Wars, 鸦片战争, 14
organised crime, Russia, 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 259 -261, 277, 289
output, 产出
China, 中国的产出, 10 -12, 47 -48, 51 -52, 175, 198 -199
Russia, 俄罗斯的产出, 17, 18, 19, 40, 292 -293
over-industrialisation, 过度工业化, 123 -124

Panda Electrical Appliance Group, 熊猫电器集团, 210
Pavlov, Valentin, 瓦连京·帕夫洛夫, 250
peace dividend, 和平红利, 136
Peel, Quentin, 昆廷·皮尔, 242
Peony Electrical Appliances Group, 牡丹电器集团, 210
perestroika, 改革(俄), 10, 232, 234 -236
backlash, 改革的后退, 251, 253
persecution, 迫害, 30
planning, 计划, 312 -313
China, 中国的计划, 45 -52, 167 -8
goals of, 计划目标, 36 -38
importance of, 计划的重要性, 4
Polanyi, K. 卡尔·波兰尼, 64 -65
policy-making, 决策
China, 中国的决策, 174
importance of, 决策的重要性, 3

Politburo，政治局，25
politics，importance in economic transition，政治学中经济转轨的重要性，4－5
pollution，Russia，俄罗斯的污染，42
Popov，Gavril，加夫里尔·波波夫，279－280
Popper，Karl，卡尔·波普尔，56－57，311
Population，人口
China，中国的人口，1
agricultural，中国的农业人口，138－140，144
control，中国的人口控制，151－152
growth，中国的人口增长，178－180
migration，中国的人口迁移，180－181
Russia，俄罗斯的人口，1
agricultural，俄罗斯的农业人口，138，144
Poverty，贫困
China，中国的贫困，12－13，14，49－50，199－200
Russia，俄罗斯的贫困，19，20－21，296
Prices，价格
China，中国的价格，175－176，195
Russia，俄罗斯的价格，269
transition period，转轨时期的价格，69，79－80，96－97
primitive accumulation，原始积累，282－283
prison camps，战俘集中营，30
private sector，私人部门
China，中国的私人部门，174－175
agriculture，中国农业中的私人部门，148－149
Russia，俄罗斯的私人部门，248
agriculture，俄罗斯农业中的私人部门，148－149
Privatisation，私有化，7－9，93－96
China，中国的私有化，215
and class structure，私有化与阶级结构，105－107
Russia，俄罗斯的私有化，21
non-farm sector，俄罗斯非农部门的私有化，275－284
production，生产，205－209
production teams，生产队，143
property rights，产权
China，中国产权，212－215
and democracy，产权与民主，61－2，65
Russia，俄罗斯产权，78－79，271－272
co-operatives，俄罗斯的产权合作，249
transition period，转轨时期的产权，59
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
China，中国的保护主义，190－191
infant industries，幼稚产业的保护，315－316
Russia，俄罗斯的保护主义，270－271
Prybyla，J.，普瑞比纳，76
Psychology，心理
China，中国的心理，14－15
Russia，俄罗斯的心理，19－20，297
public sector，公共部门，174－175
Pyatokov，皮达科夫，37

Qing government，清政府，160
Quotas，配额，270

raw materials，原材料，150－151
Russia，俄罗斯的原材料，260－261
Reagan，Ronald，罗纳尔德·里根，42
rectification movements，纠正行动，30
reform policies，改革政策，5－6
regional growth，China，中国的地区增长，223
relative prices，相对价格，195
research institutes，研究机构，201－202
resources，资源
natural，自然资源，150－151
Russia，俄罗斯的自然资源，260－261
wasted，浪费的资源，147
Reynolds，B.，雷诺兹，89

risk assessment，风险投资，230
Russia，俄罗斯，302－311
“catch-up” capabilities，俄罗斯的赶超能力，110
economic factors，俄罗斯赶超能力中的经济因素，111－113，116－130，135－152；
non-economic factors，俄罗斯赶超能力中的非经济因素，153－157
economic performance，俄罗斯的经济绩效，16－23
focus of study，俄罗斯的研究重点，1
under Gorbachev，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俄罗斯
economics，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俄罗斯的经济学，243－257
politics，戈尔巴乔夫统治下的俄罗斯的政治学，230－243
need for reform，俄罗斯对改革的需要，24，52－53
economics，俄罗斯需要改革的经济学，35－45
politics，俄罗斯需要改革的政治学，25－35
as Russian Federation，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257，298－301
economics，作为联邦的俄罗斯的经济学，268－298
politics，作为联邦的俄罗斯的政治学，258－268
significance of study，俄罗斯的研究意义，1－2
themes of study，俄罗斯的研究主题，3－6
transition orthodoxy，俄罗斯的正统的转轨理论，54
economics，俄罗斯正统转轨理论中的经济学，77
politics，俄罗斯正统转轨理论中的政治学，69－70
Ryzhkov，雷日科夫，245，250
Sachs，Jeffrey 杰弗里·萨克斯，80，81，174，263，266，269
savings，China，中国的储蓄，182－183，192－193
Schevardnadze，Edvard，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245
science，科学，201－202
scientific personnel，科技人员，117－118
self financing，自我融资，246
self-sufficiency，自给自足，38，131－132
service sector，服务部门，125
contracting out，服务部门的外包，98
Russia，俄罗斯的服务部门，246，292－293，294
Shanghai Petrochemicals，上海石化，203
Shatalin programme，沙塔林计划，58，77，78－79，82，251
Shchekino experiment，晓基诺实验，244
“shock therapy” economics，休克疗法经济学，75－83
Shostavkovich，肖斯塔科维奇，29
Siew，Vincent，萧万长，66
Singapore，新加坡，161
Size，规模
Country，国家的规模，115
establishments，China，中国公司的规模，204－205
skill level，labour force，劳动力的技能水平，144－145
small businesses，小型企业，81－82，92
social capability，社会能力，113
Soskovets，索斯科韦茨，299
South Korea，韩国
economic power，韩国的经济力量，161
growth，韩国的增长，65－66
Special Economic Zones，经济特区，245
stabilisation package，稳定的一揽子计划，

75，86－87
stability，稳定
political，政治稳定：
China，中国的政治稳定，160－161，224
and economic advance，政治稳定与经济进步，71－72
Russia，俄罗斯的政治稳定，239
social，社会稳定，200
Stalin，Joseph，约瑟夫·斯大林
culture，斯大林时期的文化，29
Great Purges，斯大林的大清洗，34－35
Star Wars strategy，星球大战战略，42，44－45
state enterprises，Russia，国有企业，俄罗斯，247
State Property Fund，国有基金，277
stock market，股票市场
China，中国的股票市场，214
and privatisation，股票市场与私有化，79
strategic goods，战略物资，270
structural adjustment package，结构调整一揽子计划，75，86－87
Su Shaozhi，苏绍智，155
Sun Yatsen，孙中山，163
Sun Yefang，孙冶方，31
supply，China，中国的供给，226－227

Taiping Rebellion，太平天国运动，160
Tariffs，关税
China，中国的关税，190
Russia，俄罗斯的关税，270
Taylor，Lance，兰斯·泰勒，86－87
technical personnel，技术人员，117－118，144－145
technical progress，技术进步
China，中国的技术进步，135－137，185
Russia，俄罗斯的技术进步，41，135－137，244
Thatcher，Margaret，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arms race，撒切尔夫人时期的军备竞赛，42
democracy，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民主化，73
free market virtues，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自由市场美德，85
leadership，Soviet，撒切尔夫人与苏联的领导层，161
privatisation，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94，95
Third Front policy，三线政策，131－132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26，62－63
trade and geo-political location，贸易与地缘政治，111
transport，China，中国的交通，31
trickle-down effects，扩散效应，317－318

undervaluation of assets，资产低估，279
unemployment，Russia，俄罗斯的失业，22－23
disguised，俄罗斯的隐性失业，125
Unified Energy System，统一能源体制，290
United Kingdom，联合王国（英国）
free market virtues，英国的自由市场美德，85
industrialisation，英国的工业化，64－65，86
large firms，英国的大型公司，98
privatisation，英国的私有化，94，9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美国）
agriculture，美国的农业，145，146
large firms，美国的大型企业，98
nationalism，美国的民族主义，70－71
property qualifications，美国的财产资格，65
social sciences，美国的社会科学，231－232，243

valuation of assets，资产评估，279
value，law of，价格法律，31
Varzegis，Gabor，哈博·罗内，106－107
vertical integration，垂直一体化，128－129
Vietnam，越南，70
Voronin，沃罗宁，247

voucher system of privatisation，私有化凭单付款制度，94，280－281

wages，工资
China，中国的工资，215
Russia，俄罗斯的工资，244
Waigel，Theo，特奥·魏格尔，287
Walters，Alan，阿兰·瓦尔特，94
Wanbao Electrical Appliances Group，万宝电器集团，210
War Communism，战时共产主义，25
Warlords，军阀，14
Weber，Max，马克斯·韦伯，153
welfare indicators，福利指标
China，中国的福利指标，12
Russia，俄罗斯的福利指标，19
worker/manager buy-outs，工人/经理全面收购，277－278
Workers' Opposition，工人反对派，25
working class，工人阶级，64－65
world economy，full integration into，融入世界经济的完全一体化，77－78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世界贸易组织，190

Yakovlev，Alexander，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231，232，241
Yang Shangkun，杨尚昆，161
Ye Jianying，叶剑英，161
Yeltsin，Boris，鲍尔斯·叶利钦
Agriculture，叶利钦时期的农业，272
conflict with Congress，叶利钦与议会的冲突，264－265
election，叶利钦时期的选举，262－263
export licences，叶利钦时期的出口许可证，260
international trade，叶利钦时期的国际贸易，270
organised crime，叶利钦时期的组织犯罪，261
price reform，叶利钦的价格改革，269
privatisation programme，叶利钦的私有化计划，275
"shock therapy" transition，叶利钦的"休克疗法"转轨，266，267，268－269
Yi He Tuan（Boxer），义和团，162
yields，Russia，俄罗斯的生产量，137－138

Zhao，Ziyang，赵紫阳，35，245
Zhdanov，日丹诺夫，29
Zhirinovsky，Vladimir，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266，297
Zhou Enlai，周恩来，35

# 译　后　记

英国剑桥大学的罗澜教授是世界一流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国和苏联的制度变革比较，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型企业的改革以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发展等。《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衰落》一书英文版早在 1995 年问世，但一直没有中译本。有些人可能读过英文原著，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一本中译本可能更方便于分享罗澜教授的成果。恰好，为了推动中外学术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推出了“社会经济史译丛”，该译丛的主编是龙登高教授，这为将《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衰落》英文版翻译成中文提供了契机。

因李伯重先生的推荐，这本书成为该译丛中的一员。并因李伯重先生与萧国亮先生的牵线搭桥，让我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译者。特别是李伯重先生，他与罗澜教授相交甚好，特意向他举荐我，而事后又多次联系罗澜教授，与其商讨有关事宜，并给我提供样书和文稿，这为本书翻译的顺利完成以及稿子的修订创造了条件。萧国亮先生是我的恩师。他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之一。对于我，他无时无刻不挂记在心。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赵琼编辑为该书的出版也费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对某些翻译的不当之处进行更正和修改。在此，向李伯重先生、萧国亮先生、龙登高教授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的赵琼编辑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首先，对于中俄经济发展道路比较来说，本书提出了一系列有深度和值得思考的观点。比如，罗澜认为，中国转轨成功的原因在于保持了一个强有力的和自主的政府，这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协调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改革，维护社会环境的稳定。另外，对于西方世界的建议，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吸收但不听之任之的态度，坚持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而俄罗斯则完全听从于西方的所谓正统的转轨经济学理论。这些观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一些问题也越发凸显。比如，腐败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依靠什么方式来加以解决，如何在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进一步和谐，政治进一步文明，这些仍需要当代中国学者深入思考。译者也认可罗澜教授的观点。译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建基于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五千年的文明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复兴的持久和不竭动力。总之，罗澜教授的著作及其观点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其次，本书展示了作者研究视野的宏大和研究手段的细腻。他在追寻中国和俄罗斯的体制和政策选择上的差异时，没有局限于某一方面，而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视角进行发问。之后又分门别类加以回答，加以细化。比如，分析俄罗斯改革的经济方面特征时，就从战略、价格自由化、国际贸易、农业、非农部门的私有化、房屋、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通胀等多个角度来加以厘定与考证。数据之翔实、论证之严密，都是值得当代中国青年学者学习的。正是由于其广博的视野和细致深入的分析，才让人觉得作者的分析头头是道、鞭辟入里。既没有大而化之，也没有精耕于细部而不能高瞻。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另外，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提供了诸多启示。译者认为，比较方法是深化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的一个

重要角度。俗语讲，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历史研究要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就不能抛弃比较。如果目光仅是盯住一个国家，不把这个国家放置在一个世界和历史情境中，那么一方面我们在理解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候本身或许就会出现错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不清这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共性和个性，我们也不能理解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动力，这一动力甚至可能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罗澜教授虽然不以“史”见长，但其从历史比较角度分析经济问题的做法却为经济史研究做出了榜样。

罗澜教授的这部著作行文非常流畅，通俗易懂。但对我来说，翻译本书仍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英文著作。而且从初中开始到大学所学的外语一直都是俄语，英语是后来自学的。尽管现在的英语要远远好于俄语，但面对这部著作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打鼓。幸好，我北京大学的师妹张越艳、雷蕾为我提供了帮助，她们帮我翻译了部分章节的初稿。这些初稿让我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并且给了我不少启发，在此，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还有一位朋友，他也在我翻译的过程中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让我能更好地理顺句子，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对他也致以谢忱。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妻子韩锋，是她的默默支持让我有信心完成此事。

当然，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翻译上一定还存在诸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隋福民

2011 年 11 月 20 日于北京